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我的父亲贝利亚

[乌克兰] 谢尔戈·贝利亚 著

МОЙ ОТЕЦ-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新华出版社

我的父亲贝利亚

[乌克兰] 谢尔戈·贝利亚 著
王志华 徐延庆 刘玉萍 译
徐葵 校

МОЙ ОТЕЦ–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贝利亚/(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著;王志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名原文: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ISBN 7-5011-5122-9

Ⅰ.我… Ⅱ.①谢…②王… Ⅲ.传记文学-俄罗斯-现代 Ⅳ.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709 号

京权图字:01-2000-4165 号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我的父亲贝利亚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著

王志华 徐廷庆 刘玉萍 译

徐 葵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插页 10 张 37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22-9/D·811 定价:28.00 元

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决

徐葵

谢尔戈·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是关于他的父亲贝利亚、他自己和他经历的苏联那个时代的一部回忆录，它把我们带回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那段复杂、曲折、矛盾重重而尖锐的历史中去。

拉夫连季·贝利亚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是斯大林周围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经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19大后曾改为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联元帅。可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4个月，在贝利亚本人还只有54岁的时候，他突然遭到逮捕，并以叛国罪、为外国资本的利益进行的反国家罪被执行极刑——处决 。直到90年代初的近40年来在苏联老百姓中贝利亚这个人或者早就已被淡忘了(特别在年轻人中)，或者只留下了是个叛徒和恶棍的形象。在我国，赫鲁晓夫的名字因为有过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的大论战和在“文革”中抓过“中国的赫鲁

晓夫”，倒是家喻户晓的，而贝利亚这个人则已像消散的历史烟云一样早已没有人再去注意了。

今年初我曾请来了一位对国际问题包括俄罗斯问题颇感兴趣的大学生帮助我修理计算机，我指着正在校对的这本书问他知不知道贝利亚这个人，他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过去从未听说过。对我国青年人来说，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终究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当年发生的那场来得十分突然的激烈斗争离开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不过对年愈七旬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贝利亚事件还是在脑子里刻下了难以遗忘的痕迹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自己 1953 年得知这个事件时的状况。那时我的思想中还是真心实意地把苏联看作是我们的伟大榜样，自觉自愿地崇拜着全世界人民的英明伟大领袖斯大林，用今天的话说还是心甘情愿地当着个人迷信的“奴隶”。我为 1953 年 3 月 5 日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逝世而沉痛悲伤之余才 4 个月，突然从报上看到苏联共产党中央挖出了一个在斯大林身边埋藏了如此深的大叛徒，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莫大的震惊。自叹自己阶级斗争的灵感太差，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精髓还非常遥远，这就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

为了帮助自己的回忆，我特意从图书室借来了 1953 年 7 月和 12 月的《人民日报》合订本来重温一下这段经历。打开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一看，赫赫在目的果然是以《苏联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开除叛徒贝利亚出党》的大字为标题的头版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就是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贝利亚的职务和将他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的决议。第三条是关于苏共莫斯科州和市委员会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热烈拥护苏共中央决定的报道。左边上下通栏(当时报纸还是直排的)则是苏联《真理报》7月10日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次日,7月12日,左边上下通栏发表了表明我们党对此事的态度的《人民日报》社论:“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社论中指出叛徒贝利亚利用了斯大林逝世后帝国主义反苏活动猖狂的条件,暴露了野心家面目,企图进行夺取权力的冒险活动。社论号召我们要从苏联共产党对叛徒贝利亚的揭露和制裁中吸取重大的政治教训。到那年年底,《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18日也是在头版发表了“关于贝利亚叛国案件苏联最高检察署侦讯完毕苏联最高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案件”的长篇报道。大家当时知道贝利亚已被处决。此案既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的同声声讨和一致决定,又有苏联最高检察署的侦讯和最高法院的法律判决,还有全苏党的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贝利亚的叛徒、恶棍的罪名不是已经盖棺定论,哪还会有错?总之,我当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之后近40年中,由于经历了中苏的大论战和分裂,我虽然也知道了苏联出版的党史上有不少不真实的东西,但始终还没有触动过贝利亚案件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只是在90年代上半期看到过俄罗斯报纸上一篇文章说过贝利亚在苏联研制核武器方面的贡献,我心中闪过一

个问号：为国家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会是叛徒吗？后来看了我国的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也曾联想到贝利亚的外国间谍罪名是否也有可能是当时党的组织派他打进敌人阵营而后有关证人又不予承认呢？不过这些问题也只是闪了一下而已，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机会把贝利亚其人其事作为苏联的一个历史问题来研究一下。

这次为了校对这本书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在阅读和校对过程中可以说深深地被谢尔戈·贝利亚在书中提供的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和内容所吸引，这本书好像给我展现了我40年前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而看不到和看不清的一幅令人震撼和悲叹的、也颇为发人思考的历史画卷。这本书的原著是在1994年出版的，算起来正是作者70岁那一年。看来这是他在接近古稀之年经过痛苦的深思，回顾他父母亲和他自己的一生，以及他所经历的苏联的历史变迁，倾注了全部心血而写出来的，想把他知道的一切都摆在读者面前，希望读者能看到历史的复杂的实际情况。

但是我在校对过程中也曾有过一点疑虑：作者一生在科技领域工作，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是否有可能接触到有关的许多政治文件；他在家庭中同他父亲虽有很多接触，但除了在家中所谈之外是否有可能了解他父亲更多的情况；父子之情是否容易使他看到他父亲的正面多，而看到他的负面少。正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俄）津科维奇著的《元帅和总书记》一书，其中第三部写的就是《贝利亚的一百天和整个一生》，还得到了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俄)姆列钦著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其中有两章写的也是贝利亚，即第五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和第九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两位作者与贝利亚一家既不沾亲又不沾故，他们的叙述和评论应是比较客观的。于是我仔细把这两本书中的叙述和分析同谢尔戈的书作了对照，结果发现这三本书对贝利亚的看法在基本点上几乎都是一致的。这样我心中的疑云也就消散了。

谢尔戈的书与其他两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三本书总的都对贝利亚作了比较高的肯定评价。谢尔戈写道："我敢预言：……他(贝利亚)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族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身的苏维埃时代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津科维奇写道："假如历史地、确切地说，贝利亚……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姆列钦写道：在克格勃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采的人物。虽然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近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或者说，出现在今天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要政治家。"

第二，三本书都认为给贝利亚定的罪名都是缺乏根

据和不能成立的。例如：

1、说贝利亚早年在阿塞拜疆投靠过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木沙瓦特间谍组织，没有证据。相反，有材料证明是党组织派他进去的。

2、说贝利亚是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是大规模清洗和镇压的罪魁祸首，这与事实不符。贝利亚到莫斯科出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在1938年8、9月间，那时斯大林搞的大规模镇压高潮已经过去。不能把前面的帐都算到贝利亚头上。他在任时镇压机器虽仍在转动，但他确实也纠正了克格勃机关的一些违法行为，他上任后被捕和被镇压的人有很大减少。

3、说贝利亚企图投靠帝国主义叛国，没有事实证据。三位作者都用事实说明了贝利亚对苏联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的巨大贡献，都认为很难想象一个想投靠帝国主义和叛国的人会为增加苏联的国防力量而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4、说贝利亚是个没有文化的粗鲁人，也不符合事实。贝利亚爱好音乐，喜欢绘画，兴趣广泛。莫斯科加加林广场大街两边的两栋在建筑设计上至今备受称赞的大楼当年是按贝利亚提出的设计方案设计的。

第三，三位作者都认为贝利亚曾提出过很多改革思想，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的立论根据就是现在俄罗斯已经解密公开的苏共中央的许多文件，包括1953年苏共中央专门为批判贝利亚而举行的7月全会的全部速记记录以及贝利亚档案中他早年自己写的履历材

料等。特别是津科维奇的那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对那次中央全会上米高扬、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许多中央委员对贝利亚的声讨发言的剖析、整理和综合。谢尔戈和姆列钦的书也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引用了这些文件材料。他们据此提出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应该有权利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他提出的改革思想比80年代中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思想早了30年。三位作者列举的贝利亚的改革思想有以下一些：

1、是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个人迷信。米高扬在全会上批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要反对个人迷信”，就是这一点的有力证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即提议不要在群众节日游行时举政治局领导人的像，政治局接受了他的意见，所以1953年五一节莫斯科群众游行时就没有举领导人像，贝利亚被捕后苏联又恢复在游行时举领导人像。

2、贝利亚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业农业等经济问题要让政府去管，党不要多插手。他在斯大林生前就有这个主张，斯大林去世后更强调这一点。为此他在全会上被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

3、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就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是他终止了所谓的“反革命医生案”，并发起组织了苏联1953年的大赦，从集中营和流放地释放了大批被判刑的轻微罪犯、儿童和妇女。为此他在全会上被批判为乱放刑事犯，有意识地破坏国家政局稳定。

4、贝利亚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

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能搞集体农庄。为此被批判为阴谋破坏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

5、贝利亚主张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上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多用地方民族干部，不要到处派俄罗斯族干部当第一把手。为此他被批判为破坏苏联民族政策。

6、贝利亚第一个提出苏联防御性炸弹已够多了，主张战后要缩减军费，多发展经济。

7、贝利亚主张修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贝利亚战时在铁托的营地受德军围剿时曾派飞机救过铁托，与兰科维奇也有过交往。他在全会上因主张与南斯拉夫修好关系而被批判为同铁托早有勾结。

8、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认为两个德国的统一不可避免，对苏联最有利的做法是争取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还认为在东德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东德与西德长期分裂对苏不利，苏联长期在那里驻军花费太大，苏联不宜背上这个包袱。

根据这三位作者的上述分析和论证，可以得出结论：赫鲁晓夫等人加给贝利亚的叛国罪是莫须有的，但贝利亚与他们之间在政策与政见上的分歧则是分明存在的。

这三本书的作者只在对贝利亚的错误的评价上有所不同。谢尔戈在他的书中承认他父亲也是有错误的，但在谈到强迫民族迁移、在卡廷杀害波兰军官的悲剧和1939到1941年那几年苏联国内镇压行动等问题时，谢尔戈认为更多的责任是在党的上层，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津科维奇等则认为贝利亚也有较大

的责任，他还引用了贝利亚在强迫民族迁移上写给斯大林的几份电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有这类评价上的不同，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

看了这本书，我想在回顾苏联的这段历史时，我们头脑中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苏共领导集团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来解决内部政见分歧？谢尔戈对苏联官方报道的贝利亚的被捕、受审和处决的情况是否真实，是存有疑问的。这些我们且不去管它。就按津科维奇根据当时《消息报》的报道作的分析，当时对贝利亚的审判和处决也是采用了苏联历史上最严厉的程序。这个程序是1934年12月1日为判处刺杀基洛夫的恐怖分子凶手而颁布的，规定审判可没有旁听，宣判后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1934年12月对刺杀基洛夫案的凶手尼古拉耶夫等是按此程序处决的第一批人。55年之后，此案当时被枪决的14人中，除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一人外，其他13人都平了反。贝利亚则是苏联历史上按此程序处决的仅有的第二个人。时隔近20年，对一名昨日共事的同志和虽有错误但也有很大功绩的国家领导人，为何要如此残忍、凶狠？

谢尔戈在他的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这是因为贝利亚看到斯大林留下的许多问题，建议召开一次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形势，总结经验和谈谈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人大家的责任，用我们中国人的通俗语言来表述，贝利亚当时似乎有点“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想法。可谢尔戈认为，正是这一点触动了苏

共党的上层权势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对贝利亚必欲除之而后快。谢尔戈还提出了民族因素的作用，他觉得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之后再也不能让第二个格鲁吉亚人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新鲜的观点，可为我们研究苏联的民族关系打开一些思路。

谢尔戈和其他两位作者对问题的回答没有到此为此。他们还联系到了后来苏联发生的党内斗争。事实上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发展的历史来看，贝利亚案件只是一个开端。1953 年同赫鲁晓夫团结一致站在一起整倒了贝利亚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到 1957 年不是也站到了“反党集团”的被告席上吗？而 10 年之后，到 1964 年 10 月，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不是也被迫因“健康原因”而辞职下野了吗？所不同的是贝利亚掉了脑袋，而赫鲁晓夫还被允许去过他的孤独的领养老金生活。他们还把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被处理过程作了一些有趣的对比。1953 年 6 月因东德出事贝利亚被派去处理此事，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在莫斯科“策划于密室”之时。等到贝利亚回莫斯科是米高扬到机场迎接，通知他第二天到克林姆林宫开会，结果在会上即遭逮捕。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休假，这也正是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在莫斯科“策划于密室”之时，他们让同一个米高扬打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开政治局会议，结果赫鲁晓夫就在会上丢了乌纱帽。

我们循着这条线索再往下看还可发现，贝利亚和赫

鲁晓夫下场的阴影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并未到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消失。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的勃列日涅夫传中说勃上台初期经常担心自己是否会遭遇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后来在他拿掉了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并营造了他的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摩尔达维亚帮后才稳坐了18年，但却使国家付出了陷入停滞的沉重代价。直到苏共的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下台的阴影仍然跟随着他，俄罗斯有不少回忆文章描绘了戈尔巴乔夫也时常担心着自己权力的宝座塌陷的心情。这里人们恐怕不禁要问，为什么苏共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党在列宁之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正常地、文明地解决党内不同政见的民主与法治的体制与程序，总是靠少数几个人"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式的方式来处理权力交接问题，这种体制或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吗，这里是不是也潜伏着导致苏共和苏联后来发生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呢？总之，我觉得谢尔戈的《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材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这段历史并引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但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作者的思想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他写这本书是从他亲自生活在其中的苏联的历史现实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从他的一生看，他无疑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人民，热爱苏联，虽处逆境，仍为苏联的国防事业和科学事业贡献了一生。他说赫鲁晓夫的儿子移居去了美国，国外有不

少科研机构多次邀请他出国，但他仍认为自己应留在国内。他的这种态度曾受到安德罗波夫的赞许。从他的一生来看，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他在书中对“社会主义”和“制度”的控诉时，应该把它解读为他指的是他所体验的苏联那种具体的，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那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须指出的是，今天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一般群众中对贝利亚还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如何看待这一点，我觉得本书俄文版出版说明中最后一段话说得很好。它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谢尔戈的评价和结论。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使用了这种权利来谈论自己的父亲、自己和过去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觉得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因此，书中谈及的贝利亚的功与过、是与非当如何论定，也正如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一样最终恐怕只能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决。

本书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虽只有短短几句，但情真意切，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巨大热情和寄托的深厚希望。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10月去世，没能在生前看到他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他如地下有灵知道本书中文版的面世，知道他父亲的真实历史面貌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了解的话，我想他是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最后我还要向读者说明两点。第一、谢尔戈的原著不论在目录和各章中都只有各章的大标题，而无二级小标题。为了使读者对各章内容一看就有个概貌，同时在查找时容易翻到要找的地方，在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下，我为各章加了小标题。很可能有的标题标得不妥或有的分节分得不当，这些都由我负责。

第二、书中的译注也都是我加的。作为全书的校对者和定稿人，全书译文包括译注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也应由我负责。本来如果有更充裕一点的时间的话，对全书译文还可看得更仔细些，有些地方还可多作一些推敲，但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也想把这本书早些脱手交卷。不妥和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2001 年 3 月 12 日

徐葵是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致中国读者

我对新华出版社能出版《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深表谢意。我父亲于1953年在苏联所希望实行的许多东西，在明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均已顺利实现。

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能客观地看待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并从原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持的观点中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谢尔戈·贝利亚

2000年6月12日于基辅

出版说明

本书是《认识时代：子女谈父亲》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可以算是一本不寻常的书。有人从书名上看到那个40年一直被列入恶棍名册上的人的名字，回想起他那些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恶行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本回忆录中哪儿有不同凡响之处？所有的东西在高校和中小学的教科书中都已经写得一清二楚了……"

可我们敢肯定地说，这部文艺政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本国和世界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它的不寻常首先在于它的作者是个有着不寻常的坎坷经历的人，有关这个人的情况，不久前无论国内国外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

谢尔戈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之一拉夫连季·贝利亚的独子，形势使他在列福尔托沃和布特尔卡蹲了一年半的单身牢房，多年使用谢·阿·格格奇科里这个名字。谢尔戈·贝利亚这个人的确不同寻常。战争刚开始，17岁的他便成为苏联对外侦察电台的报务员；28岁时，他成为高度机密的设计院的领导人、科学博士、火箭宇航方面的总设计师，参加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和氢弹的研究，为国防做了大量的工作，至今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做为贝利亚的儿子，他还能为我们不久前历史的广为人知的事实补充什么呢？……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这一类回忆录已经塞满了人们的书架，随手就可以取出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谢尔盖·赫鲁晓夫、安德烈·马林科夫的回忆录。他们都是谈自己的父亲，对他们做出自己的评价，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他们的行为。

这些观点对在哪里，错在何处，我们不妄加评论。历史会对他们的回忆录做出自己的裁决。众所周知，历史像一位任性的“贵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把一切都摆放到自己的位置上，对一切都予以公正的回报。至于评价这些书列举的事实究竟客观、准确到何等程度则不是我们的任务。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可以认为它们都在追求真实，努力使我们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看到，谢尔戈·贝利亚在这本书中也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来描述他的父亲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谢尔戈·贝利亚的评价和结论，这很自然。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使用了这种权利来谈论自己的父亲、自己和过去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觉得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吧！

俄罗斯当代人出版社 1994 年

作者的话

……儿子应当清楚他父亲有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在什么地方把善当成了恶，而把恶当成了善；是什么帮助了他，又是什么妨碍了他……

因此，我这本书不是目的，不是硬要指驴为马，颠倒黑白，因为这样做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于事无补。但是研究问题的实质，分清是非，却是我做儿子的责任。要知道，“贝利亚案件”决不是孤立的案件。其中包含许多克里姆林宫之谜和谜底。

想了解真相是人之常情，我只想使读者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过去的时代。

谢尔戈·贝利亚



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谢·阿·格格奇科里），1924年11月24日生于第比利斯市。1941年在莫斯科第172中学毕业后，被苏联内务部中央无线电技术实验室录用。战争初期，他作为志愿者被共青团区委推荐到情报学校学习。结业后，以中尉技术员的军衔开始在军队服役。

1942年10月国防人民委员部派遣谢尔戈·贝利亚入列宁格勒布琼尼军事通讯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曾多次奉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部之命执行特别秘密任务。曾获“保卫高加索”奖章和红星勋章。

1947年，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政府决定派遣谢尔戈·贝利亚到计划设计部门工作，信箱为1323（即后来著名的第一设计局），在那里直到1953年7月担任主任工程师、主任设计师之职，曾荣获列宁勋章和苏联国家奖金。1952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受其父拉夫连季·贝利亚“案件”牵连，他于1953年7月

被捕，到1954年年底，先后被关押在列福尔托沃和布特尔卡监狱。

获释之后，交给他一本署名为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格格奇科里的护照，被流放到乌拉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处于长期的“监护”之下，他在代号为320信箱的单位工作将近十年，一直担任高级工程师。由于国家一批科学家向政府提出申请，也由于其母生病，他被获准转到基辅市代号为24信箱的单位工作。后来这个单位改组为“量子”科研所。1988年9月之前他先后担任首席设计师、科主任、部主任，后来转任系统设计部主任、乌克兰科学院材料学问题研究所新物理学问题综合部主任设计师。从1990年起，谢尔戈·贝利亚(谢·阿·格格奇科里)成为科技领导，“彗星”科研中心基辅分部主任设计师。

拉夫连季·贝利亚——巴库高等技术学校学生(1916年)



拉夫连季·贝利亚(中)——苏呼米市立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1915年)



1930年时的拉夫连季·贝利亚



拉夫连季·贝利亚同他的母亲玛尔塔·伊万诺夫娜和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1934年于第比利斯)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贝利亚（格格奇科里）



贝利亚同他的儿子谢尔戈（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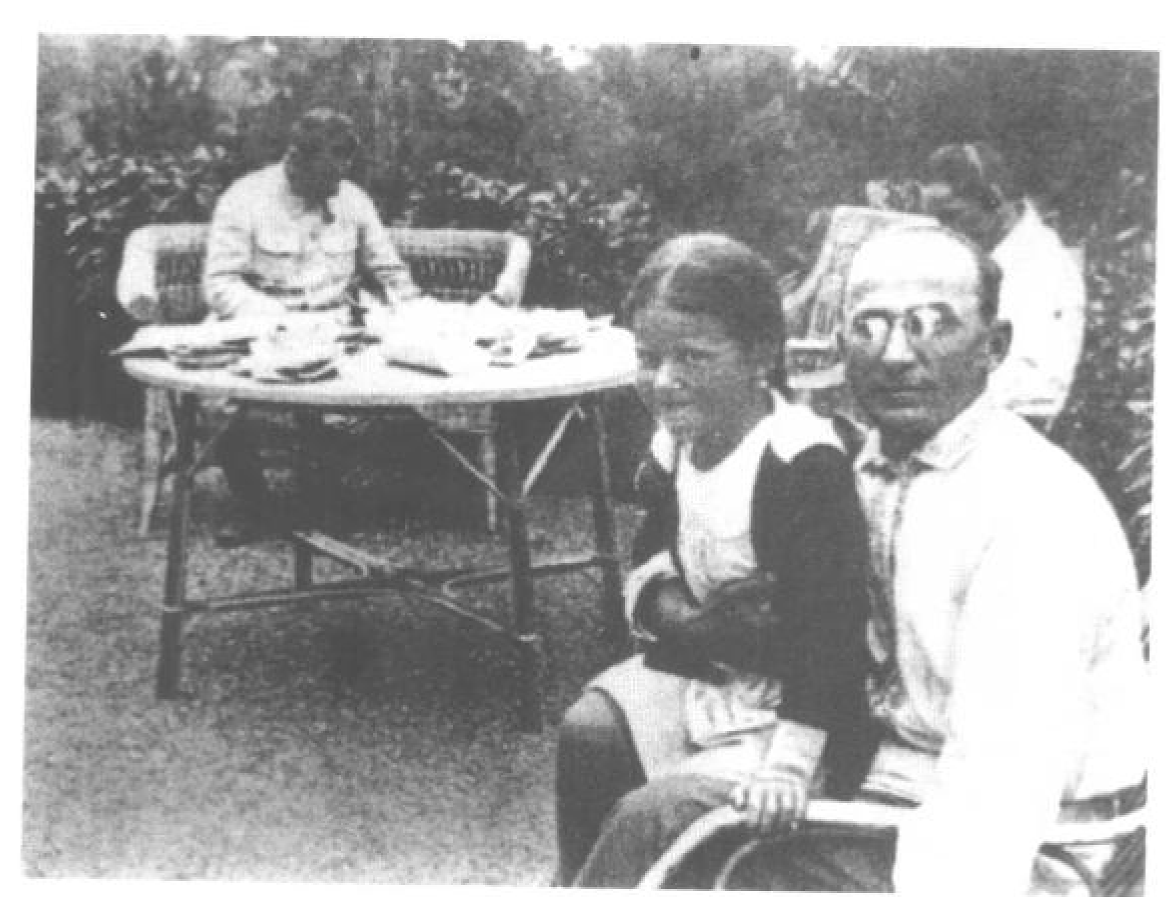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观看游行



贝利亚同妻子一起在度假



贝利亚父子(1937 年)



贝利亚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谢尔戈·贝利亚和母亲尼娜·泰穆拉佐夫娜



瓦西里·斯大林(1936年)



斯维特兰娜·斯大林娜(1938年)



拉·巴·贝利亚在约·维·斯大林母亲的葬礼上(第比利斯)

谢尔戈·贝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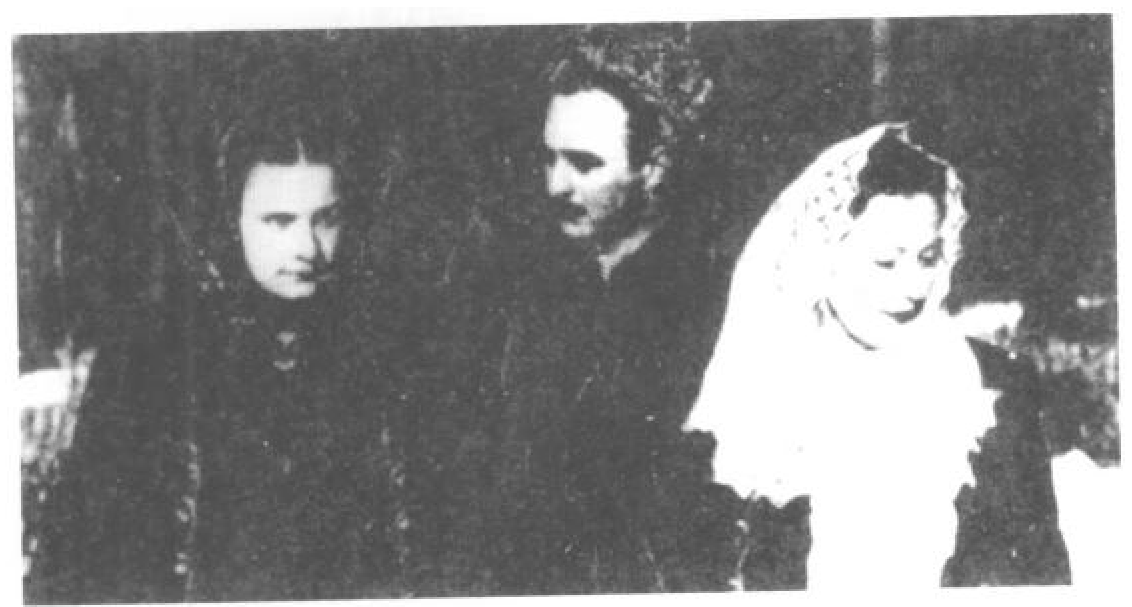




谢尔戈·贝利亚和妻子玛尔法(佩什科娃)(194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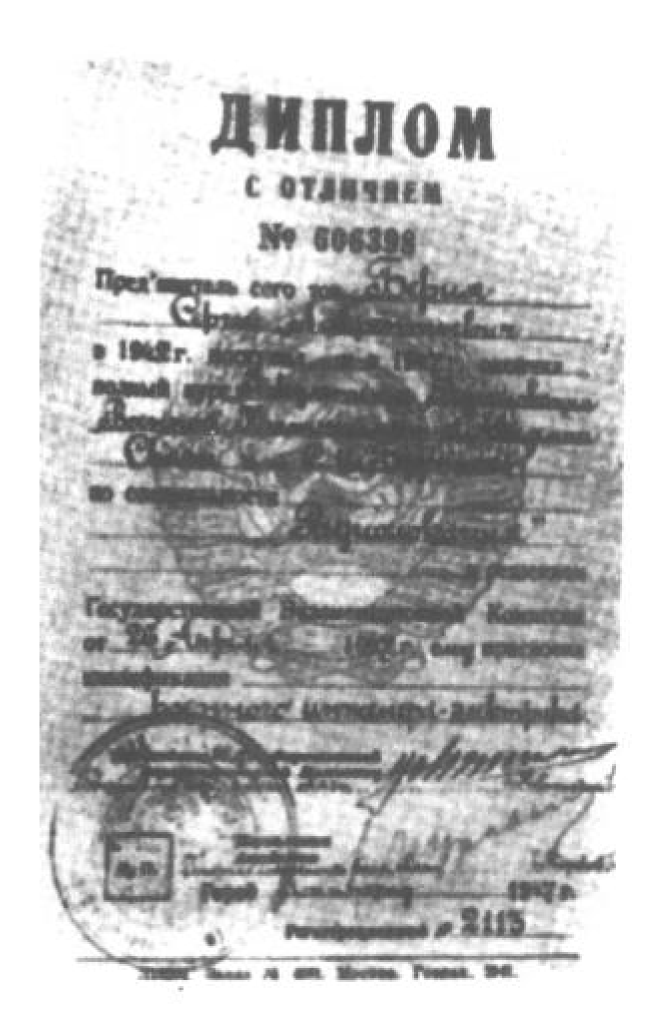
拉·巴·贝利亚一家



谢尔戈和玛尔法与母亲尼娜·泰穆拉佐夫娜(1950年)



玛尔法·佩什科娃和孩子们(1990年)



ДИПЛОМ

С ОТЛИЧИЕМ

№ 606398

ДИПЛОМ

С ОТЛИЧИЕМ

У № 854401

谢尔戈·贝利亚在各个不同年代和用不同的姓名所获得的学校毕业证和军人身份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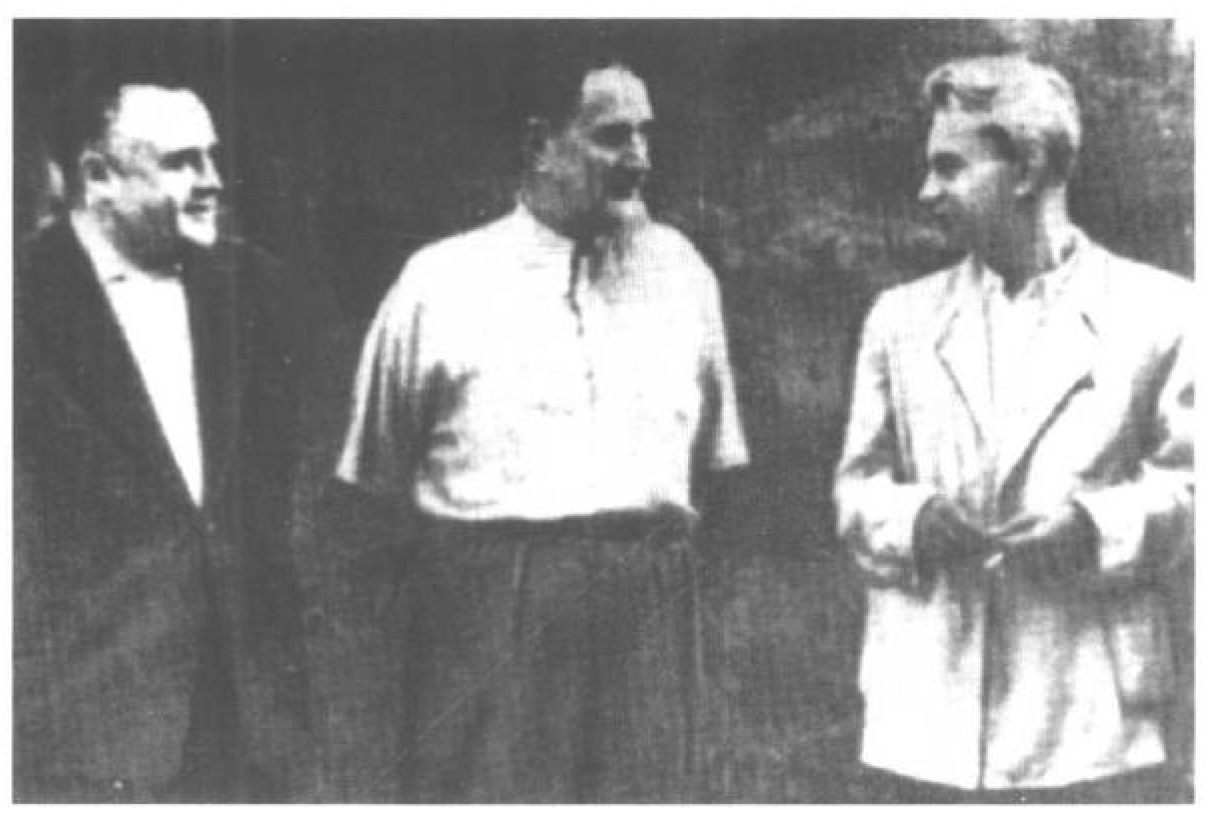
苏联代表团在同盟国(苏、美、英)首脑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为加里宁送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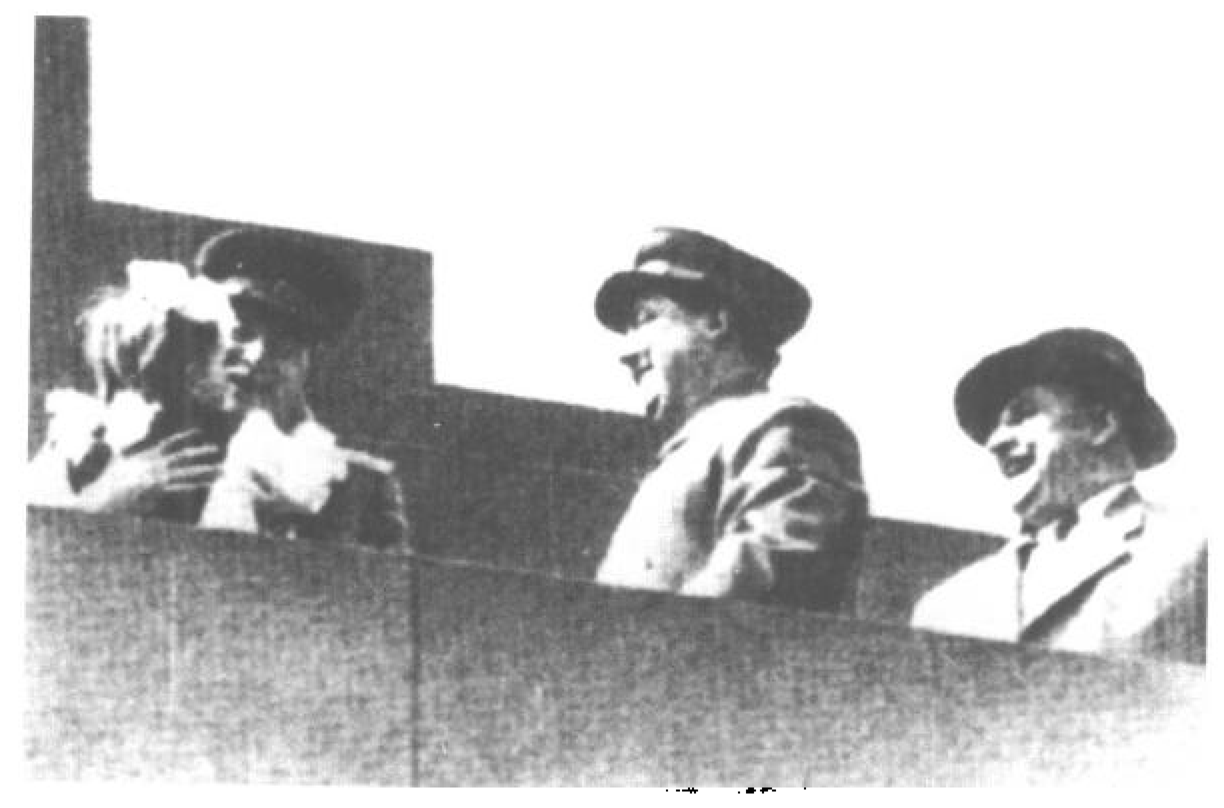
莫斯科(1949年)。庆贺斯大林70岁生日的大会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



“3K”(指姓名均以俄文字母“K”为首字母的:库尔恰托夫、科罗廖夫、克尔德什三人)——这张照片已载入苏联核导弹发展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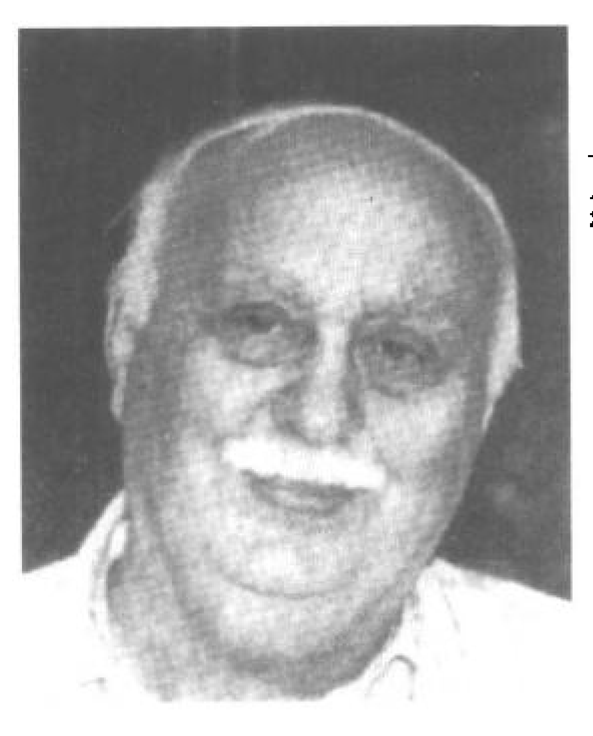
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



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在“五一”节庆祝大会上(1952年、莫斯科红场)



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时的情况



谢尔戈·贝利亚(格格奇科里)——"慧星"研究所所长、宇宙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拉·巴·贝利亚一家在莫斯科住过的别墅





位于莫斯科的著名KB—1型建筑("塔式起重机—1型"建筑大楼)。谢尔戈·贝利亚被逮捕前在此工作

目　　录

第一章　起　　步

一、家庭出身和青少年时代

我对我祖父帕夫列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有他的黑色斗篷和长耳风帽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再加上他讲述的与自己有关的故事。祖父是一个特别热爱劳动的精力充沛的人。

在故乡明格列利亚，他的生活很不安定。在阿布哈兹，由于宪兵的追捕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工作。据我所知，这与农民起义有关。梅尔赫乌利是一个小山村，虽然位于阿布哈兹境内，却划归明格列利亚。这可能就是祖父选择了它的原因。

我的祖母玛尔塔·贾克丽尽管与明格列利亚的庄园主达吉阿尼沾亲，但很穷。她的第一个丈夫死了以后，她带着一子一女改嫁给帕夫列，就这样结束了帕夫列的独身生活。听我祖母本人讲，祖父是以他的勇敢和貌美征服了她。祖母衣服做得很漂亮，毕生都以裁缝手艺挣钱，为家里增加点收入。而帕夫列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一刻闲过，他俩很合得来。

帕夫列和玛尔塔生了 3 个孩子，但是 3 个孩子都命苦。一个男孩只活了两年，死于天花。安娜得了一场病以后变得又聋又哑。全部希望就落到了拉夫连季身上。帕夫列和玛尔塔非常想让他们的儿子受教育。我父亲拉夫连季刚满 7 岁，祖父就决定送他到苏呼米高级小学去读书。那时候还有一种叫做“实科中学”的学校。

文科中学不收父亲这样的学生，而念实科中学的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祖父不得不卖了半幢房子，因为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的钱。

父亲的老师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从事教师工作完全是凭着一种使命感。许多年后，我在格鲁吉亚见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对我讲了许多父亲童年时期的趣闻，而父亲也总是很亲切地谈起他们。父亲清楚地知道，他之有今天，多亏有他们做自己的启蒙教师。

父亲 15 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呼米高级小学，他决定继续求学。祖父不得不卖掉另一半房子，举家搬入一间板条小屋，而父亲则前往巴库，进了一所机械建筑技术学校。

父亲当上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开始帮助在家乡的父母，而他们还跟从前一样贫困。父亲一再求他们搬到第比利斯来与我们同住，可是祖父很倔犟，说："在你们城里我无事可做。"他的确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没了沉重的农民的劳动会是什么样子，再说他喜欢那广阔的天地。他常常伤心地说："为什么谢尔戈一年到头也不愿到我这儿来？我会把他培养成人的！"当然，我母亲是反对的。

母亲得知祖父因患感冒卧床不起，这才前往梅尔赫乌利，那里距苏呼米很近。母亲照顾祖父直到他去世，而父亲却没有来得及在祖父弥留之际看他最后一眼……

我母亲尼娜·泰穆拉佐夫娜生于 1905 年，比父亲小 6 岁。我外祖父泰穆拉兹·格格奇科里是贵族的后裔，外祖母达里娅出身于公爵家庭。我外祖母和外祖父都是第二次结婚。伤寒病在一天当中夺去了泰穆拉兹·格格奇科里的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的生命，而外祖母的第一个丈夫死后留下 3 个孩子。外祖父很长时间没有再婚，他与我外祖母结婚后只生了我的母亲一个孩子。

外祖父跟外祖母一样，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他参加了民族

运动，在一次反沙皇的农民起义中，中了7颗子弹。他70岁的时候被打断了两条腿，一年以后就去世了。那个朝外祖父开枪的人，是当地的沙皇宪兵，一个米格列尔人。他一直生活在那个村子里，此人在我父亲领导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外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时候，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得以善终。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一家人的特点。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对别人进行过报复。

我母亲从明格列利亚的一所乡村小学毕业以后，上了文科中学。她是在她叔父萨沙·格格奇科里家里受的教育。她叔父是个布尔什维克。我父亲常到她叔父的秘密住宅去。是她叔父让她和我父亲相识的。

我母亲的第二个叔父叶夫根尼·格格奇科里曾在孟什维克派那边当了外交部长。命运就是如此不同……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父母去了巴库，稍晚些时候，去了第比利斯。我母亲在农学院毕业后，读了研究生，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父亲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她就到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工作去了。

1953年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当时一位84岁，另一位81岁，同时被赶出家门，发配到离第比利斯100多公里的一座养老院。当局不允许任何亲戚把她们接到自己家中。当我们走出监狱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和母亲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她终于得以秘密地前往格鲁吉亚。此时我外祖母已不在人世，在我母亲到来前4个月去世了。

我祖母已经完全失明，但是当母亲走进房间时，她拉住母亲的手，立刻认出了她，说："你是尼娜……"

我们费了两个月的周折，想把祖母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然而已经晚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难以理解，当局迫害贝利亚的所有亲属到底

是出于什么目的？把这些老太太隔离开有什么好处？难道说当局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对国家的威胁？对我和母亲来说，惟一的安慰是，祖母玛尔塔总算活到了得知我们还活着的一天。在此之前她当然得不到一点有关我们的消息，而亲友们的遭遇如何，我们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才知道。

关于我的父亲和我们一家，在后来的40年中发表过许多不实之词。终生热爱父亲的母亲过了87岁生日以后，带着坚定的信念离开了人世。她坚信的是，所有那些推测和毫无掩饰的谣言都是党的上层人物所需要的，而对父亲的所有中伤都出自党的上层人物之口，其目的就是要在他悲惨地死去之后把他搞臭。

譬如，人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漂亮媳妇是抢来的。在一本西方出版的苏联人都知道的《名人录》中，作者肯定地说，在20年代末，我父亲乘坐私人豪华火车去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检查农业工作，在这里邂逅了我未来的母亲。他对姑娘很感兴趣，于是就抢走了她。如今这种鬼话从一篇文章抄到另一篇文章中，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思考一下它的真实性。其实真该思考一下。

20年代末，我在家乡第比利斯准备上小学一年级。正如我上面所讲的，我父母相识要比这早得多。我父亲在库泰依斯监狱中与舅公萨沙同住一个牢房，我的母亲去探望舅公，他们相识了。只要把事实和日期拿来对照一下，这种抢亲的说法便会像儿童用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土崩瓦解，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没人这样去做。更不用说年轻的肃反工作者拉夫连季·贝利亚并未见过任何专列火车——级别不够。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我们的家庭，暂时少谈一点父亲的事。父亲生于旧俄历1899年3月17日(公历3月30日)。他本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画画得很不错。我想起一件事，这件事与我的童年有关。尽管我对宗教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我并未成为一名教徒。那

时我还是个孩子，是个积极的无神论者，有一天竟砸碎了圣像，当然不是出于什么信念(这样说未免可笑)，而是受学校教育的结果。总之，祖母玛尔塔非常伤心。她信教，热心帮助教会和教徒，直到去世。

父亲下班归来，给我那无神论的狂热浇了一瓢冷水……他画了一幅新的圣像。他跟我谈了一次话，我永远无法忘记。他说："应当尊重别人的信仰。"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善于画素描、水彩画和油画，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懂得音乐。有一部西方拍摄的情节紧张的政治打斗片，把贝利亚描写成"允许自己按西方方式享受奢侈生活的惟一一位苏联领导人"。这部影片说，贝利亚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得到一辆"帕卡德"高级轿车，在莫斯科郊外拥有一幢从前属于奥尔洛夫伯爵的豪华别墅，又在索契拥有一所大理石别墅，还有不只一个网球场、台球房，以及打靶场、室内游泳池、快艇。影片甚至说，父亲的服装是在罗马和伦敦定做的，还说他把国家收藏的一张珍贵的唱片据为己有，他喝法国白兰地酒，只读过去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诗……

怎么说好呢？……这不过是一大堆推测罢了。母亲经常买一些四月唱片厂灌制的古典音乐唱片，和父亲一道欣赏它们并感到一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不读诗的。他喜欢历史文学，总是饶有兴趣地研究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才比较接近父亲的生活。

他不抽烟，对白兰地、伏特加都很讨厌。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总有一瓶葡萄酒倒是真的。父亲只喝上好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也只喝一点点。我从未见过父亲醉酒。而人们却说他烂醉如泥……在伦敦、罗马或其它什么地方订做服装，更属无稽之谈。请注意：在父亲所有的照片上，我们见到他总是穿着肥大得出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一个姓富尔曼的裁缝做的。我没听说过还有别的什

么人为他做过服装。我觉得父亲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他的生活特征与当今完全不同。随便您怎么想，您可以把这称作伪善，但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不流行过奢侈的生活。至少我们家从未追求过奢侈。

不过，我们家确实有一座别墅，是现代建筑，当然不可能与奥尔洛夫伯爵有丝毫的关系。这所别墅并不属于我父亲，而是国家的财产。有5个不大的房间，包括饭厅，一间屋里确实摆着台球桌。如此而已。

当我们从第比利斯来到莫斯科时，父亲分到了一套政府大楼里的住房。这座大楼还被称作政治流放犯大楼，里面住的是人民委员、高级将领，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有一次斯大林来看了看我们的住房，说："别在这个蚂蚁窝里过日子了，搬到克里姆林宫来吧！"可母亲不想搬，斯大林说："好吧，您看着办。我可以安排一下，让他们给你们选一处独门独院的住宅。"

斯大林来过以后，我们也换了别墅。原来的在伊利亚村地区，靠近鲁布廖夫公路，是一所由3个房间组成的小房子。斯大林来到这里，四处看了看，说："我流放时也比这住得好。"于是我们搬进了与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为邻的一所别墅。那时任何人的别墅里都没有网球场和室内游泳池。只有科涅夫元帅的别墅给我留下了印象，他从德国带回几只孔雀在自己家中饲养。

"帕卡德"高级轿车确实有，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每人一辆。当时好像是买了15辆，分给了父亲一辆。不过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的人不同的是，父亲并没有乘坐。那是防弹汽车。父亲使用的是一辆普通轿车。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国家领导人没有什么特权。我母亲跟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夫人一样，不需要去商店购物，因为有特别供应服务。举例说吧，管理人员接到购物订单，拿了钱，然后把各家必需的物品送上门。多买根本不允许，即便是斯大林周围的人想多买

也不行。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就没有第二条裤子。我母亲的第一件毛皮大衣，是我获得国家奖金后买来送给她的。当然，并不是因为我父母穷。我再重复一遍，在那个时代不流行奢侈的生活。要知道，斯大林自己就是个苦行僧，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这当然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

斯大林到什么人家去从不预先通知。他喜欢吃简单的饭菜，也注意别人怎样生活。无论在我们家里，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我从未见过豪华宴会，既没有白兰地，也没有伏特加，虽然人们大写特写。不过，始终有上好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后来的国家领导人才开始追求奢侈，而在当时……我记得有件小事相当典型。此事发生在交通部长(当时称人民委员)科瓦廖夫身上。有一天他送给夫人一枚钻石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种戒指现在连女中学生都戴。这事马上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这个倒霉蛋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便被清除出党，并开除公职。后来父亲帮他安排了工作……这件事处理得正确与否，我不探讨。也许这种苦行主义毫无必要，但是当时就是如此。

我不止一次在报刊中见到一些所谓“事实”：据说在我们家中搜查出数十万卢布、许多珠宝、40 支枪……这些无稽之谈是不值一驳的。比如说，在第比利斯有一个裁缝，他叫萨沙，姓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有一次他来莫斯科，妈妈向他定做一件连衣裙。结果这件事也算在她头上，说她“使用雇佣劳动！”

对妈妈的指控甚至包括：她利用国家的运输工具——飞机从非黑土地带运来一桶红土。妈妈当时在农业科学院工作，确实在从事土壤研究。

真是荒唐透顶，有人居然肯定说，我妈妈经常骑着挂金铃铛的马到处招摇。实际上妈妈真的很喜欢马，并经常光顾驯马场。至于那些所谓金铃铛，当然又是凭空杜撰。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指控”会变得有声有色，并传遍世

界，同时还会再生出许多新的传说。据说我父亲有一支由200名格鲁吉亚人组成的精锐御用卫队。如果相信西方材料来源的真实性，“警卫队就像爱戴部落酋长一样爱戴贝利亚”。这些不过是童话而已，但言外之意非常清楚：是两个格鲁吉亚人占据了俄罗斯舞台，并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当然，警卫队由格鲁吉亚人组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也来自格鲁吉亚……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警卫队真的很爱我的父亲，他待他们也非常好。他们有10到12个小伙子，不会比这多。他们轮流值班，我从未见过他们超过3个人在一起。通常总有一辆车尾随在父亲车后，这就是全部警卫。对了，在别墅的大门口还有一个值班员，不过他不是军人。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就是，在父亲的私人卫队中有一个格鲁吉亚人和一个亚美尼亚人萨尔基索夫，其余的全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但我父亲的生平经历本身已被涂改得面目全非。如果相信某些出版物的说法，他在30年代初就差一点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他投身革命非常早，还在读中学时便组织了秘密马克思主义小组。

二、革命生涯的开始——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1917年6月，父亲作为一名陆军水利工程见习技术员被派往罗马尼亚前线。接着便是革命。他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释放后继续地下工作，再度被捕……

革命后他的生活变化很大，与他原来设想的完全不同。他幻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却迷上了石油勘探，甚至准备派他去比利时学习。后来他不止一次回忆起这件事。但就是在这个领域他也没能固定下来。从1921年起父亲开始在肃反委员会阿塞拜疆处担任副处长，后来担任处长，再后来成为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在此之前，他曾在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巴库政治学院工作和学习过一段时间。

在阿塞拜疆还保存着与父亲工作有关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923年。

摘自贝利亚的鉴定：

> *“……在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表现了他所具有的卓越才能……他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应当指出，他是一个优秀的、有价值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是当前苏维埃建设时期不可多得的人才。”*

鉴定的签名人为阿塞拜疆中央书记阿洪多夫。顶头上司给这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契卡人员以如此高的评价，并将他派去布尔什维克党的肃反委员会工作。很明显，出于捷尔任斯基的赞许，我父亲成了红旗战斗勋章的获得者，奖给他一支刻着名字的勃朗宁手枪和一块刻字手表。32岁他便成了外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的全权代表。后来更有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一最高职位、外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人，接着便调往莫斯科……前程远大？毫无疑问。但是其根源何在？正如媒体所说，是出于斯大林的赏识？绝对不是，在那个年代他们还不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通常，道路只有一条。请回想一下马林科夫的飞黄腾达。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依靠的是中央组织部。包括赫鲁晓夫也不例外。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后，他进入了斯大林和党的高层人物的视野。告密，阴谋诡计，在当时是家常便饭。父亲的经历——我指的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凭空杜撰的

——与其他大多数人的经历明显不同。他的迅速升迁甚至在当时也属罕见，这首先与他1924年对孟什维克在格鲁吉亚举行起义所持立场有关。正是在那时，他引起了政治局的注意。

事情是这样的：1924年，父亲作为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预先得知孟什维克正准备发动起义。考虑到事态发展的规模，父亲建议利用各种政治手段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奥尔忠尼启则按规定将情况报告莫斯科。形势非常严峻：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孟什维克制定了周密的起义计划，准备了部队和大量的武器装备。起义将在共和国境内全面爆发。尽管不是全民性质的起义，但当时表现的征兆却是如此。

父亲明白，这种冒险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而且会带来许多无谓的牺牲。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避免发生流血。于是父亲建议将获得的情报泄漏出去，以使孟什维克领导人知道，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已掌握了关于起义的全部情报，因而不会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奥尔忠尼启则看来是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认可，他没有反对这个建议。在当时非同寻常的情况下，这是惟一正确的决定。但孟什维克不相信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认为这是反间行为。可见，他们过分相信了法国和英国的许诺：你们干吧，有我们支持……

后来事态的发展是这样的：孟什维克运动首领之一、民族近卫军领导人朱盖利被派到格鲁吉亚。关于他的到来，父亲预先从自己侦察员那里便已得知，并采取措施，从一入境就对瓦利科·朱盖利实行监控。但仅仅是监控而已，逮捕一个有影响的孟什维克领袖不宜操之过急。朱盖利在格鲁吉亚逗留本身也可以加以利用。父亲通过内线告知朱盖利，他的入境已为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所掌握，并尽可能使他个人相信，起义必然失败。

很遗憾，这一情报仍被视为契卡人员的反间行为。朱盖利认为，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只是害怕在共和国内发生大规模的群众

运动，而又没有能力制止，因此才想尽办法要孟什维克领导人取消起义。

朱盖利还是被捕了，但却是因为一次令人沮丧的偶然事件。在街上，一位老相识认出了他，他被正式拘留。在狱中，朱盖利看到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劝说同谋者放弃行动。无论是境外，还是格鲁吉亚境内，谁都没有听从他的忠告。孟什维克还是组织了起义，但结果不出所料，起义被军队镇压，人民牺牲无数。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奥尔忠尼启则稍加干预，本可不必发生流血，因为起义发动之初所有的领导人就已被捕，弹药库也被占领。实际上，军队屠杀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

但不管怎么说，为了避免流血，父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而且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始终坚持用政治方法解决各种问题，反对使用暴力。后文中读者有很多机会相信这一点。

按照性格，他是一个注重理性分析的人，从不感情用事，从不对各种事情急于下结论。他认为，对于一个政治家，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毫无疑问，这是多年的情报工作给他的性格打上的烙印。他得出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是建立在深入研究具体材料基础上的。我想，为了把我培养成人，他教我怎样有条理地劳动，养成研究资料、参照事实、并提前进行预测判断的习惯。

显然，这是往日对技术爱好的影响。尽管并不直接涉及计算问题，但从事技术工作本身要求条分缕析。譬如，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一些责任重大的决定，例如有关新式武器的决定，他一般需要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作出。但这纯属外在表现。我清楚地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这种决定是在经过无法计算的大量工作之后做出的。也不仅仅是数小时的讨论、向专家咨询，还需要对材料进行独立分析研究。我记得，在制定核武器计划、弹道火箭计划和防空系统等计划方案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父亲还是一个目的明确、意志坚强的人。他如果接手一件工作，就会自始至终将它干完。他不回避干粗活和艰苦的出差旅行。

我记得，父亲从未改变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早晨不到 6 点起床，早操后至少看 3 个小时的文件。下班回家，晚饭后又进入自己的办公室，还要工作两三个小时。只有在召开马拉松式的重要会议期间例外。

当然，父亲还是个酷爱劳动的人。这里可列举一些他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不同于专事宣传说教和管由来已久的“干部”问题的政治局其他成员，他一直在干具体工作。比如说吧，做党务工作也需要同人打交道，要处理某些组织问题。但我深信，我父亲不喜欢这工作，因为它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具体结果，从而也就不能因所做的工作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当 30 年代初父亲从情报机构调出干党务工作时，他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但就在那里，作为一个实干家，他给自己找了要做的事。严格说来，他也没有去做一般性质的党务工作，把这些工作交给机关去做。自己则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利用共和国首脑的权力，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提高格鲁吉亚的国民经济上。后来他自己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党抓经济是越俎代庖，但在 30 年代的时候人们别无选择。就是作为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如果他在气质上不是一个机关权势分子，他也能在工业、农业和建设领域做很多的事。第一书记的职位使父亲得以积极介入经济问题，并在最高层次上予以解决，这是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本身竭尽全力也难能做到的。

很遗憾，党的机构后来变成了远离解决实际问题的纯监督机构。

大概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我父亲是一个极为温和的人。当然奇怪，因为 40 年来描写他进行地下室的审讯、他的对别人意见的不能容忍以及他的粗鲁的文章连篇累牍。毋庸讳言，所有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才通过了禁止对被告使用任何暴

力的规定，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还有他关于此项动议的报告。为了遏止住镇压的车轮，为了洗涮由于参与大规模镇压活动而败坏了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声誉，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这个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的话题将设专章论述，现在我只讲一点：我父亲不是当时领袖们试图在人民眼中所描画的那样的恶魔。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他反对任何暴力。甚至有人说，父亲在成为内务人民委员后，便遣散了那些对30年代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事情并非如此。那些违法的侦查员和集中营管教被迫离开并承担相应责任，父亲在当时和以后对此都没有姑息。而数以千计的诚实可靠的工作人员，还像从前一样，继续同刑事犯罪进行斗争，在情报机构和反间谍机构中工作。众所周知，与新到任的内务人民委员紧密相联的是惩罚机构的改组、解救数十万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无辜民众。

三、贝利亚与30—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有多少关系？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我父亲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在1938年的11月末。老一辈的人还清楚地记得在苏联停止大规模镇压的时间，这有充分的事实可以对照。大家知道，1942年以后，我父亲同国家安全机构已无任何关系。由于战争，当时父亲的这一职务由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接替，而战后负责国家安全机构的则是阿巴库莫夫和伊格纳季耶夫。不管怎么说，当话题涉及到制度性犯罪时，大家会认为我还是不提为好。各种材料当中都会时常出现内务部长贝利亚的名字。而问题只是在于，1953年3月我父亲确曾主持过内务部的工作，尽管他只干了三个月的时间。我想，本书读者对了解我父亲生活的这一页是不会不感兴趣的。我现在只说一点，我父亲没有担任这一职务的任何愿望。很遗憾，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轰动一时的回忆录中，他没有

谈到在斯大林死后的几天里他坐在我家别墅一再劝我父亲说："你一定要同意接手内务部，那里的秩序需要整顿。"父亲则予以拒绝，理由是正忙于国防问题，脱不开身。但政治局坚持意见，其理由亦不可谓不充分：他在司法部门为恢复法律秩序曾做过大量工作，现在是非常时期，急需他这样的权威行家的介入。父亲不得不同意这一决定。

我想，这一切的深远意义在于：把惩罚部门的全部罪恶都算在新领导的头上。应当找到适当的方式，向人民解释战前的镇压和后来的制度性犯罪。而我父亲，赫鲁晓夫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最合适的人选。多么奇怪，简单的日期更动竟足以歪曲全部事实。时至今日，尤其是年轻人，谁还记得是谁和什么时候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

许多历史学家都毫不含糊地暗示我父亲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死有关，并参与杀害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谈到了这一点："1934 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在索契，有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而 12 月份就发生了尼古拉耶夫[1] 进行枪杀的事件……，将这一枪杀事件同贝利亚的名字联系起来，而不是像现在人们所做的那样同我父亲的名字联系起来，这样岂不是更合适和更符合逻辑吗? 父亲参与杀人我永远都不会相信……1936 年我们失去了我们家的另一位老朋友，我想，这同样是贝利亚无耻阴谋的杰作。我说的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我相信，类似的指控读者所见颇多，但又有谁知道，这两个人一生同我父亲和我们全家有着多么亲密的关系。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是我的教父，因此我的名字也叫谢尔戈，以示尊敬。只要我父母从第比利斯来到莫斯科，就一定住在他家。他也常住我们家，如果他因公或度假休息来到格鲁吉亚。

---

① 尼古拉耶夫　刺杀基洛夫的凶手。——译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亲密无间。

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曾经两次将我父亲从孟什维克监狱救出。基洛夫被害的时候，他正在格鲁吉亚工作。后来他说，不存在任何阴谋，正如报纸报道的，杀手身后没有指使者。在父亲主持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自然又想起这一悲剧，试图重现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重新解释基洛夫死因的文件材料。就是那些后来指控斯大林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的人手中当然也没有。但是，这一说法却长久流传。不过，这毫不奇怪。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道，国内战争期间"贝利亚在高加索被红军逮捕，于是基洛夫命令将叛徒枪毙……"那么怎样看待贝利亚是木沙瓦特[①]间谍分子这一定论呢？对父亲的这一指控响斥了中央全会，父亲在惨死之后被开除出党。而父亲在巴库从事反间谍工作是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从不需要掩饰。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情报工作之路。在同一个地方执行相同任务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

中央全会上不过是把众所周知的事实颠来倒去。米高扬自己后来对我说，为了保护我父亲他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遗憾的是，这件事本身也不真实。

在上层执政者的手中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我父亲的任何罪证，但败坏他在人民眼中的名誉却是急需的。可是，纸包不住火。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的关于父亲的故事，只是为一个人的肖像提供线条。他曾经真诚地工作，是一位合格的公民、好儿子和好父亲，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可以信

① 木沙瓦特是1912—1920年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政党，主张民族地域自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联合土耳其和英国武装干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1918年9月在阿塞拜疆执政。1920年4月成立苏维埃政权后，木沙瓦特不复存在。——译注

赖的朋友。我和所有多年认识父亲的人们一样，永远不会同意官方宣传给我父亲所作的定论，虽然我明白，从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这个"制度"那里会有什么别的结果，那至少是天真幼稚。

当我谈起父亲，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早已模糊的童年画面。可以说，童年时代我对技术就感兴趣，父亲又千方百计地给予引导鼓励。他非常希望我能读工程技术大学，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很清楚，即使在当时，他如允许我开车兜兜风，那是不难的事。可事情不是这样……你想开车吗，那就到车库去，那里有老牌福特车，你把它安装起来，装好了去开吧。在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的帮助下，我把这辆车装好了，但问题不在于装车，我父亲是想从小就让我学会工作，为此我至今对他感激不尽。

他拿来一叠外文杂志，让我翻译其中的部分文章或某篇材料的短评。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材料很严肃，他何不交给那些专家来翻译？他只是利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教人劳动。父亲和母亲对我的教育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虽然他们俩人的空余时间都不多。他们督促我认真学习外语、音乐，以身作则使我参加体育运动。

还在读小学时我便学了德语、英语，后来又学了法语、丹麦语、荷兰语，能读一点日语。可以说，这些都使我的生活受益匪浅。

忘不了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滑雪和林中的漫步。父亲喜欢主动安排休息，也是个善于休息的人。记得我们俩利用两周的时间布置体育场的器械。我们找到一小块空地作滑冰场。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我们还买了排球网。我们俩都为此感到得意。

我们总是一起去南方度假。后来他常和妈妈俩人在一起。他喜欢登山，游泳很好，经常乘坐皮艇出游或自己划船。这种时候总有妈妈陪伴着他。

他和妈妈一起光顾养马场。从小他就学会了骑马，让人感到他年轻时便是个不错的骑手。

关于父亲如何热爱足球还有许多故事，传说贝利亚在年轻时

差点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虽然父亲很喜欢排球和足球,而且玩的也不错。

当迪纳摩体育俱乐部成立的时候,其基本任务就是促使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士都来参加体育运动。调子要由领导来定。这样,父亲对运动的爱好便也具有了示范的性质。年轻的契卡人员争先恐后,不愿落在领导的后面……

和我们一样,父亲从不讲究吃。当然,最高层的日常生活还是有别于千万民众的。有保卫,有固定的优惠,但这和后来有所不同,绝不是党以此对自己干部的施恩布惠……有一个姑娘常来收拾房间,打扫厨房。厨师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受过专门训练,毕业于喀山某个有名的烹饪学校。显然,他没有工作经验,这一点家里人都很理解,没有让他为难。妈妈自己就很会做饭,因此,我们的厨师很快洞悉烹饪技巧,做起饭来也便应付裕如了。

当然,格鲁吉亚风味最受欢迎了:云豆,核桃油,如果有客人来,这两样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别丰盛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但却永远让人感到温馨愉快。无论是学者、艺术家、作家、军人聚会,还是从格鲁吉亚来的亲人朋友,总之,大家全都一样,无一例外。

许多年中,确切地说直到父亲临死前,一直住在我家的还有一位像我们家庭成员一样的埃拉·埃玛努伊洛夫娜·阿尔梅丁格尔。她是一位优秀的女性,一名教师,日尔曼族。就是在流放地我们也没有同她失去联系。

战争爆发后,所有的德国人都开始遣返。我们家的这位德国女人哪儿都不打算去。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贝利亚家里住着一个德国女人,等等,诸如此类。有一次斯大林来到我家(正赶上我们按惯例都坐在一起吃饭),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埃拉·埃玛努伊洛夫娜坐在了一起,同桌相对。斯大林问道:

“那么，您就是那位希特勒的代表了？奇怪，我从来没想到您竟是德国人。”

而埃拉张口结舌，这次造访使她不知所措。事情总算过去了。斯大林笑了起来，并开始说起奥地利，事情便到此为止。实际上，父亲非常不赞成将人驱逐出境。当然，最后决定往往不是他说了算。

我还要详细讲一讲我父亲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所参加组织的在高加索对敌人的反击。我之所以回忆起父亲生活的这一页，是因为参加保卫高加索的还有当地居民，各处山隘站立着誓死保卫家园的印古什人、奥塞梯人和车臣人。这是我亲眼所见。父亲对这些人也深怀敬意，并会见了宗教界的长老和活动家。

遗憾的是，政治局做出决定，连这些人也赶走。这无疑是可耻行动。但命令已经下达，内务部队强行完成了这一可耻行动。

此事的开端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不是人民！）送给希特勒的部队马匹和斗篷。是的，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欢迎占领者的大有人在。谁没有和德国鬼子合作过呢！遗憾哪，叛徒到处都是。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就成了人民的背叛，他便不加区别地命令道："全都流放！"

真可惜，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命运就是如此。我想起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我的一个朋友，试飞员阿梅特·汗·苏丹，作为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在他家乡为他竖了一个半身像。有趣的事发生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全部被赶出克里米亚，而雕像却是为一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竖立的。将这个样子的一个鞑靼人单独留在克里米亚是不妥的……我们只有拆掉你了，我的青铜伙计。关键是，你为这样的流氓行为不会受任何惩罚。我们当时正在刻赤附近的打靶场干活。我们受了一整夜的折磨，但雕像还是拆除了……

我16岁的时候不得不离开父亲的家，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战争将我进大学学习的设想化为乌有。我进了情报学校，尔后是

前线，又在列宁格勒军事电子工程学院学了几年。当我回到莫斯科，甚至在结婚以后都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坚持这样做。他的一生都是在我们眼前度过的。我想，一个人可以掩饰某一个别事件，但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无遗的。这不仅是针对亲近的人，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始终都处于被关注的中心。

几十年来，在数百万人的心中，贝利亚的名字始终和30—5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联系在一起，和数百名据说是为这位多情的政治局委员而牺牲的妇女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顺理成章。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所有的人类共同的弱点，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为什么中央委员会通过官方宣传明显引导人们只对我父亲的所谓"荒淫"感有兴趣，为他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色魔形象？老一辈的人都记得，在父亲生前莫斯科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什么"可怕的流言"传播。诚然，今天正越来越经常地反证过去，似乎那些被忘记的还活着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过去的一切。没有办法，一个谎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另一个谎言，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摘自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记录：

"我们发现了多封女人写的内容暧昧下流的来信。我们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男色棍用的东西（这指的是在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大楼他的办公室搜查的结果）。这些物品使事实昭然若揭，不言自明，使任何解释成为多余……下面我宣读一下这个叫萨尔基索夫的供词，他在贝利亚的警卫队中工作了18年，后一个时期任警卫队长。这个萨尔基索夫供称：'我了解贝利亚同许多邂逅相遇的女人的关系。我知道贝利亚通过女公民C（请允许我不提她的名字）认识了她的女友，

姓什么我不记得了。她在模特之家工作……此外，我还知道贝利亚同外语学院的女大学生迈娅姘居，后来她怀了贝利亚的孩子，做了流产。贝利亚甚至和只有18到20岁的良莉娅姘居……在第比利斯，贝利亚认识了女公民M，并和她同居，之后她生了个小孩……我甚至还知道，贝利亚同一个叫索菲娅的女人姘居，由贝利亚建议，通过内务部卫生所长沃洛申为她做了人工流产。再重复一次，贝利亚类似的关系举不胜举。'"

"'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我制了一份他曾与之同居过的女人名单。（大厅内笑声）后来根据他的建议，我销毁了名单。但我留了一份。这份名单中记载了25个以上女人姓名。萨尔基索夫谈到的名单被发现了……一年或一年半以前我确切地得知，由于和妓女的不正当关系他染上了梅毒，为他治病的是内务部卫生所的尤医生，姓什么我记不得了。萨尔基索夫。'

"同志们，这就是苏联人民领袖职务觊觎者的真面目。就是这副肮脏的嘴脸竟妄想成为伟大人物，胆敢和我们党抗衡，和中央委员会抗衡。我们的党和中央委员会已经收拾了这些败类，并变得更为强大……"

够啦！苏共中央书记沙塔林在揭发一位中央主席团成员的道德沦丧时是否坦率地过分了呢？请注意他的话："同志们，这就是这个公务觊觎苏联人民领袖地位的人的真面目。""觊觎者"已不在人世，何不指控他为政敌，而指控他为刑事犯？这样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说，谁无罪孽？如果再作夸张，添枝加叶，那又何妨……

一位著名作家甚至被"收买"来写了一篇"风流"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与中央主席团委员过夜后悲惨死去，在煤气室中毒而死。当然，煤气室就在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家的地下室。

当然，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这样说严肃吗？什么煤气室、中毒……我现在明白了中央全会编织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因为没有事实证明父亲参加了所谓的阴谋，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国外帝国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于是决定向人民展示他的"腐化"形象，把他说成是一个酒鬼、淫棍、虐待狂，企图成为独裁者，并使国家陷入恐怖流血的深渊。让我费解的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要编造这些？

大概，在撰述猎艳传奇故事方面，尼娜·阿列克谢耶娃比其他人要略胜一筹。她曾是莫斯科某歌舞团的演员，早已年逾70，但作者的充沛精力令人惊叹。几年来，老太太面对各式各样的听众兴致勃勃地发表演讲，答记者问，甚至准备出版一本关于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回忆录。据说她同贝利亚过从甚密。只能猜想，这位新露面的女作家将会以什么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不管怎样，在一定时期内，对她的以各种文字出版的回忆录，在期刊上没有发表过对之表示怀疑的文章。在我看来，尼娜·阿列克谢耶娃不过是想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挣钱糊口而已。您自己想想，对以下的所谓事实您是否会深信不疑？

"您知道，我和贝利亚的关系很自然地亲密起来，他当然一点都没有强迫我。起初我们坐在桌旁，那里一切应有尽有！……坦白地说，他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非常强，没有丝毫病态。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是不够的，他需要很多的女人……当他第一次占有我时，他是那样疯狂。我感到他对我是中意的。我家旁边开始常有政府的车辆出现，那位萨尔基索夫经常光顾我的住所……我看出，他对我满怀热情，可我对他却热不起来。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你是冷血动物，你为什么这样美丽而又这样冷漠……'后来，我对他在卡恰洛夫街房子的环境产生了反感。您知道，从外观上看房子非常漂

亮，可里面给人的印象极为恶劣，我简直不能说贝利亚竟住在这种地方。核桃木做的双人床很大。记得萨尔基索夫第二次或第三次将我带到那里，我等贝利亚等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穿白色长衫的女人向我走来，非常亲切、殷勤，她对我说：'你别着急，他一定会来的。'我清楚地记得，走廊的左侧有一个图书室。我看那里的书，清一色都是斯大林的著作。我就想，难道他对古典作品就毫无兴趣吗？"

我不想对此作什么评论。来描写一下我们家的家庭图书室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请原谅，在这里还是要问一下，贝利亚个人丰富的藏书，还有农业科学副博士尼娜·泰穆拉佐夫娜·贝利亚和数学物理科学博士谢尔戈·贝利亚的藏书哪儿去了呢？是藏在充满煤气的地下室里吗？这位善于玩弄爱情把戏的房主，长年在自己的卧室里当着妻子、儿子、儿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面夜夜宴饮狂欢，这难道可信吗？

如果不是阿列克谢耶娃女士这个舞台老手一再以主角的面目，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大作文章，我永远都不会触及这个如此有伤风化的题目。最近，俄罗斯一家有名的报纸发表的她的"日记"摘抄，简直是在拨动人心。假如以前她不能(?)向广大读者披露某些细节，那么现在应该设想，她是坦率无遗的了。据她说，我父亲将这位情人带到了昆采沃斯大林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同领袖的结识并没有对阿列克谢耶娃产生特别印象。怎么说呢，这种事也是会有的。可她想得到的是别的东西。总而言之，下一集"领袖们的爱情"故事完全可以继续写下去。有谁知道，昆采沃别墅的高墙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很有可能，尼娜将来也要不加掩饰地讲述这些……

一家有名报纸以《贝利亚爱情的女奴》为题刊登了一篇记者与阿列克谢耶娃的谈话，这引起了读者的愤怒，其中一个读者的反响

耐人寻味。是什么引起了读者的反感？是有关这个“虐待狂”故事再一次出现于媒体的事实本身吗？不是！“为什么要向青年人展示，贝利亚这个野兽并非那样可怕呢？”这篇文章以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为背景，编造有关副主席在自己家里整天盯着漂亮女人和无所不在的萨尔基索夫上校的传奇故事，无疑是苍白无力的……

我在读被激怒的读者的来信时想，当时被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老一套东西竟如此顽固？难道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在干什么吗？利用这种谎言来愚弄民众的那些人早已不在人间了，就是利用其喉舌和代言人散布谎言的中央委员会也已不复存在，而神奇上校的汽车还奔驰在首都的大街上，使迷人的莫斯科女郎惊慌不已的传说还在流传。天哪，这是什么滑稽？但这也让人感到沉痛。是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在 40 年中一直让人把自己当成傻瓜，他们真是天真到了没有边际的程度。

我重申，我父亲的一生都是在家人眼中度过的。缺点无疑是有的，任何人都有他的弱点，但如此离奇却是子虚乌有。如果谈这方面的事，我可以说，确实有个姑娘是我父亲的情人，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过。

我已经成年了，但和父亲仍保持了彼此非常信任的关系。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应该和你谈谈。我想让你知道我有一个女儿。孩子太小，我不能漠不关心。我想让你知道这件事。”他说，“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要永远记住，你现在有一个妹妹。只是别让你妈妈知道这件事……”

妈妈已经去世，到死也没有知道那个女人的事。我遵守了父亲的请求。

那个女人我见过，那时她大概有 20 岁左右，或者稍大些，是个非常年轻腼腆的女人。确实，她的生活很不安定。出嫁后生了第二个孩子。丈夫去世了，她又再嫁……她父亲是一名职员，母亲是教师。而现在，我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自然也有了儿女。

有一个时期她嫁给了政治局委员维克多·格里申的儿子。当格里申得知他的儿子要娶贝利亚的女儿为妻时，他决定找勃列日涅夫商量一下。据我所知，勃列日涅夫的反应是："好，这与你儿子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小题大作……"

顺便说一下，在讨论与我的制造新式武器工作相关问题的国防委员会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我和勃列日涅夫不只一次相遇。但我们从未谈起过我父亲的事……他绝不触及这个题目，好像格格奇科里就是格格奇科里，其余他一概不知。

他本人同父亲的事是无关的。别说勃列日涅夫，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不是全都知道准备要枪毙他。事后，根据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教训，他们不得不做出最佳选择——投靠较强的一方。是的，后来的事态进展表明，权力上层就是在我父亲死后也谈不上步调一致。请回忆一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反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随之而来的赫鲁晓夫对他们的镇压。后来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被迫去职，甚至同赫鲁晓夫一起迫害过我父亲的一些人也相继离去，最后赫鲁晓夫本人也被清除。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像新领导人从未停止过诋毁昨天的伙伴一样。老广场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延续到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天……

所有后来的领导人都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创作的"揭发"有多大价值。他们知道，但不想去破坏这个传说，因如这样做的话，他们不可避免要向人民说明那些更为重要的事情。

我完全坦率地说，我父亲并不是个清教徒。和正常人一样，他在生活中既没有回避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能回避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每个男人来说都鲜能抗拒的诱惑。类似的事情曾在格鲁吉亚发生过，他当时迷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此事以一次家庭争吵而告平息，妈妈要走，父亲自然请求她原谅，一切就过去了。如果现在对我父亲的描述哪怕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您可以想象

我母亲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她是一个格鲁吉亚女人啊！她和斯大林都能争辩，她定会毫不迟疑地摔门而去，离开这样的丈夫……

对于从萨尔基索夫等人那里逼出的那些供词，我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有人向他们作了允诺，如果他们说了希望他们说出的话，就会给他和其他的人"缩减"刑期。当然是欺骗他们。在一定阶段是需要他们的。签完字，就入狱。举例来说，在那种情况下一个警卫队长又能说什么呢？说他保卫了一个帝国主义的间谍、党和人民的敌人？叫他说曾将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带到贝利亚家，他就照着重复一遍。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期大概没有别的做法，只能如此。

这样的供词可能也给了一些在审讯中承认是我父亲情人的女人。至于秘密住宅，任何一个在国家安全部门、民警局和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都知道。通常，这些住宅的拥有者都是女人。在特工中，特别是做外国人工作的特工中有不少女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父亲死前不久，政治情报和反间谍业务归内务部管。作为内务部的领导人，父亲和特工人员会见时肯定到过这些住宅。因此，如果想这样做的话，大概可在那个倒霉的名单中列入更多人的名字，包括外国人的名字……

还有一个有关我父亲的传闻也流传颇广，有人竟然把据说发生在阿布哈兹的对斯大林的谋杀事件与我父亲的名字联系起来，具体内容如下：1933 年 9 月斯大林正在南方的一个别墅休假，据说我父亲导演了谋杀斯大林的一幕。目的很明显，为了赢得领袖的赏识。对此传闻媒体刊载文章颇多，而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有过所谓的特殊时期。这就是斯大林在某个地方休假时候。在 1933 年也有过这种时期。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去莫斯科了。于是，阿布哈兹国家保卫局长米克拉泽决定放松一下。顺便说一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像通常所说，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回归"大

自然”，来到河岸边，大吃大喝，开怀畅饮。这时，米克拉泽看见一条边防军快艇。也该他倒霉，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让大家坐快艇兜兜风，尤其是中间还有几位妇女。

米克拉泽是阿布哈兹国家安全组织的领导人，此外，作为行动部门的首长，边防部队也归他管辖。但是怎样截住边防快艇？他开始向空中开枪，试图引起艇上人员的注意。我要强调一点，是向空中，而不是向快艇开的枪。但谁又会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正站在快艇上面……

开枪的事实确定后便开始案情调查。那些发热的头脑立即认定这是一起恐怖活动，说米克拉泽图谋杀害国家首脑的生命。一次酒后失态就这样变成了谋杀。

父亲当时还是成功地保住了米克拉泽，此人只受到解职和调到格鲁吉亚降职使用的处分。后来，他和妻子一同来我家，很痛苦，认为这样对他是不公正的。我父亲对他说：

“你听着，还能怎么办？你自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家甚至指责我包庇恐怖分子。想想吧，这样处理已经够轻了。”

妈妈也为这一家人难过。米克拉泽妻子的职业是化学家，是个非常好的女人。

总之，米克拉泽去了格鲁吉亚，而这次令人沮丧的误会也逐渐被人们忘却。当然，并非全部。

当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巴去死之时，就把他的死与米克拉泽联系了起来。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还在拉科巴生前，在他的别墅里，国家银行主席罗森戈列茨的女儿用他的转轮枪自杀了。把这件事也联系到一起了。编造了一个说法——从莫斯科专门派来一个侦查员！——传言这个姑娘偷听到了阴谋者们的谈话，于是她便被这样“清除”了。阿布哈兹政治保安局未被允许就此事进行调查。法庭开了庭，几个人被判枪决，其中也包括“恐怖分子”米克拉泽。是的，我听说莫斯科的侦查员们答应释放他，并提供其它文件。据说对米克拉泽的枪决是虚拟的，而对他的问题

的决定几乎是在最上层作出的。由于没能使米克拉泽(他确实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屈服,于是决定用劝说的方法制服他。但是,这位阿布哈兹前政治保卫局领导人当时是否真的成功逃脱了被枪毙的恶运,我自然没法确定。

当然,涅斯托尔·拉科巴的死也经常归咎于我父亲,这同样没有任何根据。我只能谈一件事,这件事历史学家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提起。

已经是基洛夫遇刺以后的事了,我们和拉科巴一家在里察休假。当时通往湖边的路还没有修好。于是,父亲和拉科巴就乘车到修路的地方看看。我们一共15人:我妈妈、拉科巴的妻子,他的比我大两岁的儿子,我们的父亲以及其他几个人。

搭起帐篷,决定在湖边过夜。我们几个男孩,跑了一整天,自然很早就睡着了。当我被叫醒的时候,我正在帐篷里熟睡。不知为什么,拉科巴向我父母建议,要我们搬到他们的帐篷里去住。当然这使人困惑,记得妈妈当时不同意。但拉科巴坚持要这样,不做任何解释。我们搬了过去。我又进入梦乡,而父母和拉科巴的妻子却坐在篝火旁。天已经完全黑了。这时,几阵机枪的点射把我们应该过夜的那个帐篷打得千疮百孔。

除了拉科巴知道准备谋杀我父亲并提前做了预防,我对发生的事找不到任何其他解释。如果他们是敌人,拉科巴当然应该保持沉默……

他们之间从未存在过任何敌意,相反,拉科巴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彼此信任的。

拉科巴有自己的政治原则,这一点就是在斯大林面前他也从不掩饰。比方说,他在向父亲阐述其分离主义主张时,甚至把修建铁路都作为俄罗斯的渗透而坚决予以反对。这是他不愿见到的。

在这样坦诚的谈话中,父亲也坚持自己的观点。比如,他认为联盟应该是统一的,他不相信自治的存在。至于加入联盟的各个

共和国应该享有比当时更为广泛的权利，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管怎样，各共和国应以某种方式联合在一个阵营里，”父亲说，“从历史渊源的观点来看，格鲁吉亚应该同俄罗斯结盟。因为格鲁吉亚整个千年史，都是我们的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说得轻一点，圣乔治协定是在格鲁吉亚苏维埃化之前很久就通过的，这种政策应继续贯彻下去。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化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只是要坚决拒绝沙皇制度采用过的各种措施，不搞语言同化，不用俄罗斯出身的官员取代我们的民族干部。”

总的来说，父亲坚信，应考虑当地环境。比如，他认为，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共和国应有自己的民族近卫军。这绝不会破坏联盟的统一。但经济和军队应是无条件保持统一的。

就某些观点而言，父亲和拉科巴的看法不谋而合，而另一些观点则产生分歧。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我知道，拉科巴真诚希望格鲁吉亚繁荣这一点使我父亲对他深为敬仰。这是个事业型的人，尽管有时易受诱惑，但他是前后一贯的、积极干工作的。在几次党的全会上受到相应的严厉批判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而顺便说一下这时拉科巴身患重病，甚至到德国治疗过，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联盟毕竟需要统一，除此之外各共和国别无选择。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些观点，但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一点。当我读到说是贝利亚害死拉科巴时，这一谎言在我心中只能引起人们完全可理解的愤怒。

顺便说一句，由于拉科巴而得以幸免的对父亲的那次谋杀绝不仅是惟一的一次。众所周知，在 30 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本不置理各共和国的党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是按联共(布)中央指示行事的。这一事实早已被证实，我这里没有新东西可披露。党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到各共和国，以协调和领导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例如，马林科夫为此来到白俄罗斯，卡冈诺维奇来到

乌克兰。当然，逮捕、枪杀那些完全无辜的人都是假他人之手来实现的，但这些罪恶行径的组织者却是联共(布)中央的代表们。

格鲁吉亚也不例外。镇压的车轮也从这个共和国辗过。还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活着的时候，我父亲就通过他给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信件，其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在有计划地消灭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和格鲁吉亚人民。奥尔忠尼启则完全支持我父亲，因为他从来就是一个镇压运动的反对者。

奥尔忠尼启则死后，屠杀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不顾我父亲这位共和国领导人的屡次抗议，内务部门继续大批抓人。当然，这不是个别人的主动精神，而是执行中央的直接指示。在其他共和国情形也是如此……

在中央机构坚持要逮捕的人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学者、作家。例如，为救其中的世界科学巨擘贾瓦希什维利，我父亲两次向斯大林求情。曾两次救出加姆萨胡尔季阿。遗憾的是，所得到的回答是更加强了大规模的镇压。米哈依尔·贾瓦希什维利牺牲了。有许多格鲁吉亚文化与科学活动家也牺牲了。

看来，父亲的举动激怒了党的上层分子。当时领导国家安全机构的叶若夫决定通过其在格鲁吉亚的爪牙对我父亲组织一次谋杀。这件事不用谁来告诉我就知道，因为由于命运的安排，那个倒霉的日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车中。

我们从莫斯科返回时走的是格鲁吉亚的军用公路。和我父亲、妈妈一起坐在车里的有一位党务工作人员的妻子和中央第二书记、白俄罗斯族人哈茨克维奇。当试图拦截我们汽车的时候，天已开始黑了，接着前后一阵枪响。这明显是一场谋杀。

哈茨克维奇坐在我旁边，所以我亲眼看见他受了伤。

他在我母亲的怀中死去，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他最后说的话："尼娜，你别忘了照顾我的孩子……"

一年以后，从白俄罗斯发来几份文件，宣布死去的哈茨克维奇

为人民公敌。在这种情况下家人也在被镇压之列，但我妈妈通过某种方式成功地救出了哈茨克维奇的孩子，并将他安置在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的家里。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像我父亲一样，哈茨克维奇也戴夹鼻眼镜。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开枪打我父亲的人选错了目标。

所以，我只知道两次对我父亲的暗杀活动。至于一共有多少次，不得而知。在家里，我们都尽量不触动这些不愉快的回忆。

对于党的机关(我是指全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来说，尽管我父亲已是一个共和国的中央书记，他仍属于外地工作人物，不过有自己的立场。中央机关对这些人始终怀有戒心。雅戈达和叶若夫都曾设法拉拢父亲到自己一边。常常把他们说成是全无头脑的精神变质的人，这是不正确的。那些专事反对人民的为非作歹之徒，机敏善变，其中不乏聪明之人，使其犯罪活动畅行无阻，这就是全部真正可怕之处。

其实，在中央组织部中获得升迁的叶若夫和雅戈达等人一样，非常清楚，贝利亚对他们个人是何等危险。首先，他有在情报机构丰富的工作经验，聪明机敏丝毫也不差。斯大林了解他。又是格鲁吉亚人。完全可以料想到，他可能被调进莫斯科工作。

他们从未像对待我父亲和我们家这样殷勤地对待过任何一位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在莫斯科迎接我们，请我们去他们的别墅……而父亲，我看得出来，对这种表面上的友善总是怀有戒心。这多少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是个开朗外向的人，喜欢和朋友相聚。

记得有一年冬天，叶若夫邀请我们去他家别墅。表面上这是一次朋友请客。要知道，他和父亲之间以“你”相称……但父亲却说，这次出行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是叶若夫或其他的人都不蠢。他们看到，也懂得，我父亲是有可能进入中央机构的人员之一，而竞争对手应

及时予以除掉。这也是这一制度的铁的规律。

父亲从未谈及这个题目，但我想，他在心中早已"看穿"了雅戈达和叶若夫。虽然对谋杀组织者的调查长期没有结果，但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点还是明白无误的。格鲁吉亚军用公路的那次谋杀的直接领导者无疑就是格鲁吉亚的内务人民委员。很清楚是谁主使的这次行动。

顺便说一句，谋杀父亲事件发生之后，斯大林给第比利斯运来一辆美国产装甲汽车。当时各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都收到了这样的汽车。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想法：针对我父亲的最初的一些阴谋的线索（还是战前的）都指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里人们好像感觉到了，如果他被调到莫斯科，对权大无比的惩罚机构会发生何种巨大的变革……

四、党的上层分子为什么要迫害我的父亲？

为什么党，确切说是党的上层分子要迫害我的父亲？因为他触动了苏维埃等级官员制中最神圣的东西，也就是能动了这个制度的基础。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在谁面前为我父亲开脱。他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所犯的罪，这些都是存在的。因为你在国家领导中同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一致，或不一致，你是出于个人信念，或者是由于某些情况而对某些事情举手赞成，这些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是的，如伏罗希洛夫所做的一样，我父亲并未在枪决人员名单上签字；也像卡冈诺维奇或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或日丹诺夫一样，没有实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只要他是政治领导中的一员，他就难脱干系，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他也曾主张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以对自己和同事的活动作出公正的评价。

无论是战前还是后来，我们具有的制度都不是斯大林个人独

裁制度。今日一些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很方便地把斯大林说成是个半疯狂的独裁者，而他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形势的受害者。是的，就连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也由于无所不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怖活动和总书记的专制淫威而成了同样的牺牲品。这是不对的。罪过属于每个人，属于斯大林本人，也属于其他人。他们都要为制度造成的全部失误、全部错误和偏差负责，包括1917年10月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也要由他们承担责任。至于谁的罪过多些或少些，谁的功绩更为举足轻重，只有交给历史评判了。

苏维埃领导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存在着为纯洁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人。我深信，这是无效劳动，因为没有什么可纯洁的。制度本身始终就是如此。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某一阶段的布哈林……一些人走了，又来了另一些人。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及其核心——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变。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专政变成了党的机关的专政，但没有原则性变化。专政仍然是专政。

斯大林死后，父亲依然希望在现存制度的条件下可以做一些改变。父亲以及和他一同工作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都明白，必须改变方针政策。但做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像我父亲要求的那样，改变党对国家领导的原则，他们自己就会站到全能的党的机关的对立面。而这也就是党的上层的终结。只要我们想一想，当最后一位总书记开始在新老朋友之间摇摆不定时，他的职位是如何的岌岌可危……而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去”的？全能的不是总书记，全能的是机关，总书记是机关的傀儡。

父亲没有排除以新代旧，换掉斯大林时期的领导干部。按照他的意见，各共和国不乏精明强干的领导人，有能力制定，而同样重要的是能贯彻新的方针政策。记得他曾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谈过这个问题：

"设想一下，我们总有一天要走，由一些年轻人来接替我们。难道他们会比我们干的差吗?"

"是的，当然不会，我们过去也是年轻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同意父亲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马林科夫还说过这样的话：

"而我一生都在幻想成为一名工程师……"

父亲这时忍不住了：

"算了吧，格奥尔吉！我们知道你幻想什么。你在学习的时候就急着进到党的机关中去。对我们最好还是别讲天方夜谭吧。"

这样开诚布公的谈话有过几次。

父亲的主要失算在于他信任他们所有的人。他知道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但仍然信任不疑。我想，尽管他已猜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起而反对他。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很快就会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将使一切都将各得其所，并对每个人论功行赏。斯大林死后的局势促使人们进行的真诚对话。人们从战场上归来，恢复被破坏的国家，他们期待对多年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作出答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今天有那些事？是谁之过?

我想，只要父亲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就会赢得支持。有一个情况多年来阻碍着对他作为一位担任国家高级职位者的活动具有客观的看法。这就是他领导着肃反机构。至于他是什么时间当的人民委员，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民委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一词本身已为其刻上无法去除的印记。

在本书中，我不要求读者改变对肃反机构的看法，但我希望，读者最终能了解推动这一机器从事最可怕犯罪活动的秘密动因。

但是，从契卡(肃反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只是过去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亦讲述党本身和党的上层机构，正是它们的罪

过使我父亲命断黄泉。但是,这本书也叙述那些只要认为正确就敢做敢为的人。他们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以及国际关系;他们创造新式武器,建设新工厂……他们中的一员就是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度过了不长的却是闪光的一生,我对此深信不疑。命运使他和什么样的人没有相识呢!和他经常接近的都是些勤于思索、积极进取、精力充沛的人,其中有我父亲的亲密朋友: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院士、冶金工业部长捷沃相。和父亲关系特别密切的还有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还有明茨院士、党务工作者库德里亚夫采夫、朱可夫元帅……

贝利亚家永远受欢迎的客人有艺术家托伊泽、哲学家努齐比泽、作家康斯坦丁·加姆萨胡尔季亚、格鲁吉亚体育运动的著名组织者阿尔奇尔·巴克拉泽和艾格纳托什维利以及那个时期许多其他有趣的人。

生活迫使他成为一名契卡人员,但他对年轻时研究过的建筑学的热爱一直保持多年。他非常羡慕他那些已成为著名建筑师的老相识、老朋友。我知道,父亲在格鲁吉亚、在莫斯科会见了热尔托夫斯基、谢韦罗夫、阿布罗西莫夫及其他著名建筑师,并饶有兴致地研究他们的设计方案。

我父亲对军人特别尊敬。除朱可夫之外,我能说出名字的和他关系较近的人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什捷缅科将军。

那时,有许多人通过父亲的帮助而得到升迁。最著名的人物有乌斯季诺夫,由于我父亲的推荐他在年纪很轻时便被任命担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一职。还有上面提到的万尼科夫,捷沃相,化工部长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萨布罗夫是位经济学家,能力很强,但他不合党的上层人物的胃口,因为他没有在党的机关工作过,而这一点在党的权势人物眼

中是个严重缺点。他们不能容忍真正专家在任何领域的存在。尽管许多人反对提拔萨布罗夫，但我父亲坚持己见。为实干家争得一席之地乃我父亲之所长，至于反对者担任什么职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任命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担任人民委员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父亲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天才的工程师，而党的官僚们却回答：

“怎么能这样，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您提议让一个一天都没干过工厂党委书记的人担任军备人民委员！他可完全不懂党的工作！”

“他懂业务，我认为这就够了，”父亲反驳说。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往往介入进来。于是，我父亲推荐的候选人的任命问题便以某种方式获得解决。遗憾的是，党的机关在提升干部时总是采用不看业务素质的糟糕做法，在生产工作中我们大家都遇到过这类情况……

我父亲同党的机关的关系一直是非同寻常的。我自己在数十年以前就解决了这一问题，我在坐牢之后坚决拒绝回到党的队伍中去，当时烧掉党证还不被视为英勇之举。父亲则要复杂些，他担任的几个高级职位都必须以政治局成员为前提……

但父亲从不隐瞒自己对党的机关的态度。例如，他对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都直言不讳地说过：党的机关使人蜕化。所有这一切只在苏维埃国家初建时期有用。父亲质问他们：如今谁还需要那些监督员？

父亲和工业界的领导人、工厂经理们都这样坦率地谈过，那些人当然从精神上就厌恶中央委员会那些无所事事之徒。

父亲在斯大林面前也同样坦诚。约瑟夫·斯大林表示同意说党的机关已不对具体事情负责，而专事空谈，无所作为。我知道，在斯大林去世前一年，当时他提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名单时他讲了话，其实质内容是说应该寻找领导国家的新方式，旧方式不是最佳选择。当时还严肃地讲到党的活动问题。我想，今天将这些材料公之于众一定是有意思的。但不巧的是，已正式宣称，在党的档案中没有这一速记记录。当然，这又是谎言……

档案问题常常成为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人，他们非常执着地试图能看到当时有关我父亲和国家上层领导的活动的材料。请注意，是试图客观分析过去40年所发生的事件真相。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些材料。是谁不许？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我知道，同样坚持不懈地试图要看到这些档案的，还有国外共产党。这就需要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批准。但就是在这些罕见的情况下，"兄弟党"的使者也未能如愿以偿。中央机关不出示原始文件，只提供中央委员会就某一问题所作的说明。有关我们和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之间关系的材料也是如此……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时期的文件和50年代的材料，也只是有选择地部分予以公布。按我的理解，政治游戏还未结束。有关涉及我父亲活动及其命运的所谓案件的全部卷宗，仍然一如既往，严加保密。而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但愿读者原谅我的啰嗦。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几十年中，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对人民仍然秘而不宣。当然，"下层"不能知道"上层"有怎样的波翻云诡，尤其是有关贝利亚所管辖的秘密部门的情况更不能为"下层"民众所知。

和其他人不同，父亲不在报上长篇大论，闪烁其词，很少在党的积极分子和其他群众性集会上抛头露面。这不仅仅是因为"保密"。他对夸夸其谈感到愤怒。他整个的一生都在从事具体而责任明确的事务，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都是如此。他简直没有时间去参加那些党的上层所热衷于搞的群众性活动。苏联党和国务活

动家近几十年的经验使人确信，要么干实事，要么"和人民"扯皮，无休止地空谈。正如古人所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而我父亲珍惜分分秒秒，从小我就知道他非常自律。实干家指的正是他这种人。

显然与占据如此高的职位的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我父亲对荣耀的态度是冷漠的。虽然，众所周知，在苏联领导人中从来不乏例外。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他拥有国家安全总政治委员的头衔。在1945年，作为国防委员会成员，他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当时获得表彰的还有马林科夫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当国家安全和内务机构职务按军衔党衔时，父亲成为苏联元帅。由于战时组织高加索防务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在此之前，他还因从事情报工作而获得过红旗勋章。记得有一次父亲笑着说："为什么我要六枚列宁勋章？难道一枚不够吗？"就修改苏联奖励制度，父亲有过许多有趣的建议。奇怪的是，竟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这涉及到有关苏维埃各共和国实施勋章制度问题。

摘自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记录：

"巴吉罗夫：讲到的是要建立各共和国新的勋章制度。贝利亚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我正在准备有关勋章的问题。我对他说：你怎样准备？他改口说：我们想设立新的勋章。我想，勋章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不是组织问题。这是党中央和政府的职能，是政治问题，他怎么可以搞这个问题……

"马林科夫：什么勋章？

"巴吉罗夫：文化勋章，全苏和各共和国的文化勋章。

"布尔加宁：针对哪类人？

"巴吉罗夫：针对艺术工作者、戏剧工作者。

“马林科夫：举例说一下是什么勋章。

……可以是以某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勋章。

“尤苏波夫：按照他的吩咐，他的助手奥尔登采夫给我打来电话，说贝利亚提议设立两类勋章：第一类是全苏的，第二类是各加盟共和国的；然后设立民族共和国伟大人物勋章。例如，他的共和国是尼扎米勋章，乌兹别克人则是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等。我当时说，这问题须得考虑考虑(笑声)。到目前为止，我们受到的不是这样一种教导……”

在那次全会上对我父亲万箭齐发，说他阴谋扼杀“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而父亲不过是力争给予各加盟共和国能享有更广泛的权利，努力扶持民族干部。勋章事件是个典型例子。例如，我父亲认为，所有各加盟共和国应设立自己的国家奖项，如乌克兰的最高勋章可以是舍甫琴科勋章，格鲁吉亚为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党的上层连这点险都不敢冒。

从我父亲方面来说，他并不像那次中央全会上对他屡加指责的那样“歪曲民族政策”。父亲是统一的强大国家的拥护者，同时他深信，中央所推行的对加盟共和国的政策恰恰是有害于各民族人民的友谊的。中央委员会总是力图给各加盟共和国“套上笼头”，父亲对此不能容忍。

父亲屡次引证沙俄时帝国政策的档案材料，举例说明在现代国家结构中无论如何不能实施这些办法，尽管形式与往日已有改变。

据我所知，父亲和朱可夫曾讨论过在什么阶段可以设立民族兵团问题。他们争论很久并最后得出结论，一旦组建这种军队的第一师，在苏联的组成中就再也没有这个共和国了。这种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不甚入耳，但朱可夫和父亲认为，民族部队是一种装饰性的，只为参加重大活动检阅而设，就像各加盟共和国的外交

部一样。记得朱可夫规劝父亲说：

“拉夫连季，你要明白，这样的军队一出现，例如在乌克兰，或在格鲁吉亚，全苏军队和联盟的末日就到了……”

父亲笑着说：

“如果我们自相残杀，你说的当然不错……而如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使整个国家结构对外是统一的，但对内不要压制各加盟共和国。”

朱可夫表示同意，虽然内心可能依旧疑虑重重。但民族军队总未获准组建。父亲开玩笑说：

“为什么格列奇科不是乌克兰集团军司令？为什么罗科索夫斯基可以当波兰国防部长，而不是格列奇科？我们再找一个白俄罗斯人……”

但是，玩笑归玩笑，而他的想法是建立真正的而非这种用刺刀维系的联盟，他一直保持这个想法，直到他去世之日。保存着很多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文件，父亲在这些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建议。在中央全会上，这些都成了他的罪状。在那时，中央也害怕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在那次中央全会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叛国犯罪活动”的决议中还列有对我父亲的另一指控：“事实表明，还在斯大林生前，尤其是在他逝世之后，贝利亚利用各种借口千方百计阻挠解决与加强和发展农业经济有关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现在毫无疑问，这个人民的无耻的敌人的目的，就是要从内部破坏集体农庄，为居民食品供应制造困难。”真是荒唐！众所周知，我父亲在这次会议之前的 15 年里和农业没有任何关系，但对这种谩骂已无人会出来回答。于是，就指控他使农业和工业崩溃，以及其他种种罪行。但有一小部分情况是真实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父亲对集体农庄的态度。这一点也被党的上层所利用，说他是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而他确实说过，集体农庄是剥削人的理想制度。要知道，德国人在

占领期间曾组织了集体农庄的工作……对剥削来说是理想的，但不是最佳的，父亲这样补充说。他看到两条振兴农业经济之路：家庭农场之路和大农业经济之路。父亲提议进行这种试验。考虑到从集体农庄到大农业经济还距离遥远，就先选出近百个国营农场，按工厂熟练工人水平发放劳动工资，为其提供机械设备，然后看看是否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恢复原有的家庭农业经济。但这样做并不是靠下命令解散集体农庄。我父亲认为，如那样做，就成了强迫推行的第二次集体化。他举出了具有家庭农场经营深厚根基的具体地区，他认为强迫乌克兰西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居民加入集体农庄简直是荒谬的。

我不记得是谁在会上大喊，说我父亲一生中从未读完一本书……他经常研究档案文件，甚至借助于沙皇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用足够的事实证明，发生在乌克兰和顿河流域的农民起义不是偶然的。那里有很强的农业经济，人们知道他们为了什么而战斗。那里的集体农庄简直就是通过流血建立起来的。而在俄罗斯中央地区情况就不是这样。很遗憾，我父亲没能说服最高领导层，党的上层不惜任何代价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西部地区努力实行集体化，而在这些地区是不该这么做的。我父亲的建议被束之高阁。数十年后人们虽然记起了这个问题，但关于这些都是我父亲的建议这一点仍然对人民保密。

我知道，父亲对家庭农场经济的拥护者斯托雷平的思想非常感兴趣。他运用大量的档案数字资料证明，再现世纪初的农业丰收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不怕利用斯托雷平的经验，并最终下决心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正如所可料到的那样，父亲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而在他死后，关于家庭农场就再没有人敢轻易提起了。

“如果我们不能让人吃饱，还谈什么共产主义”，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的矫揉造作和故意做出为民请命的姿态。父亲真心想改善那负载着整个可怕战争重负的人民的生活水

平。他把提高生活水平视为头等大事，并为实现自己的意图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党务活动家报告说，贝利亚公开声称工会无所事事。我可以坦率地说，他连自己对党的机关的态度从来都不加掩饰，可想而知，他这样说工会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父亲一度主管过的冶金、石油、煤炭工业部门的老战士一定没有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我敢肯定，这些都不是来自苏维埃工会感人的关怀。父亲和他周围的人都深信，对待劳动者不应有另一种态度。我不相信，后来能像战后几年困难时期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解决工业领域内存在的社会问题。

请看，党的官僚们在那次全会上声讨他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愤怒："他向我们提出大堆的文件、建议……他在寻求廉价的声望……"特权者的不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共产党和它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从来就只需要那些不会动脑、毫无进取精神的应声虫，而非创造者。而当仇恨超过一定限度时，党的上层分子便会进行政治绞杀，并在其死后再上演一出司法审判的闹剧。

我不知道认为1953年我父亲失败的那些人是否正确。如果说我父亲死了，这种认定可能是接近真实的。但是，他一生所信奉的思想、原则却使我们相信，为这些思想原则而战斗是值得的。我们坚信，真理当时在谁的一边，时间会作出裁决。

一个政治家可以从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可以枪毙他，败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诋毁他的形象，就像对我父亲做的那样。但是，将他为自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好事一笔勾销，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 斯大林和贝利亚

一、贝利亚与斯大林是否有特殊关系?

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比如,有一位令人厌恶的苏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将军便时常利用完全捏造的事实,徒然歪曲贝利亚的形象,试图让读者看到他是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一个苍白的影子。另外一些人不那么耽于幻想,继续在要弄“格鲁吉亚牌”的游戏。这些臆测都无助于我们接近真理。斯大林与我父亲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诸位读者,让我们先比照一下两件证据确凿的事实。第一件,莫斯科,红场,斯大林葬礼那天。贝利亚从陵墓主席台上念他的著名悼词:“我们有目共睹……”,第二件,不知为什么同第一件不同,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的兴趣。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会议。从那次念悼词之后仅仅过去4个月,但对我父亲的一项指控竟是:“贝利亚想破坏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全会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其语无伦次的发言中也有一句名言:“斯大林同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他就主张要反对个人崇拜。”

那次全会记录本身直到不久前才解密,看来这为认清苏联国

家首脑与其亲密战友之一之间的相互关系透出了一丝光亮。同一位米高扬时常悲痛地说,"斯大林过分信任了贝利亚",但马上又否定了自己,肯定没有这回事。那些证明斯大林对我父亲有明显猜忌的证据也是同样可疑的。人们说,战争期间斯大林把国家安全工作与内务部分开,把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调到部长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如果考虑到 1941 年 6 月 30 日我父亲就进了集中国家全部权力的国防委员会这一事实,那么米高扬的讲话听起来就非常奇怪了。

可无论如何,发自高高主席台上那铿锵有力的声明,哪怕缺少最起码的逻辑,仍然值得注意和引人深思。

1953 年 5 月追悼会上我父亲的发言到底有几分真诚? 和他的其他声明是否矛盾?

他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能说的话(他已说过!)没有获准在这个主席台上来讲。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父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在那次中央全会材料中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恐慌。

有人经常问我是哪种人,是斯大林分子还是反斯大林分子。我自己认为我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非反斯大林分子。我反对这一制度,它产生了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这一名单读者会毫不费力地续列下去。请回想一下那些镇压。那不是从 1937 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从 1934 年,比这早得多! 而有多少无辜的牺牲应由斯大林之后的人负责? 而且问题在于数字,这是制度之罪! 然后才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其他的人。但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有罪的。他身边的那些人也难逃罪责。但既然斯大林是为首的,他应负的责任自然就要多些。

坦率地说,我对斯大林之死的感受是双重的。总的来说我很同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我对她非常了解,到那时她还孤身一人,而斯大林死后她的生活也多有不顺。当然,举例说,表面

上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都曾关系过她，实际上这些人非常清楚斯维特兰娜的心理十分脆弱，他们把她推向了后来发生的事件。

关于斯大林病危之事是我回家吃午饭时妈妈告诉我的。通常父亲这时也回来，但那天他没在。妈妈坐在那里哭，并马上告诉我，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得了脑溢血，很可能活不成了。

“那你哭什么?”我问，“要记住父亲说过的话。”

我们谈到斯大林准备对我们下手的事。

妈妈当然什么都知道，父亲确实将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告诉了我们。

“知道吗，”她回答说，“我什么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我坐下吃午饭，而妈妈去了斯维特兰娜那里。

关于斯大林之死及其亲人、战友在那些日子的所做所为，叙述的文章很多，但基本属于传言和明显的臆测。如说斯维特兰娜差不多日夜守候在斯大林的床边，这一点广为人知。而我们知道，斯维特兰娜非常平静地呆在家里。我不是说她不爱自己的父亲，但她的爱绝不像所描绘的那样如醉如痴，而基本是正常的那种……

我当然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由党组织给多单位下达通知，各单位确定人选。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相反的情况我就不会去了。

当时，1953 年 3 月，我已经不是来自第比利斯的中学生、对领袖盲目崇拜的毛孩子。我知道很多，也明白很多。从一定意义上我今天完全可以说，只要斯大林再多活几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能活过他的人一个都不会有。当然我的父亲也不例外。还在斯大林生前就已准备除掉他，这一点他对我和妈妈讲过。

记得已是斯大林死后，当我父亲对妈妈说他向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及其他人提出了怎样实行改革的建议时，她说：

“或许是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来做这件事，或许是由他

们来做，都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如果由他（指斯大林——译者）来做的话，就不会使人那样感到委屈。”

妈妈非常了解斯大林周围的人，她不相信他们会允许父亲实施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我父亲都将被撤职这一点，她在当时就确信无疑。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人的命，否则，他会一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人，他们不像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再重复一次，我父亲也在内）那样了解他的一切。毫无疑问，他会清除掉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我甚至要说，斯大林已准备好作为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和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绝对纯洁的人载入史册。我们客观而论，斯大林于身后确实留下了一个建立在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上的伟大国家。至于取得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父亲非常明白这一切。虽然他比政治局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和斯大林有着更深的矛盾，但国家首脑的死还是使他痛苦。我知道，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矫揉造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之死给他带来的痛苦源于纯粹的人之常情。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与那个“明格列尔案件”的处理方式不符，但事情就是如此。我父亲不是一个残忍的爱记仇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

摘自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录：

“只有一个人的表现近于有失体统，这就是贝利亚。他兴奋异常。他的平时就令人生厌的脸，由于充满激情而不时扭曲，变得更加难看。他的激情就是：虚荣、残酷、狡诈、权力、权力……在这极为重大的时刻，他努力使自己既不过于狡诈，又不能不够狡诈！这一切都写在他的额头。他走近床前，长时间看着病人的脸。父亲有时睁开眼睛。但是，看得出来，他已经没有意识，或处于意识朦胧状态。贝利亚当时全神贯注地

盯着那双朦胧的眼睛。此时此地，他也希望让自己表现出是‘最可靠最忠诚’的人，就像他一贯竭力表现给父亲看的那样，很遗憾，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表现非凡……

“在最后时刻，当一切就要结束的时候，贝利亚突然发现了我，就吩咐说：‘把斯维特兰娜带走！’站在周围的人看了他一眼，但谁都没有动。而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第一个快步走到走廊，在大家默默地围着卧榻站着的寂静大厅里，响起他的在声音里透出无法掩饰的兴奋的响亮嗓音：‘赫鲁斯塔廖夫！车！’这是一个现代宫廷奸臣的无与伦比的典范，东方狡诈、谄媚、伪善的化身，甚至像我父亲这样一般很难欺骗的人都曾被他蒙骗住了。这个多头蛇的许多作为如今都成为我父亲名下的污点，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有罪的……”

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话：“贝利亚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可怕的角色，妈妈是多么害怕和仇恨他呀！”可当时斯维特兰娜的母亲纳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对我父亲不可能产生什么爱和恨，他们连认识都不认识。斯大林的妻子于1932年自杀，是在我们家搬到莫斯科之前6年。斯维特兰娜那时还是个小孩子……

我理解斯维特兰娜，尽管我不可能同意她写的那些东西。她只是想让她的父亲不要显得那样可怕。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他已被官方正式指控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人们怎样写他都可以无所顾忌。照我的理解，道德在这里已不起什么作用了……

几年前，她回到苏联后，斯维特兰娜希望和我们见面。妈妈当时还活着。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没有与她会面。关于她的生活我只是从西方传媒报道中知道一些。

而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非常熟悉。我和斯大林的孩子

们在一个学校读书。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和我未来的妻子坐同一个课桌。也是她介绍我和马尔法认识的。

记得斯大林的女儿是个聪明腼腆的小姑娘，英语非常好，很依恋我母亲。战争期间，一件与斯维特兰娜有关的事使我陷入不快的窘境。从前线归来，我赠给她一件礼物——一支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过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私人警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来到我学习的军事学院。

"准备一下，"他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叫你去。"

我去了，在此之前叫我去他那里的事从来没有过。

我们简单谈了几句我的学习，然后他说：

"是你送给斯维特兰娜一支手枪？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因为枪出的事。知道不？斯维特兰娜的母亲在情绪恶劣的时候自杀了……"

我愣住了。只知道斯维特兰娜的母亲死了，但关于自杀的事我们家从没有人说起过。

"好了，"斯大林说，"去吧，但因为这些玩艺是应该受罚的……"

当然，我和斯大林不只一次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见过面。我必须承认，我对他的看法就是今天也远不是单一的。我们住在格鲁吉亚时，我们只是为他祈祷。在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不时听到父母谈论斯大林。就是我自己也已逐渐明白，谁是镇压和政治运动等种种暴行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能使任何人为之倾倒着迷的人。说只有平庸的谄媚者才认为他伟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想，许多文化界人士，包括著名苏联作家、艺术家，都按各自的方式真诚地歌颂过斯大林。虽然不可否认，通常也不乏专靠拍领袖马屁而活的流氓无赖。

我今天甚至也不想冒昧去指责几位西方著名作家，他们当时

都为斯大林的魅力所倾倒。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大林的确是一位能让聪明练达、阅历丰富的老者和初出茅庐的孩子都着迷的人物。类似的感受我在自己身上体验过，因此，我认为，我在道德上有权利肯定这一点。

在这里不是讲斯大林是好是坏，他是不是个独裁者。当然，他是个独裁者，但我绝对不理解“斯大林分子”和“反斯大林分子”之间的争论究竟意义何在。我重申，我不属于这伙也不属于另一伙。看一下一个具体历史人物背后的现象不是更重要吗？但遗憾的是，我知道认真剖析“斯大林怪象”的尝试并不多。

摘自法国著名政治家、国务和军事活动家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回忆录：

“……我有一个印象，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因在俄国施行暴政而衰颓的、具有强烈的民族虚荣心的狡猾和毫不妥协的斗士。斯大林具有强大的意志力。阴谋家的生活使他疲惫不堪，掩盖起自己的思想和心灵，没有同情心，不相信真诚，他在每个人身上都感到了抗拒或危险的根源，他的一切就是诡计、猜疑和固执己见。革命、党、国家、战争，对他来说都成了实行统治的原因和手段。他实质上利用诠释马克思学说的诡计和严酷的极权，靠果敢和非人的诡诈，在使一部分人俯首贴耳的同时除掉另一部分人，他靠这一切得到了高升。

“从那时起，斯大林便将俄罗斯视为神秘的国度，认为她的制度比任何制度都强大和稳固。他用自己的方式爱他的国家。俄国在一段可怕的时期里也把他视为沙皇，并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以便充当他的工具。团结斯拉夫人，消灭德国人，在亚洲扩张，获取自由出海口，这就是祖国的梦想，这就是一个专制暴君的目的。为了取得成功需要两个条件：使国家成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当前则在世界大战中赢得胜利。第一

项任务已在付出了前所未闻的痛苦和生命代价之后完成了。当我见到斯大林的时候，他正在坟墓和废墟之间完成第二项任务。他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遇到的人民极富生命力和忍耐精神，就是最残暴的奴役都没能使其瘫痪；他的国家具有资源丰富的土地，最可怕的滥用也未能使其耗竭；他遇到了如没有那些盟友的话就无法战胜敌人的盟友，但是盟友如没有他，也同样不能击溃敌人。

“在我与斯大林交谈的15个小时中，我研究了他高傲的深不可测的手腕。身着元帅服的共产党员，高深莫测的狡诈的独裁者，外表和善的征服者，他总是努力将别人引入歧途。他的激情是冷酷的，缺乏那种让人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的魅力。”

为斯大林开脱罪责是不可能的。读者清楚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但他的确是一个聪明人，洞悉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弱点。他不是那种不善于分析形势和自己行为的狂热分子。当需要的时候，他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能允许做的一切。首先是权力集中。我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那些在民主条件下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那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儿？……而当需要的时候，斯大林又是多么轻易地利用同一权力去达到其它目的。这同样是他的罪过。他还是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人，今天有人试图将他视为偏执狂病患者，如果真的如此，对他的苛求就该少些。但事情并非如此！站在布尔什维克权力金字塔顶上的是一个天赋才能的人，这只会加重他的罪恶。

有人正确指出：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的智力潜能一直在下降。这是真实的。今天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契尔年科或戈尔巴乔夫等人相比也许有些可笑。我说这些仍然不是为斯大林开脱罪责。

相反，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可怕的暴君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之内，他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改变很多东西的。不是全部，这是制度本身不允许的，但却可以改变很多。可斯大林不仅没有缓和这一制度，而是有意识地使许多东西尖锐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条去压制这一派中的对手。这就是大规模地镇压和政治运动。

我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个不懂得同情和怜悯的人，也不接受说斯大林用这些镇压活动建立起连环保制度，使数以千万计的人陷于罪恶的渊薮的说法。难道布尔什维克另一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如此轻易地建立起了集中营，使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数百万人？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在列宁的首肯下实行了人质制度？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捍卫者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斯大林只是完善了列宁时期就已开始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列宁和斯大林在智力和狡诈方面处于伯仲之间，不相上下。但我最好还是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这两位领袖究竟谁是"最人道的人"……这还需要认真地加以思考……

后来"领袖们"试图使我们相信斯大林背叛了自己的"伟大导师"，他们都是在编造谎言。来自所谓秘密档案中的列宁著作和书信(目前只有部分出版)所肯定的东西刚好与此相反。"逮捕"，"枪毙"，"绞死"，"就地枪决"，"不宣布原因就逮捕几百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气勃勃的遗产我们已写得何其多，讲得何其多。为什么我们对此"遗产"含羞地保持沉默？要知道支配政权的不是斯大林，也不是以雅戈达和叶若夫为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

而且，问题可能还不在于列宁，起码不仅在于他一个人，而是不是在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权结构，在于那个由布尔什维克主义衍生出来的可怕和缺乏人性的制度？但列宁当然也是难脱干系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生前这一切都是不能讲的，但我知道，父亲无意于神化列宁和斯大林。总之，任何个人崇拜都使他憎恶。如果考虑到父亲是个消息灵通的人，那就不难猜出，他会知晓多少这样那样的罪恶内幕。

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二、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内务人民委员的动机

1938年11月底我父亲受命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以接替叶若夫。斯大林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何在?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唯命是从。原来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这一制度长于榨尽一切：从一个人身上要榨取所需要的一切，而当不再需要他时，就将其一脚踢开。同时，斯大林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

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

第二个不无重要的形势是大战的临近。当我父亲和斯大林因卡廷事件发生冲突后，日丹诺夫立即建议：

“我已准备好负责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斯大林没有任命他，任何事他都想由专家来做。日丹诺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党的机关工作干部，大规模镇压的积极拥护者。这个职位上已经不需要他了。镇压行动已经停止，斯大林还未准备将其恢复。相反，那一时刻内务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必须用另一种风格的人。斯大林是残忍而又聪明的人，他非常明白，继续镇压的结果就是他个人权力的垮台。也许他已认为，有人特意这样做，已是为了要清除他本人。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要在有效监督之下来使党的制度所制造的镇压机器停下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曾雪片般将信件投向莫斯科，以保护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总之，那一时期父亲使斯大林完全满意。而且，还存在一外部刺激因素——托洛茨基，整个30年代他都使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不得安宁，而足有10次除掉他的尝试均告失败。又过一段时间，战争开始了。父亲又回到自己的位置。后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专业实验室基础上成立原子能管理局时，他又被责成也去管这一问题。还有火箭、飞机、工业、氢弹方案……看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才没有急于除掉我的父亲。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充足的，但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始终考虑时局变化。在生命之旅快要结束之时，当地对空导弹已制造完成，洲际导弹基本准备就绪，当氢弹的制造已近尾声的时候，看得出，斯大林已准备好彻换掉父亲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些……

时常天真地想，在那种条件下有的人能有所做为，改变某些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而已。但我绝对相信，除掉我父亲，斯大林会得到周围许多人的支持。首先满意的是党的机关，它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他从不掩饰他反对党的机关

对国家实行专政的观点。不光是党的上层，就是一般的党组织对这类事情也总是非常敏感的。

一般来说，党的上层分子总是给斯大林帮倒忙。我父亲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个人崇拜的危害。顺便说一句，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党的上层分子有意宣传个人迷信并不仅仅是出于其固有的谄媚逢迎。毫无疑问，这里有着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没干什么。“他既是上帝，又是沙皇，还是军事首长……”就是说，一切罪过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后来党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的领袖身上。像通常那样，其他人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我父亲在此之前就已不在人世，而没有任何另外一位斯大林过去的战友鼓起勇气站出来，道出斯大林周围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大概在德国发生的也是这种情况。在那里大家也把罪恶都往希特勒身上推。这样说起来方便。但独裁归独裁，所有的一切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

记得父亲不只一次说过：

“斯大林犯了任何人都不能饶恕的罪。”

按照他的直接命令或在他的同意下，确实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行，不应该找理由为斯大林开脱，像有些人过去和现在都这样做的那样。我父亲没有这样做过，虽然他也不是败坏斯大林个人名誉的拥护者。至少在 1953 年的春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认为，无论如何需要公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路线。正是党，首先是其最高领导层应当对所发生的一切向人民负责。

“我不知道”，父亲对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其他人说，“我们是否还能留在自己的职位上。我们报告自己的工作，其他事就由代表大会去决定。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换掉我们，那就换掉吧。届时取代我们的将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一定不会重犯从前领导者

难以回避的那些错误。”

我知道，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是同意他的观点的：

“是的，我们过去也是年轻人，并曾为老家伙干扰我们做事而愤怒。当然，应该召集代表大会，到会上谈这一问题……”

诚然，对如何提斯大林的名字曾有过疑虑。不管怎样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讨论将沉重地打击原总书记的威信。我父亲表示异议：

“不公开讨论我们就无法过关。任务不在于立即公开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或败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声誉。应当从我们中央主席团全体人员开始。我们报告自己的工作，揭露党的路线错误，然后听听大会怎么说。”

主席团成员们在这一点上同意我父亲的意见。他们表示了同意，因为知道，大家永远也不会去冒这个险。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眼里，这种举动当然是轻率之极的行为。

讲到斯大林，使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们迁居莫斯科的事。父亲不想回契卡重操旧业，请求改派他去搞经济工作。这种情况在他的生活中已不止一次。但是，当作出了调父亲去莫斯科的决定时，妈妈却无论如何也不想离开第比利斯。这使斯大林非常恼火，安排在一昼夜时间内就把我们全家都搬到了首都。第二次冲突是在妈妈拒绝入党的时候出现的。斯大林甚至为她作了批示，说您不是家庭妇女，而是位苏联学者，同时又是人民委员的妻子，您不能留在党的队伍之外。

三、斯大林和他周围人的关系

在父亲在莫斯科工作的15年当中，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各种情况都发生过，人们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们两人是亲密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是如此。斯大林讲格鲁吉亚语的时候非常少，而

且每次讲总要向其他人表示歉意。他们之间从未像描述的那样以“你”相称。斯大林对我父亲总是叫名字和父名。

我父亲是中央委员会中惟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也允许别人这样做。问题在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或别的人从来就不和斯大林争论，也从不试图反驳当家人。他们称其为当家人。盲目服从，随时准备执行主子的各种意志，这在我看来很好解释：害怕影响个人升迁使他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斯大林经常要求讲实话，我不认为看到谈话对方只是一些俯首贴耳的执行者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相反，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承认，他也善于说服论敌。当然，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和他还是不争论为好。据我所知，除我父亲之外，莫洛托夫有时也和他意见相左。很可能，在早些时期这种人要多些。托洛茨基很可能是这种人，别人我看不出。看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早期言论，都是一味赞扬斯大林的话。正是他们制造了个人崇拜，而且是在列宁死后马上开始的。

我从父亲处得知，军人中能坚持己见，而且态度坚决，不怕引起独裁者不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 年是这样，1942 年也是这样，以后的几年都是这样。这是个不容你不尊敬的人。显然，斯大林也这样认为。

斯大林只有和一个人称“你”，这就是莫洛托夫。这不表明，我意欲以这种方式拉开我父亲和斯大林之间的距离。但事实就是如此，斯大林对待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确实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人，如对待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对这些人他根本不重视。

大概，斯大林身边最令人厌恶的人莫过于日丹诺夫了。他随时随地忌妒每一个同斯大林接近的人。和其他任何人不同，他真正热衷于成为独裁者的继承人。说他是斯大林身边不学无术的红衣主教也许更准确些。他就是这个国家大规模镇压的思想家，将

来档案公开，一定会发现许多由他和斯大林签署的电报和信件。经常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签名，但却是他日丹诺夫的风格。要知道，他不仅在大规模镇压中飞黄腾达，而且还打算踏着尸体继续前进。多可怕的人！

做着继续升官梦的可能还有伏罗希洛夫，此处难以妄下定论。但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继续升迁的可能已被排除，前者对他毫不尊重。而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些更为机智灵活的问鼎领袖宝座的成功竞争者。

卡冈诺维奇非常明白，他无法竞争最高职位。有报道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和斯大林屡生冲突，朝他喊叫。这一切都是虚构的。有一次妈妈问他，难道他真的那么真诚相信所谓"人民公敌"那些说法吗。卡冈诺维奇答道："这是我的信念！"

他是个怪人，对自己的亲弟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米哈依尔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对斯大林却极尽谄媚之能事。

父亲视卡冈诺维奇为变节者。当由我父亲倡议，为了苏联的利益，试图利用世界犹太运动时，卡冈诺维奇立即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现在业已明了，卡冈诺维奇是怎样迫使犹太运动的活动家们在反犹宣言上签字的了。

已知的还有他在大规模镇压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只要回想一下他在乌克兰的所做所为，便足以说明一切。

说他参与强迫一些民族迁移的指控只有部分是真实的。他也像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一样，确实表示赞成，但他不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这里调子是由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等人定的。斯大林虽然作风非常专制亦不能不重视这一政策，并向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了妥协。他玩弄俄罗斯民族主义，玩弄俄罗斯化帝国政策。这是明确无疑的。但我重申，这和卡冈诺维奇没有直接关系。

我想，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最有竞逐国家首脑宝座的基础。我指的是他的资历，而不是政治素质。还在1906年，维亚切斯拉

夫·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是他的假名)就读于喀山实科中学时便已入党。1909年他作为革命组织的领导者之一而被捕。流放归来后在彼得堡工业技术学院学习。1916年春再度流放西伯利亚3年,但这次他逃了出来。

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党委会成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他认识列宁。2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曾作为中央书记代行斯大林职务。从1939年开始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那些年斯大林周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资历。日丹诺夫对此非常清楚,所以就千方百计在斯大林面前诋毁他。1949年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被捕。老一辈的人都记得那是个与“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期。

热姆丘任娜是苏联犹太运动积极组织者之一,她被指控与世界犹太运动有联系。逮捕决定由中央委员会批准。说只有莫洛托夫自己在政治局逮捕他妻子的表决中弃权,那是不正确的。在那次会议上我父亲发了言,声明逮捕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没有任何根据。后来查明,热姆丘任娜曾进行过事关中央委员会决议及其针对犹太委员会的路线问题的谈话。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之外讨论这些问题是不允许的。

莫落托夫知道,还在战前就要逮捕热姆丘任娜,只是我父亲的积极反对,阻止了政治局一伙委员们对莫洛托夫实施打击。

毫无疑问,这是个比日丹诺夫还要聪明的人,别人更不足论。但是,没有哪一个涉及党的原领袖们和党派方面问题的文件没有莫洛托夫的批示。我指的是政治运动和镇压。他做了一切,别人做的,他都有份儿。

他和我父亲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相反,他对我父亲评价颇高,同时,这并未影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父亲在卡廷悲剧事件以及几个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我父亲为铁托辩护的发言使莫洛托夫极为不快。斯大林当时称我父亲和几个

反对同南斯拉夫冲突的人为铁托分子，而莫洛托夫以激烈的方式声称：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出卖者。

父亲在这种时候总是针锋相对，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予以回敬。

全会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我知道，在这之前的那个晚上开过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莫洛托夫说了完全不同的话。比如，在中央全会上他批评我父亲要对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负责。各人表现如何，到底怎么回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最清楚不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在那次中央全会上人人都说谎话，区别只在于有人说的多些，有人说的少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趣的是，在前夜那个小圈子里，同是那个莫洛托夫说的却完全是另一些话：

“我们中间比贝利亚更有能力的人是没有的；在他所主管的问题方面比他更有干劲和学养的人也是没有的。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我们自己却曾赞同他的诸多建议，但现在我们却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

我没有那次中央主席团会议的速记记录，没有其他证明，但我倾向于相信向我讲述莫洛托夫那次讲话内容的那个人的说法。我想，如果莫洛托夫知道我父亲还活着，他在全会上的表现会截然不同。参加那次全会的非常多的人也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因而进行斗争已经没有意义了。数十年来，党已使人民习惯于玩世不恭，于是干脆就把记忆这一概念都抛弃了……

我对赫鲁晓夫也所知不少。他常来我家做客。今天人们力图把他视为反个人崇拜的斗士，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反驳斯大林。不错，记得有一次在桌旁他伤心地说，“主人把我们当作婴儿抓着不放，不让迈步，不让施展本领。”当他的面都一声不吭，充当侍臣小丑。我还知道他的酒量很大。

我也了解他的家庭。和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在他其与拉达结婚之前就已相识。阿列克谢的母亲是个优秀的裁缝。她向我妈妈抱怨说，儿子为了升官毁了自己的生活。她坚决反对这桩婚姻，因为她讨厌赫鲁晓夫家的人，称他们为伪善的戈洛夫廖夫一家。[1]

阿列克谢确实是个有才干的人。他在电影学院学习过。和拉达·赫鲁晓娃结婚之后他成为"共青团真理报"的主编，从 50 年代末到赫鲁晓夫被解职失掉权力的那天，他是"消息报"主编、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因参加他岳父的访美报道而获列宁奖金。按一般大家公认的标准，他的升迁是闪电般的、光彩夺目的。但是，1964 年 10 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进程永远终止了。

虽然赫鲁晓夫自己常来我家，但我们和他的家庭却没有来往。尽管我和赫鲁晓夫的女儿在一个学校读书，无论是我还是妈妈却一次也没有到过他家。

有些事我们从阿朱别伊的母亲尼娜·玛特维耶夫娜那里略有所闻。

"你干嘛难过"，我妈妈安慰她说，"是个好姑娘，谢尔戈说她学习很好。"

"你见过她吗?"尼娜·玛特维耶夫娜问，"没有? 他不会爱她的。这你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她? 我从没想到阿列克谢会这样做……"

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我家吃午饭的时候，尼娜·玛特维耶夫娜突然又回到令她伤心的话题。看得出来，她只是想找个人聊聊：

"真是可怕的一家，尼娜! 他们不接待我。我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女裁缝。"

---

① 源自(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家的先生》，后用来指假仁假义的人。——译注

妈妈很是意外：

“你说些什么呀！ 你是手艺人，你是艺术家！ 不可能这样。”

“还说怎么能这样。您总是以己度人，而他们可不是。他们是上等人，而我只是个裁缝，不是他们那个阶层的人。阿廖沙却进了这家的门……”

应当承认，无意中听到的这次谈话使我多少也感到吃惊。尼娜·玛特维耶夫娜不仅是本行的能工巧匠，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很高，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委婉点说，赫鲁晓夫这样瞧不起她是毫无理由的。很有可能这个家庭对整个“非圈内人”都是这样的，并不只对女婿的母亲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例子足以准确说明整个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时尚特征。

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性格直率，是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难得的襟怀坦白的人。我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而且也是作为各种不同场合目睹他的行为的见证人来这样评价他的。

当国家真正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案件”所震动的时候，我父亲直接了当地对马林科夫说：

“要知道，格奥尔吉，你干了战前在白俄罗斯干过的同样的事。你要相信，你会遭报应的……不能这样干！ 不应使无辜的人们卷入政治盲动主义中去！”

父亲指的是马林科夫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所参加的 30 年代在白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镇压。

马林科夫辩解说：

“我能怎样……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你应该明白。”

“不，格奥尔吉，人们会要你负责。想一想，你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档案里还留存些什么，但我想，有关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其他党的高层官僚参加大规模镇压的资料是应该保存着的。

我又说到这点，同样绝对不是为斯大林开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而不能诿过他人。我知道，镇压行

动结束后还不能使赫鲁晓夫罢手，乌克兰在无法无天的痛苦中呻吟。斯大林甚至给他发去了一张便条："停止吧，你这傻瓜！"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指控和逮捕的理由简直像是从天而降。看看天，或摇摇耳朵就可找到理由。而这些行动是用来反对成千上万的人的。类似的举动不仅是伏罗希洛夫的特色，可以说，莫洛托夫也是这样。

"1937年正当镇压的高峰期，确定这一政治路线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而在他们之间拍马逢迎、见风使舵的则是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同莫洛托夫不一样，他甚至比莫洛托夫更恶毒。莫洛托夫是和斯大林关系密切的人。虽然卡冈诺维奇也和斯大林关系很近，而斯大林提拔他是因他有敏锐的阶级嗅觉，因他符合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准，对阶级敌人的毫不妥协性。我们都非常清楚这种'坚定性'的含义。要知道，就是这个人，对保护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竟一句话都不肯说。米哈依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对他的指控竟是说他是德国间谍，希特勒安插他进入俄罗斯政府。一派胡言！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希特勒打算让犹太人米哈依尔·卡冈诺维奇进入俄罗斯政府？……在一切真相大白，弄清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之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从来不提自己弟弟的悲剧，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未再提这件事。米哈依尔·卡冈诺维奇从前只是个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他死了，所以好像他压根就不曾存在一样。这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特点。此事发生之后，出于对自身命运的担心，他在斯大林面前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

我认为，赫鲁晓夫等人评价斯大林和大规模镇压的讲话伪善

之极。他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恢复公正。一切要简单得多:他们谁都不想也不准备对过去的所做所为负责。

我不认为马林科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以大批抓人和处死无辜的人为乐。很明显,党的机器当时完全不需要别样的人,而马林科夫等人则从肉体到精神都是这部机器的成员。他 18 岁入党。在红军中服役,从卑微的政治处文书干起。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没毕业即进入联共(布)中央做技术工作。此后先后担任政治局记录秘书、总书记秘书处人事部主任、莫斯科党委组织部长(卡冈诺维奇任第一书记)、党中央部长、党中央书记……一个典型的党的机关干部的典型发迹史。可能比其他的人要更顺利,但就是这样。对他有一恰当的描述:"随着党的路线一同摇摆。"当党实行镇压政策时,他立即投入战斗;党谴责这一政策,他也谴责。数千名党务工作者在各共和国、各州、各地区也是这样干的。而当时间来临,需要向国家解释这一制度的罪行时,又和亲爱的党一起急于推卸责任。何况,无论何时何地,党从来都是不承担责任的。正是这样,伏罗希洛夫批准逮捕军人,赫鲁晓夫也同样如法炮制。作为党的领导人,没有他的批准,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乌克兰,逮捕就不能进行。而"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以及诸如此类的"案件"呢?总之,党的最高权力集团血债累累。正是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使镇压的车轮越转越快。当然,斯大林作为国家首脑和中央总书记,他的责任是无可推卸的。

据说,斯大林或者是意识到自己双手沾满了鲜血,或下意识地感到对报应的恐惧,他不敢在民众面前露面,弄几个替身在前台代替他。人们甚至能叫出其中一个人的姓名——温尼察人叶夫谢伊·卢比茨基。关于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替身的故事,报界互相转载已有几年。记者援引他的回忆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杀害了卢比茨基一家,而将他本人变为"斯大林第二"。差不多直到国家首脑去世之前,据说他在国家节日里总是登上陵墓观礼台,接见外

国代表团、出席正式招待会，这使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及其他人极为愤怒。

当然，这又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我父亲，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从未有过替身。从技术角度可以说这并不复杂，如果有必要，就可以挑选一些这类人。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对于斯大林及其周围人的安全采取的是另外的极为有效的措施。我也许可说到过斯大林所有的别墅，在不同时间不止一次见过他，直到他去世。所以我正式声明：所有这些全属杜撰。而且据我所知，乌克兰安全局及其所属温尼察州内务局几年来也从未确认传说中的叶夫谢伊·卢比茨基存在的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斯大林的杜撰越来越多。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斯大林 1952 年秋天就死了，但老战友们惊慌失措，乱了阵角，于是就向外界隐瞒了领袖的死。当时为了不使国家机密泄漏出去，从克里姆林宫清除了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1] 等人，这也是无稽之谈。1952 年我见过斯大林 15 次，其中包括在讨论军事技术问题的中央主席团几次会议上。和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一周也要见上几面。1953 年初我还见过他。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戒了烟。有一次他向我妈妈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在第比利斯住着一位我们的家庭医生基普希泽。他是一个医道高超的大夫！斯大林听说过他，要求邀他来莫斯科。基普希泽确实来了，为斯大林作了检查和诊断，但他拒绝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私人医生，说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我想，他只不过是心存戒意，因为他了解那些御用医生的命运。

现在谈一下对斯大林的谋杀事件。我非常清楚：不曾有过一次谋杀事件。准确些说，是没有让谋杀事件发生过。在德黑兰，德国特工部门计划劫持斯大林或将其刺杀，但结果已如所知：多亏苏

---

① 系斯大林的秘书——译注。

联情报部门的努力,反对“三巨头”的阴谋被揭穿,使英国、美国和苏联领导人都未遇害。

1942年底,逃兵萨维利·德米特里耶夫在红场向从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大门驶出的汽车连开数枪。潜伏点设在宣谕台上。这是米高扬的汽车,当时无一人受伤。警卫队立即向恐怖分子投出几枚催泪弹。

有侦讯中德米特里耶夫自己供称他准备谋杀斯大林。父亲以为,这位原红军战士德米特里耶夫很可能认为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受害者,但另外的动机更具说服力:逃兵德米特里耶夫无疑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认为,还存在另一些谋杀计划。但这些计划或为安全组织所阻止,或在这类行动的准备阶段即告中断,或者恐怖分子自己放弃了行动,使其原有意图未能实现。

摘自官方材料:

恐怖分子德米特里耶夫于1942年11月6日在红场被拘捕。1950年8月25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决被执行枪决。

按原克格勃材料记载,有一次谋杀斯大林的行动由德国帝国安全总局策划(PCXA),代号为“齐柏林飞艇”行动,这一恐怖行动计划于1944年秋天实施。

1944年9月6日,一架大型运输机在斯摩棱斯克州境内降落。据说在飞机降落后即被防空火炮哨截住,并通知了安全机构。随着发出的警报,一个战斗小组立即行动,封锁了道路。经过短时间搜索,抓获两名德国间谍,其中一个是这次行动的执行者,他是33岁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希洛,切尔尼戈夫州人,富农的儿子。恐怖分子身上有军事反间谍机关“斯麦尔什”塔夫林少校的证件,

顺便说一句，塔夫林少校是位苏联英雄。而这次未遂犯罪行动的火器是“潘采尔克纳克”。这种火器像个钢筒武器，可固定在右臂上，而开关和引线都在左手，可以发射喷气炮弹。原来设想，当斯大林的装甲汽车在莫斯科的一条街道上行驶时，他们向其发射炮弹予以谋杀。

和希洛·塔夫林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一个扮成少尉的女搭挡。

在各个不同年代，原契卡人员、记者都有关于那次未遂谋杀的记述，而且“齐柏林飞艇”行动的许多细节明显互相矛盾。有一种说法是纳扎罗夫上尉讲述的，说这个化名塔夫林的“斯麦尔什”少校的人姓波利托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地区分局（另外资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中，混入人民内部的这个坏分子掏出了德国香烟，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怪？难道缴获的香烟会使恐怖分子现出原形？而犯罪工具又在何处？

总之，整个故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没有听说这个故事。我想，这样的大事许多人大概是知道的。

希特勒特工机构消灭斯大林的计划还是存在的。

摘自德国政治情报长官瓦尔特·舍勒贝格回忆录：

“里宾特洛甫站起身，走到我面前，表情严肃地将我拉到屋角。

“‘请等一下，舍勒贝格，我要和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绝对保密，除了元首、博尔曼和希姆莱谁都不知道这件事。’他用凝重的目光盯着我继续说：‘应该除掉斯大林。’我点了点头，不知对这一声明如何表态。里宾特洛甫对我解释说，俄罗斯的整个制度靠的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技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

按舍勒贝格的话说,斯大林应在一次会议上被干掉。很清楚这指的是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希特勒的政治情报长官承认,还着手实施了另一次尝试:

> "和希特勒讨论之后,希姆莱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和里宾特洛甫的计划极为相似。按照这一计划,我们的专业人员制造了一枚炸死斯大林的炸弹。炸弹有拳头大小,外表看上去是一团脏东西。它应该贴在斯大林的汽车上。炸弹装有引线,受短波传导器的控制。它的威力如此之大,在我们试验将其引爆时,我们的汽车被炸得几乎一无所剩。引爆器不过烟盒那么大,它可以在11公里的距离内将炸弹引爆。"
>
> "有两个战前长期流放西伯利亚的原红军现役军人来承担完成这一任务(其中一个认识斯大林车库的机械师)。夜里,根据通知一架大型运输机将他们载到据我方谍报人员称是斯大林大本营所在的地方。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他们跳伞后准确地降落在指定地点,但这是我们听到的有关他们的最后消息,虽然俩人都配有短波引爆器。我不相信,他们一直试图完成任务。很有可能,跳伞后很快被抓获,或者他们自己主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投降,并交待了所要执行的任务。"

是谜?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我父亲为接近斯大林"也寻找过别的途径",并肯定说他的表妹亚历山德拉·纳卡希泽长期在斯大林家当女管家。这里没什么神秘可言,只是不够准确。

我们还住在第比利斯的时候,斯大林求我父亲为他找一个女人来照看失去母亲的斯维特兰娜。当时,斯维特兰娜只有10岁。

从推荐给斯大林的10至15个候选人中,他最后留下了纳卡希泽。顺便说一句,他不是我父亲的妹妹,而是远房的一个什么亲

戚。但问题甚至还不在这儿。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决定的。后来我在某个地方读到一份材料，说她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名少校。这我不知道，老实说也不感兴趣，但这完全是可能的。所有为斯大林及其家人服务的工作人员都有军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也无不如此。这很好解释：这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可获得某些优惠待遇和军衔补贴等等。

当斯维特兰娜16岁的时候，亚历山德拉·纳卡希泽决定回格鲁吉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怀着极大的感激让她走了。她回到家乡，嫁了人。这便是我父亲一位远亲“打入”斯大林家的整个故事。1953年当到处寻找证据给我父亲栽赃的时候，有人记起了她。

四、我所知道斯大林的女儿和两个儿子

我已说过，和父母一起或单独一个人，我都到过斯大林的家。我认识他的孩子们，和斯维特兰娜甚至有过愉快的交往。

众所周知，她的命运颇为不顺，失去了家庭、孩子。我认为，作为个人，她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虽然她不惜任何代价试图为其洗刷罪名。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用自己的生活本身来证明某些东西。

瓦西里·斯大林是个怎样的人？1944年斯大林决定派几个人去英国见习，任命我为组长。我拒绝了。我说，让我在军事学院把书念完。当时斯大林平生第一次骂了我。他说：

“你和你们全家人一样，都是犟种。”

如果说真话，我的拒绝不仅仅是因为真想结束军事学院的学业，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小组里有瓦西里·斯大林参加。他是个非常诚恳的小伙子，只是当时就已不服约束，出了事会拿我是问的。

我深信，是周围的人把他毁了。他死的时候，我正在流放地，不准许我参加他的葬礼。

据官方说法，斯大林的小儿子于 1962 年 3 月 19 日因酒精中毒于喀山逝世，这是他从列福尔托沃监狱出狱后的流放地。以朱加什维利为姓氏葬于喀山阿尔斯克公墓。他第一次被捕于 1953 年 4 月 28 日，并以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的名字被关押于弗拉基米尔监狱。

战争的几年时间，斯大林这个儿子从一个飞行学校的毕业生升为师长。20 岁时是上校，24 岁为少将，27 岁升为中将，后任空军军长，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我想，斯大林明白，速度如此惊人的高升到头来会怎样？曾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斯大林因什么事指责瓦西里，我刚好站在旁边。

“你看看谢尔戈”，他说，“学院毕业成绩优秀，副教授，研究生。可你为什么就不学习？”

瓦西里顶撞说：

“你自己学院就没毕业，我也同样能对付。”

关于瓦西里的不服管教的文章已刊载很多，其中有些撰文者本人就是这种行为的唆使者。对此要作什么补充是困难的。

他父亲的死当然对他是有影响的。酒喝得更凶了，说话随便，口没遮拦。1953 年第一次判刑，刑期 8 年。官方的解释是他超越职权和滥用权力。第二次将他投入监狱是在他开车肇事之后。人们知道他不能喝酒，但还是把他灌醉，让他开车。又一次进牢房，然后流放。

我妈妈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写信给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会帮他学会工作，并禁止他无所顾忌，一味放任自己。”但斯维特兰娜回信说，现在说这些话为时已晚。

"就连我,"她写道,"都管不了他了,他已无可救药,成了废人。"

我没能参加葬礼,但从共同朋友的信中得知,瓦西里是在一次斗殴中被刀子捅死的。至今我依然惋惜没能把他弄到乌拉尔来。如那样的话很可能对他来说整个情况最终会完全不同。

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长子(第一个妻子所生)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我所知较少。他比我年长。在他们家和斯大林的别墅里我们都见过面。在性格方面,他无论是与瓦夏还是与斯维特兰娜都明显不同。他的母亲死于肺病,当时斯大林正在流放地。他的亲戚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一家把他养育成人。

1908 年雅科夫生于巴库,就读于运输工程师学院,在工厂的电站任工程师,1937 年入苏联工农红军炮兵学院。1941 年 5 月参军,战争开始几天后就参加了战斗。1941 年 7 月 4 日作为第 14 装甲师 14 榴弹炮团的炮兵连连长陷入包围圈,并和数千名官兵一起成为俘虏。和数百万人一样,他英勇地承受住了作为一个俘虏的全部恐惧,无论是刑讯还是诱劝都没有使他屈服。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拒绝了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分子的全部建议,没有丧失一个军人的荣誉。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获释后(他和雅科夫一起被关押在德国俘虏营中)写信给斯大林,说他是他长子悲惨牺牲的见证人。关押雅科夫的地方也关押过台尔曼。和台尔曼一样,雅科夫也被枪杀。在我们的部队到达之前不久,他被枪杀在监狱的院子里。

我不时听到试图从德国俘虏营解救雅科夫的计划。我想,因为类似行动前景渺茫、成功无望,所以根本就没有作过这种计划。但我知道,情报部门掌握了把斯大林儿子的转移的情报,好几次他从一个地方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和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相比,利奥波德国王受到特别优待。德国人让他活了下来。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他在散步时间见过雅沙。他从德国警卫队那里还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斯大林拒绝了用巴乌留斯元帅换他儿子的建议，这是真的，那次谈话在场的人很多。

我确切地知道，斯大林也没有下达任何关于派遣特工小组去德国的命令。但雅科夫在俘虏营中的一举一动斯大林却了如指掌。我已说过，情报部门掌握这一情况。

关于雅科夫是斯大林的儿子这一点，德国人是非常偶然才得知的。他被俘时受了伤，同样受伤的同团一个战友认出了他，激动地向他扑了过去。旁边刚好有个德国特工卧底在场，报告了朱加什维利上尉的真实身份。

当向斯大林请示雅科夫一家是否也要流放时，他说，数万个战俘家庭都被流放，他自己儿子的家也不能有任何例外，按法律办。(后来他被判罪，正如常发生的那样这个判决很晚才被撤销)

摘自1956年6月29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消除在对待原战俘及其家属上粗暴破坏法律所产生的后果"的决议：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指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一段时期在对待被敌人俘虏或包围的苏联陆海军现役军人上粗暴破坏了苏联法律。苏联军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同法西斯占领者英勇作战，诚实地奋不顾身地完成了祖国赋予自己的使命。但是，由于战争初期所形成的严重局面使数量众多的苏联军人陷入重围，在失去抵抗的一切可能性之后成为敌人的俘虏。许多军人在空战时被击落或在敌后执行战斗任务中身受重伤。

"被俘的苏联军人保持了对祖国的忠诚，表现英勇，顽强地忍受了俘虏的磨难和希特勒分子的嘲弄……无视于此，并违反苏联的法律，对原战俘表现了普遍的政治上的不信任，广泛实行毫无根据的镇压和非法限制他们的权利。突围出来

的、从俘虏营中逃出的和被苏联部队解放的军人都被送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专设集中营接受检查，这里被关押的人所处的关押条件，类似于劳改营里关押的劳改分子……从1945年开始，所有被解放和遣返的战俘，甚至没有任何污点的证明，都被编成营级单位发配到边远地区的煤炭和森林工业企业从事惩罚性长期劳动。国家安全机构在战后时期继续毫无根据地追究原战俘的刑事责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非法镇压。对原战俘及其亲属在劳动就业、社会活动、入学、居住迁移等诸多方面的各种非法限制非常普遍。

"在对待原战俘问题上粗暴破坏苏联法律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这首先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及其同伙横行不法，进行大肆镇压的罪恶活动的结果。"

又一谎言。镇压被俘红军战士和干部家属的首倡者是党的机构。相关的法律是在谢尔巴科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的坚持下制定通过的。斯大林则是应党的上层分子的要求而予以同意。

我郑重声明，我父亲和战俘命运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认为，只有那些犯了罪的人才应该受惩罚。父亲认为，甚至对那些未用鲜血玷污自己的警察都应予以宽容，而对由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局势而陷于包围和被俘的人进行惩治就更不应该。他死后，包括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内的党的上层分子，就将原战俘的悲剧赤裸裸地归咎于我的父亲。上面所引文件就是明证。

我不知道，斯大林拒绝解救儿子及其家庭是不是故作姿态，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斯维特兰娜告诉我，当将儿子被俘的消息报告他时，他非常难过，周围的人都看得出来。斯维特兰娜讲，他开始整夜把她留在身边，几个小时不停地回忆雅科夫的童年。无疑，在那些对他来说无比沉重的日子里，他甚至连外表都变了。

雅沙是个严肃正派的人，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耍手腕，这给我的印象颇深。和瓦西里相反，他外表矜持，动作缓慢，很可能这种遗传来自于母亲。在格鲁吉亚山区住着拉金茨人。人们认为那里的男人都是英雄好汉，只是性格迟缓。当雅沙为某些决定犹豫不决时，斯大林时常笑称他为拉金茨人。

他入党非常晚，在战争开始前不久。他认为，他不能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政策的党内供职。据我所知，他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原则立场。不管怎样，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周围的人，都非常了解雅科夫的信念。大概在 1940 年，他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有关这一问题的谈话。

“你不能成为惟一留在党外的科学院毕业生，”斯大林当时说。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但这次谈话之后，雅科夫入了党。

有关他个人生活我了解不多。听说他不是一切都顺遂如愿，但他的妻子，与无聊的臆测相反，是个品行端正的女人。

(据西方媒体报道，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女儿加林娜住在俄罗斯，现年 52 岁。她嫁了个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做法语翻译工作。

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伊萨科夫娜·梅尔茨生于敖德萨一个职员和家庭主妇的家庭。英国报刊说她结过 4 次婚，包括一次嫁给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别萨拉布。所有这些都是臆测，还说尤利娅·梅尔茨 1963 年死于莫斯科，曾是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弗拉西克上将的情妇。西方报界有关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死亡报道也经不起推敲。援引英国被俘军官所提供的大量资料表明，斯大林的长子是扑到有刺的电线上自杀身亡的。)

我在材料中读到，在拒绝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

以弗里德里希·巴乌留斯交换雅科夫的复函发出后，尤利婭·梅尔策尚处于监禁之中。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她只是被赶出了莫斯科。对其他战俘的家人也是这样处理的。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里，德国宣传机构利用斯大林儿子被俘这一事实大作文章。自从1941年7月16日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被"中央"集团军群第四坦克师在维捷布斯克城下俘获之后，希特勒分子印制了如下内容的传单："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铁木辛哥和你们的政委教导你们说，布尔什维克党员决不投降。但是，红军战士不断向我们投诚。为了恐吓你们，政委们欺骗你们说德国人虐待俘虏。斯大林儿子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是谎言。他投降了。因为任何对德军的抵抗都无济于事！照斯大林儿子的榜样做吧，他活着，健康地活着，感觉良好！你们也过来吧！"当时德国宣传机构还散发了一个伪造的宣传品，上面刊登着雅科夫的照片，旁边站着一个人，据说是莫洛托夫的儿子。传单旨在使正在作战的红军相信，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孩子已经背叛。莫洛托夫从未有过儿子，因此戳穿谎言并非难事。希特勒的宣传机构还肯定说，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妹妹萝扎曾是斯大林的妻子。根据德国集中营中的审讯材料推断，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自己否认了这一点……

于是德国人决定利用反犹太主义。说卡冈诺维奇的妹妹或侄女儿确实不曾做过斯大林的妻子，但她与斯大林生了一个孩子。

她本人是个非常美丽、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据我所知，她也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他们的亲密关系成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妻子纳捷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的直接原因。

我对这个小男孩非常了解，他长在卡冈诺维奇家，名叫尤拉。记得有一次我问卡冈诺维奇的女儿：

"这是你的小弟弟吗？"

她窘迫起来，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小男孩很像格鲁吉亚人。他母亲走了，把他留在了卡冈诺维奇家里。我不知道1953年以后他的命运怎样，关于卡冈诺维奇侄女儿的音讯也没有再听到过。

* * *

斯大林和贝利亚这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也是非同寻常的。

或许，我的证明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接近事实真相。我相信，时间，也只有时间会评判一切，并给一个国家首脑和他亲密战友之一之间的关系透进亮光。

第三章　卢比扬卡:党的惩罚之剑?

一、贝利亚之前的内务人民委员和他们的结局

据俄罗斯安全部统计资料,自1917年至1990年在原苏联境内有近4百万人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中827995人被判枪决。实际上被辗在"红色车轮"之下的人数比这还要多。在共产主义暴政的牺牲者中,有数百万"人民公敌"的家庭成员,有被作为富农遭没收土地和农具的农民,被强制迁出原籍地者。看来准确数字今天谁都不知道,但死者的骨灰却时时敲击着我们的心房……

当战争结束后,镇压重新开始时,记得父亲曾悲伤地说:

"这已经是第三轮了……政治真是肮脏的东西……"

有一次我问他:

"可是要知道,诚实的人也有在你的管辖之下蹲牢房的呀。"

"你要明白,"父亲回答说,"无论什么人处在这部镇压机器里,他都会不停地寻找敌人。以前契卡在商人、地主、贵族中发现敌人,现在他们在自己人中寻找。我们已经换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许多人,镇压的轮子已转了那么多年,你试试让它停下来……"

不幸的是,在那可怕的年代我父亲当了内务人民委员。他在1938年年底,继雅戈达和叶若夫之后,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曾试图立即刹住镇压的车轮。很可能,斯大林在那一时期需要这样

的人，尽管政治局内部的意向与此不同。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反对改变政策。

摘自契卡洛夫[①]之子伊格里的回忆录：

“193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之后，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斯大林给契卡洛夫家里打电话，请他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起身迎接他，握手后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圈椅上，便立即开门见山地说：政治局认为，该把契卡洛夫调到另一工作——党和国家工作岗位上去了。大家都知道，早就该清除叶若夫分子了。这样，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兼水运人民委员应由瓦列里·契卡洛夫担任（像当时叶若夫一样）。父亲不客气地回答：管水运还可勉为其难，但内务人民委员可不行！斯大林就此表示说，他喜欢契卡洛夫为人公正，善于辨别人。他年轻，只有34岁。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干上两三年，让一切步入正轨，而以后计划成立个统一的运输人民委员部。准备任命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作契卡洛夫的助手。

“父亲请求让他把波利卡尔波夫设计的伊－180型飞机的试验搞完，它可提前5至6年为我空军保证供应威力强大的武器。而后党的任何任务都可承担。斯大林提出一个条件：从今天起，没有他斯大林本人的许可不准起飞升空。他们分手时议定，有关新任命的问题留待1938年12月底最后决定。

“斯大林真要进行这样的任命，或者只是玩弄一个令人不

---

① В.П.契卡洛夫（1904—1938）苏联飞行员，苏联英雄（1936），旅长。创造过许多高级飞行特技。1936—1937年完成莫斯科—远东乌德岛的不着陆飞行，与另二名飞行员一起完成莫斯科—北极——美国温哥华的不着陆飞行。后因飞行事故遇难。——译注

解的花样？”

接下来不难猜测，这个传奇式飞行员之子做了个明显的暗示：

“政治局讨论我父亲为候选人之事，贝利亚和叶若夫当然知道。他们更知道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贝利亚不能不明白，就是作为运输人民委员，我父亲对他也会构成威胁……”

那年12月，瓦列里·契卡洛夫牺牲了。于是，他儿子伊格尔接着推断说这是“竞争者们”搞的奸计。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小契卡洛夫说法的真实性。我们可从这里说起：叶若夫在1938年12月才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以后直到被捕前，他的确领导水运人民委员部。只是到了1939年春天他才被逮捕。说建议契卡洛夫同时立即领导两个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水运人民委员部。“像当时叶若夫一样……”这是第一点不准确之处。

斯大林的话也让人非常生疑。他说该清除叶若夫分子了。叶若夫被称为罪犯是很久以后的事，当时谁都还没有把大规模镇压归罪于他。相反，叶若夫还在玩冒险的游戏。是的，他已注定灭亡，很可能斯大林已做出了给这位人民委员带来灭顶之灾的决定。但这和飞行员契卡洛夫有什么关系？叶若夫还是内务人民委员，而契卡洛夫已被提议担任正准备任命叶若夫担任的职务。总之，都是胡说八道。多半这又是系列传说之一。

而1938年12月确实作出了决定，是正式决定。实际上斯大林很早就做出了这一决定。

看来，这里需要偏离一下主题，而准确地说，是略为讲讲历史，说说我父亲的前任们。父亲对他们的看法各不相同。说是贝利亚作为一个格鲁吉亚族人确信，让非俄罗斯人领导惩罚机构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可要知道，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时起就一直如此。

“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父亲说。“还有一个不小的错误，就是任命俄罗斯人到各民族加盟共和国担任类似职务。”

后来，父亲不止一次证明，他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立场。

捷尔任斯基、明仁斯基、雅戈达都是革命的参加者，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任。但是，要知道，受到信任的并非只有波兰人……为什么领导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都是这些人？这很好解释：这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治。不礼貌地说，从列宁开始，党就假异族人之手压制基本群众，实行政治压制。我深信，这不是偶然的。

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父亲对这位第一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作为一个优秀的组织者评价颇高。虽已身患重病（父亲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捷尔任斯基仍能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在若大的国家中重整运输业。换句话说，毫无疑问，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强者。同时，父亲还讲给我捷尔任斯基生平中一件令他震惊的事。这件事后来从来没有人宣扬过。

“捷尔任斯基，”父亲讲道，“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但这种内在的品格，他的对亲人的爱有时使他做出些有欠思考的行为。他的家人侨居国外，他决定去寻找他们。在正常条件下这种愿望完全可以解释，但在年轻国家命运攸关的紧急关头，捷尔任斯基走了。到处是白色恐怖，武装叛乱，而他全都抛诸脑后。他走了，无论对列宁还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句话都没说。离开整整两个月。这是前无先例的事件！如何解释？两个月时间，国家没有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现在谁敢再来试试这样的把戏……”

关于从 1926 年至 1934 年领导国家政治保安局机构的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父亲说他是个病魔缠身的人，很少做具体工作。我在某个材料上读到，明仁斯基在进入安全机构前通晓 12 种语言，在新的岗位上又学会了几种。我未曾听到这些，总之，我怀疑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问题并不在此。接替

捷尔任斯基占据惩罚机构领导职位的人无论受过怎样的教育，也不能证明这一任命的正确；新提升担任领导国家安全机构的又是一个非俄罗斯人。

1934—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是亨里希·雅戈达。

摘自官方资料：

亨里希·雅戈达，1934至1936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1891年生于小手工业者格里高里·雅戈达家。部分资料表明，这位未来刽子手的父亲不是钟表匠，是个药剂师。一系列资料证明，人民委员父亲的真名是吉尔什·菲利波维奇·亚古达或叶古达。

1907年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流放两年。1915年应征入伍，加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是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工农红军最高军事检察院工作，在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南方和东南方战线的战斗。1919年起成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1920年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不止一次会见过列宁。批准亨里希·雅戈达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证明文件就是乌里扬诺夫—列宁本人签的字。

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亨里希·雅戈达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七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被控与沙皇暗探局合作，但斯大林认为出示的指控材料证据不足。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档案全已被毁，确认指控不能成立，斯大林于是下令“永远不再提这一问题”。

1927年12月，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工作10周年之际荣获红旗勋章。正如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呈文中所言,“捷尔任斯基创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机构的积极工作者和亲密助手之一雅戈达·亨里希·亨里霍维奇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事业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工作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作为特别局局长,雅戈达在组织和提高红军战斗力方面功勋卓著。因此,革命军人委员会申请授予雅戈达红旗勋章。”

后来,雅戈达不止一次被授予勋章,其中包括因参加组织建设基本由囚犯完成的白海—里海运河而被授予的列宁勋章。

1935年11月他任第一任内务人民委员,并被授予国家安全总政委称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还是明仁斯基,或他的其他前任都没有拥有专职称号。

基洛夫遇刺后立即开始的大规模政治恐怖运动就是在雅戈达当权期间和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36年9月25日,正在索契休假的斯大林电告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我们认为(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在一起休假)任命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是绝对需要和紧迫之事。雅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案件中明显失职。国家保安机构在此项事业中晚了4年。全体党务工作者和大多数各州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都这样说。”

从1936年9月27日起雅戈达成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他被解职,并被开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名字从高级边防学院和其他机关与组织中都消失了。并开始对其案件进行侦查。

在侦讯过程中和法庭上,雅戈达承认,他参加了刺杀基洛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别什科夫和谋害新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行动,领导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不管看来多么奇怪,雅戈达却没有承认

自己是外国间谍。很可能，斯大林和叶若夫没有特别坚持这一点。

1938年3月15日，包括俄罗斯联邦第一内务人民委员雷科夫和雅戈达在内的17名被告被执行枪决。

原人民委员的所有近亲属在不同年代均被镇压，得以获救的只有1929年出生的儿子小亨里希。1949年他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刑，1953年大赦时获释。后来他受了工程技术教育并以假名和家人一起住在乌克兰。

雅戈达的妻子伊达·列昂尼多夫娜（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①]的侄女）被捕后死于拘留所。

我想，雅戈达的妻子并不像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斯维尔德洛夫的侄女，在任何场合我都没有听说过此事。雅戈达的发迹很明显靠的不是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明仁斯基……总之安全机构从其存在之初就有许多波兰异族人，因此，雅戈达的提升显然也受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经常有文章说他是犹太人。很有可能，对此我不能肯定其是，也不能证明其非，我家从未谈过这个话题。

我认识雅戈达。和叶若夫一样，他对我们非常殷勤，千方百计讨好我父亲。当我们从第比利斯搬到莫斯科时，雅戈达热情周到，主动提供住房、汽车。总之，他和叶若夫都非常想成为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俩都知道，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对我父亲印象颇佳。

我父亲拥有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巨大支持，这在那个层次上不是什么秘密。俩人把我父亲视为自己的学生。我不想隐瞒，我父亲20—30年代的所有任命都是在他俩的积极倡议下促成的。父亲被认为是格鲁吉亚问题专家并非毫无根据，而许多事又

---

① Я.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01年入党。曾参加十月革命的准备和组织工作。1917年11月8日（公历21日）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党中央书记）。——译注

使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同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有关。因此，他们关心我父亲的晋升是毫不奇怪的。

从父亲处我了解到，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由于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提议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积极支持，他被吸收为中央委员（此前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看来，当时他们说服了斯大林，因为最终还得由后者拍板。

雅戈达并不笨，又因职务关系而消息灵通。他非常了解谁支持我父亲，也完全能预知其未来的前程。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大家通常所采用的方法）都是表面上热情友好，而实际上则是在搜集这个或那个政治活动家的材料。雅戈达也不例外。有时专门逮捕一些人，并从这些人身上逼供出可用来针对那些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人的材料。需要“栽赃”之时，这些材料便会被放到斯大林的桌子上或报告给政治局，其结果可想而知。

还在我父亲被调转到莫斯科很久以前，就逮捕了一些无辜的人，他们的供词中就有“关于贝利亚的供词”。雅戈达当时把它压下，希望俟机迫害他。而且，通常用作证人和“同案犯”的都是些级别很高的领导人。据父亲讲，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我父亲的好友库德里亚夫采夫就是这样被害的。进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父亲索取有关他的案件卷宗。那些审讯的基本主旨就是要求：“提供贝利亚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证据！”多亏库德里亚夫采夫的人格，任何刑讯都未能使他屈服，也没有提供针对我父亲的证据。

我父亲的前任、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的尼古拉·叶若夫运用的也是这种工作方法（而这是党的方法！）。

摘自官方资料：

尼古拉·叶若夫，1936—1938 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1895 年生于彼得堡。工人。1917 年 2 月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任军队政委。1922 年起任谢米巴拉

全斯克省委书记、哈萨克边疆区党委书记。1927年起进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任配给部部长、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部长。

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这次代表大会在历史上被称为被枪决者的代表大会①)。当时任中央工业部部长、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劳动和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作为中央书记，直接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参与准备政治审判。

从1936年10月1日起任内务人民委员。从1937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总政委。1937年7月为表彰其"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完成政府任务的事业中成就卓著"而被授予列宁勋章。仅在1937年6月叶若夫就提出了一个对3170名政治犯执行枪决的名单，当时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批准了这份名单。

正如当时报纸所报道的那样，"根据他的请求"，1938年12月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此后，担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10日被捕，被指控在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领导阴谋组织，为外国间谍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筹备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

1940年2月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2月4日执行枪决。

---

① 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开始"大清洗"，出席十七大的代表中大部分人遭镇压，故被称为被枪决者的代表大会。——译注

他有一个养女(这位人民委员没有子女),生活中用的是假名。

记得有一次叶若夫和妻子一起来我家,他已经喝得有些神志不清。

“有什么办法,”他坐在桌旁说,“我全都明白,已经轮到我啦……”

叶若夫及时毒死了妻子。也许,这听起来太不人道,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她是幸运的:免遭所有等待着她的那些可怕的事。

为搞大规模镇压的罪人开脱罪责是不可能的。但主犯是产生非法违纪的制度。我已讲过惩罚机构与中央紧密相联的纽带关系,讲过中央组织部在策划镇压方面的可耻作用。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行动都得经过中央组织部通过。叶若夫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他来自那个中央。马林科夫作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分管安全机构,也来自那个中央。顺便说一句,叶若夫之后曾想让马林科夫当内务人民委员,这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在所有时期,无论是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惩罚部门首脑一职一直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因此任命了叶若夫,后来又任命伊戈纳季耶夫和其他党务工作者担任些事。专业的谍报与反间谍部门的人员走上这一职位的非常少。除了父亲,我能叫出名字的人不多。通常,这个部门的未来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会得到高升。党的机构一直控制安全组织,并永远时时刻刻不会放松对它强有力的监督。我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监督是全方位的。难道能够同意说这个机构曾“将自己置于党组织之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它是“党的惩罚之剑”。我的观点更为直率,舍党其谁!

我父亲绝对不想担任这一人民委员职务。政治局曾两次讨论这一问题。不管怎样,父亲不得不同意这一任命,但预先提出了自

己的条件，并被大家所接受。有一个事实，就是蓄意给父亲抹黑的不诚实的历史学家也不敢冒昧去推翻它。在我父亲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前，1938年10月17日就已作出了一个谴责已实行多时的不法侦讯方法的决议。这个文件的出现是和他提出的要求直接有关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政治局，都同意这一要求。

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①]，同样是布尔什维主义精心设计的“产物”。它们是按于1936年11月27日作出的党的秘密指示而设立的。通常其组成人员有党的州委和区委书记、内务人民委员部局长、检察长。我父亲上任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人小组”被马上取消。

父亲毕生都在尽其所能地与非法机构作斗争。但我要强调，所有这些机构在我父亲调到莫斯科之前很久就已建立。比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后来属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臭名昭著的特别会议就是根据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成立的。部分资料显示，它共判442531人有罪，其中处极刑者超过1万人。就在那1934年的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要求在没有证人参加的情况下就对一些策划恐怖行动的案件进行审理。特别会议审理案件不仅无需证人，而且还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判决。自然，这为在侦查过程中肆意篡改材料、粗暴破坏法律提供了便利条件。

难道历史学家们不知道，在乌克兰甚至不是在1934或1937年，而是1920年就有了集中营。可是，在俄罗斯比这还要早许多。甚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进集中营!”有关命令还保存着，这一点今天已众所周知。该命令由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首脑和布尔什维克党缔造者签署于1918年夏天。距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年……

① “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是苏联在30年代“大清洗”中设立的，有权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对所谓的“人民敌人”作出判决。——译注

父亲能够说服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明对被捕者实行肉刑和其他方式的强制来迫使这些人承认有罪，不仅让人怀疑其可信度，同时也违反国际公约。勿庸讳言，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要让这些非法机构转变类似的侦讯方式恐怕并不简单。党，准确地说是党的上层，对这些新措施并不欢迎。父亲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建议，为其寻找理论根据。当然，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将一事无成。但是，看得出来，这一切父亲早已成竹在胸，将其调转莫斯科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谈谈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恶棍。正是他们为那些被捕者捏造证据，从而注定了无数无辜者的死亡和多年集中营生活的命运。无论是雅戈达时期还是叶若夫时期都是如此。我父亲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后，许多工作人员被开除，还有许多人被解职和判刑。但是，是谁允许，更确切地说，是谁促成了这种无法无天局面？当然，是党的上层为这些人开具了所有罪状。

无疑，也应该谈谈那些在 1935 年至 1938 年间身不由己陷于当时处境的人。勿庸讳言，那些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存在一些恶棍、追名逐利的爬虫和下流无耻之徒。但我永远不会相信，那些侦查人员天生就喜欢作恶。主要犯罪者是制度，他们只是罪恶命令的执行者而已。我说这话不是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开脱罪责，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但这样易使主犯溜之大吉，不负任何责任。

党的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的机制一直是这样的：实施侦查的文件全部出自中央委员会，否则正式侦查不能开始。当然，安全机构在不经过这一程序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但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不能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类似程序也存在于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和各区。比如，批准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处、局实行逮捕和侦

查的文件都是由州和区党委书记下达的,而且必须下达给所谓"三人小组"。

和任何其它部门一样,在国家安全机构本身内部自然也有党组织,但我要说,那里的党组织更加严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克格勃存在的最后一天。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主席,旁边就是党委。而且,地方党务活动家可不通过内务人民委员直接"上达"中央。这是独特的监督机制。不过,到处都一样。父亲制止了这种"首创性",他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不能容许这类事情的。他认为,这里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保密制度,此外,还有特别责任制。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中央介入某些问题,但从不准备负任何责任。从中央直接接受指示的工作人员开始对事情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由中央去决定吧,和我没有关系……这使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认为,就像不允许中央委员干预总参谋部的事务一样,同样也不能让他们插手谍报或反间谍机构的事务。应该理所当然地让党的机构知道:它的干预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制造许多新的麻烦。也许,这是它们惟一能做到的事……

执政党多年来有目的地消灭自己的人民究竟意义何在?从消灭贵族、老知识分子开始,后来就变为消灭新生的苏维埃知识分子。

镇压永远是有针对性的。消灭了军官、商人、贵族,接着是神职人员。后来便轮到了农民,所谓的富农。战后又有新的受害者。制定了目标往下,一切就很简单,按既定的形式行事。但是,勿庸讳言,许多事情也取决于当时谁是惩罚机构的头头。一部分人,像雅戈达、叶若夫,不仅急于完成党的新"指标",而且自身积极主动。另一些人,像我父亲,就千方百计阻止制造违法乱纪的行为。就算不是全部,但总有一部分是做到的。不管党的机关怎样不情愿,有时也不得不彻销自己的决定。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斯大林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应该撤换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因为他不称职。他提名由叶若夫来顶替他。叶若夫是党中央干部部门的领导人。我非常了解他。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知道，叶若夫原是一名彼得堡的工人，1917年成为党的一员。彼得堡工人，这是一张很好的招牌！当叶若夫被提升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我还不明了这一举动的深刻动因和斯大林的内在依据。我个人对雅戈达印象不错，事先在他的举动中也未看出和感觉到他有什么反党迹象。但是，任命了叶若夫，镇压之风愈演愈烈。简直就开始屠杀军人、公民、党务和经济工作者。奥尔忠尼启则领导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卡冈诺维奇领导交通人民委员部，两个地方也普遍抓人。同时，叶若夫和马林科夫关系密切，并和他一起工作。因此，后者同‘叶若夫整人风’并非不相干。”

这一点赫鲁晓夫是对的：高高在上的党的官僚马林科夫完全是积极主动和坚定不移地领导了镇压工作。但是要知道，赫鲁晓夫本人虽然没有写到这一点，但他当时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党所制造的违法状态，而且还像马林科夫一样，成了党的这一思想的推行者，这一点他到死都没有承认。当然，他和马林科夫以及其他的人，不过是把雅戈达和叶若夫当成“靶子”，把自身的罪恶全都推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罢了。

二、贝利亚抵制过镇压政策的一些行动

和克里姆林宫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政策。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当时有数十万人从集中营中被释放出来。康斯坦丁·

西蒙诺夫也写到了这一点：

> “对贝利亚的任命显示，好像斯大林要求一个人来完成与这一职位有关的艰难职责。这个人来自格鲁吉亚，他对他很了解，显然也是信任的，这个人应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去纠正叶若夫搞的胡作非为。应该记得，在1938年底和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中释放的人都是在贝利亚任职期内获释的。人数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领域中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但《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一书载明，正是这几年释放了超过1/4的在叶若夫时期被捕的军人。因此有传闻说，贝利亚恢复了公正，力图纠正叶若夫作的孽，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贝利亚在莫斯科工作的开始是与大批人的平反昭雪，大批案件的停审和从集中营中遣返了数万人，数十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释放的这部分人有助于构筑支持他贝利亚的氛围环境……他想进一步赢得声望……”

我从来都不会相信，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位一般来说品行正派的前线作家，在这里是彻头彻尾地真诚的。他非常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和怎样发生的。他所写的东西只有一半是真话，尽管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敢这样做。对数百万古拉格关押者来说，正是贝利亚成了解放的象征，这一点，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还有，说这位新的人民委员做这些只是捞个人资本，沽名钓誉，这种说法并不新鲜。父亲死后，他不久前的战友就是要人民去接受这一形象的。在几百万不久前还被关押的人尚还活着的时候推翻一件善举是不可能的。因此，党的上层分子不得不利用一些臆造的所谓动机。这位未来的“阴谋家”为什么要急于释放无辜者。当然，是为政变制造土壤。这当然是愚蠢之举，但在相当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谎言越可怕，人们越愿意相信。也许，戈培尔就是如此这

般教导自己纳粹党的同伙的。可见，我们本国党阀所运用的方法和希特勒分子并无二致。

甚至如果设想，我父亲曾酝酿过什么计划，那么就在当时来说释放数百万人（涉及的人数确有数百万），这对恢复被践踏的公正也不是迈出的一步，而是巨大的跃进。但是，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推测，这里也没有指控我父亲的任何根据。平心而论，当时在1939、1940、1941年，在这个被镇压运动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偌大国度里，我父亲确实做了已很少有人奢望会做的事情。后来，在1942—1943年又陆续释放并输送到军队中15.7万人，在战时3年中总共释放和为军队输送了97.5万人。当然，这里说的不仅是因政治原因而被镇压的人，而且还有那些纯因刑事犯罪而被判刑的人。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入伍的有未来的苏联英雄马特罗索夫、布列乌索夫、奥茨塔夫诺夫、谢尔然托夫、叶菲莫夫等人。

也有一些别的数据。由于德国入侵的威胁，必须疏散75万在押犯，其中42万立即送入军队，许多人获释。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把所有因非法镇压而被关入集中营中的受害者一下子全部释放。准确的数字至今尚付阙如，但我们知道，1940年3月1日166.8万名因所谓反革命罪而被关入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中营的在押犯有28.7%的人获释。如果考虑到释放还在继续这点，那么，很有可能，在战争开始前关在集中营里的在押犯数字已大为减少。

完全可以设想，而部分资料也表明，在1939年的时候，有数十万人当时已获救无望。只是几十年后世界才知晓“十年无通信权”这几个字的真实含义，并为之震惊。在雅戈达和叶若夫当权时被捕者差不多立刻枪毙，甚至到不了集中营。后来，已经是50年代的后半期，他们的家人收到了死亡通知，说他们已于1941、1942、1943年或其他战争年代在古拉格集中营去世。其实，他们的遗骸在30年代就已被集体掩埋，长眠九泉。

我提醒诸位，所有这些犯罪都是在我父亲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之前干的。但党的上层却能巧妙地将我们历史中的这悲惨的几页同一个它深恶痛绝的名字联系起来。可是人们并未发现过稍后时期被镇压的苏联人的集体掩埋地，而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广为人知的那些被镇压者的掩埋地，掩埋日期基本上是在1937—1938年间，也就是尼古拉·叶若夫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

偶而重读朱可夫的回忆录，看到这样几行："那一年军队里发生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且毫无根据地大批抓人的事件是反常的，既与制度的本质不符，也与到1937年时国内形成的具体局势相左。几位著名的军人被捕了，当然，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及其战斗力。"尽管我对伟大战略军事家深怀敬意，但在这里也不能与他苟同：无论是集中营，还是枪决、数百万人被镇压，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名目繁多的罪行，都有机地"纳入"到了极权主义制度之中。苏维埃制度本身从一开始就沾满了血腥。

朱可夫是不是这样写了，对此自然难于判断。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去为强暴辩护。他很清楚，谁是对自己人民胡作非为的罪人，但是谁能允许他在这个问题上去指控党的上层呢……

无需争辩，集中营，人质，大批枪决，这是制度的产物。还记得吗，戈尔巴乔夫向我们讲过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请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承受的布尔什维克党给我们带来的牺牲不是那个社会主义的面孔？当读到专制独裁给人民带来的后果时，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有人却要让我们相信，我们在斯大林时期误入了歧途。没有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并不好些。我们不应将这些个人化：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而其他的人和整个制度与此无关。这种事是不存在的。我不是个政治家，永远也不想成为政治家。但从我的角度观察，可以看到一个链条：一些人杀掉另一些人，后来，这些人又被其他人的手清除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人的面孔可

言……

部分历史学家在承认存在谴责大规模镇压的中央决议(这是我父亲提议通过的)的同时,认定在他(指我父亲)当权期间对一批人的秘密审判仍在继续进行。这是谎言。他最终未能做到的惟一一点就是不能立即释放那些被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判罪的人。复查这些案件需要时间,需要更充分的论据来证明这些人无罪。

在1939年和1940年代逮捕仍在进行,尽管规模不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正如现在人们写的,这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倡议的,而根据的是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和政治局的决定。是的,迟到超过20分钟的旷工者也被送进集中营,少则关几个月,多则关几年。我同意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1940年8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处罚劳动纪律破坏者的命令。这不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们签署炮制的命令,也不是产生于惩罚部门内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委员能改变什么?或者,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能有何作为?其实,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本身和这份可怕的文件也只具有间接关系,一切都由党的上层决定,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但总有一些事,正如我说过的,是新的人民委员办成了的。例如,为什么已宣判死刑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没有被枪决?而鲍里斯·里沃维奇·万尼科夫①在判决后一直在监狱小号中等待执行枪决?记得父亲讲,斯大林有一次记起了万尼科夫,他说,真可惜,这样急需的人不在了……而万尼科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还活着。父亲对此非常清楚。他直接指示推迟执行判决,而对斯大林却回答说:"要是突然有所变化……要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① 鲍·里·万尼科夫(1897—1962)曾任苏联国防工业副人民委员,武器装备人民委员等职。——译注

万尼科夫很快成为人民委员,后来三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而又有多少军人学者当时获救!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一坐就几个小时,制定释放军官和将军名单。要知道,当时有数十万无辜者身陷囹圄!

或者举另一个例子。临近战争爆发的6月,空军司令员、空军总监和防空部队司令雷恰戈夫、什穆什克维奇和什捷伦被捕。谁干的?总参谋部和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检查了防空部队和空军的备战情况,军人们自己把检查结果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成立了一个由日丹诺夫领导的委员会,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前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罗夫。我不知道,被指控未执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指示的将军们所犯罪行到底有多严重,他们后来被解职、逮捕。很清楚,内务人民委员无论如何与此毫无关系。后来,当经过了战争初期有目共睹的失利之后,仍然没有任何人对这一判决提出置疑。无论是防空部队还是空军,遗憾的是,都表现得很不光彩。但我重申,我不拟对这些人妄加评论。我记起他们,只是有人常把军人被捕之事也归咎于贝利亚。要知道,只有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军事庭才能受理军人案件。

我有机会和那些遭受肆意迫害的人一起工作,我对待他们的态度总是和父亲一模一样。在我们设计局有不少人的父亲被枪毙。如拉斯普列京,他的父亲是雷宾斯克的一位商人,1918年就被枪毙了。后来,这位大学者成了科学院院士,并领导我从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

在许多履历使党的官僚们愤恨的人中,我也挑了一位天才的教授工程师到我这里工作。他的父亲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土地和农具,被赶出乌克兰,后来又枪毙了他。是的,这没有影响他的儿子读完大学、研究生和在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

党的机构终于按捺不住。有一天叫我到中央组织部,直截了当地说我隐藏了一些不应在这种秘密单位工作的可疑的人。而我

父亲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在阿巴库莫夫和伊格纳季耶夫时情况都是这样的，后者在阿巴库莫夫被捕后成为惩罚机构首脑。他们说了不算，一切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我当时遇到了真正的人事方面的难题。我找那些适合工作的聪明的人，有才能、有发展前途的人，但按规定他们是不能录用的。大多数人的简历都是“不宜录用的”，而几乎所有的军官、学院毕业生都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如果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设计师集体的领导者严格执行党的指示，我们就不能吸收他们中任何一位我们急需的人才。要工作只好违反规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那些顾忌自己前程的领导者当然不会这样做。就是许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也深信，我的做法是对的，当年的所做所为不过和我父亲一样，都是不计后果而已。

我和马林科夫就此问题的谈话是非同寻常的。他把我叫去，当着中央组织部长谢尔宾和其他几位党务工作者的面对我说：

“我们机关的同志们提醒你不要违反现行规定完全正确，但我认为，你的做法是对的。”

这不过是演戏。这位党的机关权势人物马林科夫也就是这些规定的制定者之一……

党内当权派的伪善是无所不在的。有一个姓科什利亚科夫的人在我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数学家和优秀的人。我只说一点，和他的交往有助于我后来可以不用提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数学物理课。

当列宁格勒市面临被德军占领的现实威胁时，出现过拯救该市的历史文物问题。后来，科什利亚科夫和列宁格勒的其他著名科学家被作为敌人的帮凶判了刑，长期被剥夺自由。这个案件认为，似乎列宁格勒这些教授们在列宁格勒市成立了一个政府，预定在德国人到来后与占领者取得联系。总之，是祖国的叛徒。实际

上一切都是经过中央委员会同意后干出来的。我知道在白俄罗斯组建了这样一个同德国人合作的政府。出于德国人必然要成立类似机构考虑,唯其如此,不如想要把谁列进去就先列进去。于是在列宁格勒也有了这样一个政府。然而,日丹诺夫却想要把这些人枪毙。是奇迹救了科什利亚科夫院士。日丹诺夫总是有他自己要耍弄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人的生命绝对没有任何意义。当需要组建这样的政府时,就建立一个,当想要指明谁是敌人时,就把那些提议搞这个育动勾当的"充当"敌人。

战后,那些规定仍不许我吸收曾在占领区呆过的人参加保密的工作。但是请问,是谁将千百万人置于这一地区而不顾?这个问题对党来说并不重要。当然,我还是尽可能地绕过这一规定。

总之,只要现在查阅一下那些旧文件并将其公之于世,那么一切都将会真相大白。而且,文件还不止这些。比如,只是在1991年才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1953年)速记记录。而为什么不公布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那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已是在斯大林死后,由马林科夫和我父亲提议,他们重又成为中央委员。但斯大林罢免他们的原因却始终是个谜。有人断言,那次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已不复存在,不奇怪吗?我敢肯定,真正苏共的历史尚未写出。对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大清洗的叙述还远远不够。

斯大林死后,我父亲被劝领导联合内务部。众所周知,他在这一职位上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却向着重建法制走出了重要几步。还在战前,他就建议将所有监狱和集中营划归司法部管辖。斯大林当时说,原则上可以这样办,但战争临近了,这个问题要先放一放。

1953年我父亲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看来,他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决议获得通过。哎,众所周知,很快一切又恢复原状,直至今天,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

他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执行惩罚的机构仍然纳入内务部系统。父亲认为这样是行不通的，内务机构的任务是揭穿犯罪，而非拘押罪犯。

1953年，由于他的倡议，在斯大林死后不久便实行了范围广泛的大赦。今天，这一人道主义举动也成了他的罪状。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相关法令。我父亲认为，应释放全部被清洗人员和因轻微刑事犯罪而被判刑的人。他认为我们这样做就可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的反革命派别，为虚构的与非虚构的犯罪和敌人划上一个句号。按我父亲的意见，不仅应释放那些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而且还要为数百万未能活到恢复公正时期的人恢复名誉。

他认为，在中央必须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在3至4个月的期限内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工作将由司法部和各地的司法机构和检察机构在其本职工作范围内承担。正是这些机构应该在紧迫的期限内辨明是非，决定每个在押犯的命运。因此，没有任何必要等待二十大召开。要知道，已经提出了具体实施这些建议的具体构想。

委员会成立了，并同司法部一道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伏罗希洛夫签署了大赦令。尔后有人散布舆论说“贝利亚放走了惯犯”。而他说的是另一回事，不是要放走惯犯，而是要释放那些因体制而惨遭不幸的无辜者。但是，这和贝利亚有什么关系？按设想，内务部只释放了那些在政府和司法部决议中列入的在押犯。请问，为什么要赦免那些罪恶累累的重犯？

总之，这世界无奇不有。当讲到释放古拉格的囚犯时，就必然要强调这是党之所为。如果要把贝利亚“牵进去”，就会因是“贝利亚搞的”赦免而感到痛心。很遗憾，各方面都是如此。

父亲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能应有一定限制。业务工作、对监管场所的警卫工作当然应该进行。侦查工作就无必要了。他

讲了这样做的理由。几年前,在苏联曾就这一问题展开公开讨论。我记得,有人甚至建议成立个专门侦查委员会。但此事不知因何而搁浅。据我了解,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任何人都不准备将这一建议付诸实行。可惜!过去这为什么这不合党的机构的需要,很易理解。党明白,这样更易于摆布人们的命运……但是,目前是什么干扰我们在文明之路上前进呢?

也就是在那个1953年,我父亲还就部分改革国家机关和部长会议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建议。比如,作为专家,他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首先应成为一个分析研究机构,为各部和部门提供情报,帮助其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向以消息灵通见长,这一点人所共知。

那几个月他几乎没到过卢比亚卡,所有的时间都呆在部长会议大楼内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毫不掩饰,高层领导成员对他众多建议的反响使他非常满意。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因素使这一切急转直下。后来一切真相大白,党的上层明显无意于根本性变革。

父亲不想在内务部久留。他说:

"我只在根本改组时期主持内务部工作。"

"当然,"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向他保证说,"你将伊格纳季耶夫的摊子整顿好,你就走。"

1951—1953年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谢苗·伊格纳季耶夫是在我父亲提议下被解职的。这个人卷入了战后清洗,制造了所谓"列宁格勒案"和"医生案"。我想,如果把他逮捕的话,就会避免党的上层所不愿发生的许多情报的流失。但是,当我父亲被处决,一切遂浸而不行。

如果父亲活着,许多事情都会有诸多改变,起码内务部会是这样。他认为,这个部不应该是个警察部门。可结果却是如此。各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因具有极大的潜能,可以作为分析机构服务于国民经济。党的机关虽然无所不晓,但永远不会为正在发生的

事件提供完整情况。而内务部却有能力进行类似的客观分析。

“不要拎着枪追，而要用头脑想，”父亲说。

在全会上也提到了他讲的这句话……对他的指责是：贝利亚对反间谍工作放任不管。

党一如既往地需要“人民公敌”……但是，有文件证明我父亲在主持内务部工作时所作的论断：对内政治侦查机构过于庞大，而对外侦查完全陷于瘫痪。当时他就提出建议，将对内国家安全机构人数缩减到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此外，父亲坚持将国家最高领导成员的私人警卫减少到一至两人。按他的意见，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保卫工作应由一般的警察代替，并由其安排各部委和各局的保卫工作。我记得，这在当时涉及到35万人。在当时当然也没有任何必要这样来利用军职人员。

我想，我父亲提出的另一个建议也具有合理性：撤销区级肃反委员会。他认为，有各州设内务处或局即已足够。众所周知，直至最后时期国家的各个区内都设有克格勃的机构。

为节省经费，我父亲提议重点加强边防部队，为其配置新的技术装备，改善这些人艰苦的服役条件。当时国内状况完全允许大幅度缩减惩罚机构。可是，不出所料，中央委员会对此不感兴趣。

那一时期，我父亲坚持设立空军和海军侦察局。顺便说一下，这一机制在美国军队有出色表现。它们同情报总局一道都应隶属于总参谋部和各军兵种的参谋部，和军事反间谍机构一样。要知道，曾几何时，我父亲的建议得到了实行。而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恢复原状：最近几十年武装力量的安全保障不是由军事反间谍机构负责，而是克格勃的特别行动处。这是我父亲一贯反对的。这样的例子不少。今天我已完全明了，他完全是因受了阻挠而未能最终完成他已开始的事业。

三、贝利亚的后任：梅尔库洛夫、克鲁格洛夫和谢洛夫

当代读者对梅尔库洛夫、克鲁格洛夫、谢洛夫的名字几乎没有概念。然而，正是他们是我父亲最亲密的助手，并在不同时期主持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工作。

我了解梅尔库洛夫。他在1943至1946年期间领导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部分资料证实，他在1941年还担任这一职务6个月时间。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是个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在国家各剧院，甚至在著名的"小剧院"都上演过他的歌剧。诚然，他用的是笔名：弗谢沃洛德·罗克。总之，他倾心于艺术。他摄影技术高超，曾拍摄过电影。

在格鲁吉亚的多年共同工作中我父亲了解了梅尔库洛夫。当父亲转到莫斯科工作时，把他也调到身边，任第一副人民委员。后来，梅尔库洛夫单独主持国家安全机构工作。1946年他被解职。这一决定的正式理由是：在侦查工作中不善利用技术手段。看来，也想不出别的理由。梅尔库洛夫不能让中央委员会满意，因为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党的上层分子，他们需要另一类型的惩罚机构的领导人。梅尔库洛夫被安排任国家监察部部长，而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转由阿巴库莫夫主持。

梅尔库洛夫牺牲了，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和我父亲多年共同工作。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给我留下了最为美好的回忆。我的父亲对他也颇为器重。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父亲的亲密助手中有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父亲死后他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请注意：那一时期的内务部也包括国家安全机构在内。

摘自官方资料：

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45—1956年苏联内务部长。生于1907年。曾经从事农业劳动，在军队服役。1930年11月复员。从1931年起就读于莫斯科利布克涅赫特工业师范学院。1934—1935年为莫斯科东方学学院日本部学员。毕业后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7年末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1938年11月被中央委员会任命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全权代表。在32岁时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党的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自1941年起为预备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11月为国防建设局局长、第四工兵军司令员。1945年4、5月间被派赴美国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会议。参加组织克里米亚和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王国政府代表团的保卫工作，因此被授予不列颠王国最高荣誉勋章和美国骑士团勋章。

1945年12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解除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职务后，克鲁格洛夫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1956年4月被解职。专门成立的政府部务交接委员会（新部长是苏共中央建设局局长尼古拉·杜多罗夫）查明，"苏联内务部未能按要求完成党和政府交给它的任务。原部长克鲁格洛夫、委员会成员及其他苏联内务领导成员未从1953年苏共中央决议中做出应有的结论……在苏联内务部的工作中，在领导地方内务机构上存在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内务部内部没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3月12日和7月10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要求内务部领导采取措施，通过加强监押制度和强制参加社会有益劳动的途径来

根本改善对犯人的改造。苏联内务部领导没有认真执行这些决议，未能整顿监押地监禁罪犯秩序，无力完成正确组织劳动改造犯人的任务。

以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为主席的政府委员会在工作几天之后，未发现这位部长有什么重大错误，但问题已决定。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几天，克鲁格洛夫被调换工作，降职使用，被任命为电站建设部副部长。

1957年8月，原部长又一次被降职，竟降为基洛夫经济行政区副主席。1958年7月克鲁格洛夫被解除公职，归入残疾人行列。

多奇异的经历。这里我只补充一点，1960年1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这位退伍的中将开除出党。

克鲁格洛夫于1977年6月逝世。

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罗伊·麦德维杰夫认定原内务部长为自杀，他不能等到对194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在驱逐车臣—印古什居民时所犯罪行进行调查完毕。

好像当时居民拒绝服从迁居命令，于是就捣毁了其中的一个村庄。内务部队行动的责任落在了克鲁格洛夫的头上。另一个官方说法是，这位中将是被火车撞死的。

在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是真的。罗伊·麦德维杰夫认定，克鲁格洛夫死的那年正在进行调查。这是在70年代末？当然，没有任何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打算在30年之后让原部长对已被忘记的，准确说来是已被从历史中删除的这一悲剧负责。您是否记得，这一罪行的同谋之一米哈依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他得以在克里姆林宫的奥林匹斯山上颐养天年，寿终正寝。一个已被大家遗忘的退伍残疾人的责任有什么好说的呢？很可能，罗伊·麦德维杰夫正如在很多情况下那样是完全背离了事实真相。

顺便说一下，说是有克鲁格洛夫所属部队参加的枪杀村民的事实至今未能得到证实。但是，难道问题仅仅是在个别的一件事？驱逐整个民族本身就已构成制度的可怕犯罪。还须想出一些别的什么理由吗？

我父亲在格鲁吉亚时就了解克鲁格洛夫。他在联共(布)中央工作，分管我们加盟共和国。当然他常到格鲁吉亚去。父亲认为克鲁格洛夫是个客观的和完全远离沙文主义的人，大家知道，这正是党的中央机关出来的人的毛病。调到莫斯科后，当需要调换叶若夫的最亲近的助手时，父亲选中了克鲁格洛夫。中央委员会同意。很快，克鲁格洛夫便进入调查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安德烈耶夫委员会。当时大家就已知道，克鲁格洛夫将成为我父亲的亲密助手。是的，出于对此项工作的特性尚不熟悉，谢尔盖·克鲁格洛夫自己没有立即表示同意。父亲说服了他，于是就进行了任命。而当 1941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划分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我父亲决定离开这一机构，并提议任命克鲁格洛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政治局没有同意，克鲁格洛夫还是我父亲的副手。而在战争开始前两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重又合并为一个人民委员部。

领导这个联合人民委员部的全部业务全都压在了克鲁格洛夫身上。据我所知，对他的工作没人说三道四。

克鲁格洛夫经常出入我家，我们和他的家人也情义深厚。

记得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我还记得他的妻子——一位女教师。

斯大林死后不久，我几次到巴尔维哈的休养所看望一位同志。克鲁格洛夫也在那里疗养。我们见面，一谈就几个小时。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和他都经常见面。

“尼娜，你别去留意现在人家如何谈论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什么，”克鲁格洛夫说，“全都是瞎说。”

“我知道得很清楚，”妈妈回答。

克鲁格洛夫对我们讲，就在当时，在所谓“逮捕贝利亚”之后他曾试图和他见面，想和他谈一谈。作为苏联内务部长的他当即被制止：“不行！”

“不管我和谢洛夫怎样向政治局要求争取能见一面，最后都毫无结果，”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讲道，“我没能见到他。而这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历史学家们不去注意这样一个细节：“阴谋家”贝利亚已被揭穿，而与他共事多年的第一助手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这不像是中央委员会做的事。请诸位判断一下，党的上层何以如此轻心地将安全机构交给克鲁格洛夫去管辖。原来他们就知道，所谓的阴谋根本就不存在……

我也非常了解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谢洛夫，他在1954至1958年主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我明白，在今天称赞这个部门的原领导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我相信，谢洛夫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个绝对诚实的人，为加强法制建树颇多。

他过去不是肃反干部，而是在我父亲提议下进入安全机构的。主持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我父亲开始用专业人员来替换那些随便调进来的人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不少人来自伏龙芝学院，那里专门设有军事谍报系。正是那里培养了在日本、美国和中欧国家从事谍报工作的干部。这些人懂语言和本行业的基础知识，内务部新上任的人民委员也能依靠他们开展工作。顺便说一句，当我父亲1953年3月重入内务部时，那里已面目全非，他不得不再选干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不得不撤换的工作人员差不多达到90%，他们甚至连所在国的语言都不懂。那一时期苏联谍报人员整体专业水平极低。但尽管如此，经过调整之后，很快又面貌一新。

从谢洛夫本人那里我了解到，他的军职晋升始于未来炮兵元

师雅科夫列夫指挥的部队，他在那里的侦察分队服役12年，已经升为中校的时候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谍报系。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和数十名这样的军官被分配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受新人民委员指挥。他们当时基本上都是上校和中校军衔。

我父亲一直器重专家，很快，这些军官都被任命为很高的职务。谢洛夫获得将军军衔，并成为内务局领导人。

在我父亲的印象中，谢洛夫是个有能力、讲原则的人。由我父亲提议，伊万·亚历山大洛维奇·谢洛夫被派到乌克兰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表现极佳，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那一时期在基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是赫鲁晓夫。共和国内局势本身是可怕的：大规模镇压运动正一步步毁灭当地知识分子，数百万无辜者在苦难中挣扎。我父亲交待的任务只有一个意思：恢复法制。按我父亲的想法，谢洛夫是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他是个意志坚定、品行端正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懂日语。而更主要的是，他是那种有自己的观点而又敢于坚持己见的人。

他和赫鲁晓夫的关系不融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完全是另一种人。据谢洛夫讲，在赫鲁晓夫同反对派无休止的斗争中他拒绝支持赫鲁晓夫。而且，赫鲁晓夫把拥有个人观点的人统统视为反对派。显然，赫鲁晓夫希望有一个顺从听话的人来担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把手的职务。而既然谢洛夫不支持他清洗民族干部的政策，冲突便在所难免。应是一个非凡的强者，才能顶住中央第一书记的压力，而谢洛夫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个“硬核桃”。

关于谢洛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我父亲当然知道，并支持这位年轻的人民委员。我知道，我父亲和谢洛夫事先有约。他说，你到那里，无论是什么事和什么人都不要怕，无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地方中央委员会对你怎样施压，都要坚持自己的路线。同时悄悄地为自己物色接班人，但不能把班交给那种只会围着乌克兰中

央指挥棒转的人。父亲当时即已决定要将谢洛夫本人调回莫斯科。

谢洛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起因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第一次婚姻所生之子列奥尼德的不快事件。很遗憾，这是“纨绔子弟”（高干子弟）圈中常有之事，中央第一书记的儿子竟同一些不轨之徒混在一起。后来才弄清楚，他的朋友都是些专事杀人越货、以诈骗抢劫为生的罪犯。当事件汇报给谢洛夫之后，他立即同我父亲联系。

“将一切通知赫鲁晓夫，”父亲吩咐说，“看他怎么反应。这是无法无天，你自己明白，就是中央第一书记的儿子也不能把他从案件中拔出来，而只能为他减轻减轻一些罪责。”

赫鲁晓夫的反应让谢洛夫吃惊：

“停止追查这一案件！”

“这怎么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谢洛夫反对说，“案子已闹得沸沸扬扬，这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已家喻户晓，把您的儿子从这件案子中拔出来几乎没有可能。”

尽管赫鲁晓夫坚持己见，调查还是有始有终，并开庭审判。这一犯罪团伙的大部分参加者——帮匪徒都被判处极刑，执行枪决。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儿子只处以10年监禁。

战争爆发后，有人为列奥尼德指点迷津，要他请缨赴前线作战。他这样做了。赫鲁晓夫儿子的请求被批准，但没有把他作为一名列兵派赴前线，而是进了空校。成为飞行员后，列奥尼德和敌人作战勇敢，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据我所知，这事发生在1943年的春天。

摘自官方资料：

第一空军第18近卫歼击机团近卫军上尉飞行员列奥尼德·赫鲁晓夫1943年3月11日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没有返回。

正如第一空军司令员胡佳科夫中将在写给沃龙涅什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中将的信中所言，在同两架“福克·武尔夫190型”歼击机激战后，赫鲁晓夫上尉的飞机“冲向地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丧失您儿子归来的希望。可是，他没有回来，从那时起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使我们得出了沉痛的结论，您的儿子——近卫军上尉赫鲁晓夫·列奥尼德·尼基塔维奇已在同德国侵略者的空战中英勇牺牲了。”

在转到歼击航空兵之前，赫鲁晓夫的儿子在第134快速轰炸机团服役，共完成33次战斗飞行，身负重伤。重新训练一段时间后，被派到第18近卫歼击机团。

很可能，赫鲁晓夫对谢洛夫心存怨恨。我父亲遵守诺言，将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调回莫斯科。于是，谢洛夫成了他的副手之一，负责谍报工作，分管边防部队。而战时朱可夫征得我父亲的同意，把谢洛夫派到前线指挥作战。

1954年，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成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但是，4年之后赫鲁晓夫将他从那里赶走。这样，谢洛夫当上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后来，又找正式借口将他清出情报总局。起因是所谓情报总局奥列格·宾科夫斯基上校案，他被指控为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

我认为，将这位忠于职守的人撤职给苏联的情报机构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是，党的机构经常被谢洛夫的原则性所激怒，至于将他撤职有何损失却很少有人考虑。之后，为了败坏苏联情报部门最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竟散布谣言说，谢洛夫利用职务之便，从德国“波茨坦和柏林的德国贵族豪宅中运回大量的家具、贵重餐具、水晶玻璃器皿、油画、地毯、家用银制酒具、珍贵茶具及许多文物古董”。现代一位著名苏联历史学家几年前曾撰文郑重地肯定说，谢洛夫上将“悄然盗走所谓‘皇冠’——一顶钻石皇冠，并

把它埋在自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私人别墅附近的地里。”显然，类似的胡说八道，恕我尖锐地说，完全不值得对之进行评论。

还尝试过用其他方式搞臭谢洛夫将军。据说已是50年代末，发现谢洛夫的父亲是一名宪兵军官，曾在沃洛格达关押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犯的专门监狱里工作了12年。1917年他消失了，而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谢洛夫本人则向党隐瞒了他父亲的过去历史。后来，当赫鲁晓夫本人已赋闲在家，有人开始撰文说，谢洛夫是他的一位亲属，还受到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保护。当然，这是撒谎。但是，谣言终归是谣言。只有不太了解谢洛夫的人才能很容易相信这一切。在谢洛夫上将手下干过事的人，都记得他是个天才的领导者，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比如，我在保卫高加索时期见过他，从此以后，我从不相信任何一句中伤这位品行极为端正的人的瞎话。

在苏联情报机关领导人中，并不全都像苏联英雄谢洛夫上将这样的人。比如，战后阿巴库莫夫上将曾领导过国家安全机构工作。

摘自官方资料：

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上将。

1908年生于莫斯科。1930年起成为联共(布)党员。工人出身，初等教育。战争期间先后任“斯麦尔什”反间总局局长、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

1951年7月4日被解除现任职务，8天以后被捕。在苏联检察院向他宣读了根据俄联邦刑法第58—1条(Б)款对他提出刑事诉讼(军人叛国罪)和采取强制措施把他拘押在内务部所属索科尔尼监狱(臭名昭著的“水兵的寂静”)的决定。

他先后被关押在列福尔托沃、布特尔卡和苏联内务部内

部监狱。为了保密作为“15号囚犯”被安置在单人牢房里。

在阿巴库莫夫之后被逮捕的有他的妻子安东尼娜(她和她两个月的儿子都被关在“水兵的寂静”监狱),还有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查处处长列奥诺夫少将,他的副手科马罗夫上校,利哈切夫上校,施瓦茨曼上校,国家安全部秘书长切尔诺夫上校以及他的副手布罗维尔曼上校。

1954年12月14日,在列宁格勒军区军官之家大楼内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巡回法庭在法学家赛丁中将主持下开庭。在诉讼过程中国家公诉人为苏联总检察长、最高检察官鲁坚科。和阿巴库莫夫一同受审的有列奥诺夫、切尔诺夫、科马罗夫、里哈切夫、布罗维尔曼。阿巴库莫夫上将不承认自己有罪,并在最后的遗言中宣称,他是忠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诚实的人。“我是诽谤的受害者。”

1954年12月19日12时15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宣读判决之后,这位原苏联情报机构领导人在列宁哥勒被立即执行枪决。在执行枪决现场的有苏联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

在我父亲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时,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罗斯托夫州内务局工作。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他适逢为雅戈达和叶若夫年代的被捕者大批平反昭雪时期。在各边疆区和州都成立了专门平反小组,由检察院检察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当时阿巴库莫夫也被吸收进这样的一个小组,并从此平步青云。在他的直接参与下,罗斯托夫州有60%的在押犯和被捕者被释放。后来传言,说阿巴库莫夫良莠不分,一味“纵囚”,以此沽名钓誉。是否如此,我不能妄加评论,但善事他是做了。因释放无辜者而升官,总比在此之前他的那些同事靠抓人发迹要好些。

两年之后,也许更早些,阿巴库莫夫已转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莫斯科的中央机关工作。之后，他的职务晋升很快，战争爆发之前，他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机构局局长，而从 1943 年起负责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军事反间谍工作。

1946 年，由斯大林提议，政治局解除了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部长的职务。斯大林又提议任命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领导人。我父亲和这一任命没有任何关系。正是从那时起，即阿巴库莫夫进入国家安全部之后，我家开始受到监视。当时在我家房子里安装了一个窃听器。但是，应当指出，这不是新任国家安全部长的倡议，阿巴库莫夫仅仅是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已。

与其前任梅尔库洛夫不同，按斯大林的观点，对于这个职务他是个过于软弱无能的人。阿巴库莫夫从未到过我家。我不知道是何原因，他一直没有成为与我父亲关系密切的人。有人时常引用他从监狱写给我父亲和马林科夫的信。这很好解释。我父亲曾在这一机构工作过，而阿巴库莫夫希望我父亲作为一个专家参予决定他命运的事。顺便说一下，我父亲总是把阿巴库莫夫的全部请求丝毫不差地正式转达给马林科夫，这很简单，因为是分管国家安全机构的。

我敢肯定，国家安全部的历史是和党的高级官僚马林科夫的名字紧密相联的。他是国家安全机构强有力的监督人。我得承认，在这方面他意志坚定，始终如一。部分资料表明，在晚年他正式出示了老同事尼基塔·赫鲁晓夫参与了这一制度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其他罪行的证据，而对自己在这些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避而不谈。这些可信的资料还认定，马林科夫将指控赫鲁晓夫的材料转给了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档案馆，甚至今天仍可找到不少指控马林科夫本人的材料。顺便说一句，如果像大家认为的那样，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安全部长一职不仅是由于斯大林，也是由于安德烈·日丹诺夫的缘故，那么，取代阿巴库莫夫的党内机关权贵伊格纳季耶夫可纯粹是马林科夫的走卒。

摘自维克多·阿巴库莫夫 1952 年 4 月 18 日的一封信：

"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亲爱的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身陷列福尔托沃监狱两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请求监狱的侦查员和典狱长给我纸笔，好给你们和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写信……我的遭遇难以想象。头 8 天被押在几乎不透光亮的寒冷的牢房里。接着的一个月审讯，一昼夜我只睡一到一个半小时，给的食物令人作呕。所有的审讯都是骂娘、挖苦、羞辱、嘲弄等等野蛮暴行。经常把我从椅子上扔到地板上。3 月 16 日夜里我被提出，并被带到一个所谓的单人牢房，后来才明白，这实际上是个带管道装置的冷藏室，没有窗户，里面空无一物，两米见方。在这个没有空气、没有食物（每天只给一块面包和两杯水）的像怪箱子的地方我度过了 8 天 8 夜。管道装置一开动，里面就越来越冷……这样的暴行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列福尔托沃有这些冷冻室……我请求你们，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和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1. 结束一切，让我重返工作岗位；

"2. 如果这样的事情在某个时候还要继续，那就把我从列福尔托沃提走，使我摆脱柳明和他的朋友们。也许，应该把我送回寂静的水兵监狱，交给检察官们审讯……或许，能把我的妻子和孩子送回家，我将永远对你们感激不尽……"

1954 年 3 月阿巴库莫夫的妻子被释放，她和孩子蹲了近 3 年的牢房。尽管侦查员们未能找到构成犯罪的事实，案件停止审理，她和她的儿子仍被逐出莫斯科，若干年后才许返回。

根据部分回忆录来看，侦查员（什么侦查员，就是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维奇·鲁坚科本人！）坚持"迫使"被捕的国家安全部

长“中伤”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指出,“我和贝利亚之间仅仅是工作上和正规场合的关系,此外没有任何其他交往。贝利亚的住宅和别墅我从来没有去过”。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党的上层分子向人民宣布:“贝利亚的帮凶们已被处决。”只是在几年以前,军事总检察长、苏联副总检察长、法学家卡图谢夫中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阿巴库莫夫“开脱”:“阿巴库莫夫被指控的理由是,他被贝利亚提拔到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的职位上,并成了贝利亚阴谋犯罪集团的同案犯,案件本身现有的证据即足以将这些指控推翻。”如果能把关于“阴谋犯罪集团”的捏造抛弃,这一表白不无重要意义。

我记得,我和父亲谈到阿巴库莫夫问题时,他这样解释阿巴库莫夫的被捕:他大概是完成了要求他做的一切,而现在,他们不需要他了。他们是指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作为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正是执行了他们的指示。

父亲认为,阿巴库莫夫,很遗憾,还有梅尔库洛夫,他们自愿变为不加思索的执行者,并最终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党的上层试图将自己的罪恶依次算在一些具体的人身上。父亲曾保护过梅尔库洛夫,但为什么不想或不能够帮助阿巴库莫夫,不得而知。看来,他是决定不卷入这一事件。使我父亲非常痛苦的是,他离开安全机构之后,这一机构越来越成为党的惩罚之剑,形象点儿说,这支剑在 1939 年时曾打算插回剑鞘。现在,这支剑像在叶若夫时期一样地挥舞着,而我父亲认为,阿巴库莫夫是其罪魁祸首之一。

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坐牢的时候,我处在完全隔离的状态,偶然一次听到侦查员们之间的谈话,说阿巴库莫夫还活着。我非常惊奇,因为如果不是了解全部就是知道很多情况的人是不能留在世上的。很可能,党的上层在等待时机,希望随便一个巧合的情况迫使阿巴库莫夫交待那些当时党所急需的证据。当他身上的油水被榨干,就将其枪毙,就像枪毙无数其他罪行的证人和同谋者一样。要知道,这是个可靠的方法:除掉一个人,不留线索。

我不是为阿巴库莫夫开脱。但是，他是因虚构的罪名而被枪毙的，而不是因为他执行了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的命令而犯下的罪行。在他同意负责领导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灭亡的命运。我丝毫都不怀疑，除掉了这个危险的证人，党的上层也便失去了阿巴库莫夫可能做出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坦白交待的历史。我想，许多东西我们至今已无从猜测。

绝 密

苏联部长会议 1947 年 5 月 21 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此向您报告如下：

1942 年 4 月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照会苏联外交部称，根据大使馆所掌握的情报，美国公民奥金斯·伊赛正监押在诺利里斯克集中营里。受国务院之托，大使馆请求告知奥金斯被捕的原因、刑期、罪名，以及他的健康状况。

由于美国大使馆的坚决要求，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于 1942 年 12 月 8 日和 1943 年 1 月 9 日两次安排大使馆代表和罪犯奥金斯会面。在会面期间，奥金斯告知美国大使馆代表，作为托洛茨基分子，他是因使用假护照非法进入苏联以同苏联托洛茨基分子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而被捕的。

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无视这一声明，屡次向苏联外交部提出重审奥金斯案件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大使馆转寄了奥金斯给在美国的妻子的信和电报，同时通知苏联外交部，承认奥金斯为美国公民，并准备将其遣送回国。

1943 年 5 月 9 日美国大使馆被告知，“苏联有关机关认

为不能重审奥金斯案件。"

1939年2月20日奥金斯确实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变行为而被捕。在调查过程中这些嫌疑未能得到证实,奥金斯亦否认自己有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却判奥金斯在劳改集中营服刑8年,刑期从1939年2月20日监押日算起……

奥金斯在美国的出现可能被敌视苏联的那部分人用来积极进行反苏宣传。

出于这方面考虑,苏联国家安全部认为必须消灭奥金斯·伊赛,并通知美国人,奥金斯在同美国大使馆代表会面后于1943年6月回到诺利里斯克服刑地,并于1946年因肺结核发作而死于当地医院。

在诺利里斯克集中营的档案中将有反映奥金斯的生病过程、我们给予他的医疗及其他方面帮助的材料,将为奥金斯之死编制病历、尸体解剖证明和安葬证明文件。

有鉴于此,在纽约的奥金斯的妻子数次光顾我大使馆咨询其丈夫情况,知道他已被捕。我们认为,应将她叫到领事馆,通知她其丈夫已经死亡。

请您批示。

阿巴库莫夫

相关的指示下达了。

现在,让我们再援引一个前不久才公布的与原国家安全部长维克多·阿巴库莫夫有关的文件。

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同志:

……在检查米霍埃尔斯材料过程中查明,1948年2月在明斯克市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原白俄罗斯

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察纳瓦秉承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旨意共同实行了从肉体消灭米霍埃尔斯的非法行动。

苏联内务部因此审讯了阿巴库莫夫，并得到了奥戈利佐夫和察瓦纳的解释说明。关于这次犯罪行动的实施情况，阿巴库莫夫证明说："按我的理解，1948 年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迅速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组织消灭米霍埃尔斯，交给专业人员来干。当时得知，米霍埃尔斯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来到了明斯克，他朋友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后，他立即下令将他们在明斯克就地干掉……

当米霍埃尔斯被杀掉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的时候，他高度评价这一措施，并命令授予勋章（一道被杀掉的还有陪同米霍埃尔斯的苏联国家安全部代表戈卢博夫）。

消灭米霍埃尔斯有几种办法：A. 车祸；B. 在行人稀少的街上用重货车撞死；C. 以上两种办法没有把握，于是决定采取下列步骤：首先通过代理人邀请米霍埃尔斯于夜间去某个熟人家里做客，为其提供返回所住宾馆的汽车，并就此将其带至察纳瓦郊区的别墅杀掉。尔后，将其尸体运至行人稀少的（僻静的）街上，放置在通向宾馆的道路中央，用载重卡车轧过去。为保密起见，也除掉了陪同米霍埃尔斯去做客的戈卢博夫（在别墅他们已被载重卡车压死）。

内务部认为，必须：

A. 逮捕并追究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长察纳瓦的刑事责任；

B. 撤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嘉奖杀害米霍埃尔斯参加者的命令。

拉·贝利亚

1953 年 4 月 2 日

我们希望，上述援引的文件多少能给某些历史学家的热情降降温，他们不失时机地把伟大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之死归罪于要求惩罚真正犯罪凶手的那个人。我们仅能猜测，和我父亲有关的一系列案件公开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在等待我们。

很少有人知道，正是我父亲建议追究在斯大林晚年负责国家安全部的伊格纳季耶夫的党性责任。建议得到了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支持，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命审查关于原惩罚机构头目的党性责任问题。还在更早一些的1953年4月5日便通过了一个决议，“由于伊格纳季耶夫在领导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期间所犯严重错误”，解除其中央书记职务。伊格纳季耶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派担任苏共巴什吉尔州执委会第一书记工作。真是“严厉的”处罚。是的，只是在先“除掉”了我父亲之后，党的上层才决定把事情压下。大家看，事实胜于雄辩。

不，所有几代苏联契卡人员坚持使人确信，克格勃就像其前身（全苏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一样，都是党的武装队伍。而当契卡人员自身起来反对肆意妄为而不急于执行明显与法律抵触的命令时，他们便会被提醒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一些人立刻敬礼表示遵命服从，另一些人则予以抵制。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很少。

但是情况表明，“党的武装队伍”、监狱和古拉格集中营，对党的上层来说也已不够了。于是，中央委员会决定再建立一个“党的”监狱，其在苏联存在的事实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数十年。

四、马林科夫组建的“特别监狱”

1956年6月23日，苏联内务部长尼古拉·杜多罗夫特别致函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称，在逮捕长期担任马林科夫秘书处处长苏

哈诺夫之后(苏哈诺夫于1956年5月14日被捕),在其被打开的保险柜内发现了马林科夫起草的在莫斯科建立"特别监狱"的文件、1950年3月4日关于苏联新政府人员组成的手稿以及说在苏军领导层存在间谍的证明材料。1956年6月16日被逮捕的马林科夫秘书处处长证实,如我后来所知,原计划在莫斯科建立的"特别监狱"地点就在"水兵的寂静"。(真是命运的嘲弄:在党的上层为昨日党内同志设立的"特别监狱"里也关押过进行政变未遂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①

苏哈诺夫供称:

> 马林科夫对我说,让我提出一个可信赖的能在"特别监狱"进行侦查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人员名单。为此,我提出两个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候选人——扎哈罗夫和尼基福罗夫。在建立"特别监狱"的进程中我得知,被吸收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当时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行政处工作的舍斯塔科夫和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克列伊梅诺夫。有关组建"特别监狱"的工作,克列伊梅诺夫和舍斯塔科夫直接向马林科夫作了汇报。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另一资料。历史学博士、教授、涅克拉索夫少将1990年在《苏联警察》杂志第6期发表《50年的斗争和胜利》一文,援引1956至1960年担任苏联内务部长的尼古拉·杜多罗夫的未发表的手稿证实:

> 作为党中央书记,马林科夫1950年亲自组建莫斯科"特

① 指在苏联发动1991年8·19事件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译注

别监狱",以便实施对政治案件的侦查。组建"特别监狱"的具体事务由苏共中央行政处的人实施,而侦查工作则由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关于组建"特别监狱"的进程及其活动直接报告给马林科夫,监狱内安装了政府直线电话。监狱可容纳30至40人,实行特别的管理制度,快速的人员流转。里面为侦查员、特警和以直接受马林科夫本人指导的典狱长克列伊梅诺夫为首的特种侦查员设置了35个办公室。对监狱实行指导和监督的还有当时任内务部副部长的谢洛夫。

有过这种情况,当有的领导人员在离开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办公室时就被逮捕。例如,原苏共中央书记库茨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在马林科夫的接待室被捕并投入"特别监狱",在那里惨遭严刑拷打,备受折磨,最后在肉体上被消灭。

对政治犯的审讯不仅在监狱里进行,也经常将犯人从"特别监狱"提出来通常在午夜12点之前用特种汽车把他们送到苏共中央大楼,由马林科夫个别审讯他们。

摘自原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1960年1月19日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

"1950年,根据马林科夫以党中央委员会和征得斯大林同志首肯的名义所作的指示,要求内务部空出独立牢房,指派监狱长,配齐监督和保卫人员,并从此不再使用这一监狱,因为它将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苏联内务部和我作为部长完成了这一指示。这个监狱我一次没有去过,一个犯人也没有见过和审问过。这一监狱存在的时间很短。记得我从监狱长克列伊梅诺夫的话里得知,有一段时间将当时被捕

的库兹涅佐夫从国家安全部的监狱提出来送到了那里。没过多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又将其转为国家安全部监狱。安全部被准许可根据一般规定自行安排使用那里的牢房。所有这一切，原副部长谢洛夫、奥布鲁奇尼科夫同志、原监狱管理局局长库兹涅佐夫同志等都能证实。”

这不是证据吗？数十份材料一如既往地指控我父亲设立了这一专门监狱。1960年1月，这一指控落在了谢尔盖·克鲁格洛夫身上。是谁提出的指控？是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这个专门监狱就隶属于这个监察委员会。可是，像往常一样，苏共中央也“忘了”自己的无耻作用。

克鲁格洛夫供出的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责成内务部筹建新监狱的只有一个人——马林科夫。

对将原内务部长开除出党时所提出的指控的其他几点亦颇为耐人寻味。例如，1944年参加将车臣—印古什居民迁离故地。苏共及其“战斗司令部”似乎与此无关。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恶棍强迫无辜的人们背井离乡，踏上遥远的途程。是谁下的迁居令？不过，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

很难说，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伊格纳托夫有没有读过克鲁格洛夫写给他们的信，但是，这位退伍将军的党籍没有恢复。“我准备接受党的任何惩罚”，原内务部长写道。但是，党对这一牺牲品已不需要，因为由制度制造的全部罪行已都算在了克鲁格洛夫之流的身上。

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这位在斯大林时期7年和在独裁者死后3年一直负责内务部的人在某些方面是否有罪。当然有罪，所有在这个部里制造违法状态的部门领导人无一例外地都有罪。至于是在中央机关，地方首府或边远贫困地区，在什么地方并无本质区别。但是，我们重又想到那个老问题：是谁责成那个克鲁格洛夫组

建党的专门监狱，迫使被镇压的民族远离家乡，等等。

最近几年，人们经常说，在联共(布)的镇压政策中维辛斯基扮演了最为恶劣的角色。

摘自官方资料：

安德烈(安杰伊)·维辛斯基，1935年至1939年任苏联检察长。

1883年他生于敖德萨。就读于基辅大学法律系。根据莫斯科市党委的委派，曾担任辩护人协会主席，但律师行业只干了几个月。其以后的经历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检察员、对所谓的沙赫特案件的专门审判团主席(国家公诉人为尼古拉·克雷连科)、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从1933年6月起任苏联副检察长，从1935年起任苏联检察长。

他是30年代所有著名政治诉讼案件的参加者兼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校长。名著《刑法中司法证据理论》的作者。

引自维辛斯基在诉讼中的讲话："我要求枪毙所有疯狗，一个不留。""逮捕无须遵守诉讼原则和事先批准。""法律可暂不予考虑"。这位著名法学家的学术活动获得了一级斯大林奖金……

从1939年1月起为院士，6月起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尔后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荣获6枚列宁勋章。

1954年11月逝世。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当然，我见过维辛斯基，但是，我们并不相识。我父亲不承认他是个真正的检察官。他当了人民委员以后，维辛斯基在联盟的职务就被解除。只要比照一下日期即可发现，政治局和斯大林已

不再需要他，正像不需要雅戈达、叶若夫一样……我父亲对检察机构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维辛斯基时期的检察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和安全机构一样，同样是一柄惩罚之剑。在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之前，我父亲提议加强检察机构职能。总之，如果维辛斯基继续留任，它们将无法工作。这是很明确的。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维辛斯基曾提出可怕的理论："口供是证据的核心。"而从被捕者那里如何"逼出"口供是众所周知的。

我父亲也从不认为维辛斯基是个外交家，称他为外交家和检察官的杂种，而更多的时候叫他恶棍。所以，当然他们之间从未有过彼此共鸣的语言交流。我想，维辛斯基亦看出，我父亲对他确实不愿理睬。问题还在于，他在格鲁吉亚时对维辛斯基就宿有恶感。父亲对他和对乌尔里希都不能原谅，他们应对他曾试图挽救的几个人的死负责。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父亲呆在别墅里，而妈妈被"克宫"送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治病。妈妈打电话来说，维辛斯基一家也在那里。

我很少见到父亲这个样子，他脸色陡变，厉声说：

"不要和这些恶棍有任何接触！"

后来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难以想象，"父亲回答说，"这个恶棍害死了多少好人。"

维辛斯基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曾是孟什维克，和沙皇暗探局合作过，这些事人所共知，斯大林也自然知道。但他认为使用这样的人可能更方便些。

但是，我永远不会相信说维辛斯基签发过逮捕列宁的逮捕证。如是这样，人们是不可能放过他的。关于他，传言颇多。甚至有人断言，说他对斯大林具有某种影响。对斯大林，任何人都不会有特别影响……而维辛斯基就更不可能有。他是不是斯大林手中的一个小卒？是个小卒，但却是积极主动的，甚至可以吃掉王后的小

卒。他不仅推行斯大林认为有利的路线,而且予以主动发挥。当我观看录有他在政治案件诉讼中演讲的旧纪录影片时,我极为震动。多可怕的人!

梅什克,米尔施泰因等,这些乌克兰内务部领导者的名字也经常和我父亲联系在一起。

我从未见过梅什克,但我知道,是我父亲提议他担任的乌克兰内务部长。他置身于国家安全机构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中将军衔,和克鲁格洛夫同一个级别。我想,父亲对他的人品、工作能力、业务品质不会有所怀疑,否则就不会有这一任命。1953 年 12 月他和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等一同被枪决。

我了解米尔施泰因,也了解他的妻子、儿子,他的儿子和我同岁。对米尔施泰因本人我是通过"迪纳摩"体育俱乐部了解的,他曾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他的经历极为典型:从 20 年代起担任过契卡的各种职务,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任一个局的局长,并为"迪纳摩"体育俱乐部的领导者之一。米尔施泰因和谍报没有关系,但通过他在美国生活的弟弟却建立了广阔的间谍网。

自阿巴库莫夫进入国家安全部之后,米尔施泰因调任森林工业部副部长。我父亲回内务部后,推荐他任乌克兰梅什克的副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任命。

我知道,部长虽遭枪毙,但没能逮住他。解释起来很简单,没能把他抓活的。当米尔施泰因看到要逮捕他时,他先有防备,使这一行动未能得逞。有人对我讲,在双方对射中,他打死了 8 人。结局就是如此……

1953 年春天,在共和国内务部机构党代会上,内务部新领导梅什克向全体与会者发表讲话说:

"首先我要祝贺你们,内务部的领导现在已经交由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负责,终于结束了国家安全机构掌握在冒险家

阿巴库莫夫、柳明和政治破产者伊格纳季耶夫手中的黑暗时期。同志们,我想提醒你们,内务机构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是指1937—1938年,当时阴谋家叶若夫广泛开展背叛活动,这些活动尤其包括为达到其反动目的而消灭大批忠于党和祖国的人。贝利亚再度出任契卡机构领导人,标志着又一次开始揭露身居内务机构领导职位的犯罪者,改正机构工作中的偏差……"

梅什克错了。未过半年,我父亲就被害,相信"黑暗时期"确已结束的梅什克本人和其他几位将军也被揭发枪毙。党所控制的安全机构无须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惩罚之剑是不应该有思想的……

如果相信审判记录的话,那么,就在那个1953年的12月,还是那个被告人梅什克所讲的就完全是另一种说法:

"我认为,贝利亚在这方面卑鄙无耻的罪行是他让侦查员们确信,杀戮被捕者是得到许可和批准的。其罪行还在于他为杀戮和酷刑营造了不受法律制裁的环境氛围,这使法院和检察院都无可奈何。他败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机构的风气。侦查员们,也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对被捕者实行杀戮和严刑拷打是一种需要。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减轻罪行……"

究竟原乌克兰内务部长何时是诚实的?诸位读者,让我试从简单逻辑角度稍作推理分析。

总之,我父亲重又接管了这一声名狼藉的部门。不难猜测,他是在听从了亲密战友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人的劝说之后才同意的。对于政府首脑第一副手和中央主席团成员来说,部长的交椅绝不是合乎逻辑的晋升的继续。但他还是走马上任了,希望能像战前一样,中止阿巴库莫夫和伊格纳季耶夫时所实行的镇压政策。

请各位注意:在基辅的共和国会议上,梅什克在大庭广众面前完全公开地说到这一点,就像说那些人所共知的事一样。此时距揭露问题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还有几年,而这位部长即已直言不

讳了。只在口头上讲 30 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运动(是在我父亲的积极参与下而停下来的)以及揭露战后几年“身居内务机构领导职位的犯罪者”这有什么用呢。可见，无论是在二十大上，还是多年以后 85 年的 4 月全会上，都不存在公开性上的任何突破。讲出真话的时间要早得多！

可是，为什么梅什克在审判中又讲完全相反的话呢？不难猜测：党内从来就有严刑酷法逼人就范的办法……

命运对我父亲来说确实是残酷的。为实现有益的计划，把惩罚部门变为真正的护法机构，半年时间显然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短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精力充沛和坚定不移的政治家成就颇多。1953 年 3 月 17 日他致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并附上部长会议关于改组内务部的决议草案。他的建议包括，内务部只保留业务机关，把内务部的全部建筑总局及建筑物悉数交给有关各部，而古拉格集中营转归司法部。第二天，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劳改营和教养院连同全部服务设施以及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而内务部的建筑设施转归主管建设的几个部支配。

五、斯大林逝世后半个月贝利亚建议实行大赦

1953 年 3 月 24 日，我父亲致函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赫鲁晓夫，同时分送给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按我父亲的观点，在大批囚犯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对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犯罪，监押这些犯人对国家来说并不十分必要。这一文件的意义在于，必须实行范围广泛的大赦。这位新内务部长提出的命令草案中建议释放近百万人，几乎是两个人放一个。3 月 27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这一命令。

那些国家安全和内务机构的老战士回忆说，当时笼罩惩罚部

门各办公场所的气氛改变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变革注定要失败，就像其发起者一样。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都已迫不及待地急于夺取个人独裁权力……

人们说，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我父亲却意欲一试。他一定以为，1953 年 3 月中旬形成的局势和他第一次负责这一部门时的形势相近。但是，目前要简单些。不像在 1938 年年底那样，在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他早已不是个新手，国家已没有战争迫近的威胁，而且归根结底，已没有斯大林，没有日丹诺夫。而周围的人，都真诚地认同他的观点。都是可共事的人！最起码他是这样以为的。

当时，在战前，在这方面他也是从恢复法制开始的。所幸，确证我父亲积极参加同恣意专横行为作斗争的文件都还保留着。

摘自官方资料：

1939 年 2 月，一批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因无故大批抓人和运用非法手段实行侦查而被逮捕，并追究其相关责任。关于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命令由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签署。

1939 年 11 月 9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侦查工作中的缺点”的命令，命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释放非法拘捕的在押人员，并对遵守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督。早在 1938 年 11 月 26 日，新人民委员贝利亚就签署了实现“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实施侦查问题”的决议要求的步骤的命令。这一文件谴责大规模逮捕，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根深蒂固的简单化侦查程序，按照这种程序侦查员仅限于获取被控人员供认自己犯罪的供辞，而丝毫不关心用证人证词、鉴定手段和物证来证实这种供辞。

禁止实行任何大规模的逮捕和居民迁徙，规定只有按照法院决议或取得检察官的批准方可实行逮捕，取消了从事审判的“三人小组”，提高对破坏法制者的严格责任要求。很快，许多从事过伪造侦查文件、造假、逮捕无辜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被交付法庭。

但是，当时没有允许新的人民委员去触动哪个案件的一个主犯。伏罗希洛夫总是能逃脱责任。但是“我们的第一位元帅”①对他长期怀有憎恨感。当1953年党的上层召集中央委员会全会对“阴谋家”进行谴责时，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这个戕害数万条人命的刽子手、红军的花朵，兴高彩烈地支持最为荒谬绝伦的捏造中伤。热衷于说谎的还有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以及所有那些双手沾满数百万人鲜血的人。

今天还有人在说有关原内务部长的谎言。1993年，几家乌克兰报纸同时刊登“在国家社会组织档案馆找到的秘密命令”，并加了相关评论。现转载如下，对之只作了一些非原则性删节。

绝　密

第0078/42号令 1944年6月22日于莫斯科

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

内容：关于在乌克兰杜绝消极怠工和对从乌克兰被解放各州被动员入伍的指挥官和红军战士实行监督。

情报部门查明：

最近时期在乌克兰，特别是在基辅、波尔塔瓦、文尼察、罗

① 系指贝利亚，他在内部机关中是第一个获得元帅衔的，故被称为“我们的第一位元帅”。——译注

文及其他各州，出现了乌克兰居民反对红军和地方苏维埃政权的明显敌对情绪。在个别区和州，乌克兰居民拒不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恢复集体农庄和向红军供应所需粮食的措施……所以，为消除隐患和监督乌克兰被解放各州被动员入伍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官

命　令

1. 将所有在德国占领者政权下生活过的乌克兰人迁徙到苏联边远边疆区。

迁徙具体实施步骤为：

A. 首先是为德国人工作和服务过的乌克兰人；

B. 其次流放那些在德国占领时期所有熟悉其生活的其余乌克兰人；

C. 迁徙行动在庄稼收割完毕和向国家缴完红军所需粮食之后开始。

2. 迁徙行动只在夜间进行，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免使其他人藏匿和免使正在红军中服役的士兵的家人得知。

3. 对从被占领各州来的红军士兵和指挥官实行如下监督：

A. 由特别处对每个人建立专门档案；

B. 所有信件，通过特别处实施检查，而非书刊检查机关；

C. 指定每个秘密工作人员监视 5 个指挥官和红军战士。

4. 调遣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12 和第 25 征伐师，以同反苏匪徒作斗争。

此命令传达到团级指挥人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朱可夫

校阅:第四处处长,费多罗夫中校

我提醒各位:曾几何时,赫鲁晓夫也说过,计划将所有的乌克兰人“驱逐到西伯利亚去”。诚然,详情已无从知晓。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秘密命令?

与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同,这一轰动一时的消息像一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很快,就是那家乌克兰主要报纸和通讯社发通告说:文件是伪造的!受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之托,基辅市老战士委员会主席沙雷金中将和乌克兰苏联英雄委员会主席、基辅荣誉公民皮利边科中将揭穿了这一谎言:

“读过这一‘文件’之后,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引起了我们这些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而我们中许多人都在作战部队中担任过指挥官)对其真实性的深切怀疑。果然,通过查阅上述提到过的部门的档案就显示,这一‘命令’根本不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上述同号的文件有一个,但内容完全不同。

“查阅乌克兰社会组织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的文件最为令人惊奇。那里确实有报纸上提到的那分文件,但这是法西斯分子1944年沿前线抛撒的一份德国传单。这份传单由戈培尔的部门制作,上面有相应的标记。它和其他类似的充满虚假反间内容的传单存在一起。在检查时同样发现,1992年乌克兰科学院考古学学院科学工作者马罗奇金确实看过这份传单。正是他赋予戈培尔这份伪造的传单以‘新的生命’,将其作为正式文件予以公布。这一肮脏的赝品后来为‘鲁赫’[1]的著名领袖伊万·德拉奇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其出版物中所利

[1] 鲁赫是80年代下半期苏联改革时期在乌兰克出现的一个反对派组织。——译注

用,称之为‘在读者中引爆的炸弹’。我们非常明白其挑拨离间的目的……”

确实如人所言,其目的用肉眼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政治……但这一伪造事件本身对我们来说却具有典型意义,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文件证明”在世上流传!

第四章 谍报迷宫

一、接近希特勒内圈的几个谍报人员

里哈德·佐尔格[1]、列夫·马涅维奇、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利奥波德·特列贝尔……甚至在过了几十年之后,社会上所知道的有关苏联谍报工作人员的知识差不多就只限于这些响亮的名字。然而,这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谍报工作就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例如,至今仍然避而不谈下面这一事实:爱娃·布劳恩的女友、电影演员奥莉嘉·契诃娃曾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过。顺便说一下,她是安东·帕甫洛维奇·契诃夫[2]的女亲戚。当时她整天呆在希特勒的家里。

摘自官方资料:

奥莉嘉·契诃娃,1896年生于彼得堡市郊一个交通工程师康斯坦丁·列昂纳多维奇·克尼佩尔的家里。1916年嫁给

① P.佐尔格(1895—1944)苏联侦察员,苏联英雄(1964年追授)。苏共党员(1925年起)(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30—40年代以德国记者身份住在德国、中国和日本,获得了珍贵而重要的情报。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被处死。——译注

② A.П.契诃夫(1860—1904)俄国有名的作家。——译注

20年代移居国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米哈依尔·契诃夫。离婚后，在1922年之前她住在莫斯科其姑母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苏联人民演员奥莉嘉·列昂纳多夫娜·克尼佩尔—契诃娃家。1922年出国。

大家可注意到，还在1992年我就提到过这位苏联女特工的名字。一年以后，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几份与奥莉嘉·契诃娃的神秘命运有关的文件，着重指出，她从未做过苏联特工。不管怎么说国家安全机构就曾作过这样的声明。

摘自1945年11月"斯麦尔什"管理总局第四处处长乌捷欣少将签署的材料：

"1922年，契诃娃·奥莉嘉为在电影艺术领域深造而出国，直到最后一直住在德国柏林格罗斯—格林尼克自己的寓所中。在国外期间，她成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和好莱坞(美国)拍过影片。德国投降后她同时又在柏林几家私人剧院演出。1936年获'德国国家演员'称号。"

根据情报资料，同时根据被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军"斯麦尔什"总局抓获的从小就认识契诃娃并直到最后一直和她保持交往的德国间谍格拉祖诺夫的供词，奥莉嘉·契诃娃作为著名演员，曾不止一次出席过德国法西斯头目举行的官方招待会，因而得以接近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要人。

在红军占领柏林之后，契诃娃被送到莫斯科，并被安置在"斯麦尔什"总局的一处秘宅中。在莫斯科，契诃娃被详细询问了她同德国法西斯领导人的关系。在解释中，契诃娃证实说，她不止一次作为女宾参加德国宣传部的招待会，并会见了希特勒、戈培尔、戈

林、里宾特洛甫等人。但是，契诃娃指出，招待会仅有官方性质，出席的有外交官、学者、作家、演员。契诃娃解释，在德国，许多人出于对她名气的嫉妒或意欲在俄罗斯人眼中败坏她的声誉才制造了她同希特勒或他周围某个人的亲密关系的传闻。但是，她和这些人物的类似关系是不存在的。

和契诃娃同宅居住的有一位“斯麦尔什”总局的装作“国际旅行社”女助手的业务人员，契诃娃也向她声称，在德国她受到过诸多诽谤。契诃娃举例说，1945 年“大西洋”广播电台有一次发布一条消息说，契诃娃嫁给了阿富汗驻德国大使，并改信了伊斯兰教。另外一次，“大西洋”电台又发布消息说，契诃娃同德国领导人一起从柏林逃到另一城市，从事政治活动。身处莫斯科，契诃娃用德文写日记，并小心翼翼地将其藏起。当日记被秘密取走和审阅之后确定，契诃娃在日记中记载了其滞留莫斯科期间自己的感受。对向她提出的与纳粹领导人的关系问题，契诃娃这样写道：

“有关我的传播很广的报道足够写一本小说。显然，有人得到消息，说我和希特勒关系密切。天啊，这多么可笑。这一阴谋诡计究竟用意何在？这是极端下流的诽谤中伤！只要良心清白，就什么都不怕。而能说出真相是多么的美好。对我相信与否，时间会证实一切。”

有一切理由可断定，这位天才的女演员当时在莫斯科不过是在同军事反间谍机构“斯麦尔什”以及安全机构耍弄而已。日记事件及其被“秘密取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奥莉嘉·契诃娃在日记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准备给阿巴库莫夫部门的人看的。斯麦尔什的工作人员似乎对这个女人的天真深信不疑。她在军事反间谍机构的秘宅中每天记载日记，并虔诚地相信能保住秘密……奥莉嘉·康斯坦丁诺夫娜·契诃娃不是也不可能是个天真幼稚的人。

在审讯中她表现出色。无论何种情况，就连阿巴库莫夫这位反间谍总局局长、副国防人民委员最终都未能得知，这个在苏军占领区内被拘押的德国公民奥莉嘉·契诃娃就是苏联特工，其他的人就更不待言……

前苏联、现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未能确证奥莉嘉·契诃娃参与过苏联谍报活动，这丝毫不使我感到奇怪。这类文件肯定没有。这很好解释：无论是当时的1945年，还是以后，我父亲都没有打算暴露她。应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例。我完全准确地知道，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卡片上有数百个名字没有登入。我父亲认为，"真正的秘密不能进入机关程序。"

这是我父亲主管苏联战略情报机构15年期间通行的制度。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况就不同；那里有"会计帐本"，这种帐本往往导致极有价值的特工的败露。只要驻外特工机构中一个人背叛，整个情报网就会尽入敌人之手。很遗憾，这种情况在苏联特工机构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顺便说一下，英国也存在类似的制度：一部分特工登记入"册"，另一部分则不记入。不难猜想，那些特工更易败露。

我知道，我父亲有一大批他所完全信赖的人，正是他们和奥莉嘉·契诃娃这样的特工保持着联系。哪怕敌人的间谍打入国家政治保安局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部，这样的情报都绝不会泄漏出去。

一些为苏联输送情报的德国、大不列颠王国及其他国家的高级官员和我父亲直线联系。我知道，这样的人不少。我想，斯大林知道其中的某些人，而政治局其他成员则一概不知。这里没有例外。据我判断，斯大林对情报来源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般说来，他对细节没有兴趣。他只交待任务，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他很少费心。斯大林感兴趣的只是最终结果，而非中间成

果。我父亲根据此或彼情报材料而得出的结论对他来说即已足够。

不过,斯大林对谁都不完全信任。他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局、"斯麦尔什"等渠道获取战略性情报。使用这种平行渠道是好是坏,我不妄加评论,但当时就是如此。显然,国家领导层认为这是完全合适的。

很清楚,当时存在着各情报部门间的情报交流,只是由于我父亲的坚持而将战略情报排除在外。据我理解,他的根据来源于特别保密制度。我父亲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去"接触"他的情报人员。无论如何,1942 年以后,当国家安全机构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谍报工作一同脱离其管辖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子。

在本书中我也要讲所谓的"原子"情报。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遭过败露,父亲认为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全因各种不同情报机构互相干扰所致。不客气地说,一钻进去,便"爆了光"。事业就遭受了损失。在情报工作中搞"社会主义竞赛",其结局总是可悲的。每一行动组、每一驻外机构都急于第一个上报结果,这也就是导致败露的缘由。奥莉嘉·契诃娃的遭遇就是这样的,"斯麦尔什"钻入了不该去的地方……

当我父亲得知羁押了德国女演员奥莉嘉·契诃娃时,使他感兴趣的是,看阿巴库莫夫怎样处理她,军事反间机构都有什么样的能损害这位妇女名声的材料。"斯麦尔什"没有掌握任何足以对契诃娃进行逮捕的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应该放了她,让她去德国吧……"

契诃娃真的去了德国。据我所知,她本人和她的女儿都供养无缺。她们再没有回苏联。

奥莉嘉·契诃娃和我父亲合作多年。我知道是谁找的她和在什么基础上操作的,但我不认为我有权谈论女特工经历中的这些

细节。我只能说，对于奥莉嘉·契诃娃不许有任何挑衅行为，她为苏联搜集战略情报完全不是出于物质考虑。

怎样评价她对我们情报事业所做的贡献都不会过高。奥莉嘉·康斯坦丁诺夫娜确实是个令贝利亚倍加珍惜的无价的情报来源。甚至在联邦德国出版的自己的回忆录中，她对自己生活的另一面(主要的)都只字未提。要知道，早在1945年的秋天，西方媒体就将她称为"控制希特勒的俄罗斯女间谍"、"纳粹德国的女王"，甚至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她，并授予她列宁勋章。这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奥莉嘉·契诃娃为她从事的谍报工作确实得到了酬谢，在物质福利方面得到了保障，但是没有授予勋章。而西方对她为苏联工作的猜疑依然只是猜疑而已，不会有更多的东西。

弗拉基米尔·克尼佩尔不是很早就对俄罗斯文学古典作家孀妇侄女的命运感兴趣。奥莉嘉·契诃娃是他的堂姐。正是他曾经找过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最后一位领导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请求弄清与其这位女亲戚的履历有关的部分细节。正如读者所知，情报机构仅掌握契诃娃于胜利后的1945年来到莫斯科这一情况，还有在那个1945年4月末至秋天所进行的审讯笔录。奥莉嘉·契诃娃堂弟讲述的一段插曲更有趣些："在乱轰轰的战后岁月中有一天，有个陌生军人打电话给奥莉嘉·列昂纳多夫娜，通知说从柏林捎来一个包裹。克尼佩尔请本家好友一个名叫索菲娅·斯坦尼斯拉夫娜·皮利亚夫斯卡娅的女演员去取包裹。里面尽是高档服装，简言之，都是出席晚会用的必需品。随包还附有奥莉嘉·契诃娃女儿奥列奇卡·契诃娃的一封信，请求其妈妈告知在艺术剧院巡回演出情况，是否演了《三姊妹》？奥莉嘉·列昂纳多夫娜深为震动。她请卡恰洛夫了解一下奥莉嘉·契诃娃在我国巡回演出的详细情况。他于是打电话给柏林卫戍区司令部一位熟悉的将军，而出乎意料，所听到的回答使大家陷于更大的恐慌不安之中：'关于奥莉嘉·契诃娃我一无所知，请不要再打来电话，忘记这

些。’”

“也许，我们不该妄加猜测，使秘密永远成为秘密?”这位名演员的弟弟提出了质疑。看来，困扰奥莉嘉·契诃娃亲人的秘密的帷幕似乎已被拉开一角儿。今天有一点业已清楚：“纳粹帝国女王”奥莉嘉·契诃娃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同法西斯勇敢斗争的人们中的一员。

为苏联工作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女演员、属于匈牙利民族的玛利卡·罗克。如果说奥莉嘉·契诃娃是希特勒家中关系密切的人，那么，玛利卡·罗克就是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家庭中的一个自己人。玛格达·戈培尔平日是个非常苛刻的女人，但对这位女演员却优容有加。戈培尔本人对其妻子女友也怀有同样的好感。但是，这位帝国部长总是贪恋女色，玛利卡也不例外。比如，希特勒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见他，这是因为他同一位捷克女明星的恋情。但无论怎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玛利卡总有办法获得最有价值的情报，并通过苏联战略情报线送达莫斯科。当我国部队进入德国后，她转入奥地利，并在他人帮助下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后来，据我所知，玛利卡·罗克去了匈牙利。

二、战前和战时苏联国外情报机构的出色工作

当我看到有的材料说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搞的情报可信度不高时，这至少使我感到有些吃惊。很可能，这些说法是出于对所发生事件的无知。其实，——我不知道掩盖这一切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意义何在——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总参谋部的几个人经常定期向总部提供甚至包括前线作战计划在内的极有价值的文件。

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人，是一些在党部办公室、有的在盖世太保的领导部门和在德国其他国家机构内占据高位的人，他们能进入希特勒和法西斯帝国最高决策人物的圈子。我仅说出奥莉

嘉·契诃娃的名字，但是，这种人就是在希特勒最近的圈子里也不乏其人。我为什么认为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谁的祖父、父亲曾做过苏联情报机构和拉夫连季·贝利亚个人最有价值的间谍，今天在西方会使谁感到高兴呢？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苏联盟国的情报工作做得要比对希特勒德国的情报工作好……”“列宁格勒城下之战的胜利不是依靠而是违背了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取得的。”有些历史学家，或者起码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人的这些“发现”使人极为震惊。柏林那么多极具价值的情报来源竟如此一钱不值？简直可笑……我敢肯定，无论是战前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分布在德国境内的谍报网一直在效率极高地活动。军事情报机构遭受过严重损失，这是广为人知的。但是，一系列军事谍报人员的败露不是由于什么人的背叛，其原因极为平常：德国人开始使用无线电测向仪。我们的谍报人员使用一个频率长时间连续工作，几个报务员相继被捕。但是，谍报工作没有间断多久。设在荷兰、卢森堡等国的外围无线电网很快便启动了。为了传递苏联情报机构在纳粹德国获取的情报材料，也充分利用了设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派机构。

苏联情报机构在其他国家的工作也极为出色。法国情报机构的头头，英国情报机构的二号人物……要知道，为苏联工作的还不只这些人……

我父亲多年领导苏联战略情报机构这件事在苏联一直被精心地加以掩盖。可是说他要求将那些向总部报告德国正准备发动战争的谍报人员“扫进集中营尘土”的文件却广为印发。

摘自奥维基·戈尔恰科夫的文献纪实故事
《前夜或卡桑德拉的悲剧》：

贝利亚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中说：“1941 年 6 月 21 日……我再次坚决要求召回和惩罚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

夫，他像过去一样经常向我施放说有人正在准备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他报告说，这一进攻将于明天开始……驻柏林武官图皮科夫少将用无线电发回了同一内容的报告。这个愚蠢的将军根据其驻柏林情报处所得到的消息肯定说，德国法西斯军队将有三个集团军分别进攻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他蛮横地要求我们为这些撒谎的人装备电台……不久前别尔津反革命集团还在那里活动的那个谍报局的局长戈利科夫中将抱怨杰卡诺佐夫和自己的中校诺沃布朗采夫，称后者也在撒谎说，希特勒在我国西部边境线对面集结了170个师的兵力……但是，我和我的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牢记您的英明预测：1941年希特勒不会进攻我们！”

我有充分理由肯定，戈尔恰科夫引用的我父亲致斯大林的函件只是拙劣的赝品。贝利亚要把谁“扫进集中营尘土”？是奥莉嘉还是几十位其他的人？他们在战前很久就报告了战争将要爆发的消息。我想，戈尔恰科夫不过是秉承别人旨意又一次诬蔑我父亲而已。

摘自奥维基·戈尔恰科夫文献纪实故事：

这些报告保存在一个旧文件夹中，其中都用褪了色的紫墨水标明了档案库、目录、案卷编码。打开文件夹，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用粗头自来水笔写的批示：“最近时期，许多工作人员惑于无耻的挑拨离间，到处散布恐慌情绪。由于有系统的虚假报道，应将‘鹰’、‘卡门’、‘钻石’、‘忠诚者’这些秘密工作人员作为有意引发我们同德国争端的国际离间分子的帮凶扫进集中营尘土。对其他人则予严厉警告。签名：贝利亚，1941年6月21日”。

印象深刻，对吗？秘密档案中的“旧文件夹”，“用粗头自来水笔写就的”批示，“扫进集中营尘土”的威胁等等……他是个孩子吗？请读者谅解我的粗鲁，这部庸劣之作虽经援引已不是第一年，但苏联官方机构从来未在任何地方正式发表过。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从未有过那份愚蠢的报告，也不存在那份同样愚蠢的批示，这是人们硬把这些加在那个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德国将在哪一天和那一个小时进攻的那个人身上的。仅仅由于这一不起眼的原因(这份报告是不存在的！)，斯大林不可能像戈尔恰科夫认定的那样在一份情报材料上甚至用红色墨水作出批示：“这份情报是英国的挑拨离间，你们要弄清谁是作者，我们要惩罚他。”根据戈尔恰科夫的说法，斯大林不相信苏联武官从法国发回的电报，那里早已被德国人占领……“文件”注明日期好像是6月21日，而这类“文件”在“文献纪实”故事中不可胜数。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战前有关我父亲和苏联情报机构活动的文件加以公布。但要公布的一定是文件，而不是像戈尔恰科夫所制作的那种完全伪造的东西。这种造假者又何止他一个……在苏联情报机构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这种不诚实的研究者始终不乏其人。正是他们在祖国的历史文献中置入了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的虚假命题。可见，战争初期的失利和悲剧应由那些没有为苏联政治军事领导者提供充分情报的人负责，如果不是贝利亚、杰卡诺佐夫(一线谍报员！)，也就不会退至伏尔加河一线，也不会蒙受重大损失。正如我们大家认为的那样，党是“并不知情的”。

这是惯用的老手法。要知道，戈尔恰科夫没有一处指明他援引的每个“文件”属于那个具体的档案库，这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所有类似出版物应包含这些内容。

将战争爆发前几年有关苏联战略情报活动的秘密资料在我国也在西方公诸于众，那才会是真正的轰动。当时我父亲正负责这一秘密机构的工作。对军事谍报以及克格勃的谍报工作的叙述可

谓汗牛充栋，而有关战略情报却不置一词。我想，其基本原因是，它的全部历史无论怎样都和我父亲的名字联在一起。

苏联在战前即已掌握包括作战部署在内的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这已不是秘密。在战争进程中，就我所知，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特别出乎意料之事发生。苏联情报机构及时获悉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转向进攻乌克兰和在斯大林格勒、高加索方向突破的计划。我们对希特勒大本营、德国法西斯军队总参谋部及其各军兵种指挥部内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军事情报机构和前线情报机构的活动值得高度赞扬，就是在我们慌乱撤退的最为危机时期，军队谍报人员亦能英勇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为军事领导层提供必须的情报。问题出在别的方面。很遗憾，无论是总参谋部，还是各战线和集团军领导人不是经常能充分利用过所获取的情报材料。但这不是情报机构之过失。我认为，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苏联情报机构的作用经常被有意识地贬低。我指的是我国所有情报机构，不论其归属哪个部门。无怪乎所有军事首长对从未在前线战报中报道过的那些人的活动大加赞赏。仅举一例，引自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发表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文章《苏联胜利的伟大和历史伪造者的脆弱》：

“毫无疑问，由于苏联情报机构的出色工作，1943 年春我们掌握了德国军队在夏季攻势前军队集结的一系列重要情报。通过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并与沃龙涅什和中央方面军司令员及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周密讨论之后，我们得以对敌人可能的计划做出结论，后来这些结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库尔斯克之战的行动计划也是根据这些结论形成的，也同样被证明是完全合理的。首先，苏联军队在防御战中使敌人精疲力竭，尔后便转入反攻，将敌人几个集团军击溃。”

即使到今天，朱可夫元帅文章的现实性仍然无可置疑。因为今天有人较之60、70年代的人更为积极地在伪造二战历史。我在不久前西方出版的一本书中读到，1941年莫斯科城下的十月攻势完全是出于最高总指挥部的意料之外的。这是又一个神话。古德里安的进攻计划已清楚地被情报部门获悉，而因为那里既无坦克部队，亦无反坦克部队，于是立刻就把装备有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的部队投入这个地区。最高总指挥部如何高度评价所获情报自不待言……

当然，也不能当真地来谈论战争前夕对情报封锁的可能性。我已说过，“巴巴罗萨”计划在战前即已报告给斯大林。应当声明，与无聊的虚构相反，斯大林对德国人可能进攻苏联不存任何怀疑。他对情报总是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不止一次强调说，情报工作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小圈子里他也这样强调过。我知道，有几位头号特工从最高统帅手中获得了勋章。我也十分清楚，在战时他两次接见了当时正在苏联境内的几位特工，不是为了听取汇报，而只想向他们表示感谢。少数知情者知道，斯大林还会见了几位在境外工作的特工的家属。我想，战后多年身居特工机构领导岗位的那些人应该知道这些事实。

不论他有多少缺点，斯大林对特工工作的意义还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吝啬为军队花钱，但从不拒绝为完善特工专业技术设备而支付外汇、现钞。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我甚至能够根据自身的感受作出判断。当1943年和1945年我参加为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布置秘密设施时，我不止一次确信，苏联特工机构的技术装备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要知道，在伊朗，后来又在克里米亚，我们不仅能听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而且他们周围人的声音都能清晰可辨。

我们深入敌后工作的特工也配备了性能可靠的现代化国产设

备。当时，德国测向员开始测定我方在德国境内发报员的位置，这导致了苏联谍报网的全盘败露。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实验室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月内便制造了一种可以在半秒钟内向太空发射数千个信号的仪器。这是一种多频电台，可以在很短的间歇时间内在各个频段上自动传送情报。而无论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还有我们的测向站，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测定其所在位置。在世界上，没有类似的无线电技术设备。为特工人员设计制造的这种无线电台非常有趣。首先将全部情报资料录到金属胶片上，或在一个圆盘上编好代码，尔后将所有这一切瞬间传入太空。这些装置的设计方式是它们能将情报资料转为高频振动。如果以前发报员有时不得不连续发报数小时，以致极易落入测向员之手，那么现在德国人就无法测定在柏林工作的无线电台的位置。在那时期这种设备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这些电台，尺寸都很小，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电台可以依靠轻便蓄电池工作，而无须另外接入电源。原来，德国人在仔细搜索他们推测可能有发报机的地区时，常切断一定的电力系统的电源，这样便可准确确定发报员所处位置。随着苏联新式无线电台的出现，这些措施亦告失败。我们的特工如果有摩托车或汽车，就会经常在行进中、在运动中发报。

当然，不可预料的令人沮丧的疏漏后来也发生过，也有过败露，但是，没有一个苏联新式无线电台被测向员发现过。这不仅在德国是这样，就是在丹麦、荷兰及其他国家亦是如此。

但是，无论设备如何完善，特工事业的成就永远取决于人。世上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已非止一年，说在战争爆发前夕，国家政治保安局长戈利科夫将军命令驻外谍报部门调查西欧国家皮货和肉类市场行情。据说他的根据是：为了在苏联这个气候寒冷的国家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德国人至少要制作600万件皮袄。而一旦开始大批宰羊，接踵而来的便会是德国人的入侵。斯大林似乎也同

意这一理由……但其实，苏联领导层并不需要这种对德国的军事计划的这种间接确定。我重申，我国情报机构有着与此不同的其他情报来源，而且更为可靠。

里哈德·佐尔格是和我父亲保持联系的人之一，多年以后他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战后，在苏联境内的战俘中有这位特工的亲兄弟，我父亲指示将他从战俘营转到一个专门实验室，后来他就一直在那里工作。

时常有人断言，是苏联政府出卖了这位有名的特工，它没有能救助他，或者根本就不想使佐尔格免于被处死刑。但是，让我们抛开情感因素而考虑一下如下情况，在间谍史上谁能举出一个例子，说出有哪一个政府当一个秘密的特工被投入监狱时它曾给予承认？况且，佐尔格也并没有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

当时正是与德国开战期间，还存在着其他原因不可能作交换。如那样做，苏联就不得不承认在日本存在一个覆盖面极广的间谍网的事实。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怎样珍惜自己的特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出此下策，苏联政府亦不例外。

毫无疑问，里哈德·佐尔格是个出色的特工，但我深信，他只是数百名既不乏个人勇敢精神又具有高超职业技能的特工之一。

这一情况从未在任何地方披露过。但佐尔格及其亲密助手的被捕并未使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实际遭受损失，佐尔格受到的基本是针对德国的专门训练，而在日本为苏联工作的有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及其他特工人员，更主要的是，有日本最高级别的官员与我们积极合作。我只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他不是苏联间谍，但可以这样说，他是个深受我们影响的人。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国务活动家、外相松冈洋右。在同斯大林的私人谈话中他声明，德国正准备进攻苏联，并通知了德国攻击的准确日期。他补充说，他的国家将不会和德军同时发起进攻。当然，外相不能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一年以后日本仍不参战，但是，这一情报已经足够。而如果考虑到为

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尚有日本高层人士，我们便不难猜测，从日本发往总部的相关情报在整个二战期间都会源源不断。

苏联特工在法国同样有着如此坚固的阵地。1993 年夏天西方媒体报道，在华盛顿公布的一批文件证明，美国曾监视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的私人通信，破译法国盟国的密码，并截获了一批秘密外交书信。例如，法国胖将军季诺维·别什科夫就为苏联工作。现在，他的名字对任何人都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可曾经是个人物！

摘自斯大林助手鲍里斯·巴扎诺夫回忆录：

"我认识了斯维尔德洛夫一家，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家庭。老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去世。早先，他住在下诺夫哥罗德，是个雕版师。他对革命满怀热情，积极参加各项工作，和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都有联系，而他的雕版工作主要是用作制造假印章，使地下革命者得以伪造各种假证件。他的家里也充满了革命气氛。但是，他的长子季诺维却由于某种复杂的心理原因而陷入深刻的内心危机，从而中断了和革命者圈子、和家庭、和犹太教的联系。他父亲用庄严的犹太教仪式诅咒他。马克西姆·高尔基将其收为养子，于是季诺维成了季诺维·别什科夫。但是，他继续沿着自己的心灵指引的道路前进，他又脱离了高尔基的革命圈子。他前往法国，加入外国军团，以同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一段时间后传来消息，说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老斯维尔德洛夫非常害怕，焦急地问：'哪只手？'当得知失去的是右手时，他又喜不自胜：按犹太教诅咒仪式的一般说法，父亲如果诅咒儿子，他应失去的正是右手。季诺维·别什科夫成了法国公民，并继续在军队服役，直到取得正级将军军衔。他和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当我到法国，想告诉他生活在俄罗斯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有关情况时，

他回答说，他们不是他的家人，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长兄的命运的确令人神秘莫测。有数百名移民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我知道，苏联战斗勋章也用以表彰为此效过力的大公和大贵族家族的代表们。他们同我们合作绝对不是为了金钱，原则上他们拒绝任何奖励，他们与我们合作完全是另有原因。例如，我知道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特工队伍中没有我们原来的同胞在工作，命运使他们远离祖国，身处他乡。

季诺维·别什科夫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祖国。我时常听到他的名字。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和他接近的人，都认为别什科夫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当时我便得知，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哥哥季诺维·别什科夫是法国特工头子。

我曾听说，季诺维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革命运动，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有联系，后者是他的正教教父。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主席的哥哥竟是一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

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当然，里面甚至没有别什科夫同苏联特工发生关系任何的一点暗示。有关这位法国将军在某个时期曾领导过法国特工机构也只字未提。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他直到去世，始终未承认与苏联特工有过联系。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丝毫不怀疑将军对祖国由衷的感情。我想，他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

总之，有许多法国人，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及其他民族人士曾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任命我父亲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前或之后，包括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都是如此。又有多少法国人，虽然没有成为苏联特工，但是他们同情苏联，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当时没有完全了解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即便如此，事实终究是事实：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

洲其他国家都有众多的苏联拥护者。比如，我绝对相信，朱里奥·居里不仅没有阻碍把有关核方案的绝密情报传给苏联情报机构，而且，很可能他在很大程度上还给予了协助。

从20年代起，我父亲便与法国的知识界和格鲁吉亚在法国的侨民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据我所知，一切都是从他进入苏联特工机构，准确地说，是从他进入第十一军的反间谍机构开始的。派他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中有基洛夫和著名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图鲁阿和贾帕里泽兄弟。大概当时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进行了最初的接触，他们大多住在法国。因为在与德国开战前很长时间里，苏联特工机构在法国一直根基牢固。应当考虑到，当地的谍报机构向总部不仅提供法国的情报，而且也提供有关可能的敌人——纳粹德国的情报。其实，法国和英国的特工部门本身，在许多年当中一直处于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和我父亲保持直接联系的还有英国特工机构的领导人之一、苏联传奇式特工金·菲尔比。1912年他生于印度一个英国殖民政府官员的家庭。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在政府机关中得到了提升。他冒充主张英德之间相互接近的拥护者而加入英德协会，不止一次作为英国主要报纸的记者前往柏林。还在战前他便进入英国的秘密机构，1944年甚至领导了同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中央局。后来又在华盛顿和近东工作。大批专家断言，在将来他完全可以成为英国国家情报处的领导人。但由于担心暴露身份，他被迫逃到苏联。顺便说一句，正是菲尔比在战前向总部提供了英国特工机构军官同鲁道夫·赫斯谈话的详细内容的情报。

摘自官方资料：

鲁道夫·赫斯，1894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飞行员。1923年因参加慕尼黑政变被判刑。和希特勒一起在监狱服刑，助其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从1925年起为希

特勒的私人秘书，党卫军总队长。1939 年 9 月希特勒任命其为自己的继任人(在戈林之后)。

从 1920 年起成为法西斯纳粹党党员，积极参加筹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 年 5 月，赫斯为签订停战协定和引诱该国政治活动家一致反对苏联而飞抵英国，他的使命遭失败而作为战俘被拘留。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其终身监禁。被监押于施潘道监狱，1987 年 8 月自杀。与赫斯使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不清。涉及赫斯的在英国的档案材料要到 2002 年才能解密。

摘自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

我以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报告原来是真实的。夜里，接踵而来的报告证实了这一消息。不容置疑，赫斯，这位党卫军的二号人物、德国的不管部部长、德意志帝国国防部秘密会议成员、秘密的德国内阁会议成员和纳粹党魁，孤身一人跳伞降落在苏格兰西部汉密尔顿公爵庄园附近。他自己驾驶飞机，着德国空军上尉制服，从奥格斯堡起飞，然后跳伞。起初他自称叫霍尔。由于在跳伞过程中受了轻伤，于是人们将他送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军事医院里。到这时才最后确定他到底是谁。很快，他开始被转移到陶埃尔，尔后又转到英国其他地点监禁，直到 1945 年 10 月 6 日在纽伦堡的监狱里与幸免于死的自己的同事会合，一同接受战胜国法庭的审判。

我从未对赫斯的这一把戏给予过分的重视。我知道，它和事态的发展没任何关系……苏联政府对赫斯事件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并围绕这一事件制造了许多不正确的传闻。3 年之后，当我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时，使我确信了斯大林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程度。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赫斯使命的背后都掩盖了些什么。我简短地通报了这里所说的情况。我

有一个印象，就是按照他的想法，这里一定进行了某些秘密会谈，或有一个英德共同行动攻击俄罗斯的阴谋，只是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因此我惊奇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缺乏理智。当翻译让我明白斯大林不相信我的解释时，我通过翻译回答说："当我叙述我所知道的事实时，我是期待别人会相信我的。"斯大林对我稍显粗鲁的话报以善意的微笑："甚至在我们俄罗斯，我们的特工机构认为许多发生的事都不必向我汇报"。我没有再继续这一话题。

在苏联，借助情报机构得以清楚地获悉，赫斯带着英国能够接受的条件以签订和平条约的直接建议抵达英国。如果不是长远利益最终占据了上风，英国最高统治集团完全准备走向同德国的联合。换句话说，这次飞行不是一时冲动之举，其余的最多不过是一场有意排演的游戏，目的是为了迷惑国际社会。

我一点都不怀疑，赫斯之死绝不是偶然的。我完全清楚，原著名纳粹分子不过是被清除掉了。要知道，在他的年龄已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并且能够道出即使是今天仍能使西方蒙受重大损失的许多东西……

绝 密

调查报告

瓦吉姆从伦敦报告：

1. 据"岑亨"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抵达英国的赫斯宣称，他打算首先拜访汉密尔顿，他们因共同参加1934年的航空竞赛而相识。汉密尔顿属于所谓的克利夫兰集团，赫斯就降落在汉密尔顿庄园附近。

2. 赫斯向第一个认出其为赫斯的"狭路相逢"的官员基

尔克·帕特里克宣称，他带来了和平建议，其实质内容我们尚不清楚（基尔克·帕特里克为原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参赞）。

1941 年 5 月 14 日第 376 号

“岑亨”是苏联特工金·菲尔比，他直接同我父亲——苏联战略情报机构首脑联系。他也直接与“瓦吉姆”联系，后者是 1941—1943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驻伦敦分部的头头伊万·安德烈维奇·奇恰耶夫。

摘自 1941 年 5 月 18 日金·菲尔比向总部发回的报告：

赫斯在 5 月 14 日傍晚之前未向英国人交待任何完整的情况。

在与英国军事特工机构军官交谈时，赫斯肯定说，他来英国是为签订一个妥协性和平条约，以便中止两个交战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消耗，并防止大英帝国作为一支稳定力量而被最终消灭。

根据赫斯的声明，他对希特勒仍然忠诚。

比弗布鲁克和艾登拜会了赫斯，但官方消息否认这一点。

在同基尔克·帕特里克的谈话中赫斯宣称，两个北方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一种罪恶……“岑亨”认为，和谈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赫斯很可能会成为签署妥协和约阴谋的中心人物，并对英国的和平党派和希特勒都有好处。

应当指出，苏联特工部门并不仅仅只通过菲尔比获取有关赫斯同英国人进行谈判过程的完整情报。1991 年苏联克格勃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转交了一批 1941 年春天收到的来自苏联驻柏林和华盛顿谍报机构的旧日秘密文件。从德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收到的情报，完全证实了菲尔比的报告。

> 发自华盛顿：赫斯抵达英国完全出于希特勒的授意，目的是进行谈判。因为希特勒不能公开提出和平建议，以免损害德国的威信，因此，他选择了赫斯作为自己的秘密特使。
>
> 发自柏林：赫斯的行动不是逃跑，而是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行事，其目的是向英国提出和平建议。对外宣传部美国处处长艾赫岑多尔夫报告称，赫斯健康情况良好，他飞抵英国是受命行事，并带着德国政府的若干建议。

当然，这只是当时输送给总部的大量情报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们从英国和德国收到了英国特工机构和赫斯所有交谈内容的资料。我有充分理由肯定，其在苏联的大部分内容从来没有公开过，而大不列颠王国本身对此则完全禁止。我相信，国际社会还将会从与这位德国高级官员秘密飞往英国这段历史直接有关的人那里了解到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首先是指丘吉尔先生和大不列颠外交部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甘，顺便说一句，他负责女王陛下的战略情报机构。

一位93岁高龄的老人大概不会轻易走上自杀之路。这位1941年5月驾驶"梅赛施密特—110型"飞机飞抵苏格兰者之子沃尔夫·赫斯不无理由地认为，他父亲已准备放弃沉默的承诺，并说出半个世纪前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他证实，鲁道夫·赫斯是被两名第二十二空降团的军人枪杀的，他们是奉英国内务部之命，而这个团就隶属于内务部。领导完成这一行动者来自不列颠反间谍机构。在西方，有人认为采取这一行动亦不排除如下因素，即苏联领导人准备同意于1987年秋天释放赫斯，而此时施帕达乌监狱的保卫工作将轮到驻德苏军接替。如果考虑到英国方面对公开国家机密明显的冷淡态度，整个事件看来完全像是真的。但无论如何，我

深信，英国人还是隐藏了什么。在当时的1941年，英国领导层所进行的这些单独谈判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促使德国同苏联开战。

看来，那些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希特勒建议的第0274B号计划的西方资料同样是不无根据的：

“1. 应向英国政府有凭有据地证明在，法国崩溃之后再继续战争将有害无益。

“2. 向英国保证，她将保持完全独立和所有的殖民地。但是，她必须拒绝任何对某个欧洲国家事务的干涉。

“3. 建议大不列颠王国同德国签订为期25年的协定。

“4. 大不列颠王国在德俄战争期间对德国必须保持友善中立。”

应当认为，希特勒的这些指示便构成了赫斯同英国人谈判的基础。

最后，还有一份保存在原苏联克格勃档案馆中的文件：

没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的批准禁止复制。副本，绝密。第4份，苏联国防委员会10月第2号。

呈送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捷克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莫拉维茨上校向内务人民委员部驻伦敦机构负责人报告如下情况：

普遍舆论认为，说赫斯飞抵英国出人意料，这是不真实的。在这次飞行之前很久，赫斯就与汉密尔顿勋爵就这一问题通过信。在通信中详细讨论了组织这次飞行的所有问题。但是，汉密尔顿本人没有参与通信，赫斯写给汉密尔顿的所有

信件都没有寄到目的地，而是由英国国家情报处收讫，同时以汉密尔顿的名义给赫斯复信。英国人以此途径将赫斯诱至英国。

莫拉维茨上校同时声明，他本人见到了赫斯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信件。根据莫拉维茨的声明，赫斯在信中充分而明确地阐述了德国政府有关进攻苏联的计划。

在这些信件中包含有必须停止英德之间战争的经过充分论证的建议。

最后，莫拉维茨宣称，英国人以此方式掌握了赫斯和其他纳粹头目准备进攻苏联的书面罪证。

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我不再隐瞒，在苏联优秀特工中除了金·菲尔比之外，还有不少女王陛下的其他臣民。例如，只要说出唐纳德·马克林、加依·比尔詹斯的名字即足能说明问题。为苏联工作的甚至还有与皇室特别接近的人。我是指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兄、大不列颠艺术理论家安东尼·勃兰特。人们说，他和马克林、比尔詹斯、金·菲尔比及约翰·凯恩克罗斯一道成为著名的“剑桥五君子”。

我认为，只有俄罗斯的特工部门有权发表明确的声明。据我所知，无论是安东尼·勃兰特，还是约翰·凯恩克罗斯都没有承认自己是苏联特工，而在西方许多广为人知的出版物也没有为我提供明确的根据来讲述这一题目。

“剑桥五君子”之“五”约翰·凯恩克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破译中心服役，在西方他被认为是出色的间谍之一，有一段时间曾为苏联安全机构工作。他的名字经常与通往我国特工部门“谜语”密码通路联系在一起。部分资料显示，完全有理由认为，凯恩克罗斯向莫斯科发送了成吨的绝密文件。人们经常把他与工作能

力丝毫不弱的苏联在美国的间谍哈里·霍普金斯相比。

关于霍普金斯我只能说一点：这个人只和西方国家一部分高级官员联系，他们认为，与较为先进的苏联打交道要比同德国打交道好些，而无须注意其所有的不足之处。而“谜语”密码事件确实让人感兴趣。几年前，根据西方媒体报道，德国的一台密码机在伦敦的一个拍卖会上被卖掉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借助于这台机器确实解读了用这种装置发送的德国武装力量指挥部的绝密情报。在英国安装了完整的被称为“极端分子”的破译系统，用以整理加工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发来的全部秘密情报。这的确是我们盟国的一个巨大成就。但是，西方列强并不甘心同苏联分享这些秘密。我只能说，苏联特工部门获取这些密码都是通过非正规途径完成的。在英国，没有任何秘密得以瞒天过海，不为苏联所知。

我想起一件事，英国人截获了一份德国军事密码电报，内容为德国空军将密集轰击考文垂。丘吉尔知道，数百架轰炸机将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但是，他禁止将这一情报转告防空部队。结果没有一个防空团，也没有一个炮兵连投入这一将被毁灭的地区。丘吉尔明白，只要他有所举动，外界就会立刻得知，英国人已经掌握了德国的密码。首相认为，秘密应尽量保守到盟军在欧洲登陆以前。

我无意于评价当时丘吉尔是对是错，但特工机构的规定确实严酷。

顺便说一句，有直接证据表明，正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长期领导了英国的特工机构。

今天最好不要旧事重提，但是，英国特工就是在战时也未停止在苏联境内活动，而且又不仅仅只有英国特工。美国在盟国境内的特工工作由哈里曼领导，而且，他并没有掩盖这一事实。当美国头号女特工落网并达成协议用以交换我方特工的时候，哈里曼就

是亲自来将她接走的。

在战时和以后，为美利坚合众国特工部门工作的也有苏联公民，当然，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从事秘密非法活动者是那些熟练掌握我们语言并了解我们风俗习惯的纯血统的美国人。

但是，按我父亲的观点，那一时期英国特工，尤其是美国特工都大大落后于德国特工机构。与此同时，我父亲说，德国特工机构所计划的基本活动我们都很清楚，因为其头目中几乎都有为苏联工作的人。据我所知，这既是指德国政治情报机关，又包括德国保卫和反间机构……

我当然对苏联和国外的特工部门的工作感兴趣。我父亲解释说，苏联特工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大学生、青年人和科技知识界人士与我们的积极合作，他们视苏联为社会主义浪漫思想的第一个产物。但是，不仅仅只有他们，就是贵族上层的代表们也看到了苏联所具有的消灭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力量。从本质上说，这也是苏联特工工作赖以开展的基础。

在美国，苏联特工部门的阵地在这方面稍显薄弱。显然，美国人有名的实用主义是有其影响的。但是，就是在那里，由于我父亲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应该强调指出，他们都是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年复一年地不断努力，使得我们的拥护者逐渐增多，并给予苏联的特工部门以极大的帮助。

美国特工机构本身实质上才诞生。我指的是战略情报机构。我知道，美国军事特工部门的行动效率相当高。但是，毫无疑问，各盟国特工机构中，英国处于领先地位。父亲向我讲述了在苏联境内的地下秘密活动分子，他说，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革命前即已潜入俄罗斯，但还在继续活动。其中部分人员由于俄罗斯特工部门掌握的档案已被发现，但是，像通常一样，并没有急于逮捕他们。

三、贝利亚与苏联的战略情报

有一天，当原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档案公布的时候，社会各界便会了解到那些双料间谍（这种间谍永远存在）和我国多年在西方国家工作的间谍机构的有关情况。比如，我知道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特工机构就和波兰的宗教界联系紧密，尤其是和天主教。有一次，我家来了位新客人。头一天父亲就说，他在等从波兰来的主教。后来他又说，来我家做客的这个人的"手中几乎掌握着所有欧洲国家的特工机构。"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据父亲讲，正是借助于波兰的僧侣集团我们和德国的反希特勒天主教徒建立了联系。我们的特工部门也为波兰天主教教堂提供一些相应方便，例如，释放某些人等……

这样一来，情报工作便成了我父亲的终生事业。不论他以后做什么，制定核计划方案，研究弹道火箭或防空配套系统，抑或负责战略工业部门，从未解除其苏联战略情报工作的领导职责。

何谓战略情报？与军事情报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工作不同，这是一个秘密机构。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在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境内迅速着手建立与对敌人施加影响的行动有关的独立的情报方向。当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和成立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我父亲被责成负责战略情报、技术情报和苏联情报机构的综合协调工作。通常，这些人和我父亲直接联系，在他们身边活动的甚至像诸如金·菲尔比这样一些以其独具的能力享誉英国特工界的传奇人物也仅仅是第二梯队……理查德·佐尔格及其他许多著名特工都是这种情况。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这里是指那些外国公民，有时在其国家和党的机构中占据着很高职位的人。

很遗憾，苏联领导层远不是一贯有效地利用我父亲报告的情

报材料。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就在我父亲临死前苏联政府对英、美领导人的全部行动计划了如指掌。然而，这些巨大的能量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

有这样一个例子。50年代初事实上是我们的特工机构将伊朗的国王赶下了台，亲苏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穆罕默德·莫萨得克出任政府首脑。之所以要采取这些特工行动，是因为这个接壤的国家对苏联有巨大的意义。美国人对伊朗的兴趣也决不少些。斯大林死后，我父亲在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报告说，他获得了美国特工机构筹备策划旨在使国王复位的国家政变的全部详细情报。

大家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认为情况危险，必须作出有效的反应，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我父亲死后，很快便发生了苏联特工所预报的一切：美国特工机构策动政变，使国王恢复了王位。而且，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央情报局，甚至毫不掩饰这是谁的杰作。

很遗憾，有一事件即使不是典型的，但无论如何，在苏联历史上却不是少有的……，甚至在战时还时有发生。我对我们的统帅们满怀敬意，但我必须承认，仅仅是因为不善于利用情报机构获得的毫不夸张地说是无价的情报（显然，具有怎样的价值勿庸赘言），才不止一次导致了一些悲剧性的后果——集团军群被包围，德国兵团获突破等。但是，卫国战争每一战役的顺利进行都直接离不开情报部门的巨大努力，数千份至今犹存的秘密档案文件就是有力的证明。

然而，西方一批研究者肯定说，“不管情报总局的间谍怎样英勇和技艺高超，他们的情报对苏军的战役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粉碎法西斯主义方面还存在一个贬低苏联情报机构作用的企图，这里是指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

总参谋部特工总局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芬兰战争雄辩地证明，总参谋部所有负责保证的局，其中也包括情报局都急需调整。

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已完成了诸多结构性调整，而军队情报机构的调整也迫在眉睫。主管苏联情报机构的父亲当时认为，情报总局的内部调整无需大动干戈，他说，正好相反，所有能够开花结果的健康枝叶无论如何都应予以保留。在这方面，我父亲有一个非常可靠的盟友——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将军。我父亲正是和他以及其他军人一道来处理全部多年未决的棘手问题的。

情报队伍的隶属关系和发展方向迅速转换，情报总局充实了一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后来，军队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很高，因此，对其所有的指责都是无谓的谎言。

但是，情报总局在历史上也有过困难时期。请读一下 1940 年 5 月铁木辛哥从伏罗希洛夫元帅手中接管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交接文件内容，这份文件已于不久前终于解密：

“情报机构组织问题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中的最薄弱部分，有关外国军队的情报材料。情报工作与总参谋部脱钩并直接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削弱了对情报业务的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情报局不是一个能保障向红军提供有关外国军队组织、现状、装备、备战及部署情况的资料的机关。到接管这个机构的时刻，国防人民委员部并不掌握这样的情报资料。对作战区域未作研究……”

与此同时，这指出了在部队的组建和装备配置、动员准备、干部和兵种现状、部队的战斗准备及防空领域方面都有不足。

文件签署人为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

离战争爆发只有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战略情报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构的有效工作，局面将会十分被动。1938 年我父亲接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构时几乎就是这种令人堪忧的局

面。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情报机构已成为西方国家,当然也包括德国在内的重要对手。当情报总局归我父亲负责之后,这里也开始了重大改组。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见解。但是,在那一时期将情报机构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一重要之举却保证了苏联情报工作无论在战时还是在以后都能卓有成效。

扬·别尔津、普罗斯库罗夫、戈利科夫、库茨涅佐夫、谢洛夫、伊瓦舒京,这些人在不同时期都担任过情报总局的局长,但是,大家最常想起的大概还是戈利科夫将军,而且,通常都是从不好的一面。例如,30年代初在工农红军第四局开始其特工生涯的女特工之一玛丽娅·波利亚科娃中校这样讲述其情报总局的领导们:

"我真正明白了别尔津对于我们军队情报机构来说是怎样的一个人。迅速建立起一个过硬的谍报网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几年的时间。具有创造性、意志坚定性,善于做人的工作,这些品质不仅有助于别尔津成为一位领导者,而且还成为一个创造者。他自己挑选并训练善于执行其意图的干部。1937年以前设立的各驻外机构的业务通常都带有他关注其生活和工作的痕迹。在理查德·佐尔格、山多尔·拉多、伊里查·施捷贝领导下的组织及其他一批组织都成为特工史上的经典之作。军队情报机构战时的行动表明,在别尔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规模宠大的特工组织的工作是稳固有力的,其中部分组织经历了整个战争,并获取了极具价值的情报。

"别尔津被捕之后长期没有领导人。此后来了普罗斯库罗夫。他年纪更轻,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对我们的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聪明能干,办事严肃认真。战前,普罗斯库罗夫出人意料地被除掉,换上了戈利科夫将军。他不知道,也不明白我们工作的特点。无论在斯大林面前还是在总参谋部,他从来没有为情报机构的利益而争过什么。和他工作很不轻松

……”

这里所说的许多内容都是真实的。我知道戈利科夫是个善良的好人,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领导,就是“上层”对他也不无微辞。要知道,时而将他派去谈判,或作为军事委员会成员被派往前线,这都不是偶然的。最终他也没有成为情报领域里的真正专家。

扬·别尔津的命运充满了悲剧。他是个拉脱维亚族人,革命前坐过牢,流放过,战地法庭判他死刑。诚然,后来这一判决改判为囚禁。

1919年他从全俄肃反委员会加入红军,几年后成为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他的被捕和被枪决是在叶若夫当内务人民委员时“伏罗希洛夫清洗”红军时期。

我还想谈一个令我头痛的问题。一系列资料指控我父亲,说他的苏联特工机构在伦敦杀害了波兰临时政府首脑弗拉基斯拉夫·西科尔斯基和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据说是贝利亚的人用了一种新毒药将他们毒死的。

当时如指控为我父亲说他没有下毒,而是将马萨里克部长从窗口扔了出去,这更合逻辑。扬·马萨里克正是以这种方式自杀的,而不是由什么人毒死了他。而且,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苏联特工都没有必要“除掉”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位总统的儿子,因为扬·马萨里克为苏联工作。现在谈谈西科尔斯基。他不是被苏联,而是被英国特工“除掉”的,这一点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摘自官方资料:

弗拉基斯拉夫·西科尔斯基(1881.5.20—1943.7.4日),波兰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将军。受工程师教育。1914—1917年为波兰军团上校,是尤·皮尔苏茨基的对手。在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五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司令。1921—

1922年任总参谋长。1939—1943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军事部长和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1941年7月30日与苏联签订恢复外交关系条约。在直布罗陀附近由于飞机失事遇难身亡。

西科尔斯基惨死的原因是他与苏联的接近。西科尔斯基及其随同人员一起乘坐的飞机机毁人亡,但机组人员却得以跳伞生还,后来被判20年徒刑。公布了这一不幸事件,但是,那些西方资料都认定,这一不幸的航行始于直布罗陀,当时被我父亲吸收加入我方组织的英国军事情报机构主要代表金·菲尔比正在那里……是各种事件的偶然巧合?

不。西科尔斯基遇难的时候,菲尔比没在直布罗陀,而是在不列颠执行苏联情报机构的任务。关于西科尔斯基之死本身有引人入胜的回忆录。比如,安德斯将军的副官在战后写道,"关于西科尔斯基之死的政府通报非常模糊、混乱和缺乏说服力。对事故事实上没有进行调查。为了掩人耳目,成立了一个确定空难原因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只接受通告的说法……正如正式通知中所言,操纵杆为什么失灵?就连这一点委员会都不肯烦劳自己去弄清楚。没人相信这是偶然事故。没有打捞到一片完整的残骸和乘客的尸体,因为飞机在空中爆炸时他们便一同四分五裂了。为什么这样急于消灭西科尔斯基?英国人极为担心西科尔斯基同苏联政权达成协议。当西科尔斯基宣布自己前往开罗去会见从伦敦赴莫斯科的维辛斯基时,不希望促成这次会见和会谈的英国人发电报将西科尔斯基召到伦敦,并事先准备好一切,以使这次航行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安德斯将军的副官、骑兵大尉克利姆科夫斯基的推论完全为苏联特工所获情报资料所证实,其结论只有一个:这是英国特工组织的一次破坏活动。

在特工历史的"空白点"之中,劳尔·瓦伦贝格的命运令人猜

疑。几年前，原克格勃驻印度间谍头子之一、后来的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学院副院长、捍卫和平苏联委员会副主席宣称，瓦伦贝格是1944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和党卫军头子亨里希·希姆莱举行秘密谈判的联络人。和这位前驻外间谍头子波格丹诺夫不同，其他资料认定，苏联安全机构试图拉拢瓦伦贝格，拉拢不成便枪杀了他。好像这位瑞典外交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死了。

摘自官方资料：

劳尔·瓦伦贝格，瑞典外交官，温斯顿·丘吉尔之后20世纪惟一获得美国正式荣誉公民的人。

1912年生于斯德哥尔摩。祖父是一位外交官，在日本、中国、土耳其工作过。父亲是海军军官，儿子未出世前就已去世。在祖父的家里长大成人，受到建筑师的教育。经过商，在斯德哥尔摩主管进出口事务所。1944年初，身负救人使命前往布达佩斯，任瑞典王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秘书，从死亡线上救出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

1945年1月17日被苏联军事反间谍机构“斯麦尔什”逮捕。这位瑞典外交官后来的命运不详。

我知道，瓦伦贝格和美国人联系紧密，他在布达佩斯的全部活动也秉承美国人的旨意。为了救人他确实做了许多工作，但他和苏联特工部门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要说根本不曾存在过的希姆莱和我父亲之间抑或其他苏联代表之间的谈判了。这一认定完全是杜撰的，尽管我知道，近几年苏联出版物关于这一虚构的谈判写的文章颇多。

在阿巴库莫夫领导“斯麦尔什”时期抓获了劳尔·瓦伦贝格。后来这位外交官被移交给了安全机构。我父亲和瓦伦贝格的命运从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我自然也就不知道这个人在苏联的遭遇

如何了。可是，我认为完全有可能他没有被枪决，50、60、70年代一直在苏联。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乏其例的。

半个世纪前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我父亲和苏联其他高层领导成员一样，也能收到外国报刊综述专刊，那些年我也就不止一次读到有关介绍瓦伦贝格情况的文章，还有西方到处寻找他所引起的关注。但是，有关劳尔·瓦伦贝格在苏联一事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如何解释今天对1963年以叛国罪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的情报总局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命运关注的非常反响？一种说法取代另一种说法，而这些说法往往又都是不久前的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公开提出来的。但是，和以前一样，佩尼科夫斯基案件的统一说法是没有的。众所周知，上校先是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工作，后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办事处，被捕前的最后几年一直从事军事技术情报工作。

只要俄罗斯特工机构不承认佩尼科夫斯基与英国和美国特工部门建立联系的时间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在当时，而是要早得多，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从文件中得知，他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执行领导任务。他自始就是个双料角色，这在特工业务中是常有之事。

战争期间佩尼科夫斯基在土耳其工作，据悉，当时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他是战略火箭部队总指挥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元帅的亲信，后者死于1960年拜科努尔试验。对他引起不满是因为他将对当时当权者的评述材料交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这些材料恭唯之话太多。

这一无头案为赫鲁晓夫及其周围的人解除伊万·谢洛夫将军情报总局局长职务提供了理由。

我想，被枪决30年后又重新引起对佩尼科夫斯基命运的关注，说明对这位特工的指控在今天仍不能让人信服。

四、谍报工作与苏联的武器改进

我不仅是战争年代在特工部门服役，参加了一系列在国外采取的特工措施，而且后来作为宇航火箭系统的总设计师，我接触技术特工工作成果的时候比较多。苏联特工机构对仔细研究西方科学技术的爱好并不限于战后时期，而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特工机构一样，在此项领域一向卓有成效。我不得不经常光顾内务部的特种实验室。例如，我们用了足足6个月时间，以国产部件为基础，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库克先科领导下，按照特工机构搞到的图纸制造了一台所谓的夜视仪。

我们"借鉴"英国人的技术而制造了舷翼式无线电台测位仪，莫斯科保卫战中每个空军大队装备这种仪器两台或三台。海军雷达系统的情况也是如此。总之，苏联特工机构为军事技术装备设计师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摘自官方资料：

根据外国报刊资料，80年代苏联制造的比较完善的武器系统，包括米格—29和苏—27飞机、部分导弹、坦克、潜艇，其问世在很多方面得力于从国外秘密获取的计算机部件。拥有数亿美元经费的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庞大业务，使其得以无孔不入，足以打破北约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各国在销售这类技术和工艺方面所作的限制。几年之中便有数万台各种级别的计算机、数十万套外围设备、控制器、备件运入苏联。借助于这些设备制造了完备的武器。在它们的基础上制成计算机设备和模拟未来飞机、火箭、坦克和其他武器的构造。只有利用这样的电子设备才能取得大型《姆利亚》机的可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材料和在空气动力学和弹性学方面的最新知

识。

俄罗斯报刊也援引其他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意大利“春天牌”低座小型摩托车冠以“维亚特卡”之名进入苏联市场。我们市场上出现的新式吸尘器、电冰箱、剃须刀及其他日用品，都得感谢特工部门。但特工机构的任务主要还是在军事研究方面。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特工机构是否策反了降落在我国远东地区的美国 B—29 飞机飞行员。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美国人在对日本实施完轰炸任务之后没有返回基地，而是在我国境内降落。苏联图—4 轰炸机准确说来就是那个外来“波音”飞机的翻版。对“美国造”装备的认识使我国当时的航空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当年类似的情况不少。美国人在轰炸日本的时候，飞机往往被防空武器击中，驾驶人员被迫启动自动驾驶仪，并把方向对准北极。飞行员自身努力不落到日本境内，而是在苏联或中国领土的上空跳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近百分之五被击中的飞机以这种方式飞向北极。自然，其中的一部分在广阔的冰面上坠毁了。但是，有一些却或多或少比较完整地落在了苏联境内，其中大部分都没有机组人员。记得有一次，一架没有机组人员的飞机完好无损地降落下来，并被飞行员莫尔古诺夫从远东转到内地。飞机被送进航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特种设计局，而且在极有限的期限内借助于我国工业仿造了美国飞机的全套部件。这极大地帮助了我国从事发动机、无线电设备、驾驶技术、电子自动设备、仪表制造等方面研究的专家们。美国工艺便这样被应用到了我国的工业领域。

我国特工机构搞到美国飞机发动机和仪器的图纸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些。我越发倾向于认为，B—29 飞机机组人员在远东机场

降落不是偶然的。看来,没有特工部门的努力,这里同样会一事无成。

例如,美国空军退伍少校罗伯特·贝塞特写自加利弗尼亚:1942年4月18日,16架B—25轰炸机从美国海军"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开始对日本实施袭击珍珠港后第一次空袭。其中的15架飞机在飞行员跳伞后或在中国海岸沉没,或在陆地上坠毁,只有一架因燃油耗尽被迫改变作战航线,最后完好无损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降落。5名机组人员在1943年末逃到伊朗之前,暂被苏联当局扣留。事情听起来不那么可信,但罗伯特·贝塞特肯定说,有两名机组人员至今还活着,他们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飞机就停在滨海边区的一条起降跑道上。

按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架轰炸机"加入苏联空军编制,并消失在时间的深渊里。"从报刊反响来看,B—25轰炸机失踪的秘密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都同样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来自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市的马尔科夫报告说,1956年6月他被派往40971部队学习空中射击业务,空战专业人员初级班部署在滨海边区的门佐夫卡镇。这位原士兵肯定说,镇上停着一架作为教具的B—25轰炸机。还有一架起同样作用的我们自己的图—2轰炸机停在旁边。飞机是从别的部队运来的。当学校搬到阿穆尔州时,两架飞机就留在了门佐夫卡镇。

我们感觉,波尔塔瓦的梅利尼科夫的证明也同样有趣。他在给《消息报》的信中写道:"战后10年我驾驶运输机在远东范围内从乌厄连到北京之间飞行10年。三个国家(苏联、朝鲜、中国)沿海机场我都了如指掌。注意到'空中堡垒'(信的作者有误,说的是B—29)不易被击落,有一个类似的事件还留在记忆中。事情发生在1945年11月,刚刚结束在中国沈阳的美国战俘营的检疫(我们的空降兵释放了他们)。经常有改装成运输机的B—24、B—29轰炸机飞到那里。它们从日本或朝鲜起飞,其航线经过朝鲜北部,途

经卡恩科市(今咸兴市),而这个城市的旁边有我们的大型空军基地,飞机主要来自滨海边区。两个月时间美国飞机在卡恩科上空飞来飞去,当地居民已经司空见惯,但对外来者却不如此。"如果读者信的话,一位高级军官,看到头上沿自己航线飞行的B—29飞机,于是下令歼击机迫降"破坏者"。在用机枪和火炮发出警告之后,飞机没有做出反应,于是,我们的一架"眼镜蛇"向"美国人"的发动机开了火。飞过海岸线后,飞机突然转向大海,在离开海岸不远的地方向海里抛下了一件什么东西,尔后在苏联机场降落。梅利尼科夫肯定说,机组人员抛进大海的是一个秘密瞄准器。后来,B—29飞机落到了一批专家手里。这是不是国产图—4轰炸机问世的又一说法?很有可能是这样。

还有一种将美国飞机迫降在苏联境内的不同说法,讲述者为太平洋舰队空军第十师三十三团原军人巴甫洛夫和韩金,他们来自比尔姆,1941—1947年曾在那里服役。据原航空主任机械师和武器装备主任技师讲,一个春天他们所在的空师第十九歼击机团飞行分队迫降了一架美军"空中堡垒",他们肯定说,这架B—25轰炸机美国人已寻找了多年。在战士们还来不及跑到降落的飞机跟前时,机组人员已经毁掉了最新式的秘密投弹仪器和通讯设备。后来,这架美国飞机被弄到俄罗斯腹地的一个机场。

1993年乌克兰报刊一度披露过苏联军人从南朝鲜劫持美国战斗机的消息。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时期,被追逼的"眼镜蛇"飞机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看来,这里讲述的起码是几次事件。

众所周知,获得别国飞机的不仅只有我们国家。维克多·别连科上尉的叛国事件广为人知,1976年9月6日他驾机在北海道的一个机场着陆。当时日本人,准确说来是美国人获得了一架苏制最新米格—25截击歼击机。

另一架苏联米格飞机事件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1966年8月伊拉克飞行员、空军中队副队长穆尼尔·赖特法驾机在以色列的

一个机场着陆。一直到现在，在以色列这一事件仍被当作当地特工部门工作成效的有力见证，因为在苏联开始向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提供新式歼击机之后不久，这一任务便交给了以色列军事特工机构和摩萨迪组织。

总之，苏联特工显然也不例外。

但是，让我们还是回到多年担任世界上最好的战略情报机构首脑的那个人的命运上来吧。在苏联国家历史上最复杂时期情报部门的专家们起码是这样高度评价其活动的。

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客观评价这位苏联战略情报机构的首脑的多年工作今天实际上在任何一份官方资料中都不可能找到，而保存在原苏联情报机构秘密档案中与“英国特务”相关的一切，还和 40 年前一样小心翼翼地被神秘的栅栏层层包围着。原因依旧。

五、贝利亚重视谍报人员的业务素质

可是，报刊终究还是有所披露。例如，1992 年 10 月原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四处处长维塔利·切尔尼亚夫斯基公开承认：

“贝利亚聪明过人，判断准确，谙熟特工和反间谍艺术。1953 年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严厉批评了战后数年特工机构的活动，并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更新了在人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组的人员构成，派一批年轻的和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去领导它们。他要求他们能熟练掌握派驻国语言，能够不用翻译直接同秘密组织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他认为，和我们盟国的关系应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之上，我们的顾问不要介入内部事务，不要鼓动那些‘没有把握’的事，尤其是那些由于高层当权者内讧而导致的纷争，以避免给

人以所谓遵照‘苏联同志’的指示行事的口吞。这是非常明智的指示。对此我在正在写的回忆录中有详细阐述，书名定为《1944—1956年在巴尔干和中欧国家》。”

让我们将这一评述与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组织者们给我父亲的定论比较一下。

会议记录：

赫鲁晓夫：特工工作和反间谍工作成了二流的、不被重视的……必须使一切各就各位，内务部机构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针对我们的外部敌人积极开展工作。正像马林科夫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迫切需要加强党在各个环节的领导，永远杜绝对党和内务部的关系准则的破坏，提高契卡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党的机构对各级机构实行日常和具体领导的责任心，时刻提高革命警惕。

同志们，我想，对这个恶棍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把他作为一个人物去加以夸大。党员群众和人民不了解他。他没在什么地方呆过，不了解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干部知道他是个粗鲁无礼的人，而现在又知道他是个挑拨离间者和叛徒。

克鲁格洛夫：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监狱使他停下来，不知他会在反党的路上要走多远。正如目前所知，他会利用内务部机关为其反动目的服务。但是，我们这次就要清算这个坏蛋。除了一小撮贝利亚的亲信，内务部集体内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及其列宁—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的，贝利亚企图利用它达到其卑鄙目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鼓掌)。但是，应当批判地认识贝利亚最后在内务部3个月期间的所作所为……许多事情显现了另一种真实的含义，他的反党和反动的面目已昭然若揭。已经清楚，他在自己卑鄙的计划中要精心利用

内务部体系。为达到此一目的，借口为了特别保密全部特工和反间谍问题都由他和科布洛夫决定。……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全力提供帮助，彻底揭露这个下流痞、背信弃义之徒、骗子、奸细，他竟厚颜无耻和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我们的领导人中，而我们的领导是人民的骄傲和党的骄傲。这个阴谋家、诽谤者、身负使命的奸细、彻头彻尾的道德败坏的卑鄙小人，在他身上集中了最下流最无耻的一切。调查将会查明贝利亚的全部反动行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他的一些措施就是有害和反国家的。尤其是在特工问题上。现在我们知道，今年四五月份贝利亚将内务部驻外机构大约一半的工作人员同时召回莫斯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莫斯科已有 2 至 3 个月了。

莫洛托夫：从哪儿召回的？

克鲁格洛夫：维雅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从国外，从资本主义国家。

马林科夫：这样的工作人员被召回数百名。

克鲁格洛夫：目前近 200 人在莫斯科已住了 2 至 3 个月时间，问题得不到解决。在此期间，内务部驻外机构的工作陷于被削弱，同许多重要特工失去联系。苏联特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驻外机构虚脱了，长期处于无领导状态。

有一个人说：这是有意识造成的。

克鲁格洛夫：完全正确。再说。内务部驻德全权代表及其副手们在莫斯科呆了 3 个月，而在德国有人在准备暴乱的时候，贝利亚却做出了将驻民主德国的全权机构人员削减到七分之一的决定。决定取消在德国的指导员机关，只保留作顾问的职能。这样，这段时间驻德契卡机关也同时被急剧削弱了。

贝利亚一味贬斥秘密谍报中的整个工作，这是可疑的。他不止一次地声称，没有特工，没有情报人员，没有任何有价

值的情报，没有干部，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现在清楚了，当时贝利亚和科布洛夫的用意在于拒绝采取一整套谍报措施，许多国外谍报材料都没有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

他任命内务部领导人员的一系列事实只能使人产生一个想法，即贝利亚追求的目标在于各个岗位上都安置忠于自己的人，而不考虑他们对党是否忠诚。任命了一大批这种人，诸如赖赫曼、艾廷根、苏多普拉托夫、梅希克、米里施泰因等人，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享有集体的信赖，这些人在他到来之前都被赶出了内务部机构的大门。现在已经清楚，这种任命无非是要把彻底忠于他的那些人放在自己身边。

贝利亚对特工局作了大刀阔斧的裁减和清洗，在短短的期限内裁减了大部分响应党的动员而加入特工机构的人。

最近一段时期，贝利亚无视中央委员会关于内务部的组成规定，特别致力于组建直接隶属于他个人的而其职能不为人所知的新的处。甚至这个处的干部选拔也不通过部人事局。进入该处的有那个刚从监狱放出来的艾廷根，有和贝利亚关系密切而名声可疑的华西列夫斯基，还有法兰西族人普拉夫金等等。

最近被重新任命为芬兰处负责人的科托夫同志报告说，贝利亚在接见他的时候建议他去拜访一下原芬兰内务部长雷诺这个叛徒，说芬兰共产党将其抛弃似有不公。贝利亚要科托夫同志明白，他应当会见雷诺。贝利亚的这一指示深为可疑，因为我们苏联的工作人员在境外会见工人运动的变节者和叛徒不能被视为是正常的。

同志们！最近一个时期，在内务部系统里，更准确地说是在原国家安全部里形成了困难的局面。最近3年那里经历了连续不断的破坏和改组。这使这个机构陷于瘫痪。但是，党所派到内务部系统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清楚，他们要在自己

亲爱的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机构力量，使其转入同我们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轨道；在自己的工作中提高革命警惕，并竭尽全力，以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信任，不辜负列宁—斯大林党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的信任（鼓掌）。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同志们，有人建议现在用餐，休息到晚8点。有反对意见没有？

异口同声：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宣布休息到晚8点。

"有人建议……有反对意见没有……"很想知道，赫鲁晓夫在和他的亲密同事们一同去用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对按照他的脚本而刚刚上演的一幕暗自欣赏？或在分析刚刚流畅地读完整个由党的机关办事员写就的虚假台词的全会参加者们的表演？很遗憾，任何人任何时候对此都已无从知晓。而且，也已无从知道，中央全会的参加者为什么竟无一人敢于对加于我父亲的虚构罪行提出质疑。难道是30年代政治审判的幽灵还在会议大厅中游荡？抑或对仕途的担心使人裹足不前？这也许更接近真实。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说出党的上层给战后苏联情报机构所带来的巨大危害的哪怕一部分真相。正如俗语所说，已是一蹋糊涂。1946年国家安全机构的情报部门落入新部长阿巴库莫夫之手，他被捕后，国家安全部又由党的机关权贵伊格纳季耶夫接管。由此这就有了所谓的党的人员指派和非专业人员。在国家安全部的情报机构中的肆意逞威。1953年3月，当我父亲在离开10年之后又回到内务部时，情报机构的状况确实令人堪忧。

大批人员的被抓，情报人员的暴露，投敌叛变者的出现，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像国家战略情报机构掌握过的那种重要情报完全没有了。所有这一切当然使我父亲非常气愤。与此同时，特工

部门的机关早就自我膨胀,超出了合理的界限。

当然,父亲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在部长会议所召集的会议上对事情现状作了如实汇报,我父亲将造成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对外特工局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低下。

"您要知道,"父亲坚持说,"不能派那些对此工作毫无概念、不懂语言的人参加特工工作。在其他地方,完全可以把一个人从俱乐部调到浴池,从区委调去建筑工地。而这里是特定的职业,需要特定专长。大家反对我说:但他们是党员呀。我不反对党员在特工部门工作,但是,怎么能派那些对这一专业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去担任特工部门的领导工作呢?

父亲正是从长期困扰的干部问题入手,裁撤无关紧要人员,并立即选择专业人才予以补充,其中一部分人员是从情报总局调入内务部情报局的,主要是那些参加过战争,并在军队特工部门有良好表现的人。也吸收不少掌握外语、训练有素、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的人。

事情真是可笑,一个人不懂一门外语,却被任命为驻外机构负责人,譬如说在东京……但这是党提拔的干部!在伊格纳季耶夫时期,干这一行只要提拔这类干部就足矣。

事实上并不像有些人有时所写的那样,苏联侦察员不曾从国外大批召回,也没有任何人将别人"暴光"。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们不过是一般地重复党的全会上所喧嚣的谎言,时而对会上所作结论添油加醋。是用专业人才换掉了专业知识肤浅的人,是进行了改组整顿,对这样做的必要性,对外谍报部门的工作人员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问题。当然,这一切都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并接受我父亲的建议后进行的。

除了杜撰捏造之外,当时对新任内务部长没有提出任何现实的指控。要知道,全会组织者本身非常清楚,我父亲是在努力整顿被他人搞乱的一切。

现在谈谈因其任命而使我父亲受到百般指责的那些人。艾廷根，特工干部，确实是斯大林死后被释放的。在此之前，无论是阿巴库莫夫，还是伊格纳季耶夫，都从他那里逼取对我父亲的供词。据悉，直到今天他在特工圈子里仍被认为是专业高手之一。

对华西列夫斯基亦有所闻。在参加特工之前是个飞行行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在法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去西班牙之前不久，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造船平台相识了。他能制造很好的快艇。也是个职业特工。也是在取得党的机构的同意这是在苏联的通常做法——之后，赖赫曼被任命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成为苏联内务部所属监察局局长、原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局长苏多普拉托夫的副手，负责内务部的一个处，相当于原国家安全部机关局局长，后为内务部第一总局副局长。所有其他人也都是专业人才。在全会上，没有一个人想对对外情报机构的改革作任何分析。全会的组织者根本无意于此。这一全会的速记记录直到40年后才公开，全会参加者很快就清楚了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力图避开这段黑暗的历史。他们利用特工这个题目如同利用其他题目一样，目的是给我父亲的名字抹黑。

第五章　战　　争

一、斯大林得知德国入侵时没有"垂头丧气，不知所措"

能否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斯大林曾否准备对德国的预防性打击？是谁和在什么时候同希特勒进行的单独会谈？为什么敌人一直能推进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真的不相信苏联情报机构吗？我们部队 1944 年为什么没有援助华沙起义？

1945 年 5 月胜利后已有多少个 10 年过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空白点"依然不胜枚举。为什么？猜测起来并不复杂。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讲述了他与当时担任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叶皮谢夫将军会见的情形。当话题涉及历史科学的真实性时，这位党所培养提拔的以其信仰和正义效忠过几任总书记的老机关权势干部大言不惭地阐明了自己的信条："谁还需要您的真实，如果它干扰我们的生活？"

对那次战争的全部真相斯大林不需要，赫鲁晓夫不需要，勃列日涅夫不需要，以及所有他们的后继者都不需要。要说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还没有写出来，提出反驳是困难的。不管承认起来多么让人痛苦，甚至受到整个世界赞扬的我们改革时期的公开化也只是使我们接近了一点真理，但是藏有秘密档案的保险柜的沉重之门最终依然没有完全打开。

没有任何一部讲述过去的书可以让所有的观点超越“自我”，回答全部问题，尤其是涉及这一令人“头痛”的题目。但是我想，这一章会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秘密略见端倪。我们模糊不清的历史中还有一种奇谈怪论：战胜者是知道不了战争真相的。这样，就流行着有关这次可怕战争的两种历史真相：一种是对人民的，另一种则是……而且，只有第二种需要挣脱已掩盖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虚假秘密的锁链。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只满足于突然袭击和飞机、坦克严重不足等神话。

那天夜里，父亲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开始了，你们听听广播吧！”这些话对不知情者来说什么也没有说明，可我和妈妈却清楚地知道父亲想说什么。是战争开始了。

关于那个战争前夜描述颇多。前线士兵、一些参战者以及我们的统帅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甚至赫鲁晓夫，众所周知当时他身在基辅，竟能自作聪明讲述当时克里姆林宫中发生的一切。并且是援引我父亲的话。好像在把战争爆发的情况向斯大林报告的时候，他很久都不相信是真的，尔后他便回自己的别墅去了。赫鲁晓夫写道，“斯大林显得老态龙钟，垂头丧气，不知所措”。政治局委员们不得不花许多时间给他打气，说我们还没有失去一切，我们是个大国，我们可以积聚力量回击敌人。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被劝回莫斯科，并领导部署国家防务。

又何止赫鲁晓夫一个……。比如，令人深为敬仰的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所写的回忆录也远非全与史实相符。我在任何方面都从未对此人的诚实和品行产生过怀疑，但事实就是事实。可能初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相信，这不是这位光荣的元帅的错，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一切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如果朱可夫当时写出他所知道的全部真相，他的回忆录就不会付梓问世。

但是，让我们书归正传。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公正地讲

到，斯大林死后有传言说，似乎6月22日前夜指挥员们和自己的参谋部没有丝毫怀疑，或者安然入睡，或者在无忧无虑轻松消遣。但这是恬不知耻的谎言，一切与此完全不同。例如，将要宣读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在德国人进攻一昼夜之前即已知悉。说当时措手不及，总参谋部的指示未及传达到部队——这纯属臆测。正像应做的那样，指示启封文件的命令随即就到，各个部队也都按命令做了。至于大多数部队能否胜任所交给的任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为什么要污蔑总参谋部？

读者一定记得在朱可夫的说法中斯大林的表现，让我从书中摘抄一小段引文：

> 3点30分，西部军区司令克利莫夫斯基将军报告，德国空军袭击白俄罗斯各城市。3分钟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点40分，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打来电话，报告敌人空袭考纳斯市和其他城市。
>
> 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我就不停地打。终于我听到了警卫局值班将军睡意正浓的声音：
>
> “哪位？”
>
> “总参谋长朱可夫，请马上给我接斯大林同志。”
>
> “什么？现在？”警卫局长十分惊异，“斯大林同志正在睡觉。”
>
> “立即叫醒他：德国人正在轰炸我们的城市！”
>
> 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话筒里响起低沉的回答：
>
> “请稍等。”
>
> 过了3分钟，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
>
> 我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批准采取回击战斗行动。斯大林默不作声，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还是沉默。

终于斯大林问道:

"人民委员在哪儿?"

"正用高频机同基辅军区讲话。"

"和铁木辛哥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朱可夫无需去叫醒斯大林,而波斯克列贝舍夫也不需要逐个打电话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全体,包括我父亲在内,早就在克里姆林宫了。当然,在那个厄运临头的夜晚斯大林也没有卧床就寝。顺便说一句,不知为什么任何地方都无人写到,是谁第一个将战争开始的消息报告给他的,其实,斯大林肯定不仅仅是从总参谋长那里获得的这一消息的。

但是,问题甚至不限于此。朱可夫如何得以发表其回忆录,尽管以现在这种版本问世,至今仍然让我惊奇不已。而所有这些不确切之处,我们姑且如此称谓……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是个聪明人,他非常清楚,读者不难辨明真伪。您说,有谁会相信,朱可夫会记起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上校勃列日涅夫呢?但是,书上有这样的描述。不提及现任总书记的姓氏这本书是难能面世的。谁敢指责元帅这样做呢?我丝毫也不怀疑,朱可夫虽然作了某些让步,他知道在主要方面他仍是个赢家——这样他就有可能说出战争的真相尽管不是全部。

我从父亲、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人那里不止一次听到有关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行为表现。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那时不能如实描述一切。而事实真相是,当斯大林得知前线局势去之后确实感到沮丧。但是,人们在提及这一点时,便一定会急于去强调:斯大林没有预料到德国人的袭击,他相信希特勒,

而后者却骗了他。这一切不过是多年前就输入到社会意识中的神话之一。而令斯大林震惊的并非是历史教课书至今依然要我们相信的那种神话式的突然袭击，而是军队竟抵挡不住最初的一击，这才是斯大林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在战争最初几天和几个小时他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朱可夫的不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是他们二人，还是其他军事高级官员都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和政治局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红军都能抵挡住最初的突击，尔后便按计划予以还击。读者请注意这一点，这里讲的不是无疑不无重要意义的军队的士气，而是更为具体的东西。要知道，斯大林曾直接了当地问过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军队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军人们异口同声地安慰说："军队已有了所有必要的东西。"当斯大林得到报告，军队正向东方撤退，他当然会感到震惊。根据德方资料，战争的最初几天在地面共消灭我方飞机约7000架。而有些人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的飞机生产直到战争中期才超过德国。我们也不好意思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坦克数量比德国要多出一倍，仅T—34型坦克我方就多于德军装备的全部重型坦克。总之，官方宣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要编造历史。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有许多编写得成功的地方，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如何看待对部队的管理遭到破坏的论点？这不是捏造，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和最初几天，国家领导人确实不能从部队哪里得到消息。原因何在？一切都归于那个臭名昭著的突发性……朱可夫对此着墨不多。在这一点上对他仍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不能揭示全部真相。军队的通讯已陷于瘫痪，但当时还有边防部队的通讯尚在工作。只要还有一个战士活着，只要一息尚存，边防部队便会源源不断地向莫斯科发送可靠的情报。这里有可以令人思考的东西，不是吗？

同参战的空军也无法取得联系。如果相信那个传奇故事的说法，就是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使我们的歼击机无法起飞。完全不对。

最可怕的是，许多、非常多的年轻飞行员没有能力驾驶飞机起飞升空。在敌机轰炸机场的时候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后来查明：在西班牙参过战的飞行员全都驾驶自己的飞机起飞升空，投入了战斗。但是，多数飞行员还都是未经实战考验的青年……而且不仅是空军如此。与德军不同，我方投入战争的都是未曾参加过战斗的军队。而这一因素不仅是军队领导人，就是国家领导人，都未曾加以考虑。

前线战士会证实说：在敌人空袭的时候不惊慌失措真是不简单的事，尤其是在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些飞机的时候。而第一次向人开枪也颇为不易。当一个新兵看到坦克向他开来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什么？

不应当把事情简单化。关于战略、军事首长们的失误想写多少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那些负有使命去实现统帅们的意图的人。三四个月过后，红军在战斗中仗已打得很好。这一事实众所周知，谁都不感到惊奇。这已不是6月22日那支未经实战考验就匆忙应战的部队了。

当然，1941年的撤退不能仅用这一点作解释，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想就此题目展开又一项研究，提交读者来评判，我不想承担这一任务，还是让历史学家去写战争史吧。但我相信，弄清某些问题还是值得的，尤其是当涉及到对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些事件有直接伪造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神话是，德国人何以使我们猝不及防。资料显示：没有一支边防军、没有一支用于反击的军队是猝不及防地遭遇敌人的。比如说，我们的部队开进了柯尼斯堡。敌人并未在南方通过。为什么？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苏联好像对战争毫无准备。这是不对的。只要统计一下我们部队第一梯队所拥有的武器装备，这一观点便会像纸扎的房子一样不攻自破了。

“怎么会是这样?”读者会问,“有足够数量的飞机,坦克更为充足,可德国人却打到了伏尔加河畔。”

我重申,原因是很多的。很可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应击学说本身。要知道当时曾有一个想法:让他们攻击吧,我们后发制人。

不能说这一学说原则上有什么错误。后来的仗正是这样打的,众所周知,效果不错。但在当时如何运用这一学说却是个问题。事后我们也可以这样议论:如果我们进行通常的防御战,而不考虑这些还击,我们的损失可能就要小得多,而德国人的向前推进速度也会慢得多。谁知道……无论如何可以断言,这一反击学说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而且没有得到当时指挥人员的一致同意。

二、芬兰战争的教训,部队对现代战争训练不够

很遗憾,我军对坦克兵团协同空军在宽广地带运动作战、侧翼突破及包抄敌军等未作训练,这一切在芬兰战争中已暴露无遗。在1941年6月之前已有诸多改善,但训练部队使之完全适应现代战争却还远远不够,尽管,我要重复说,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人在这方面已多有建树。

我认为,至今人们仍然一无所知的对芬兰战争与这一题目具有直接关系。正是这次战争之后开始了红军内部的根本改革。

摘自官方资料:

那次“不著名的战争”的结果是:苏军官兵死53522人,伤163772人,12000多人冻伤,16208人失踪,5000多人被俘。苏联史料证实,在军事装备方面苏军也同样损失惨重。前线空军损失540架飞机,仅第七军在突破马涅尔盖姆主防线中便丧失1244辆坦克。

按西方统计资料,芬兰方面的损失是:近2万人死亡,伤

4万多人和3273人失踪。有千余官兵被苏方俘虏，和平条约签订后他们全被遣返回国。

不久前才得知，在芬兰最少有76处苏联战俘将士墓地，他们都死于1939年年底以后的芬兰集中营。

苏联于1939年10月31日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众所周知，我们的邻居沿着距列宁格勒仅30公里的卡累利阿地峡边境线修筑了以强固著称的马涅尔盖姆防线。苏联政府要求在边境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将边境移至离列宁格勒70公里处，并在领土上作出极大让步，以换取拆除距边境很近的海军基地。建议以卡累利阿的5500平方公里交换列宁格勒附近的2700平方公里的领土。谈判艰难，未取得预期成果。

11月29日，苏联利用边境事件，撕毁同芬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军大部队越过边界。对芬兰战争共投入部队45万人，1000辆坦克，1700门火炮，800架飞机。

直到2月底，苏军才得以突破敌方防线，占领维堡。仅在拉登·勃尔基城下，芬兰军队就歼灭了红军两个师的兵力。深入到日托米尔附近的第44"乌克兰"师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0年3月12日苏联与芬兰之间签订和平条约，结果，列宁格勒以北的边境移到了维堡以后一线。多年以后，我们的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我看来，几年前苏联媒体援引的一个文件颇为耐人寻味。严格来说，将其称作文件是有条件的，只是考虑到一个不无重要意义的情况，即它涉及到至今尚未公开的"贝利亚案件"的有关材料。在对我父亲这位原内务部长的无数指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贝利亚要求他的亲密助手们不仅对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历史，而且包括战前年代的事件进行全面审查。他大肆嘲笑在对芬兰战争中所采用的方法，说什么，如果斯大林听从他的忠告和建议，这场错误

的战争就完全可以避免发生。而既已开始了作战行动，仍然需要听他贝利亚的，按照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计划进行军事行动，这样就可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我父亲从不认为自己是军事专家，他也没有将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强加于斯大林和那些军人们。至于说那场战争可以避免，这是对的。甚至是开战以后，苏军仍可不致遭受那样重大的损失。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对一个事实保持缄默：没有任何必要对马涅尔盖姆防线实施突击。我父亲报告说，芬兰海岸线没有掩护的，只要投入足够的登陆部队即可……顺便提一下，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在这一点上支持他。很可能这也是海军人民委员的思想。我对此不拟加以评论。

敌人既无像样的海军，也无空军。总之，我父亲认为，从海上登陆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战役必须速战速决。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部队对芬兰人实行的短兵反击防御战毫无准备。

我父亲已掌握情报，说法国人和英国人为支持芬兰回击我们的入侵，已准备好 100 个有上千人的军团。其中一个军的计划用于北部侧翼，另一个应从近东进击高加索。斯大林收到这些报告材料之后说，应尽一切方法结束战争，但应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指的是必须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

苏芬冲突不仅使我们未来的盟国，而且也使德国人受益。顺便要提及的是，此时英、法、德三方会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历史学家们今天不知为何对此事总是不愿谈起。

然而，英、法政府联合反对苏联的决议并未付诸实行。战争在这之前就结束了。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后来反对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永远不再拥有一个友好邻邦。这将是一个为恐惧所左右的国家，只有靠强力才能使它和

我们保持在一个联盟之内。我们同芬兰的关系，还有与其他邻邦的关系，应该完全不是这样的。

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存在到1956年的夏天，当然这无助于我们同芬兰之间的相互理解。

1940年度最后一周召开的红军最高司令部会议的完整速记记录不久前才解密。在这次会议上对芬兰战争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但国家领导人做出基本结论要早得多。苏芬战争使斯大林极为震惊。他终于认清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是怎样的人了。他不仅将他撤职，而且还想要剥夺他的一切职务。

经常有人说斯大林权力无限，但事情并非如此。他不是万能的。他不能不考虑各种情况。

伏罗希洛夫在人民心目中是内战时期的英雄。年复一年形象已经固定，斯大林不想毁掉它。他认为，在他周围应该有一些俄罗斯人，而伏罗希洛夫以其出身履历正好符合这一需要。

"他是个傻瓜，这我们知道，"斯大林不止一次在小圈子中说，"但整个国家不知道这一点。"

芬兰战争不仅使红军领导人发生了诸多变动。根据此次战争的经验，立即通过了建立坦克军、制造新式武器装备的决议。开始要军队认真为打一场现代战争作准备。不仅是斯大林，就是军人们本身都相信：苏联对实战还完全没有作好准备。

而时间是不等人的。当"巴巴罗萨"计划放到我父亲面前的时候，总参谋部的代表们也立即被请到了卢比扬卡，要求对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这些材料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都曾受到舆论的大量关注。军人们争分夺秒，立即动手翻译文件，将进攻计划标在我们的地图上。华西列夫斯基率领他的人在朱可夫的监督下从事此项工作。当然，斯大林不仅知道存在这个计划本身，而且也知道进攻的日期。

我父亲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两位

局长一起将希特勒第21号指示——“巴巴罗萨”计划放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诚然,德国人的进攻日期后来有所变动,但计划本身却没有变。因此,如舆论所言的出人意外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在等待着战争,在为战争做着准备。

大约在战事开始前一个月,我和父亲一起来到喀朗施塔得。父亲此行的目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个海军基地我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只是看不到那艘德国潜艇。我没有到艇上去过,但清楚地记得它就停在海军码头,有警卫站岗。潜艇有扫雷舰挡着,使其无论从海面还是从岸上都无法被看到。

起初,和德国潜艇艇长会谈的有我父亲和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参加者还有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列尔,他战前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海军总参谋部部长、海军副人民委员。第二次会见在我父亲和德国军官之间单独进行。后者通报说,在他的艇上有一份作战命令包(我不知道当时打开过没有),战事开始后他就立刻启封。他说,战争最初几个小时他要巡游的水域已经确定,一旦遇到敌人——苏联海军舰艇,他就要放鱼雷实施攻击。

他向我父亲报告说,在战争开始前的一或两天,所有的德国船只将驶离苏联港口,而苏联船只将被扣押在德国港内。当我父亲将这一情况向斯大林汇报之后,他命令不要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第二天我和父亲回到莫斯科,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库兹涅佐夫在其回忆录中对德国潜艇进入我海军基地一事只字未提。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位潜艇艇长及其艇员们命运的任何消息。真是一段奇怪的历史。

我们的海军如何迎战已众所周知。我已说过,是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的海军。

摘自官方资料：

苏联海军上将、苏联英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生于1904年。从1919年开始在海军服役。20—30年代为黑海海军“赤色乌克兰”号巡洋舰值班舰长，海军科学院学员，“红色高加索”号巡洋舰舰长第一助理。1936—1937年为驻西班牙海军武官和海军首席参赞。战争前几年先后任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司令、海军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

1947—1948年为海军学院院长。1950年2月之前任远东海军武装部队副总司令。

1950—1951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51—1955年任海军部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1956年2月退休。1974年逝世。

他和我父亲志同道合。他是个极富魅力的人，令我倾倒。经常来我家作客。

他的红海军战士生涯始于北德维纳区舰队。35岁时就统率海军人民委员部。他才能出众，极有天赋，是个名副其实的海军统帅。我还记得他和父亲关于舰队未来前景的谈话。俩人都非常清楚，要建立航母舰队我们还力不从心，但是他们知道，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舰队是必须的。战后，他们一起研究制定了建设苏联海军规划，许多方案都得以实现。我父亲却没能活到这一天。可后来按照赫鲁晓夫及其周围人的命令，将战舰切割为废钢铁[1]，库兹涅佐夫得以成为这一鲁莽行为的见证人。

他是个非常坦率的人。如果他不喜欢某个人，也从不加以掩饰。比如，他丝毫不尊重伏罗希洛夫这位军事领导人。

---

① 赫鲁晓夫认为苏美都拥弹道导弹后，军舰只能成为活靶子，已没有用，所以主张发展火箭部队，而裁减海军。——译注

克里姆林宫的上层完全遵循着另一种生活准则。如常言所说，在那里要有城府，深藏不露，不能凡事一往无前。要善于等待，培养自己的拥护者等等，不一而足。而库兹涅佐夫是个直爽的人，经常锋芒毕露。显然，他的宦海浮沉都不是偶然的。

斯大林喜欢他。他是个意志坚定、才华横溢的人。因西班牙战争而对他牢记不忘的水兵们向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他们说，在最为复杂的情况下他都能够镇定自若。他在战争爆发的初期表现就是如此。到处是损失，而他的舰队的全部舰只却完好无损。

天有不测风云，此人的命运也急转直下。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们搞了个小发明，一种舰载速射炮。我们的设计师在这方面起码比我们的盟国要早 10 年。有一次在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会见中，库兹涅佐夫不经意地将这门炮作为礼物赠给了客人们。他们赠给我们整艘的战舰，而我们回赠的不过是一门炮。

到这时候，我父亲和国家安全机构还没有任何关系，不然的话他当然不会把汇报库兹涅佐夫的材料上报。而那些"好心人"却努力以适当的方式使斯大林得知了此事。于是，这位上将被降衔、撤职。

第二次撤他职已是赫鲁晓夫了。他不能容忍海军被慢慢地毁掉，这是他的事业，他的整个生命。这位勇于战斗的上将对最高首长的想法全都传到了中央委员会。这样，库兹涅佐夫又得"走人"。

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加列尔上将的命运则更为悲惨。1948 年为他编造了一个"案件"，指控他向国外传递秘密情报。1950 年他在喀山监狱含冤而死。

领导海军的就是这些人。战争爆发前几天，库兹涅佐夫上将就命令所有大小舰队进入二级战备。6 月 21 日下达了整个海军转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敌人对军舰和海军基地的第一次袭击很快被击退，没有一艘战舰失去战斗力。

虽已事隔多年，但是，和所有同代人一样，我还清楚地记得1941年的那个夏天。战争没有放过我的家庭。战前我幻想进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认真地准备了功课，但是1941年的毕业生们已顾不上这些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我就和朋友们跑到了区团委会。“我们要上前线！”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当说到我的姓氏的时候便卡住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全知道了。

“这样决定对！”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妈妈也表示赞成。这样，我便进了莫斯科郊外的情报学校。我德语很好，又有报务员初级技能资格认定，因此，没有什么特别难题。那些不懂报务的小伙子们就要难多了。

我们是速成训练。射击，定位行军，体能训练，跳伞，译报码等等。

我们任何人连想都没有想到过，11月7日会像通常一样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早晨6点钟，整个情报学校全体起床，开赴莫斯科。我被编入陵墓旁的警戒部队。那场面对学员们来说是非常惊人的。德国鬼子兵临城下，而这里却在阅兵。

11月底我们已在波罗的海海面上空作超低空飞行了。我们这一组应当空降在德国境内佩内明德地区。现在得知，那里坐落着冯·布劳恩的导弹中心。顺便说一句，我的德国同行者已把图例画的非常精细。作为报务员，我该做的就是向总部发送关于实验新式武器的情报。

我们已准备好向下跳的时候，机组人员通知说：“我们返航：雾太大。”

第二次尝试仍然没有成功。飞机飞到指定地区，但收不到地面发出的信号。不知为什么飞机落在了喀山，并且由于失误还毁坏了起落架。于是，我们组乘坐另外两架飞机被送回了莫斯科。

很快我们便得知，我们将全员被投到南方去。去哪里？为什

么？没有答复。这类事情一般是无需讨论的。

我们当然知道，不会是飞到那里休息，但仍然疑虑重重。要知道，我们大家是受训在德国北部地区工作的。但是，首长们显然有自己的打算。而无论如何我们也没有猜到，通过伊朗也可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

莫斯科准备进行防御战。在动物园内部署了100毫米大口径高射炮。起义广场、花园环路和马洛尼基茨科伊街我们家的院子里满布着爆炸后的炮弹的碎片。空袭的时候，父母当时如果不在班上，就会躲到屋子里去。像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去防空洞躲避，因为附近根本就没有防空洞。

告别了亲人，我实际上是离开了濒临前线的城市。外交人民委员部、外国使馆及部分机关都疏散到了古比雪夫。斯大林命令从莫斯科驱除所有多余（他是这样表述的）的人想法。同时，为防务进行生产的工厂一个都没有疏散，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的所有必要的机构都在继续坚守岗位。诚然，一部分人是走了。读者一定会猜得到，他们是“服务于”外国外交官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继续撤退的可能性任何人都没有想过。与传言相反，斯大林立刻对军人们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交出莫斯科！”

是的，在斯大林的圈子之内就有人“出于真诚的善意”建议斯大林暂时离开首都一段时间。

“您必须马上走，”大家这样劝道，尤其是谢尔巴科夫。他是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他当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顺便说一句，他给军界带来的危害和臭名昭著的列夫·梅利斯几乎不相上下，尽管我可以毫不隐瞒地说，他给人的印象颇佳。

斯大林的反应是：他仔细地看着他们几个人说：“我看你们就像一群白痴和恶棍。不过，我还是照旧把你们当成傻瓜放在原来

的位置上好些。”

对那个谢尔巴科夫他没有认真理会，他知道每个人的分量。

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才从妈妈那里得知，斯大林在那段日子里来过我家。正赶上城市轰炸，他请求给他一杯茶喝。他坐了一会儿，不等空袭警报解除就走了。据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进过任何防空洞。

他是个个性极强的人。他认为，如果有他的命令不允许敌机飞临莫斯科，那么，事情就应该如此。

1953年之前，写战争本身及其结局的文章不像后来这么多，但总还有些文章出现在报刊中。比如，有关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8个师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材料就曾一度刊登过。这些被用来实施突破的队伍在一系列地段上扼制了德军的进攻。现在对此一般已讳莫如深，不再提起。原因很简单：内务部队的这几个师系属于被指控犯有滔天罪行的那个部门。

这些誓死捍卫莫斯科的人究竟错在何处？难道只因为他们参战不属于正规军系列？

一次，我看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第150团一批特工人员为保卫莫斯科郊外几个极为重要的据点而牺牲的材料。1941年12月28至29日夜间，在莫斯科州奥金佐夫区丘普利亚诺沃镇，该团四个特工小组成功地穿过德军警戒线，前往该地区执行战斗任务。奥夫恰连科中士、济马和纳雷什金两个少尉、斯特留科瓦特中士及其所部应在几个地方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并获取一系列有关情报。而在黎明时分，他们全部陷入埋伏。于是，便发生了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

直到70年代中期才把这些牺牲者移葬到明斯克大路的阵亡将士墓内，但是，纪念碑上既无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为他们竖立方尖石碑。据说是不知道英雄们的名字。一句托辞，搪塞了之。可是，谁的遗骸安息在莫斯科郊外的地下我们是知道的。这些特工

军人多数是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人，也有不少人来自乌克兰。比如，尼古拉·奥夫恰连科来自第涅普罗彼特罗夫斯克州，红军战士费多尔·利托夫琴科、德米特里·索切耶夫、费多尔·奥列伊尼克是他们的指挥员，来自尼古拉耶夫州的尼古拉·博罗杜里亚的老乡；阿列克谢·托茨基来自扎波罗日州。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对缅怀历史纪念物态度问题。

这当然仅是一个例子而已。成千成万的内务部队官兵参加了首都保卫战，前线士兵都知道他们同敌人是如何战斗的。而且，绝不仅此一地。请回忆一下内务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想到这些英雄的功绩今天有意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令人感到痛心。

边防师团在莫斯科城下之战中的英勇表现也毫不逊色，对此今天同样鲜为人知。究其原因，这仍不过是因为边防军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

这些兵团装备精良，配备有反坦克武器。它们从远东调来参战，形成一个内环防御线，并在莫斯科郊外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德军在数处突破第一道防线而冲向莫斯科时，几个危险的方向正是由这些兵团作掩护的。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对内务部队在首都防御战中的作用都评价颇高。在其他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也可以读到对内务部队的诸多溢美之辞。换言之，这支部队对我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永远不容置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今天如此拙劣地篡改历史究竟用意何在。

我从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本人那里得知很多关于那些日子的事情。朱可夫从列宁格勒被召回之后，他便成了我家的常客。在 3 至 4 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和我父亲一起吃饭，并且经常就住在我家。1941 年的秋冬之际朱可夫的指挥部形式上是在莫斯科城外，对此多有描述。朱可夫本人就在其回忆录

中写道："我打电话给最高指挥部……""斯大林给我打电话……"。事实并非如此。朱可夫在莫斯科几乎寸步不离，他从首都向各处发布命令，指挥军队。因此，斯大林无须给朱可夫打电话，有事直接问他即可。

战后，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向我讲述了他去前线的情形。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从突破口乘车出去。后来俩人回忆道，当时形势十分紧急。例如，德军从某个防御地段冲了进来，而他们面前已没有一个人，也没有防御工事。事态就是这样。

每当话题涉及到1941年秋冬之际的时候，无论是父亲还是那些高级军官，总会亲切地回忆起边防战士、内务部队的官兵们。我父亲总是不无自豪地谈起他们，我非常理解他。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也非常清楚这些生气勃勃、装备精良的师团的价值。他们二人不止一次亲眼目睹了这些部队的实战表现。

既然我谈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那么，我就还想提到一件事。我认为，说出真相是我的道义所在。今天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一个人对这一事实进行思索。德军在几个防御地段突破，一直冲到纵深15公里左右，但是，莫斯科市内敌人的间谍却未能成功地实施一次破坏活动与之呼应。信号员当然是有的，但都被很快抓获了。原来，全城被划分为许多方块，一有情况便可瞬间收缩包围圈。

最近几年，关于1941年秋契卡人员从莫斯科落荒而逃的文章连篇累牍，说内务人民委员部从战事开始便撤离了。我已说过，甚至连撤离的计划都不存在。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莫斯科，他即刻被罢免解职，并作为一名列兵被派往前线。没有一个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局长擅离莫斯科，也不可能这样做，为什么要冤枉这些人呢？相反，为了使希特勒的特工机构在后方各处的间谍活动陷于瘫痪，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除了莫斯科，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尽管破坏活动在我

们后方不能完全避免。例如,列宁格勒市的巴达耶夫仓库被烧毁,此事社会各界无人不晓。但是,同样鲜为人知的是,还在封锁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便屡次警告州党委会,这样大批的粮食储备不能存放一地。遗憾的是,日丹诺夫对契卡人员的一再要求不予理睬,粮食一直没有分散保管。这对这座围城造成后果如何,已众所周知。

只是奇迹救了日丹诺夫,使他当时免于受审。斯大林当然知道一切,因这一过失完全可以不放过日丹诺夫。但他迁怒于伏罗希洛夫。众所周知,后者在列宁格勒所做的蠢事更多。

应当说,德军那几个月的行动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并非秘密。关于德军和芬兰军队共同计划合围列宁格勒这一点是早就非常清楚的。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都知道敌人准备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关于希特勒分子在莫斯科城下行动的情报材料也作了报告及时,只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这一珍贵情报而已。那个以悲壮闻名的列宁格勒包围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也是往日战争中令人痛心的一个实情……

我有意识地避而不去细谈战争初期阶段的有关情况,尽管我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领导人那里知道不少。这方面的著述已然很多,我毫不怀疑,当我们了解了今天解密的近几年的文件之后,此类文章还会更多。但是,我想纠正一下某些以讹传讹的"寓言故事"。比如,无论我怎样憎恶日丹诺夫,我仍然不能相信他在封锁期间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盛大宴会的说法。没有此事。我这样说不是为日丹诺夫或其他某个身处列宁格勒围城中的领导人开脱。不幸的是,我们今天经常从现在的观念出发来看问题。请诸位相信,当时一切要严格得多。问题还不在日丹诺夫本人。他那里敢于试图去做出这类事情……

固然军队的食品配给不是被围城市中那种食品配给。但仍然是配给。每人只有一份,不能再多。说当时上乘的水果和上等葡

萄酒摆放在洁白如雪的桌布上，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显然，也无需再把多余的罪恶算在日丹诺夫身上，他自身固有的就已足够多的了。在作战部队中，在各军各兵团参谋部里，当然各种情况都有，这不是什么秘密。那里可更放纵自己，不受拘束。但这也只是偶或为之，这没什么秘密可言……

还有一个神话，说斯大林对前线怀有莫名的恐惧。就今天我们对斯大林所了解的有关情况而言，我应当予以反驳的是：最高统帅到过前线。

事情是这样的，最高统帅有一次去前线也有我参加。斯大林在保卫莫斯科时期共有两次视察前线。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出行的组织本身，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提前作过计划。例如，有一次当他去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区时，他突然召来朱可夫和我父亲，通知他们说，他那天打算和他们一起到前线的一个战场上去。我再重复一遍，事先没有丝毫准备。我本人不止一次地确信，他在这方面是个奇特的人。

父亲和朱可夫当然非常清楚，斯大林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他有一条铁的原则：除个别情况外，无论何时他都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打算做什么。很可能，他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这无疑是绝对正确的。

这里没有自我标榜之意。毫无疑问，对于莫斯科的保卫者来说，就是对整个处于战斗中的国家来说，最高统帅视察前线都是一件大事。如果斯大林愿意的话，宣传部门会像应该做的那样为他颂扬。但按我的理解，斯大林对此根本就不需要，很明显，他另有考虑。不管怎么说，报刊对他的这些视察都未报道过。

当最高统帅准备前往沃洛科拉姆斯克区的时候，除了他的私人警卫，参加护卫的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团的两个连。我记得一个连在前方开路，第二个随行担任保卫。

我和我的无线电台在随行的一辆车里，斯大林、我父亲和朱可

夫去的指挥所我没有去。

最高统帅在指挥所里停留了一段时间，查看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我们便返回了莫斯科。到那里的时候我才得知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前线视察。原来在前一天的夜里，送给他的侦察报告材料显示，敌军正准备对莫斯科实施最后的攻击，已在前线这个战场上集结了大批坦克部队。后来查明，敌人已不打算作任何的进攻。在往日的战斗进程中德军已消耗殆尽，此时已无准备力量进行大规模进攻战役。斯大林当场确信这一点后，就命令返回首都。

走和来一样，没有多余的排场。斯大林穿着那件军大衣，没有区别标志，戴着有护耳的普通帽子。他一坐进汽车，我们便动身出发。以后，在类似的场合下我没能再参加护卫最高统帅，虽然在部队里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出行。这些出行有些属实，有些则是明显的虚构。

有些历史学家肯定说，斯大林"于 1943 年 8 月初视察了当时未采取积极进攻行动的西部前线"。这只能令我感到惊奇。他们同时肯定说，在离真正的指挥所百公里之外专门为最高统帅构筑了一指挥所。应当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全。

当时，1943 年我，正在列宁格勒，但我知道历史学家们指的是哪一次出行。斯大林和我父亲以及部分军人确实一起去过一次前线，当时我们的部队正在进行重新部署，并准备展开大规模的进攻。除此之外，其余内容都是杜撰出来的。不像现在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没有构筑任何东西，其中也包括指挥所在内。像前几次一样，这次视察也未作宣传报道，否则便会留下纪录片，报纸会刊登图片。相反，这次最高统帅的出行秘而不宣，斯大林的去和回都很突然。和平时一样，对出行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斯大林在这方面可谓始终如一。

这样的事对前线绝对保密是困难的。但是，当这一消息在部队里传开和为敌人所知我完全认为有此可能时，斯大林早就已经

离开了指挥所。因此，我认为他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

关于战争的传奇故事本身并不可怕。什么样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在前线流传！这些都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士兵的传言”对有些事情加以美化，对某些事件的解释也有偏差。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再炮制这类玩意，这起码有失体面。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已经不只一个10年了，我们的国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一直小心翼翼地不予公开。在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国家或其他方面的重大机密？

三、卫国战争中的国防委员会委员贝利亚和苏联内务部队

摘自百科全书《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 “国防委员会苏联非常最高国家机关，战时集中全部权力。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1年6月30日决议成立。最初组成人员：斯大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后来成为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有布尔加宁、沃茨涅先斯基、米高扬。……国防委员会每个成员负责一定范围的问题。”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后来又加上布尔加宁、沃茨涅先斯基、米高扬。

我们发现，在所有的历史资料中，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教科书在内，都是这种说法。我们大家在改革时期的公开性年代里一直齐心协力为历史真实而斗争。但我们又如何把这一点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呢？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国防委员会的决议

鉴于所形成的非常局势和为充分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全部力量以反击背信弃义侵犯我们祖国的敌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

1. 成立国防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斯大林同志(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副主席)，

伏罗希洛夫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2. 集中国家全部权力于国防委员会。

3. 要求全体公民和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及军事机构无条件执行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加里宁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克里姆林宫，1941年6月30日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中为什么没有一行文字谈到国防委员会委员贝利亚？

与此同时，就是在这部叙述战争的百科全书中却有关于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的大块文章，并配有图片。还有关于他的一些实施改革的亲密战友、数十位其他党务工作者的文章。委婉些说，他

们甚至都未曾参加过战争，与保卫国家毫无关系。

虽然在战争年代我到过前线各地，但在我的记忆中，保卫高加索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父亲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那里，而我和总参谋部的一批军官前往北高加索，直接隶属于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作为无线电台台长，我和他后来共同参加了在那一地区进行的所有战役。无论是职位，还是军衔一中尉，都比较低微，但我当时见识颇多。我负责保障北高加索前线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由于职务关系，使我得以走遍战场上最为关键的地段。因为什捷缅科是个精力老师的人，什么事情他都要亲眼目睹才感到稳妥。

在此之前，我们的情报机构获悉，大本营也应已知道，克莱斯特的坦克兵团将不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开赴斯大林格勒，而是转向高加索。同时还获悉，德军将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作战。显然，大本营担心敌人在这一方向上的挺进，这样，石油产地巴库便面临着被攻占的危险。情报机构报告，德军的意图并不以此为限，希特勒军事指挥部计划要突破进入伊朗。

起初，敌人实现自己的计划非常顺利。出乎大本营的意料，战役发展迅速，我们在前线数次失利（哈尔科夫、罗斯托夫）之后，敌人得以推进到山地边缘。我父亲抵达那里的时候，这一战场上便是这种令人忧心忡忡的局势。德军已经突破南方战线，实际上已遇不到真正的抵抗。

我们乘坐我父亲的飞机飞离莫斯科。有什捷缅科，他当时已是上校，还有博金中将，另外还有几位军官，由于年代久远，我已不能全都记得了。

前一天夜里，我收到一台通讯仪器。后来我见过美国和英国的无线电台，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较之盟国的仪器更为优越，一般来说，我以前接触的也都是这种设备。他们告诉我，这种轻巧便捷、性能极为稳定的无线电台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专门实验

室研制的。我要说，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同这种苏联设计师们制造的仪器打交道，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不比西方研制的逊色。

四、贝利亚指挥保卫高加索

在向目的地飞行过程中我就已经知道，父亲是临危受命组织防务，扼制德军突破到里海油田和进入高加索。正在迫近的灾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局势已经失控，需要采取断然措施，任何迟疑，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在莫斯科起飞前几小时，父亲就命令集中前线各地的格鲁吉亚族军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而是像团长这样中等级别的军官。父亲认为，这些人作战经验丰富，熟悉地方环境，在部署部队保卫高加索方面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令人惊奇的是，和我们一起乘飞机的就有几位这样的军官，当时执行上级领导人的命令就是这样雷厉风行。

在飞过巴库上空的时候，麻烦来了，飞机突然起火。多亏父亲私人驾驶员格拉切夫上校的技能高超，得以在空中将火焰扑灭。夜里，我们在第比利斯顺利降落。

战争前夕离开格鲁吉亚首都，我当然没有料到有一天会身着军装回到这里。但是，那时顾不上儿时的回忆，我们小队马不停蹄，立即奔赴莫兹多克，通往该地的要冲地带战斗已经打响。

边防部队司令、副内务人民委员马斯连尼科夫上将已在那里等候我父亲的到来。根据我父亲的命令，在此前不久，他和部分边防军人被空运到这一地区。这些边防军既无坦克，又无反坦克炮，却要挡住克莱斯特坦克军团前进的道路。

我出席了北高加索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会议。我们的无线电台就布置在隔壁的房间。记得当时的办事效率极高，开门见山，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几乎一切问题都在瞬间处理完毕。我们将作

出的决定编成电码，并立即发往莫斯科。显然，有些决定必须要取得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同意。

还在莫斯科的时候，父亲便与斯大林约好，将因与英国抗衡而派往伊朗的部队撤回苏联，用于保卫高加索(战争伊始丘吉尔就建议部署英国军队保卫高加索。斯大林拒绝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事后我们将无法让这些部队彻走……"按照他的命令，以前部署在高加索的两个军被投入到相邻的伊朗)。从"伊朗"部队撤回的独立机动反坦克兵团需要10天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而这段时间需要顶住。我重申，对当前防务来说，力量明显不足。

父亲认为首要任务是封锁山隘道口，边防部队和一个山地作战步兵师立即分头实施，还吸收了体育学院学登山运动的大学生参加。总之，狙击敌人的屏障终于建立。无论如何，德军再也不能指望不受阻挡地进行突破了。

我不再复述，读者可以从回忆录中去详细了解那些事件，我要说的只是我认为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的某些细节。

当时的部队对无声武器尚无概念，而在所述事件发生前不久特别设计局已将这一技术研制成功，用于消音的是安装在步枪上的一个装置。正是参加高加索保卫战的部队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了这一秘密武器(特工机构获得这种武器当然要早些)。

当时军队还获得了一种新式武器，由边防军和军事特工组成的几支队伍配备了红外线瞄准器，记得和消音器结合使用效果极佳。

前线战士清楚地记得，德国人做事一向刻板：在一支队伍向前移动之前，必须有军事侦察队在前面开路。其人员组成有若干具有一定级别的军官——炮手、工兵、坦克手、飞行员，此外还有报务员和必不可少的护卫队。当时就是如此。没有一个坦克纵队向前移动时不配备精良的侦察队与空中保持联络。和敌人一旦交火，

护卫队即刻投入战斗，而后便是坦克向前推进了。

我们决定利用敌人行动刻板这一弱点。在希特勒军队可能推进的地带一昼夜设立约500个伏击点。他们后来的行动规则是这样的。由军官组成的军事侦察队在前进100至150米之后便被干掉了，而没有他们德军就不再向前推进。那些日子从这些侦察队中成功地俘虏了30人。我记得，克莱斯特军队因此而丧失共计近2500名军官，我们却得以赢得五六天的时间。

直到从惊慌错乱中恢复过来后，德军指挥部才投入坦克，但为时已晚。从伊朗撤回的部队开始向前推进，并在这一地区投入了数十辆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的坦克。

敌人在数量上仍占优势，但进攻速度已得到扼制。德军在战斗中受挫，仅在莫兹多克城下便丧失近百辆坦克。

整整两周时间，在德军没有停止进攻、局势未稳的情况下，父亲一直呆在那里。当确信防御已有保障之后，他才前往新罗西斯克。后来，以父亲的副手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为首的北高加索集团军在敌人的进逼下稍有后撤，但敌人按计划进至符拉迪高加索的意图未能如愿以偿。

南方战线的形势更为令人忧虑。方面军指挥部完全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士气极为低落。征得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同意后，父亲当即解除了方面军司令谢苗·布琼尼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一大批应对战线崩溃负责的人的职务。斯大林赞同这一决定，因为他本人也相信方面军领导人没有能力对敌人组织应有的还击。

我见过布琼尼，当时他精神沮丧，意志消沉。当我父亲来到他那里时，他开始劝说："没必要保卫这些桔子林，该撤离了！"父亲虽然知道作为军事首长的布琼尼元帅为何许人，但仍感到吃惊，方面军司令竟不能清楚地讲出每支部队所处方位和它们的指挥员是谁。当他向我父亲报告情况时，他立即明白了，他脑子里空空如

也，无话可讲。父亲中断谈话，开始召集各级军事长官，以便弄清那里的实际情况。

当即制作了一张军事作战地图，我当时也在场，而布琼尼元帅心不在焉地坐在旁边。在我看来，他完全不能明白大家谈话的内容。

1941年9月朱可夫在列宁格勒大概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和后来的布琼尼一样，伏罗希洛夫证明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生活现实表明，这些权威都是华而不实的。两位元帅没有受过打现代战争的训练。

全面分析局势之后，并征得莫斯科的同意，父亲决定建立两个独立的集团军。此前采用的统一方面军证明是错误的。

父亲当时任命两位年轻军官为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员，按我当时的理解，俩人都以其专业知识和果断精神给父亲留下了良好印象。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列谢利泽、未来的上将、苏联英雄、在战争开始时是上校，炮兵团团长。在西部战线、外高加索战线作过战。46集团军之后，他还指挥过第47和18集团军。1946年去世。

父亲提拔的第二位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后来指挥过几个集团军，曾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副司令，战后先后担任基辅军区司令、驻德苏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晚年担任国防部长职务。而这位未来元帅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迅速上升正是始于我父亲对他予以赏识的时候。

我不想说假，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许多人，有非常多的著名人物的上升都应感谢我的父亲。对其中一些人的提升他关注一生，我毫不隐瞒地说，在必要时，他便尽其所能地予以帮助。我不拟使人相信，后来无一人背叛我父亲，很遗憾，这样的事是有的。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没能起而公开反对全

部谎言，但在他们的记忆中始终保有我父亲的位置。这样的人在军界也有不少。

和当时所有善于思索的领导人一样，父亲非常清楚，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之流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部队和指挥部需要完全不同素养的人。他善于挑选干部，这一点官方宣传工具也不否认。不少文章说他总是让忠于自己的人围在身边。这是谎言。对我父亲来说，事业永远是主要的标准。了解并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油嘴滑舌的人和平庸之辈是不需要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都恪守这些原则，我不止一次确信，对天才和狂妄之徒的惊人鉴别力从未使父亲误入歧途，导致用人不当。这在与军人、学者、特工打交道时都是如此。

我们在新罗西斯克地区逗留两周，而战斗就在市区内进行。按通常标准衡量，两周时间不长，但战争期间每个小时都很宝贵。父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我还记得他刚到南方方面军司令部时进行的一次谈话。父亲对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深感兴趣。当即弄清楚，原来在战士人数上我们足足有余，但很多人都是在第二梯队。报告说，他们是从第一梯队渗透过去的。有什么办法，战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可是，军官到哪里去了？总之，有些人受到了严厉处分，而秩序却因此得以恢复。

我还记得第一次前往隘口的情景。和父亲同行的有一批特工军官，其中就有未来的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和著名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谢洛夫上将。当我得知他准备前往隘口视察，我就请求我的顶头上司什捷缅科上校，哪怕只批准我一昼夜的时间和谢洛夫一起前去隘口看看。什捷缅科批准后，我们便乘飞机抵达苏乎米，从那里再乘坐吉普车和骑马去各处隘口。

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战线处处长的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陆军大将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战事最为激烈的克卢霍尔和马鲁赫隘口，有几行专门描写封锁敌人道路的当地居民。

我永远不会忘记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深情怀念的那些人。我，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军官也非常清楚，在高加索，诸多方面都要依赖当地居民。我当年18岁，受过很好的体能训练，当我看到肩负战备物资、粮食走在队伍前面的那些老人时，我感到很吃惊。这种活连年轻人都会感到吃力，而这里却都是些老年人。一段时间过后，这些地方的居民也被指控通敌，而被迫远离故土，强迫迁移。这也是战争中令人痛心的事实。

由于山地地形特征，完整的防御战线是不存在的。我们有某些火力点，德军也有一些火力点。火力控制区域也这样。基本上双方都着力于干扰敌人的弹药运输。而在这方面许多事情需要依靠高山居民。

组建新的有战斗力的兵团大约需要两周时间。在此期间改组了后勤部队，为列谢利泽和格列奇科的集团军划分了战区，为军队配备了武器装备。

我们此行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巴库。此时，德军打算突破并穿过卡尔梅克草原，以期进军中亚。当时决定，如果敌人某部果真突破成功，就在杰尔宾特和马哈奇卡拉方向重新设置屏障。

在这里，我不仅有幸见到了忙于战事的我的顶头上司什捷缅科上校、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博金中将，而且还有和我父亲关系非常密切的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秋列涅夫陆军大将。

摘自官方资料：

伊万·秋列涅夫，陆军大将，苏联英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二战前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41年起任南方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战后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并在苏联国防部中央机关中任职。1955年起在苏联国防部总督察组任职。

1978年逝世，享年85岁。

秋列涅夫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多年，因此，他和父亲早就认识。后来他也被调到了莫斯科。

我记得，他们当时面临需要合力解决的共同任务之一是组织对空防御。当父亲抵达高加索时，德国空军的出动还不甚频繁，但不难推测，局势将会发生变化。

“即使我们能够迅速挡住德军，他们也不会放弃轰炸我们产油区的企图，”父亲当时这样说。

米哈依尔·斯捷帕诺维奇·格罗马金将军直接负责组织对空防御。后来他获上将军衔，指挥防空部队，此后重又主管国家整个对空防御。而当时他是防空部队副人民委员，负责指挥防空部队。

当德军企图轰炸油田的时候，没有一架轰炸机能够飞抵目的地上空。只有单个的侦察机能飞过来，但距离地面非常高。我起码没有听到过有关德国作战空军的成功飞行。我记得，从伊朗调来的武器装备极为有效实用。

严格禁止在有坦克进攻危险的方向上布置用于防空的大口径火炮是极有远见的。有人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显然也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使产油区失去空中保护。事实肯定了高加索防御战领导人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明沃德地区数量众多的防坦克壕，这是当地居民的杰作。今天有许多文章叙述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但我亲眼目睹的却是这些哥萨克对德军坦克的迎击。也许，哥萨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要这个政权，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是他们更仇恨德国人。

有人会反驳我说：如是这样的话，对在德军方面与我方作战的哥萨克营又当作何解释？懦夫、叛徒以及普通老百姓，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新编的军队之中的这样的人不仅只在哥萨克中有。几百万人被俘并非自愿。一部分人忠实于军人的使

命、誓言，意志薄弱者则反过来同自己人作战。哥萨克也是这样。但是，请注意这一事实：德国人竭力在各个战场上，在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利用这些新军，只是不在俄罗斯。我完全可以设想，德国人不是很信任这些"志愿者"。而他们自己也拒绝开赴东部前线。

摘自官方资料：

到1943年年中，法西斯分子组建了90个高加索和中亚人组成的营以及约90个"俄罗斯营"和哥萨克营，每营人数400—500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这些分队的基础上又建立第15哥萨克讨伐军，总人数为18000，其中三分之一是德国军职人员，近5000人是白俄。还建立党卫军"汗沙尔"第13穆斯林师、党卫军"加利奇纳"第14师、第29和30俄罗斯师、党卫军第20爱沙尼亚师和第15及19两个拉脱维亚师。

当俘虏，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件可怕的事，这样严酷的考验便落到了我的一个表弟的头上。战争开始的时候，泰穆拉兹·沙夫基亚在波多利斯克机枪学校学习，和许多学员一样，1941年的秋天他受伤被俘。当德国人开始组建民族新军的时候，他便成了这种队伍中的一员。有些人自愿加入这类新军，有些人是被强迫参加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希望借此脱离战俘营，并回到自己一方去。

初时，德军打算让这些人在苏联后方发挥作用，将他们派到库班。沙夫基亚所在的那个营被派遣到法国，那里聚集了大批这类新组建的军队。泰穆拉兹·沙夫基亚和被俘的同志们一起跑到了法国游击队一边。德国人决定不利用留下的"志愿者"去攻占高加索，而是派到离祖国远一些的意大利。但是，在那里同样有大批人投向游击队。

没有一个这样的营开赴高加索作战。在意大利，和在法国一样，我们的战俘勇敢地同敌人战斗，许多人当了游击队长。战争期间还有一件史实也曾多年讳莫如深：格鲁吉亚侨民与占领军积极斗争，并在很高层次上与戴高乐抵抗运动保持着联系。这些人立刻开始援助苏联战俘。

法国解放以后，沙夫基亚和数量众多的其他人一起被遣返苏联。和所有的原战俘一样，任何亲属关系都无能为力，泰穆拉兹·沙夫基亚在经过数月的相关检查之后才回到第比利斯。

我有机会读到一份材料，说泰穆拉兹背叛祖国，为德国法西斯保安处工作，获士官衔，据说甚至“舅舅的高层保护都不能使他免受应得的惩罚。迫于社会压力，这名叛徒被判25年劳教。”我这位表弟的命运就是如此不顺。沙夫基亚确实坐了牢，一位节日酒宴参加者荒谬的死亡成了逮捕他的原因。他也参加了宴会，尽管有证人证明沙夫基亚和所发生的事无任何关系，开枪者另有其人，沙夫基亚还是被捕入狱，被判10年徒刑。他讲道，在狱中他经常被打，要求他指证我父亲。看来，矛头所向是针对我父亲的“米格列尔案件”。

我父亲知道泰穆拉兹被捕之事，但无能为力。当父亲被枪杀之后，又重新开始向沙夫基亚逼取指证我父亲的口供，要求他：承认吧，你是他的私人间谍。

1955年他被释放，而5年之后又一次被捕。糟糕的是，他性格外向，只要有可能，他就到处讲述他的不幸：“你们看到怎样打我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结果，沙夫基亚又被判刑10年。但是，判刑当然不是由于他的“长舌头”，而是因为“侵吞巨额公款”。沙夫基亚管理过一个书店。

事有巧合，格鲁吉亚克格勃一名参加安排“沙夫基亚案件”的工作人员被开除，他决定报复自己的领导，就将这件事的全部历史加以公开，并用文件证实自己所讲事件的真实性。于是，沙夫基亚

被恢复名誉，最后10年得以自由度过。

五、贝利亚与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军人的良好关系

但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高加索吧。我觉得，父亲在那里又一次确证了政工人员的一无用处。我记得父亲向朱可夫讲述他如何解除卡冈诺维奇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的时候，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表示同意说：

"这些军事委员会委员干的都是空洞的事，他们对我有什么用？教战士们喊'乌拉'？我看没有他们会喊的更响。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用处。哪怕他们能帮忙把后方组织好，但愿他们能起点好的作用。"

在这位著名的元帅的回忆录中您找不到对政工人员的丝毫指责。这很容易解释：当时领导党和国家的是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再早些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众所周知，他们二人战时都是政工人员。

无论是朱可夫，还是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或格列奇科，在其回忆录中都不能完全如实地描写战争，因为掌权者都是党阀。比如，我对"忘记"我父亲在保卫国家中所起作用的什捷缅科陆军大将便无可指责，虽然他的高升应感谢我父亲，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以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系。格列奇科不能不那样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他人也不能写出有关我父亲的真实情况。有什么办法，既然命运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尊重历史真相的国家。

当我决定讲述战争的时候，便立即想到，一定要讲讲那些在不同的时间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军人，他特别器重谁，什么人他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我已经说过，我父亲庇护着一大批军人，这里我只说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托

尔布欣、阿尔捷米耶夫。

摘自官方资料：

费多尔·托尔布欣，苏联元帅，苏联英雄。战前任外高加索军区参谋长。战时历任若干方面军参谋长，南方方面军、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后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外高加索军区司令。

帕维尔·阿尔捷米耶夫，上将，1941年起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局局长，莫斯科军区和莫斯科卫戍区司令。战后继续指挥莫斯科军区，并任乌拉尔军区副司令。

父亲对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极有好感。战前他们经常见面，而当铁木辛哥被解职以后，这种紧密接触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本人很熟悉他们中的几个人。和什捷缅科认识的时候，他还是个上校，在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手下总参谋部的一个局里工作。

我当然认识朱可夫，记得他是个严厉而又极富同情心的人。我在家里常接待他，我们的接触也仅此而已。而我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关系却很亲密，他经常向我回忆起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的情景，讲述他怎样和为何成了一位军人。原来，他还很年轻时便作为一名骑兵军官指挥一个分队，这个分队全由来自格鲁吉亚的人组成，而且又全是米格列尔族人。我对这一切当然兴趣浓厚。华西列夫斯基面带微笑地回忆起格鲁吉亚军官是如何的贫穷，比如，要去参加一个不大的招待会，大家便互相借衣服穿。但他强调说，作为军人，他们是勇敢的。

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不是富家子弟。他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神甫家庭，是家里的第5或第6个孩子，我记不清了。他总是满怀

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父亲。我在某处读到一篇文章说，这位未来的元帅入党通不过，他当时不得不拒绝承认自己的做神职人员的父亲。他当然没有拒绝承认任何人，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1939年之前一直没有入党。有一天，他对我讲述了他战前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斯大林问华西列夫斯基为什么没有入党，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直接了当地回答说：

"因为没有人介绍我入党，而且也不会通过，因为我是神甫的儿子。"

斯大林微笑着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甚至在宗教学校读过书。"

华西列夫斯基入党当然通过了，但在我看来，他本人对此并不热衷。

战后，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当了总参谋长，武装力量副部长和部长。我和他常在试验场见面，而且不只是在那里。听到他的消息总使我心情愉快。

华西列夫斯基和我父亲关系密切。很可能，他们的亲密关系还不能和朱可夫相比。父亲和朱可夫是多年好友，但他对华西列夫斯基却怀有特殊的好感。什捷缅科也是和父亲关系亲密的人，但论级别、论年岁，华西列夫斯基无疑要更近些。众所周知，朱可夫在战后不得不离开莫斯科，于是，父亲基本上只和华西列夫斯基打交道。

我之所以在本书中屡次提到什捷缅科不是偶然的。他的高升乃出于我父亲的帮助。我坦率地说，正是和我父亲的亲密关系才使他得以平步青云。他们一起工作始于1942年，那时他还只是个上校。我父亲作为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代表所制定的所有命令，都由什捷缅科签署下达。

我也不能不记起安东诺夫陆军大将。战争开始时他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后来领导南方方面军、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部。

1942年底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再后来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

这是一位很会用心思的和有知识的人。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军人都是些粗鲁的人，或者说，是那种不够聪明的人。这种看法总使我感到惊奇。我接触过的所有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知识领域造诣颇深。而读者也能猜到，这种人是不少的。当然，这首先指的是军事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安东诺夫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我在战后的军队里也遇到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军事学院，又懂外语。

多年之后我得以确信，当代军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其前辈们逊色。比如，设在基辅的华西列夫斯基防空学院，那里有训练有素、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一批在数学、无线电技术、无线电电子学领域杰出的专家在那里工作。我相信，那里的毕业生也会同样优秀。

或者以哈尔里科夫的戈沃罗夫学院为例。从这所学校出来的是真正的技术知识分子。但是，也有不能不令人忧虑之处。想起战时和战后几年，应当指出，从前统率集团军、方面军的都是技术型知识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任命军事工程人员担任高级指挥职务，认为由指挥系出来的毕业生担任这些职务更为合适。那次战争的经验教导我们，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现代军队，尤其是未来军队，是一门极为复杂的技术。

我们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很好地培训了未来的军事工程师(本领域的高级专家)。我想起我的军事学院的那些同窗波斯佩洛夫、伊万琴科、沃尔科夫等等。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身居高官的父亲和靠山，他们所取得的一切只能归功于自己，归功于他们的执着、勤奋和才能。这是些名副其实的军官。后来他们几乎全都成为将官，并为完善我军现代技术装备和培养技术干部贡献颇多。

我有幸曾和维塔利·米哈依洛维奇·沙巴诺夫一起共事。和我

们一样，他也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先当实验工程师，后来成为我的副手。后来的维塔利·米哈依洛维奇·沙巴诺夫是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获得者、陆军大将、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那些年，每个军事学院都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许多东西。我们修完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全部大学课程，认真研究语言和军事技术。这类学府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直接可以指挥团队作战的，因此，其训练水平已不言自明。

六、我个人的战争经历

我本人进入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 11 月，国防人民委员向部队下达命令，每个方面军抽调 100 名前线军官入军事学院受训。

“别拿不定主意！”博金、什捷缅科和谢洛夫这样劝我。

“去侦察系。”

伏龙芝军事学院有这样的系，毕业后我将在军事情报机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系统内工作。

技术吸引了我。既然我没机会在大学无线电物理系学习，我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军事工程师。从少年时代起我就醉心于无线电。

父亲支持我：

“你懂几种语言，又受过专门训练，在侦察系你不会学到任何新东西，而技术倒是你该用功学习的。”

那时还没有雷达专业，于是，我开始在无线电通讯系学习。只是到后来我们才开始研究雷达。

军人都知道，在军事科学院或院校学习必须经过在部队中的实习。在战时条件下等待我们的将是在前线的实习。1944 年夏天，我们列宁格勒电力工程学院的全体学员被派往前线，受集团军

群的指挥。我们将到营、团、师和集团军的通讯部队实习。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我们中的几个人落在了战线之外。事情是这样的，斯洛伐克出现了紧急情况。像在华沙一样，英国人在那里组织了起义。目的只有一个：英国人利用部分受其影响的解放运动组织来对抗红军的进攻部队。我们的盟国企图以此来达到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未能达到的目的，即切断我们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他们打算借助于这些先发制人的起义来削弱与我军一同进攻的斯沃博达将军的部队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而后便将自己人安插到政府中去。

某些斯洛伐克的部队也纳入了德军编制，但只是护卫和辅助分队。比如，德军不许他们上战斗机，斯洛伐克人只能飞运输机。我忆及于此是事出有因。我们队在里沃夫安营扎寨的时候，这个城市才刚刚解放几天。一个完整的斯洛伐克空军师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降落在当地机场。所幸，没有一架飞机遭受我防空火力的损害。直到那时我们才明白斯洛伐克人对红军的态度。当我们踏上他们土地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好感更是与日俱增。

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开始攻击喀尔巴阡山隘口时，斯洛伐克便发生了起义。为了镇压起义，德军准备了几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两个坦克师，并开始缩小包围圈。应该救出这些人。指定几个分队空投到敌人后方，我被派到其中的一个分队，当时我是大尉。

我们对人员的挑选很严格，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跳伞经验，受过专门训练，大多数人已在德国大后方工作过，并且很有成就。除救人之外，这几支专业破坏行动队还得去占领并守住喀尔巴阡隘口，以协助我们的后续部队。

除了操作员和，两名战士，他们都是体格很棒的小伙子，还有编入我们队的两位边防军官。两人都是少校，能熟练使用各种武器，掌握肉搏战的擒拿技巧。

我被任命为无线电台台长。我们应当随时与总参谋部及被空

投到斯洛伐克境内的其他各分队保持联系。指挥我们的是总参谋部，而空投却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局负责准备的。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还从事这类业务。要知道，游击战运动也是在这个部门的积极参与下才遍地开花的。从敌后全民斗争刚开始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便派出数千名军官越过前线，他们都受过各方面的训练。

我们乘"道格拉斯"飞机从里沃夫机场起飞。我们称这种飞机为 Л—2 型飞机，是战时主要的运输机。我们得到美国的许可将其改装，西方人称其为 C—47。

我们就从这架飞机上跳伞。降落非常成功，无论如何，我们分散的地域不是很大，40 分钟后我们便集合完毕。我们很快赶到约定地点，与苏军分队会合。和我们不同，这些战士在斯洛伐克不着军装，装成游击队的样子活动。

我们立刻与莫斯科取得联系。总参谋部命令我们与投入到斯洛伐克的其他各队进入作战通讯状态，并按时报告情况。

那时我们有一个功率很大的无线电台。拆开来秤，它大约有 100 公斤，这还不算电池的重量。跳伞的时候，我们把这一重物分开让所有的人分担。通常电影中在敌后工作的侦察员们所使用的电台都是便携式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如此，一切视这个组所要完成的任务而定。

我们在喀尔巴阡山脉跋涉两周，并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络。在此期间，我们的队伍得以攻占山谷中的几处平地，并接收 30—40 架飞机。

先遣分队和敌人几次交火，但我们未能参加这样的战斗。我们是中心电台，受到严密的保护。我们应当留在斯洛伐克，直到我军突破到这一地区。但形势有变，起义者占领的全部领土陷入双重的包围圈中。于是，命令基干部队实行战斗突围，斯洛伐克人的指挥部人员乘飞机撤离。我们分队被最后一批飞机接走。到此

时，德军已攻占整个桥头堡。

我们在里沃夫以南地区降落，因此，我们进城要比暂归斯洛伐克分队指挥的电台组的同志们晚些。在向我军方向突围的过程中，他们销毁了重武器，也销毁了无线电台。

他们说，他们只是在突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战斗。德军在那一地段还没来得及真正实施合围，我们的队伍利用了这一点。这些同志的被救应该感谢我们在德军中的那些情报员。

从战线之外归来，我们获得两周休息时间，因此可以在乌克兰西部旅行。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了我们后方起义运动的真相。

残酷产生残酷。我记得，一支民族主义分子队伍冲入一个边防哨所，那里关押着几个他们的人。当苏联小分队赶来救援时，已是无人可救，边防哨所的人员都已被杀，无一幸免。

在战斗中射杀敌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被抓的士兵绑在树上烧死则是……总之，我们极为震惊。

那些日子，我也从另一方面接触到了残酷性。我们的部队包围起义队伍，或按当时的说法，民族主义匪徒。他们建议被围者投降，遭到拒绝。这时这一地区就调来了 3 个炮兵团。后来参加地方清剿的同志对我说，炮轰之后一个活人都没留下。这是在莫斯季斯卡地区。后来我得知，科涅夫和彼得罗夫将军抽调了近 10 个炮兵团来进行他们所说的对后方的清理。“清理”国土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甚至受命负责后方安全的边防战士都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这简直没有人性，对付几个散兵游勇竟要打一场兵团战役！”

我得公正地说，我们的部队也损失巨大。我们的军官常在近处被打死，破坏交通的事件接连不断。战线西移之后，我们与起义者的斗争也开始改变方式。比如，给我们的战士换装，把这些队伍装扮成匪帮。这些在今天已广为人知。

要对所有的事都采取容忍态度，那是困难的。我们指责德国将军和军官们对付游击队的方式，可我们部队有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有时更为野蛮残忍。甚至放火烧掉整个村庄。

一批被捕获的起义者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年龄相仿，是些有文化、坚定自信的年轻人。他们中间也常有大学生。

记得一个青年，抓住他的时候他已身负重伤。人们知道他有找到其队伍领导人的途径。审讯时他表现勇敢，什么都不说。

当我把我在西乌克兰所见的一切讲给父亲听时，他的反应是：

“这你有什么奇怪的？这些人在为乌克兰独立而战斗。在格鲁吉亚也是这样，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如此。用武力强迫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是不可能的……”

父亲认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和德国人有牵连。我记得，我们长时间地谈到马泽帕[①]，谈到格鲁吉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类似情况。

我们的特工机构有能力收拾民族解放运动的头领，但不知为什么，父亲相信这一力量也可以用来对付德国人。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待这个运动的态度。

我知道，他坚决反对利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分队，把它们改扮成起义队伍进行活动。甚至他周围的人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父亲说，“即使不这样，整个西乌克兰也都在支持他们。”

很遗憾，战后对起义者的镇压极为残酷。宣称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予赦免，许多人被骗出森林，而后便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镇

---

① 马泽帕(1644—1709)乌克兰首领(1687—1708)。力图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1700—1721 年北方战争时期倒向入侵乌克兰的瑞典人一方。波尔塔瓦战役(1709)后同查理十二世一起逃跑。——译注

压。

我记得，妈妈接到当时住在乌克兰的少年时代女友叶连娜·斯图鲁阿的一封信。她的丈夫，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哲学家，在大规模镇压时期被捕了。现在，她正在为那些陷入相同境地的人奔忙。斯图鲁阿写到几名大学生，他们都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并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宽恕他们。

“怎么会这样?”妈妈问，“叶连娜信上说，所有这些人都被骗了。”

父亲讲，镇压的倡仪者是党的机构，而决议本身的制定者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的事在他的一生中屡有发生，当时人们不听我父亲的建议。后来在对我父亲的无数指控中叫得很响的一条就是：“不加分别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开脱。”

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对乌克兰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曾看到有的文章说我家只有斯大林的书。可这些书恰巧真就没有。图书室的藏书很丰富，关于乌克兰历史的书也有不少。父亲说过，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有许多地方极为相似，比如，都有一批历史人物由于祖国的解放而不得不走向反叛的道路。我已说过，他例如，不止一次提到马泽帕首领。

不久之前我惊讶地得知，一家西乌克兰报纸报道说，我父亲似乎在 1945 年去了一些地方，大概是为了安排将几个州的居民集体驱逐迁离故土。我不想去说，没有计划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我感觉，只有那种思维不正常的人才会想到去这样做。再说我父亲从来就没到过西乌克兰。

这种文章的轻率令人吃惊。上帝保祐他们——那些新闻工作者。学术界人士也时常写些这类东西玷污史实。近几年出版了许多所谓填补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空白点”的欺世盗名的学术著作。最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在毫无秘密可言的地方探寻秘密。

七、指责苏军西进中未援助波兰起义毫无根据

当代历史学家提出问题，为什么苏联军队在1944年不去增援华沙起义？这还不够，还断言说，斯大林还禁止驻扎在波尔塔瓦的美军“空中堡垒”从空中去援助起义者。

要知道，这里没有任何秘密。解放波兰的苏联军队在进军时经过了这样一个空间，其距离大大地超出了在同一时间进行冲击的可能性(不论用何种军事分析方法来估算)。绵长的交通线、炸断的桥梁及其他种种原因，阻碍了我军继续向前推进，这也是事实。例如，不说别的，罗科索夫斯基甚至没有应有的炮弹储备。军队已精疲力竭，强行突破水上障碍根本不可能。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转战40昼夜，推进了近70公里，在华沙南北两个方面进行苦战，根本无力对起义者给予及时援助。举例来说，今天历史学家们意欲置疑的这一事实，其英国同行们早已给予承认。换言之，这完全是伪造，仅此而已。

英国人鼓动波兰人举行的这次起义从军事角度说没有丝毫可行性。这不是军事行动，而纯粹是波兰流亡政府所制造的一次政治冒险行动。

和在斯洛伐克如出一辙，在这里也是企图利用起义者来对抗正准备解放华沙的苏、波进攻部队。

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苏军在前几次的战斗过程中已疲惫不堪，而且占领军拥有不容置疑的优势。起义的组织者对此也非常清楚。然而，克拉约瓦军队领导人未取得苏联指挥部的同意在预测到事态结果的情况下，还是决定采取行动，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德国统治，计划夺取政权。只要他们的行动和苏联前线指挥部协调一致起来，就完全能够取得某些军事成果。在华沙情况却不是这样。城市几乎完全被毁，牺牲了20万人。不管承认起来多令人痛苦，

这些牺牲实际上是意料之中的。

英国人不无理由认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稳操胜券。比如说，如果红军部队倾其全力花难以置信的代价向前猛冲，并进抵华沙城下，城市解放者的光荣已不可能属于他们。如果红军不予援助，那就更好。这个污点就又会落到红军身上。

我还知道，尽管这样的战役不在计划之内，但苏军指挥部还是准备与起义领导人取得联系。但是，起义者甚至拒绝向罗科索夫斯基的兵团派出自己的代表。

另一事实也非常引人注目。众所周知，苏联飞行员和波兰军队的飞机完成了数千架次的飞行，向起义军投掷武器、弹药、药品、粮食。空投物品数百吨！而波兰指挥部千方百计设置障碍，阻挠物资落入亲苏军队之手。武器和弹药经常立即入库，直到最后起义军也未能拿到手。

现在谈一下苏联领导人是否阻挠了美国空军方面的援助问题。盟国要从 6—9 公里的高度空投物资。很清楚，全部武器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苏联方面建议由自己来承担这一任务，借助我们的小型飞机空投美国物资。美制飞机有 4 个发动机，无法降低高度。而德军防空武器厉害，其对空机关炮能在 7—8 公里的高空击中目标。

我们的飞机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投掷武器、弹药，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东西落到了德军手里。这就是我对美国空军所要说的全部内容。

事实就是这样，但还有另外一些。今天某些人不愿记起波兰的将军们，他们在使数万名波兰爱国者遭丧亡之后，和德国人谈判，最后投降当了俘虏。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实历史对许多人来说今天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我还是打算回答历史学家的几个问题。这涉及到那些令我们当代人激动不安的最空白的历史“空白点”。

1940年秋斯大林是否准备加入德、日、意三国公约?

当然不是。相反,不仅是保存在我们档案馆中的文件,就是在德国、英国、美国档案馆中的文件,都证明了苏联方面在谈判中的原则立场。当德国人企图诱使苏联代表团或莫洛托夫本人参加讨论这类问题时,他们都坚决予以拒绝。苏联领导人的观点是:任何有关重新瓜分世界或重新划分与我们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和相邻国家的问题一概不谈。德国人确实是这样,他们千方百计企图诱使我们讨论这些问题。而他们的目的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在玩两面派把戏。

西方列强与苏联能否结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发生?

这里的答案也是确定无疑。如果西方列强采取另一立场,即使在当时那么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共同安全体系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父亲收到的情报资料证明,西方正积极促使我们与德国人发生冲突。今天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说苏联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当然,这是无耻的谎言。无需掩盖,苏联领导人犯过错误,有过明显的失策,但是,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列强是难辞其咎的。它们不仅将希特勒推向战争,而且还长期阻挠建立共同安全体系。

竭力使波兰阻止我们的军队经过波兰领土的不就是他们吗?是谁要求苏联参战而又不给任何保证?是谁中断了和我们的谈判而和纳粹德国继续进行谈判?真是史无前例的事:与赫斯飞往大不列颠及英国政府和德国人进行谈判有关的文件的公布日期一再拖延。这是为什么?

历史学家们进行着种种猜测而不能自拔,可还在战争期间我就听说,我们未来盟国与德国人进行的所有谈判的文本已传入苏联。据我所知,资料来源有两条途径——德国和英国。特工机构从不同国家获取的资料内容完全一致,这是极为难得之事。

我明白英国人不公开这些文件的原因。但是，让我们看，是什么妨碍俄罗斯历史学家去澄清这一历史事实呢？

如苏联与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会不会侵犯波兰？

唉，波兰无论如何都是厄运难逃。至于为什么签订条约，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我还记得我和父亲就这一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

"难道你不明白？"父亲当时说，"战争当然是要打的，但是，我们应当争取时间。"

我们当时签订或不签订这一条约，对波兰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希特勒清楚地知道，西方国家自己并不想打仗，只是鼓动德国向苏联开战。

条约不仅延缓了我们与德国的冲突，而且也使波兰的部分领土免遭占领者的吞没。要知道，今天已无任何人对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土地归并过来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否则的话，他们当时就会陷入希特勒之手。甚至英国人对此都不加怀疑。

我设想，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西方国家采取强硬立场，就有可能进行某种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迟些发生。但无论如何它是避免不了的，因为纳粹分子力图统治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本性就要求发动大规模战争。而如果考虑到德国奉行的这一政策实际上已在没有任何抵制的情况下为西方所接受这一事实，那么战争便在所难免了。

在此我也要作这样一个推测。我绝对相信，至少我有完全充分的理由这样想，如果英国人不从中挑拨，德国在1941年就不会进犯苏联。这是纯属我个人的想法，但我认为，全部问题在于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对某些巨大让步作出的承诺……要知道，已作好了侵入英国的一切准备，这是赤裸裸的！而后来希特勒的计划急剧转变……当丘吉尔得到报告，得知德军已越过苏联边境时，他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英国得救啦！"这绝对是实话。我想，真正能引起轰动的消息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和外国的历史学家。

许多关于我军进入波兰的谎言在世界上流传。红军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越过边境，占领了根据 8 月 23 日秘密议定书应归属苏联的领土。这是那些苏共中央最后一位总书记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的文件之一……

今天，有关苏、德军队的相互协作、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的紧密联系，不仅谈的很多，文章也不少。甚至有人写道，好像伏罗希洛夫从戈林那里收到了一架飞机礼物。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我从战争期间就对伏罗希洛夫怀有恶感，但无论我怎样憎恶他，我还是要说，他和德国军事领导人没有任何联系。无论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联系，他都没有。众所周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那个时期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都不能自作主张，一切都定有规定，甚至对每句话在表态之前事先都要加以讨论。如果有必要和德军接触，只能在军长这个层次上，即使如此，也要经过国防人民委员的批准。建立了地方性的而非政府性的、常常是军事性的委员会来划分军事管界。我设想，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军队才发生某些接触，但同样有着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可想而知，德国军队和工农红军部队无任何相互协作可言。

我从铁木辛哥那里知道，我们事先备有几个突击军团，有过这样的指示，红军指挥部在德军越过事先划定的界线时可能加以利用。指挥部应以猛烈突击的方式将其逼出根据秘密协定归属于苏联的领土界线之外。虽然我不知道细节，但详细制定了一个继续突击攻至德国边境的计划。

问题都取决于西方国家。苏、德条约签订之后，同西方国家的谈判仍在继续，苏联如果能获得某种保证，事态的发展便会不同……

这样的指示我没见到，但我得以听到的谈话却肯定这是完全现实可行的。我军在西部边境的集结可以视为这类计划存在的间接证明。从各种标准来看，这种集结的规模要大大超过形势所要

求的集结。而且,波兰军队并未对抗工农红军。我这样说,这是同流行的苏波军队进行过战斗的说法是不同的。部分波军突围进入了罗马尼亚,其余部队别无选择,从德军那里脱险后,便跑向我们这边。

许多坦克部队、航空兵部队集结在边境地区,最终还是未采取行动。但是,我重申,如此大规模集结兵力雄辩地证明,这些兵团有着完全不同的使命。

如果后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一下当时所形成的局势,就不会太难地确信,除了签定的条约之外,苏联与德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样的事实也很有典型性。苏联方面回避德国提出的交换被双方特工部门逮捕的特工的建议。而这正是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时期。

关于苏联将德国政治反对派交给德国的论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仅在我们班便有 8 个德国孩子,我们学校共有反法西斯分子的子女近百名。他们真心痛恨法西斯主义,亲身体验了纳粹主义的可怕。我想,他们应该是知道我们这里的这类情况时。相反,反法西斯分子家庭的生活全由国家包下来了。战争爆发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德国后方投入了对敌斗争。许多人成了侦察员、伞兵。

顺便说一下,在民主德国我的中学同学虽然没有一个飞黄腾达,但有几个人的职位也颇为显赫。例如,彼得·弗洛利昂当了外交部副部长。有几个人继续在年轻德国的军队和特工部门供职。但是,占据高位的终究不是参战者,而是那些在苏联后方坐等法西斯主义灭亡的人。几乎全部高级指挥职位很快便被党的上层夺取。

回到共同安全问题上来,我想请读者注意一个更为复杂的论点。历史学家们时常援引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中发现的文件,

证明英、美在苏联与德国交战时准备给予苏联以有效的援助，而苏联似乎不接受这些建议。委婉点说，这里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最好是将这些文件公开发表出来，并给予相应解释。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是有意识地去误导社会舆论。

我知道说的是什么文件。这是苏联为建立那个共同安全体系而准备的条约方案，这个体系由于西方列强的原因终未建立。苏联方面十分明确地宣布了苏联在对敌斗争中准备派出的坦克、航空兵、步兵和海军兵团的数量。波兰政府予以回绝，英国和法国则满足于发表一些一般性的宣言性质的声明敷衍了事。如谈判取得最顺利的结果，它们准备派出的对德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其军队的 1/3。不客气地说，这只是苏联提议的 1/10。加之，英国和法国代表宣称，他们无权签署这类文件。总之，游戏还在继续。对欧洲各国人民来说其结果如何，我们早已知道。

在英国，已公开发表的几个人的日记肯定说，还在当时丘吉尔即准备将英国与赫斯谈判的有关材料予以公开。他还想在下议院发言说明这一情况。他犹豫多时。他非常清楚，下议院会投票赞成与德国结盟。最终他还是没有走这一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对他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做了另外的选择。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未来盟国直到最后时刻仍不急于投入到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

正如我们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者们的新发现其实不过是在编织谎言，而且时常不攻自破，并没有对大家关注的问题作出回答。只要查查档案资料即已完全足够。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和政论家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比如，他们继续渲染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在反对波兰人民的斗争中紧密合作的谣言。这全是杜撰。有报道说，大约是 1940 年在扎科帕纳成立了一个共同训练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和纳粹军官共同在那里受训。而且，近年来这类论点竞相转载，当然，无需引用什么文件。哎，这远不是这类简单造假的惟一例子。

与此同时，也确实存在着需要更充分加以阐明的问题。

八、二战中苏美关系的一些内幕

众所周知，1943 年春，罗斯福派特别信使——原驻苏大使戴维斯将给斯大林的一封密信带到莫斯科。他建议“或在白令海峡的贵方，或在白令海峡海岸的我方。”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会晤不能有丘吉尔参加，而且，双方国家随行领导人要尽量限制。建议“讨论在陆地和海上的军事问题”。斯大林答复说，他原则同意举行会晤，但附加一个条件，即必须要有丘吉尔参加。会晤未能举行。罗斯福想对斯大林说什么？一位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已提出了这一问题。很可能，他想和苏联盟国分享其“曼哈顿计划”[①]的秘密？

任何人都从未准备将“曼哈顿计划”的秘密告知苏联，否则，苏联特工机构就不会为达到目的千方百计地用尽一切办法，付出巨大努力……而现在我要说的是，罗斯福不掩盖在对法西斯斗争中他是英国的盟友，但无论如何不是在保存大英帝国方面。这一点时常在一些小事上都能表现出来。比如，在一次会晤中，当有人提议为英国国王干杯时，罗斯福拒绝举杯。斯大林于是出来解围，他说：

“好吧，这不是我们的国王，而是他们的国王，因此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

罗斯福的美国对战后世界有着自己的主张，在许多方面与苏联政府的看法不谋而合。而英国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们更接近于主张胜利之后便开始的对抗。

而如果要说这类会谈的机密性，我敢断言，其内容完全可以在

---

① “曼哈顿计划”即美国制造第一个原子弹的计划——译注

三方会晤中谈。其实,1943年在德黑兰正是如此。在那里,罗斯福向斯大林十分准确地阐述了自己对德国未来及其在战后欧洲的作用以及对英国和美国的作用的观点。非常可能,丘吉尔还是知道了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这次谈话。其实,罗斯福也不对丘吉尔隐瞒自己的看法。

有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是对的:罗斯福确实计划过他所讲的那次会晤,但事不果行。斯大林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档案馆中应存有他的复信)。他大概是这样措辞的:"我不希望在盟国之间产生什么误会,像不久前在我们历史上已不止一次地发生的那样……"请读者回忆一下西方国家与德国人之间的那些会谈……

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这样匆忙地取消共产国际?直到最后的一天,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未料到它的解散。

历史学家们对此问题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对许多人来说,无疑这是出人意料之举。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苏联领导人欲以此举表明苏联已改变立场。我们放弃了一个统一的中心,在此之前它一直指挥着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活动,也就是说它们未来的活动应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性质。数十年来所宣扬的世界革命思想本身,也因反希特勒同盟盟国之一的此举而宣布放弃。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做戏,而又有多少真实性?我倾向于认为,苏联领导人方面在这里并未玩什么把戏。而一些共产党开始独立行动之后,这一点开始使我们党的上层感到生气,那是另一个问题。例如,我们党的上层极端仇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若干举措。结果是,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这一邦人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质上就是那个共产国际。

有人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贝利亚与原沃尔霍夫战线第二突击军司令员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于1945年5月被捕后是否见过

面？有人企图证明，苏联元帅贝利亚甚至还审问过这位投向法西斯德国一边的“俄罗斯解放军”领导人。

我父亲从未会见过弗拉索夫，所有关于审讯这位叛徒的说法都是凭空猜测。他和拘押弗拉索夫一事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可能是军事情报机构在我父亲领导的战略情报机构的“安排”下做的。我不记得这些细节，而且，老实说，我对此也从来都不感兴趣。直接抓获原所谓“俄罗斯解放军”司令员的是“斯麦尔什”，因为军事反间机构当时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

但问题甚至不在于是我父亲还是另外什么人逮捕和审问过弗拉索夫。他视这位在最艰难时刻抛弃自己的军队的原苏联中将弗拉索夫为临阵脱逃的懦夫。要知道，这位平庸的叛徒投降敌人并非像人们时常企图作出解释的那样，是由于思想意识原因，而仅仅是要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条命。

结果是，他的背叛给正在一心作战的整个集团军投下了阴影，几乎全军覆没。第二突击军从未想过要投降当俘虏，弗拉索夫自己投向了德方。我无意妄加判断，弗拉索夫在被俘前是否是苏维埃政权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他的信仰，如果他有信仰的话，据我所知，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初期，都未曾表露过。

也许，多年过后的今天，仍然不能宽恕他，即使是将他走出这一步的行为理解为是想拯救自己的部队。但是，要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很难将一个叛徒当作为俄罗斯解放而斗争的思想斗士。

从莫斯科击退德军之后，红军为什么急于开赴伏尔加和高加索一线？

德国人明白，他们已经无力继续此前进行的全线进攻。希特勒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情报部门了解到，敌人已转向夺取油田，而下一步企图通过伊朗、伊拉克进入近东。希特勒以为，这样就会把土耳其卷入战争中来。

德国人计划从巴基斯坦南部边境突破进入印度，甚至为此而成立了一个特种军，称之为印度军。希特勒及其周围人认为，无论是高加索民族还是其他民族，都会像迎接解放者一样欢迎德国军队。正像事态发展进程所证明的那样，一切都事与愿违，全然不同。

九、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意图

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的意图也不是什么秘密。其目的非常明确：切断我们与产油区的联系。希特勒以为，他的部队会闪电般地突破高加索防线，不会遇到真正的抵抗。在这里他也明显打错了算盘。

高加索战役之后，德军计划利用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军建立针对莫斯科的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认为，继续向伊朗和伊拉克推进是不合理的，因为那里起义爆发在即。这些材料后来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都提出来了。当时德国人考虑，在事态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军队转向西北即可切断莫斯科与后方的联系。由于特工部门的努力，无论是总参谋部还是政府，对此都已了如指掌。一部分军人认为，这是希特勒玩的声东击西的把戏，其主要突击将在西部战线，主攻莫斯科。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我父亲坚持加强北高加索集团军群。但是，斯大林支持另外一部分军人的意见，认为那个时期应当阻挠实施包围莫斯科计划。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我父亲坚持自己的提议，但最后拍板的是最高统帅。结果不出所料，在德军开始战役时，我们在南方侧翼未作准备，我们所有掩护莫斯科的部队都留在原地，按兵不动。这是非常强大的兵团。新的部队的集结尚未完成，它们还在伏尔加河的那边。不错，已开始修筑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支线，人们却还不知，这里即将变成前线。只有几支部队准备投入高加索一线。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早已非常清楚。德军把发动战役的时间改动了2至3个月，便开始发动进攻。克莱斯特的坦克集团军攻向高加索，

而帕乌留斯的集团军则攻向斯大林格勒。

关于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集结大规模兵团之事，我在1942年夏末时即已得知。博金与什捷缅科、秋列涅夫和我父亲谈论了这一话题，当时有我在场。当时他就说，只在那一个地方保留所有这些兵团是一个错误。他甚至不得不将计划用来对付克莱斯特的内务部队的一个师投到斯大林格勒。后来，这个师成为惟一在两个月期间内坚守马马耶夫高地[①]的一支部队。全师几乎全部牺牲在那里……

我已说过在内务部部队中作战的前线老兵们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某种诅咒一直笼罩着这支部队，尽管他们的作战表现丝毫不比正规军兵团差。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简称（后来的克格勃）使当代历史学家愤愤不已。但为什么对所有的人都一概而论？这些官兵未参加过大规模镇压和任何类似的行动。马斯连尼科夫中将指挥这支部队，还在战前他就当了我父亲的副手，负责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事务。父亲解释他作出的这一选择的理由是，马斯连尼科夫是位军事干部，有丰富的经验。战争爆发后，我父亲建议任命他为北高加索集团军群司令员。马斯连尼科夫于是走马上任。虽然我知道，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对他明显没有好感，他不止一次地请求我父亲："你把他从我身边弄走，他不是正规军指挥官，是游击队……"

朱可夫从自己的角度可能是对的。马斯连尼科夫确实惯于同突入我国境内的土匪作战。但在高加索山地条件下，这种经验便十分有用。

在雅尔塔，罗斯福是否将自己"出卖"给了俄罗斯？请读者对如此奇怪的问题不要吃惊。这正是当代某些历史学家提出来的。

---

① 马马耶夫高地位于现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中心。苏联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会战期间因苏军曾在该地进行英勇战斗而闻名。高地上修建了斯大林战役烈士纪念碑。——译注

总之，关于雅尔塔会议（时常还称其为克里米亚会议）的歪曲言论颇多。

雅尔塔协议成为德黑兰会议符合逻辑的续篇。会议文件早已公开，据我所知，直到最近尚无歧议。例如，就是今天翻阅这些材料，我仍未见到一种提法可以让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罗斯福完全目的明确地接受了苏联从对待日本问题上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出发而提出的一定的和完全合理的要求。我不会冒昧地称此举是对苏联的让步。

罗斯福没有出卖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如果他再多活些日子，苏-美关系会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经济上的支持，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在这些方面罗斯福视苏联为自己的盟友……许多东西会把我们联合起来。

苏联极不情愿承担有关日本的那些义务（我知道，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对此还争论不休），这有着重要的原因。日本不是出于爱苏联，而是由于别的原因，但众所周知，它遵守了自己的义务，没有向我方开战。因此，从伦理角度来说，一切并非都那么简单。但事态发展的进程证明，雅尔塔通过的决议还是正确的。

十、1942年丘吉尔对莫斯科的访问

1942年8月，丘吉尔在访问莫斯科之后给罗斯福写信说，斯大林向他谈了苏联的强大反攻计划。那些日子德军已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但是，众所周知，斯大林格勒城下反攻计划直到9月中旬才开始研究制定。不知斯大林向丘吉尔说的是哪次进攻?

我不得不让历史学家们失望。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当时指的就是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反攻。我已经说过，这次反攻的准备时间要早得多。将研究者引入歧途的是某些军人的回忆录，他们将那些计划周密的成功战役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这里也是这样。因此，在日期上也就变得混淆不清。

众所周知，1945年10月丘吉尔抵达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交谈中，他提议划分苏联和英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将希腊留给英国，并确定在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势力划分。协议没有签订，但是，历史学家们认为，苏联在积极支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同时，在1944—1945年对希腊为反对右翼势力和英国军队而进行斗争的人民解放运动实际上未给予军事援助。这种对苏联的指责有多少根据？

这是毫无根据的责难。丘吉尔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计划，但苏联政府也从未接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苏联领导人把什么认为是势力范围和如何推行实际政策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苏联没有在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与大不列颠发生条约关系。

而我们对希腊游击运动的援助是一直存在的。我本人在莫斯科就见过许多希腊指挥官。当英国军队将游击队员们逼入山区时，南斯拉夫人不得不扣留这些希腊爱国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数万人，后来就生活在苏联。被扣留者约达到15至20万人。战后，部分希腊游击队员返回祖国，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我国南方。

苏联支持任何反对专制独裁的运动，在希腊也是如此。

十一、希特勒企图加快研制新型武器以扭转战局

广为人知的是，希特勒在法西斯德国濒临灭亡的最后时刻还在寄希望于所谓的“报复性武器”。敌人这一军事技术设想的实际成就又如何？

我在胜利后的1945年夏天进入德国。特工小组在那里已开始工作，逮捕那些参与包括核武器计划在内的秘密计划的德国科学家，同时没收军事设备模型、图纸、资料等等。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因为我们的盟国对德国专家及其研究课题也表现了极浓厚

的兴趣。我的德国之行没有多少官方性质。坦率地说，我去那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作为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未来的军事工程师，感兴趣的也正好是无论我们的专家还是我们的盟国都在全德国搜寻的那些研究项目。除此之外，1941 年我们在情报学校毕业后就应被空投到佩内明德地区，冯·布劳恩的火箭中心就在那里。我事先对其已有所了解，很自然，我有兴趣知道，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和取得了什么成果。和几位工程师以及当时在朱可夫指挥部工作的谢洛夫上将一起，我们来到了南萨克森的火箭工厂和埋在盐矿中的几个核实验室。

例如，在佩内明德我认识了谢尔盖·帕甫洛维奇·科罗列夫。他是专门从事 V—2 型弹道火箭研究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另外，那里还有一个地对空火箭委员会。

德国的火箭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应给予应有的肯定。以弹道火箭为例，他们已达到了实战应用的水平，地对空火箭正在试验，他们只是没有来得及在战争中应用。

战时，德国最先制造了军用喷气式飞机(在这方面也应肯定德国人的成就)，尽管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在开展此项工作。战争结束时，德国航空兵已拥有数百架装有涡轮喷气发动机的飞机，在速度上具有很大优势，但机动性不够。因此，我们的飞行员成功地将其击落。德国人在这方面也没有来得及完成他们的工作，而如果他们能够将其包括轰炸机在内的全部飞机都改装成喷气式，而他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长足发展，那么空战便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当然不只是在空战中。和 V—2 型、V—1 型弹道火箭相配合，德军行动将更具威力，更不用说其科学家们正在顺利实施的核计划了。希特勒将核计划放弃了，正像苏联也曾放弃过那样。但是，可设想一下，只要德国早一两年开始研制核武器工作，结果会如何……喷气式飞机、弹道火箭、原子弹都有了。我们就会有一个装备有可怕武器的德国这个敌人。所幸的是，他们没有来得及。

关于德国军事工程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写得很少。当讲到有关V—2型或V—1型弹道火箭时，苏联某些资料总要强调说：这些火箭尚不完善。而对喷气式飞机则只字不提。最多就像苏联战时歼击航空兵一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所做的，他举了在1945年4月德国天空出现新式飞机的个别例子。但是，难道讲真话会贬低战胜这样敌人的苏联战士的功绩？当然不会。但是，大概这会让人有所思考。

我们的盟国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还是下了决心……其原因之一正是担心德国人可能抢在别的国家之前制造出可怕武器。而且，已没有时间拖延盟军登陆了，因为我们已打到国境。丘吉尔的计划是通过希腊切断我们和欧洲的联系。美国故意不予接受，因为它对加强大英帝国的势力丝毫不感兴趣。结果，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是最佳的方案，即在欧洲登陆。美国人清楚地知道，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将像以前一样同红军厮杀，而不和美军对阵。特工机构报告了这一情况，艾伦·杜勒斯[①]通过其代理人与德国人的谈判也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苏联领导层对此也非常清楚。这仍然需要感谢我们战略情报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所有这些谈判都有与我们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人参加……

十二、斯大林与希特勒在战时有无秘密联系？

1991—1992年，苏联报刊刊载了一些大量轰动一时的材料，其中特别肯定说，斯大林通过战前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韦尔纳·冯·德·舒林贝格伯爵于1941年7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

① 艾伦·杜勒斯(1893—1969)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53—1961)，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1953—1959)的弟弟。1942—1945年任欧洲政治情报局负责人。——译注

私人信函”。当时报道很多的还有我父亲同希特勒在战争初期通过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所进行的几次谈判，按照其中一个说法，苏联险些准备向德国让出乌克兰、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地峡……

我敢断言，无论是当时的1941年，还是后来，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曾讨论过如何赢得时间的问题。莫洛托夫也参加了讨论。但我重申，谁都没有进行过谈判。50年代的时候，对苏多普拉托夫将军也曾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似乎他按照我父亲的命令企图通过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与希特勒取得联系。这些证词都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强迫他提供的。那时向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一部分人予以拒绝，另一部分人则同意合作，但是他们全都被判了一定刑期的徒刑。

摘自官方资料：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1941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情报局)局副局长。1953年7月21日被捕，5年后被判处15年监禁，在弗拉基米尔监狱服刑。两年后，在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被赦免。

1992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指控苏多普拉托夫奉联共(布)中央之命在荷兰枪杀叶夫根尼·科诺瓦列茨。将军本人承称，他从1921年5月至1953年夏一直在同“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

摘自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我应当对斯塔梅诺夫讲(完全以个人名义!)，莫斯科存在着这样的心情，以为以和平途径调解德国与苏联之间开始的冲突还为时未晚，而这可能在作出领土让步的基础上加以实现。但未谈过实际让步问题。这不过是向德国人提供假情

报，以期扼制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和继续向前推进，从而创造条件，使苏联政府得以进行迂回，赢得时间。贝利亚也是从这一点开始讲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贝利亚指示我不要委托斯塔梅诺夫将一切都向德国人通报。可能他要根据自己的判断通报一切。但他并未通报。我们破译部门对大使馆往来信函进行监视，未发现任何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信件发往索菲亚。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侦察试探。"

在所谓的"贝利亚案件"中曾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似乎最后还是进行了谈判，而且是在苏联政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对此苏多普拉托夫作出了明确的评价：

"对贝利亚案件进行调查，必须考虑当时的局势。在1953年8月6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了1941年的接触问题。我也被叫了去，并汇报了同斯塔梅诺夫会面的情况。顺便说一句，我汇报说，这次会面是在取得莫洛托夫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向我保证，这次会面不会成为我的罪状，但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显然，他们不愿放过我这个可证明他们与贝利亚的关系的令人不快的证人。我被判刑，而且其中一项指控便是参加单独的谈判。这一指控于1968年被一个专门委员会撤销。"

一些西方资料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我父亲的副手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参加了苏德会谈。有一种说法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一时期研究制定了一个最为巧妙的积极行动方案，企图说服德国签订条约。初看起来，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易职换上莫洛托夫也显得极为合乎逻辑。历史学家们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变动只有一个解释：李特维诺夫是共同安全

体系的拥护者，并阻挠同德国谈判。

外交部的每个人都应当积累实际材料，加以分析，并在外交政策领域向政府提供建议。但是，当外交政策部门所提供的情况远离现实的时候，那么，这个部门就不能称其为外交部了。据我所知，李特维诺夫向政府报告称，西方列强愿意同我国签订盟约。而这个时候，情报机构所提供的证据则与此相反。特别是，政府获得了西方列强正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情报。我设想，李特维诺夫自己不希望西方国家同德国谈判，可能成了假情报的牺牲品。他已是一个年事较高的，很有知识的人。他认为，一个人怎么说，他就会怎么做。很天真……总之，作出了决定，他不适合这一工作，外交人民委员部改由莫洛托夫来领导。

他作为人民委员，受苏联领导人委托进行谈判。杰卡诺佐夫是位职业特工，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他是以外交官的身份，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谈判的。起码官方身份是这样。

我父亲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当然了解会谈情况，包括其准备工作在内，但他本人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谈。梅尔库洛夫也没有参加过。他身为副人民委员，肩负着完全确定的职责。

如果相信西方某些资料，苏德谈判也完全可能在 1943 年举行。流行的说法是，无论如何，德国政治侦察头子瓦尔特·谢林贝格试图通过瑞士和瑞典与苏联代表建立联系，据某些历史学家说，苏联代表对“签订停战条约的会晤非常感兴趣。但由于里宾特洛甫的错误而使联系中断，他要求苏联代表团成员中不能有犹太人。”

我不能肯定德国人没有进行某些接触的企图，但是，这类谈判不曾有过，我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就像里宾特洛甫与特工部门的会谈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在这方面有关犹太人的全部谈话当然也都属于虚乌有。我从杰卡诺佐夫处得知里宾特洛甫在他们最后

一次会晤中的表现。他宣布对苏战争已经开始，并立即向他耳语说："请您务必转告莫斯科，这不是我的意思。请相信我，所有这一切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顺便说一句，德国驻苏大使舒林贝格的表现也和他的表现如出一辙。我们已习惯于认为，那里没有聪明人……甚至如果设想，德国人在那一时期真的热衷于谈判，那么里宾特洛甫就不会提出上述条件。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事实和对所有这一切都持怀疑态度。

十三、斯大林得知希特勒自杀后的反应

1945年5月4日在德国总理府花园弹坑中挖出的是谁的遗骸？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真的自杀身亡，而不像其他几位纳粹分子那样趁战争最后几日的混乱之机隐姓埋名，亡命他乡？时隔近半个世纪之久，围绕一号战犯的激情并未平静下来。

有一种说法是，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希特勒的尸体已被找到，并建议他去看一下。斯大林没有去，而是派了莫洛托夫和我父亲去。这只是神话而已。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某一日，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的确去了那里，但纯粹出于好奇，绝对不是奉斯大林之命。他们查看了德国总理府、地下掩体等，这种兴趣是很自然的。当时，即1945年的夏天，我和谢洛夫也到过那里，也纯粹是出于好奇心。

至于斯大林，当向他报告希特勒已自杀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对细节并不感兴趣。粗鲁地说，他深沉地啐出一口吐沫，不问他希特勒是服毒死的，还是自己枪杀的。他只说了，这些土匪和冒险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没有勇气对其所做所为负责。然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他在生前是否流露过对希特勒个人的兴趣？斯大林掌握所有自己敌人和盟国的资料，当然，希特勒也不例外。不仅有德国领导

人的，而且也有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成员的报告材料，特工部门向苏联领导人提供有关这些人员的强项和弱点、积极和消极方面的特征、以及进行谈判的方式等情报材料。如有某国代表团来到苏联，特工部门必须呈上该代表团每个成员的详细材料。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对我说，斯大林战时这样评论过希特勒："这是个宿命论者。希特勒不会彻离斯大林格勒。是的，他可能转向高加索，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总要保留部队，因为这个城市叫我的名字……"

对找到的遗骸，和对以后的各种调查发现一样，斯大林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也没有任何人建议他去过任何地方。向他作了报告，事情也就完了。

是"斯麦尔什"的机构发现的希特勒遗骸。对玛格达·戈培尔及其孩子们尸体的确认没有产生疑问，但帝国宣传部部长的尸体却有过疑问。众所周知，他是个跛足的人，可在审问他的主治医生的时候，在其供词中没有说清楚戈培尔哪条腿有病。这是谢洛夫对我讲的。

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一样，希特勒的尸体被烧的很厉害。先是被埋了起来，后又被挖出。但从被拘的一些人所提供的间接证据仍能得出结论：这就是希特勒的尸体。当然，"斯麦尔什"对此并非确信无疑。

据我所知，苏联最高领导层对组建新的调查委员会未下达任何指示，很可能这是在较低的级别上作出的决定。我们开始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在英、德报刊出现希特勒还活着的报道消息之后。有谣言说，他有时藏在南美，甚至有时就躲在苏联。当这些谣言甚嚣尘上之际，这样的委员会成立了。我不排除，像今天报道所说的那样，其中一个委员会是遵照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的指示建立的，但无论斯大林，还是我父亲，都与此毫无关系。

十四、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微妙关系

斯大林和朱可夫。前者是最高统帅，一个战胜国大国的首脑；后者是刚刚结束的这次大战的卓越统帅，但他在元帅队伍中并非独一无二。前者站在陵墓观礼台上，后者则骑着白马检阅胜利游行队伍。为什么是他？难道真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由于斯大林已感到年老了？而又为什么不是罗科索夫斯基，或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

恶意中伤者说，起初最高统帅打算亲自检阅胜利游行，甚至在毫无骑马经验的情况下跨上了马背，但从马上摔了下来。“有什么办法，”斯大林似乎这样说，“我已经老了，让朱可夫检阅吧……”是杜撰？好像是这样。据谣传，在尼古拉·布尔加宁身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拒绝再次跨上马鞍。

当布尔加宁领导武装力量部的时候，检阅游行队伍方式本身发生了变化。有一大批人研究过这些事，最后决定作若干修正。大家认为：骑马自然很好看，但现在已到了放弃骑马而改乘汽车的时代了。因此，没有哪匹马摔过布尔加宁，他甚至都没有去练马场进行过练习。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骑术高超。斯大林本人从未尝试过骑马。当谈到胜利检阅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应该让朱可夫去检阅。当然没有异议。罗科索夫斯基受命指挥检阅队伍。科涅夫深感委屈，其他方面军司令员们对这一决定也没有什么热情。但是，争议当然没有发生。

大概在决定由谁来攻取柏林的时候，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已经明确，罗科索夫斯基战后将成为波兰国防部长，因此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波兰民族出身的人。

我父亲推荐朱可夫。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承受了战争的基本

重负，攻克柏林正应该是位俄罗斯人。斯大林同意了。罗科索夫斯基可能在内心深处有所抱怨，但他没有表现出来。总之，他一直是个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人，就是凭他的作战经历也可以对此作出判断。他作战英勇。可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和他的同志们曾经遭受过逮捕和百般嘲弄。

而科涅夫仅仅是嫉妒朱可夫。这纯粹是出于人性的嫉妒，还是作为统帅的嫉妒，我不拟妄加评论。科涅夫本人无疑是位天才的军人，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予以否认。尽管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那些人认为，他从不爱惜人，为完成任务他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他经常任性专横，例如，他竟放任自己用棍子毒打部下亲兵。

他还有一个恶习，即无论是当着斯大林的面或赫鲁晓夫的面，他随意诋毁他人，尤其是朱可夫。他给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写信告朱可夫。很遗憾，军事领导层中这类人不仅只有他一个，许多人嫉恨朱可夫。我记得战争期间他向我父亲请求说："给我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我愿意要谢洛夫。我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诽谤我，关键场合还可以替我挡一挡。"谢洛夫将军和朱可夫一起进抵柏林城下，也是朱可夫呈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

斯大林和我父亲都认为，战后应该由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从中作梗，这一任命在我父亲生前就应该实现了。我记得 1953 年 3 月在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之际他和我父亲的谈话。我父亲说，一定要使他成为部长，暂时达不到，要再稍等一段时间。"格奥尔基，"我父亲说，"你别难过，除了你，我看谁都不称职。"

那些当着我的面进行的谈话总是非常推心置腹的。例如，朱可夫确实想从军队中清除党务工作者，他认为他们只能瓦解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在小圈子里朱可夫称他们为密探，并在我家不止一次说："还要忍受他们多久？或者我们干脆就不信任军官们?"父亲总是安慰他："再等一等，不能一蹴而就。要相信，你我还力有不

足，还要等。"

不是为了袒护斯大林，而仅仅是为了客观，我应当说，虽然斯大林也同意给朱可夫调职，但主意不是他出的。军人们都"努了力"。总之，大家的过错就在于嫉妒。他一定曾经刺痛过某些人的虚荣心。他是个要求严格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些粗鲁。但我在这一点上对他不想妄加评论。可能有时是时势使然。打仗顾不上情感，来不得儿女情长，何况他又是个担任如此责任重大的职务的人。

我不知道其中原因，反正党的上层分子不喜欢他。比如，赫鲁晓夫便极为仇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对朱可夫不怀好意的人在选拔上不受任何限制。1957年10月，朱可夫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全会指控这位元帅"破坏列宁关于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原则，推行旨在收缩党组织、政治机关和军人委员会的工作及取消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真理报》当时刊登科涅夫元帅的文章，题为"在党的领导下与人民紧密相连的苏联陆、海军力量。"科涅夫对朱可夫百般指责，无所不用其极！指责这位统帅的功绩名不符实，好自我标榜，工作不扎实，经常出差错。朱可夫又一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知道，1946年他就是如此这样被解除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的。开始将其调到敖德萨军区，而后又转到乌拉尔军区。人们都惧怕他。既怕又恨。布尔加宁是个平庸的机关权贵，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当了国防部长，在他的唆使下，无论是战时还是以后，对朱可夫的诽谤何曾间断！那些人寻找各种借口，极力往痛处给予打击。我父亲极为愤慨，他说，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人，却整天被阴谋诡计所包围。

我知道至今还流行一种说法，即准备战后逮捕朱可夫似乎我父亲与此事有关。时常也提到阿巴库莫夫的名字。据说只是因为斯大林的干预才使这位光荣的元帅免遭灭顶之灾。朱可夫有一次

对我说："什么都别信，你知道我和你父亲是什么样的朋友。他们对我捏造的一切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有人说我父亲阴谋反对朱可夫，说朱可夫逮捕了我的父亲等等，这一切已延续40年，竟玄到有文章说我父亲完全掌握了柔道技能。这一情况据说使参加逮捕我父亲的那些人深为忧虑。文章写道，只有朱可夫自信地说："没什么，我能对付……"赫鲁晓夫和党的上层是极愿意渲染与这位著名统帅名字有关的谎言的。

现在刊登了不少文章，说明阿巴库莫夫和他的手下人怎样寻找损害朱可夫名誉的证据，进行秘密搜查，逼取口供。但正如通常所说，主要还是"幕后"操纵，要知道不是安全机构本身决定要诋毁这位元帅，指挥员都坐在中央委员会里。另外，正如前述，军人也插了一手。

在我的记忆中，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遗憾的是，一些人今天还在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朱可夫的名字。

谈到战争，谈到光荣的统帅们，就不能避而不谈原情报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列尊撰写的曾经轰动一时的那本书，其中谈到了有关战争起始的题材。

摘自官方资料：

弗拉基米尔·列尊，1947年生于切尔卡瑟，毕业于基辅高等普通军事指挥学校。曾为军区司令部情报局军官，在情报总局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4年。1978年逃亡英国，当时以叛国罪判处其死刑。

他是几部关于苏军和军事侦察方面书籍的作者，以笔名维克多·苏沃洛夫名义发表。

虽然《破冰船》是一部根据传说写成的书，但我还是饶有兴致

地读完了它。很可能这位叛逃特工是个天才的作家,我不想对此妄加评论,但据我所知,该书的作者并不是他,而是一批业务熟练的专家。驻外间谍机关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接触不到这类情报,尤其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总结概括。我丝毫不想从文学家这个角度责难他。问题并不在他,获取这类情报要有一定的职务级别。而作者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材料?

其实,对待题材的态度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今天同样可以成功地证明罗斯福是为日本人工作。而事实可以任意选择。例如,据悉,罗斯福掌握了日本准备进攻珍珠港的材料,但美国人仍然被打个措手不及。按苏沃洛夫的逻辑,为什么不能指控罗斯福叛变呢?也可以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这一点也没有加以证明)即这是为了要唤醒美国社会舆论。美国不太想卷入对德和对日战争。

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作者,也不在于这本书。无论在西方还是近期的我国,都弄混了两样东西:我们的军事学说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纳粹分子即已证实,似乎希特勒及其德军最高指挥部不得不先发制人发动对苏战争。

我从铁木辛哥、秋列涅夫、梅列茨科夫、朱可夫那里了解到,1939年底时即已完全清楚,德军将进攻苏联。我不想重复,但谁是敌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是清楚的。

(特要·绝密·亲启)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1940年9月18日
第103202/06号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兹报告关于1940—1941年苏联武装力量在西部和东部

实行战略扩编理由的若干意见，请予审查。

1．我们的假想敌

欧洲所形成的政治局势创造了在我西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这一冲突可能只局限于我西部边境，但也不排除来自我远东边境日本方面进攻的可能性。

我西部边境最可能的敌人是德国。至于意大利，它可能参战，而确切地说，它进入巴尔干将对我构成间接威胁……这样，苏联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准备战斗：在西线，面对受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支持的德国；在东线是日本，它或者是公开的敌人，或者在军事上保持中立立场，但随时可能转向公开冲突。

这份文件的签署人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陆军大将，执行人是作战局副局长华西列夫斯基少将。

我提醒诸位注意：21号指标（《巴巴罗萨》计划）在1940年12月18日才签署，就是说正好要晚3个月。如果有先发制人的愿论的话，这一情况也可对之作出有利于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方案的解释。但真是这样吗？

国家正忙于准备即将来临的战争，但并不准备放第一枪，首先发起进攻。问题最终并非在于苏联方面和斯大林的政治道义。斯大林是很重视世界舆论的，我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作出过这类指示。他认为，应当想尽办法延缓战争的爆发，但与此同时，继续进行对战争的各项准备，并准备用还击来回答德军的进攻。我知道他是从如下情况出发的。即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作战计划及其集团军群的集结地点都已清楚。因此，任务是明确的：抵挡住第一次突击，并按我们总参谋部研究制定的相应作战计划实施反击。我知道，计划切断集结在哥尼斯堡地区的波罗的海集团军群，而在南方

则突向罗马尼亚油田。为此也就需要坦克和空降部队。这就是对苏沃洛夫(列尊)所提出的斯大林为什么需要10个空降军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在防御战中不需要那么多突击集团军也准备用于这一目的。还必须没有能行驶于汽车干线的快速坦克,以及强击机等等,这些都使作者困惑不解。

作者所提出的解释完全是为了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侵略目的。这些观点明显经不起认真的批评。如果苏联准备侵略,为什么在边境要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军事指挥部的错误在于从旧防线上拆除了武器装备。战争实践表明,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而新建立的防线又不打算用于保卫……为什么要白白浪费大量金钱?

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改组为借口也没有说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实成立了几个总局,诸如:边防军、警卫军、铁道兵等。我感到,无论你多么想,都很难看出此处有准备侵略的迹象,但是,这好像丝毫没有使某些历史学家们感到难堪。要知道,战争本身已经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事改组是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边防军最先投入战斗,而且没有一支边防部队后退。在西部边境,这些部队抗击敌人8至16个小时,而在南线则达到两周之久。这不仅是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而且还反映军事训练水平,边防部队哨所为什么配置炮兵的问题亦不言自明。正如书中所述,哨所没有榴弹炮,但有反坦克炮。这是战前在我父亲的坚持下配备的,他十分清楚,光靠步枪是奈何不了坦克的。边防总队部署了榴弹炮团,这在最初的几次战斗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正规炮兵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一时期,没有谈过断阻部队问题,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要知道,谁都不能想到军队会逃跑。但却逃跑了。原因已众所周知。在1941年6月,当时尽管我们对未来与法西斯主义的一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对这场后来赢得的战争仍没有准备好。也许这就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主要教训。

第六章　德黑兰，1943，艰难的几个月

一、我参加德黑兰会议的经历：搞窃听，向斯大林汇报

当调我去莫斯科的命令下达时，我在军事学院学习已有一年时间。我猜不到这与什么有联系，从列宁格勒出发时，只知道我被派去总参谋部待命，因为命令就是从那里下达的。

在莫斯科的谈话也未使事情特别明了："派你去执行特殊任务。你要把收到的一个仪器安装在一个地方。"

仪器是个窃听装置。话题未涉及到任何会议，我们要飞往德黑兰我也不知道，甚至我们要在巴库降落我也只是在飞机起飞后才得知的。

一起飞往德黑兰的还有几位军官。我们在机场便分手了，并且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都有谁和出于什么目的飞往伊朗。我们以后再没有见面。

迎接我们的是几名军人和一些穿便衣的人。我立即认出其中的一个，他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实验室的专家、报务员。从他那里知悉，我要做的是破译录音磁带。

从机场出来的路上谁都不谈工作，而又不许问。我们来到一幢大楼前，进到里边。

我没料到在伊朗这个地方能见到我的父亲。几位专家刚说完

仪器已经接通,就进来一个熟悉的军官,对我说:

“有人叫您。”

走过几个房间,我到了父亲那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你看,”父亲说,“我们在哪儿见面啦?德黑兰。事先告诉你没有,让你干什么?斯大林本人要求你和另外几个人根据他的指示来承担这项工作。顺便问一问,你的英语怎样?单词忘了没有?没有?这很好,我们现在就测验一下。”

请来一位翻译,我们相互问候之后,开了几句玩笑。

“这不行,”我父亲说,“正常谈几句。”

父亲听完我们交谈之后说:

“还行,没忘。”

当翻译出去之后,我父亲谈起了工作:

“只是要注意一点,这是个非常沉重和乏味单调的工作。”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没有问题。而我们这是要为某种目的窃听某个人的谈话,这不由我不好奇。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谈一谈,斯大林便派人叫我到他那里去。

斯大林对我在军事学院的学习感兴趣,简单问几句之后便立即转入正题:

“我专门挑选你和另外一批人,你们在正式场合从未见过外国人,因为我要你们做的事是不道德的。”

他稍作停顿后强调说:

“是的,谢尔戈,这是不道德的事。”

他思索了一下,又补充说:

“但是,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现在是要解决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将对我们实施援助还是不援助,我要知道一切,所有的细节。我正是为此挑选你和另外几个人的。我选了我了解的人,我信赖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忠于职守。这就是摆在你面前具体要你完成的任务。”

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1943年夏天我们这个邻国的局势极为紧张。希特勒分子急于把伊朗变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准备了武器和弹药仓库，德国间谍机构的活动活跃起来。在当时，就在敌人进一步行动之前，盟国采取了相应对策。而在盟国的军队进驻两周之后，伊朗政府同轴心国断绝了关系。

1943年深秋季节，反希特勒同盟国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决定就在这里、在德黑兰举行会晤。

摘自温斯顿·丘吉尔回忆录：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3英里的路程中，沿途每隔50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如果有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对此没有任何保卫措施。

美国安全机构较为聪明地为总统提供了保卫，总统专车沿途有配备防弹汽车的强大卫队护送。与此同时，总统飞机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降落，于是，总统便在无需任何警卫的情况下驱车前往公使馆，沿途街巷也无人会料到他的出现。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

这时，在我们之前24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企图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宽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予以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

斯大林把我们挨个儿叫去。我不知道，他们中间谁像我一样是陆军军官，谁在特工部门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永远不互相询问任何事情的规则要严格遵守，这一点我在见习侦察中即已掌握，而这当然是对的。

我只记得，所有这些人都比我年纪大，而且，正像斯大林所说，没有一个人与这次前来德黑兰参加会议的美、英代表团成员和某个普通外国人正式打过交道。

很可能，斯大林也把这一任务交待给了我的这些新同志。我指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全部谈话都要窃听、翻译，并每天向斯大林本人报告。麦克风具体放在什么地方，斯大林没对我说。后来我得知，在苏联大使馆罗斯福总统停留的六七个房间里都能窃听谈话，所有他和丘吉尔的谈话都在那里进行。他们之间的交谈一般都是在会见开始或结束的时候。当然，也有些谈话是在代表团成员之间和休息的时候进行的。

至于操作方式，不过是普通录音，当然，当时的录音机要比普

通录音机大些。所有的谈话都经过录音、整理。但是,斯大林当然从来没有读过、也不想读这一大堆材料。要知道,罗斯福有大批的随从人员,算一下要有多少小时的录音?当然,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罗斯福,我们必须根据声音和打招呼特点确认他和丘吉尔。我已经说过,各个地方都装有麦克风。

军事指挥部的代表们也讨论某些军事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之,要在众口纷纭的谈话中选出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整理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指挥部长官们的对话。每天早晨开会前我便去斯大林那里。

我向他报告的基本文字材料量不大,一共只有几页,都是他感兴趣的东西。材料本身已译成了俄语。但斯大林总是要求我们手头一定附有英文原文。

他每天有一至一个半小时只和我们一起工作。这是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例行会晤之前独具特色的准备工作。

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准备每一次谈话。对每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他都有咨询材料,并能详细准确地掌握谈话题目。记得他在阅读俄文材料时时常问道:

"说得很肯定还是有所怀疑?你怎样想?而这里呢?你觉得如何?会不会让步?而在这一点上他会坚持吗?"

如注有英文原文和自己作的附注,你即使有多大愿望也无法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的工作是认真严肃的,既要分清语音,也要分清语调。

当然,这样参加会议工作是不公开的。我们在德黑兰所干的工作,除了斯大林之外,显然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实际上不和任何人接触,白天和晚间窃听,整理材料,早晨向斯大林汇报。会议期间每天工作千篇一律。我想,斯大林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因为他对我们没有任何责难。当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又被悄悄地送走,就像把我们送来时一样。我被送到莫斯科,而从那里我前往

列宁格勒，继续我在军事学院未竟的学业。

虽然关于德黑兰会议本身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报道颇多，但国防委员会委员贝利亚战时也到过伊朗却没有任何记载，这多么令人奇怪。其原因还是那一些……甚至因为关于他曾是国防委员会委员这一点，在今天也无人知晓。虽然他和斯大林一起去过波茨坦，在此之前又参加过雅尔塔国际会议，更不用提德黑兰会议了。

那些描写德黑兰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作者当时甚至不能提到贝利亚的名字。您一定记得我们谈过的我父亲的那次北高加索之行。什捷缅科将军十分真实地描述了那里形成的局势。描述了一切，除了当地反击敌人的直接组织者是我父亲这一事实。

摘自官方资料：

谢尔盖·什捷缅科，陆军大将（1968年）。1926年起参加苏联军队，毕业于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军事学院、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从1940年起开始在总参谋部任职，先后担任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从1943年5月起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参加制定粉碎德国和日本武装力量的作战计划。最近几年任总局局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苏联武装力量副部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兼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

1976年逝世，享年69岁。

多年以后，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陆军大将回忆说，在德黑兰会议召开前夜，最高首长对他这位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也没有说明，只对他说："拿上所有前线地图，并带一名译电员。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发，随后你就会知道。"

什捷缅科讲，他们沿莫扎伊斯克公路前进，在昆采沃车站的军列专用线上停着一列火车，陪伴者将将军领入车厢，并简短地说了

句："您就坐这儿，马上出发。"

专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进发，然后穿过基兹利亚尔、马哈奇卡拉。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对目的地车站没有任何概念。只有一次，在例行报告前线局势之后，什捷缅科被邀去就餐，斯大林和旅伴们开始谈论一个应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会议，一个半小时的就餐时间，话题始终是这次即将来临的会晤。

据什捷缅科回忆，当时专列相隔一段时间就停车，接通高频线路——最高统帅要求了解最新的前线总的情况。作战局长把战场局势标在地图上，向斯大林报告了乌克兰第二、第三和波罗的海第一、第二方面军行动情况。正是那些日子乌克兰一线局势令人堪忧。占领基辅、科罗斯坚之后，我军在日托米尔和法斯托夫地区艰难地抵御着德军的反攻。在此前夕，敌人攻占了日托米尔。在火车上，什捷缅科向最高统帅报告了科罗斯坚被围情况，第 60 集团军第 226 步兵师正在那里英勇厮杀；报告了基洛夫格勒、克里沃罗格战场的艰难进攻。

在各条战线上人们早就期待着开辟第二战场，但谁都不知道"三巨头"即将会晤；也不知道正是这次会晤将使胜利更加临近。

按什捷缅科的说法，他们晚上抵达巴库。和斯大林同行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至于贝利亚，当然只字未提。

早晨，在停机坪上停着几架 C—47 飞机。空军司令员、未来空军主帅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国防人民委员部空军副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诺维科夫和空军远征军司令员、同为未来空军主帅的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戈洛瓦诺夫俩人在其中一架飞机旁边散步。什捷缅科将军在另一架飞机旁看见了他熟悉的飞行员格拉切夫。早 8 点斯大林到达机场，诺维科夫报告，为飞行准备了两架飞机，第一架由戈洛瓦诺夫上将驾驶，第二架由格拉切夫上校驾驶，建议斯大林乘坐戈洛瓦诺夫的飞机。斯大林微笑着说：

“上将不常驾驶飞机,我们和上校一起飞。”

回忆这一事件的时候,什捷缅科陆军大将丢掉了一个细节,即格拉切夫上校驾驶的是国防委员会委员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的座机。

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我父亲,他们一起抵达德黑兰。同机飞行的还有什捷缅科将军,在空中飞行期间他向国家领导人报告了前一昼夜前线的最新局势。在戈洛瓦诺夫上将驾驶的飞机上,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在这两架飞机的后面,还有几架飞机沿德黑兰航线飞行。

据什捷缅科回忆,在飞行时话题涉及的是乌克兰的情况,他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敌人急于攻取基辅,因此,科罗斯坚局势岌岌可危。

3 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格拉切夫上校的飞机着陆。机场上早有汽车等候政府人员。汽车快速向市内急驶,第一辆车中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我父亲和伏罗希洛夫,紧随其后的是警卫人员的汽车。

在当时,1943 年秋天,我到伊朗已不是第一次。我已经讲过,1941 年我进过情报学校。空降德国失败后,我们这些人又被送到巴库地区,准确地说,是在离市区 30—40 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里。这一问题没和我们讨论过,只对我们说,到当地再下达具体任务。在南方战场情报中心,给我们重编了发电代码,并将我们和另外两个爆破小组的人一起空投到伊朗的库尔德斯坦。另外两个组都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能用爆破的方式破坏交通线。而我们组是战斗护卫队。

我们在伊朗库尔德斯坦的山里驻扎下来。应当说,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土耳其,我们的情报网都是很棒的。联络线通过库尔德人部落进入土耳其,然后再到保加利亚,而从保加利亚我们的特工则是携带正式证件被直接转送到德国。一部分人已经不需要跳

伞即可潜入德国。战后我才知道，应同我一起在德国北部空降的那两个德国人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抵达目的地的。其中一人进了研制喷气式飞机的米歇尔施密特的工厂。顺便说一句，美国人将他和另外一些专家一起带到了本国。而第二个特工则进了冯·布劳恩研究小组、“佩内明德”的导弹中心。

我是报务员，和总部保持联系，但情报不是发回莫斯科，而是发往高加索联络处。

很遗憾，我被从穿越土耳其的小组中除名，虽然我非常向往。对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已经有一个报务员，是德国人，在原地待命。而我在伊朗还要呆上4个月。当时，我们组发现了几个德国特工机构。而后对其深入的研究工作已交给了其他的人。我们被送到了巴库，接着在第比利斯休息一个月。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还有其他小组在伊朗工作。

1942年的夏天我来到北高加索前线，而稍后的秋天，我被派去军事学院学习。

当我再次置身伊朗的时候，我便知道了德黑兰会议召开前夕所发生的事情。

二、罗斯福为安全起见住进苏联大使馆

当然，罗斯福下榻苏联大使馆无疑帮了我们大忙。但是，对他和对丘吉尔以及斯大林所存在的威胁却不是凭空杜撰的。会议前夕在德黑兰确实抓住了几个德国特务。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介绍了这几个人和全部材料。他们得以相信，苏联特工确实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德国人的目的是活捉“三巨头”或消灭三个同盟大国的领导人。

为了安全，罗斯福同意搬入苏联使馆来住，丘吉尔则予以拒绝。但英国方面同意苏方加强保卫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

这些预防措施都不是多余的。

谋杀行动未能得逞全赖我们的情报机构,至于哪个部门更为出色,是战略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机构,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我想,这在本质上并不重要。

摘自1942—1944年在罗夫诺州和里沃夫州活动的“胜利者”特工游击队队长、苏联英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梅德维杰夫上校的回忆录:

西贝尔特和冯·奥尔德里在“德国”街的赌场会面。当时冯·奥尔德里终于告诉他下一步准备迈向何方。他说他要去一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前线战场。

“那么,你的那个‘决定性’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德黑兰,”冯·奥尔德里微笑着说。

“德黑兰?但你可要知道,这是伊朗,一个中立国家!”

“11月份,‘三巨头’正是将在这地方聚会——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是,冯·奥尔德里讲,不久前他去了一趟柏林,米勒将军接见了他,并接受了一个极为诱人的建议,其含义西贝尔特大概已经猜到。其实,他可以直接了当地对他说:建议除掉“三巨头”。专业人员已经准备停当。如果西贝尔特愿意,他,冯·奥尔德里即可替他提出申请。学校设在哥本哈根,专门为德黑兰这次行动训练恐怖分子。当然,关于此事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这一天,在例行政治情报通报会上,斯捷霍夫向游击队员们宣读了关于挫败希特勒在德黑兰的阴谋的消息。当然,此处未提到库兹涅佐夫的名字……不容置疑,电报中涉及的希特勒的间谍活动被及时发现和排除,其中当然包括冯·奥尔德里,他在其中并非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祝贺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嗨，这能与我有什么关系”，库兹涅佐夫回答说。

“要知道，应该考虑，有几十人都出了力……”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特工部门不仅破坏了敌人的阴谋(德国人对此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而且还充分利用了美国总统下榻苏联大使馆的机会。

我们不无兴趣地读了曾在西方轰动一时的克里斯托夫·恩德留和定居大英帝国的原克格勃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合写的一本书中提到40年前那次行动的那段话：

“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顺利安装最现代的窃听设备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仔细研究制定了在德黑兰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的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莫洛托夫使人相信，有情报说德国正在策划一个阴谋，于是他宣称，与苏联和英国大使馆相隔一英里之遥的美国公使馆不够安全。丘吉尔建议罗斯福总统住英国使馆。总统不想给俄罗斯人怀疑英、美串通一气的借口，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而轻意地接受了斯大林的下榻苏联使馆区的一再要求。内阁办公厅军事处主任伊斯麦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想知道，在安排好的住所中是否提前安装了麦克风。’”

“当然，毫无疑问那里安装了麦克风，”世界畅销书的作者们推测，“美国代表团在第一次高级会晤时便住在苏联的领地内，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为其提供服务，其全部谈话立即为俄罗斯人所知悉。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开外交。”当你听说“三巨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中斯大林获得了比丘吉尔和罗斯福更多的情报资料时，很难不接受这一观点。

这样同盟国打交道是否道德？要知道斯大林自己这样解答这

一问题:“这是不道德行为……”但是,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其他途径是没有的。而斯大林有理由怀疑盟国不诚实吗?理由十分充足。只要回想一下战前年代……例如丘吉尔,众所周知,他曾属于保守党,该党以消灭苏维埃国家为其目标。他本人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仅仅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他才考虑可能和我们实行短期联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是从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的。

为什么斯大林应该信任他?甚至在英国宣布在这场战争中支持苏联之后,盟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仍然无所行动。当他们明白干涉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时候,而且据我所知,也是由于美国人的影响,这一切才得以实现。

而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是如何表现的?德黑兰会议便是极为典型的证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试图告知斯大林,他们的观点相左。丘吉尔宣称,他非常同情美国,但有一半是美国人,而不能全都赞同总统的观点。罗斯福也一样,他说他没有理由反对英国人,但他不打算捍卫大英帝国的利益。顺便说一句,双方的特工部门也以相应的方式有所表现。

显然,这里应该回忆一下那次“跳远”作战。部分资料证明,希特勒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了他最宠信的党卫军冲锋队长奥托·斯科尔采尼。据我所知,这一情报并未得到证实。而他领导过全伊朗的德国特工机构行动,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斯科尔采尼只是偶尔来到伊朗,而大部分时间呆在德国。

当我在伊朗的时候,我们对为斯科尔采尼工作的部分战时特工顺藤摸瓜,甚至深入进了敌人内部。很有可能,部分小组的情况是英国人转交给我们的。不是在正规场合,而是通过我们的特工部门。因此,希特勒间谍网的差不多全部情况在德黑兰会议召开之前已经了解到了。

三、三巨头会议地点从卡萨布兰卡移到德黑兰

而总的来说，这次会议是不应在德黑兰召开的。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建议这次会议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但斯大林没有同意。他说，这离苏联太远，因为他是最高统帅，不能离开这么远的距离。将不可避免会出现与前线联系的难题等等。英国人和美国人最后不得不同意改在伊朗。

关于德国人正准备谋杀这一情况，斯大林在来到德黑兰之前即已非常清楚。而盟国代表团在卡萨布兰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那就很难说了。毫无疑问，我们的特工部门掌握了某些情报，但对其研究肯定少于对伊朗的研究。问题在于，当就这一切进行安排之际，北非并未纳入我们国家的利益范围，而伊朗却在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内。这一点便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特工机构在邻邦伊朗表现积极活跃。

当第一次提出关于卡萨布兰卡作为最高级会议举行地的问题时，阿尔及尔立即引起了我国特工部门和总参谋部的兴趣。首先必须分头建立联系点。当时我便前往北非。坐英国飞机从伊朗起飞，因为我们的飞机不飞那里。回程也是和英国机组人员一起回来的，他们都是非常严肃持重的人。而美国人和我们更相象一些。

我们在卡萨布兰卡呆了5天或6天，但来了“撤退”的命令，我们只得返回。还记得几幢有深院和高墙的房子。

我们来去悄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很清楚，这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稍后便是德黑兰。

东方的观点(摘自《伟大卫国战争历史》)：

德黑兰会议的基本问题是战争问题，特别是开辟日期已被美国和大英帝国推迟至1942和1943年的欧洲第二战场问

题。苏联继续承受着在欧洲同法西斯集团斗争的基本重负。在苏军几次著名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河之战)之后所形成的新形势下，英、美同盟开始担心，苏联武装力量会在没有美国和大英帝国武装力量参与的情况下解放西欧。苏联代表团指出，在法国北部或西北部对敌实施突击的同时，在法国南部实施登陆作战最为有效。经过 1943 年 11 月 30 日的公开讨论，最后盟国宣布，“霸王”作战计划于 1944 年 5 月实施，并在法国南部实行支援性登陆作战。苏联代表团同样作出声明，苏军届时将发动进攻，以防止德军从东线向西线抽调武装力量。会议参加国达成协议，必须采取措施使土耳其站在反希特勒同盟一边参战，并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实施援助……德黑兰会议有助于反希特勒同盟的加强，并证实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为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利益在解决国际问题过程中合作的可能性。

西方的观点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巴黎民族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1941—1945 年战争中的俄罗斯》一书的著名作者亚历山大·维特之子尼科利亚·维特写道：

在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终于同意离开苏联国境几天时间)第一次聚到了一起。就在离更为著名的雅尔塔会议之前 15 个月的这次会晤中即已开始确定战后欧洲的未来格局。斯大林巧妙地利用西方盟国因早已承诺而一再推诿开辟第二战场的负咎感和美、英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关键问题上通过了他所需要的决议：

英、美承诺不晚于 1944 年 5 月在法国登陆；

波兰边界向西移至奥得河岸，并应予以承认；开始西方盟

国可以非正式承认以“寇松线”作为波兰未来东部边界；

承认苏联取得历史上从未隶属过俄罗斯的柯尼斯堡的要求；

承认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所制定的文件证明，这是“根据其居民的意愿”。

为了换取这些让步，苏联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不超过3个月内向日本宣战。这次外交成功之后，其武装力量在各个方面都较法西斯德国军队占优势的苏联，在1944年1月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甚至今天，在那次难忘的“三巨头”会晤过去四个10年之后，无论怎样评价德黑兰会议对我们共同胜利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都不会过高。如果承认斯大林在1943年深秋季节比盟友们要高出一筹，我们仍然怀念那些在此帮助过他的人。不管我们如何对待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在这里我们要讲的不是他。无论如何，在1943年，从1941年炎热的夏天即已开始期待第二战场的开辟的苏联士兵当时也正在赢得胜利……

第七章　雅尔塔,1945

一、我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经历:窃听工作的继续

雅尔塔会议(时常也称其为克里米亚会议)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此前不久,为拯救在阿登[①]遭到德国出其不意反攻的盟军,红军重又转入反攻,并于2月初即已占领西里西亚。这离强渡奥得河只剩一个月,冲击最后的堡垒柏林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于战争的结局,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人,以及我们的盟国,都已非常清楚。

从全部情形来看,我进入为第二次反希特勒同盟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领导人会晤服务的特工组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在"三巨头"会晤之前的莫斯科,我们翻出了与在德黑兰会议上组织专门侦察措施有关的文件,并决定利用我们的经验。这样,我当时便到了克里米亚。

通知发到学院和上一次一样突然,而有关即将到来的"三巨头"会晤当然没有提及。命令去总参谋部报到,到莫斯科我才知道将飞往克里米亚。还有一件新鲜事。在此之前我们的特种实验室研制出一种更为完善的仪器,这次我们就要派上用场。

---

① 西方盟军在欧洲登陆后向德国进攻时,1944年12月16日在比利时的阿登山脉遭德军的突然反击,使盟军措手不及,遭遇巨大困难。——译注

在雅尔塔，和在德黑兰一样，会议参加者居住的所有房间都安装了窃听设备，但事情并不仅限于此。新仪器不仅使我们能不间断地录下分住美、英代表团楼内的谈话，而且借助于调向麦克风，在公园内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感兴趣的目标处于50—100米的距离之内，就不会有问题。

在高级会晤开始前我们便来到雅尔塔，并得以立即对会议更大的组织规模和技术设备安装作出成功的评估。我指的当然是这一服务措施的特殊方面。这里的人多些，因此，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比“德黑兰会议”要少得多。比如，我就只和美国总统发生关系，丘吉尔和其他人有另外一些专家负责。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德黑兰，我要向斯大林本人报告，这里不需要将所有获得的情报都通过总参谋部处理。据我理解，斯大林根本不看这些材料。总之，坦率地说，似乎相隔久远，所有这一切与德黑兰会议很少有相似之处。在那里，我们最好的时候也只能休息四至五小时，也没有我们在伊朗那些日子始终存在的神经紧张。每天向最高统帅报告，日复一日地为他准备材料。我承认，这使人形成了一定的条件反射。每次见他都不免神经紧张。这不在于我这个小小的军官在这位统帅和国家元首面前感到恐惧，而是希望将一切应该做的都做得完美无缺。要知道，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受命从事的工作是多么事关重大。当我后来读到关于德黑兰会议的回忆文章时，我不止一次发现我对许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工作强度大，神经和生理上的紧张，使所有来自外部的印象都化为乌有。只是在那里，在德黑兰，而后又在雅尔塔我才得知，这些会晤存在着台上的一面和隐在“幕后”的暗中活动。与外交官们不同，更不用提会晤的参加者了，我们始终处在阴影之中。

西方的观点

摘自克利斯托夫·恩德留和奥列格·戈尔金耶夫斯基合著《克格勃·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对外行动史》一书（1990年英国出版）：

> 1945年2月在黑海之滨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第二次会议（这是4月份逝世的罗斯福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为苏联的又一辉煌成就。斯大林重又握有全部军事王牌。红军几乎完全控制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国，同时还有德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盟国尽管取得了“霸王”计划的胜利，但还面临着强渡莱茵河。在谍报方面斯大林也拥有极大优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可靠的间谍：多纳德·马克林在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能在会前汇报英、美会谈的有关情况；另一位加伊·贝尔杰斯1944年从BBC转入外交部新闻署工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基本情报来源是美国国务院的埃尔泽尔·西斯，他是雅尔塔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作为特种政策行动处副处长，他从1944年底开始直接从事会议的筹备工作……美国人被安置在里瓦基亚原沙皇的夏宫内，而英国人则下榻于距离此地30分钟汽车行程的沃伦佐夫宫。两处公馆都安装了窃听系统。美国人好像未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

是不是非常像我们前面曾经读过的东西？记得吗？“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开外交。”前面涉及的是德黑兰会议，而现在是雅尔塔。但是，难道美国人真的如此天真？

二、苏联与西方国家互搞窃听

当然，我们的盟国——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无论是在德黑兰还是在雅尔塔，都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特别是他们

有对建筑物内敷设的麦克风的搜索系统，只是都是老型号。我们的窃听系统在当时却较为完善，对其根本没有感应。无论是在德黑兰还是在雅尔塔，我们的设备没有一处露馅即是明证。但是，我当然不能指责我们的盟国天真幼稚。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所有的地方都仔细地进行了检查，而且他们自己的特工人员清楚地向他们建议，不宜在这些房间里进行不希望为外人知道的谈话。但是，实践证明，这样的劝告永远是劝告，未起更多作用。不管外国代表团成员怎样谨言慎行，结果某些东西还是不由自主地透露出来了。他们呆在住所时或在散步时都是如此。

苏联方面也采取了全部防范措施。很清楚，我指的不仅仅是德黑兰和雅尔塔。外国人随身都携带窃听设备和搜索系统，这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每次会议之后，对客人到过的房间都要进行仔细搜查。我们找到过那些“臭虫”，近几年对此报道颇多。顺便提一句，我们当时就这样叫它们。

我们的搜索系统使我们得以应付裕如，并找到了不少这样的“臭虫”。但是，对此从来没有在正式场合宣布过。通常，我们的盟国也如此这般行事。他们认为能安装上就是好样的，而我们找出来了。确实，有一次在古比雪夫，英国人使我们出了丑。或是安装时不仔细，或是安装了一个老化设备，反正他们在英国使馆内发现了它们。这是仅有的一次就这个不体面的事由所进行的交涉。

此处应作一更准确的说明：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一定的时期段里的事情。据悉，从50年代中期起，这类“损失”便层出不穷。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大楼竣工几年之后，时间已是60年代，美国特工部门在那里发现了数十个窃听器。真正的丑闻在瓦季姆·巴卡京领导苏联克格勃那一闪即逝而又不光彩的时期爆出。正是他向罗伯特·斯特劳斯交出了美国使馆楼内安装的窃听设备的全部图表。我不拟对此作评论，而只想提醒诸位，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是苏联领导人的有关“政策决议”促使这位前苏共地方州党委书记

作出了如此乖张的行为。在国家安全机构内部，其实在全世界特工机构内，包括著名的中央情报局在内，这一事件引起了震惊。部分资料表明，苏联特工机构“听”美国人谈话是从30年代初开始的。而我们的盟国只要能做到都是这样做的。这从来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奇怪。勿庸讳言，这是大家普遍采取的做法。

从我的观点来看，巴卡京的行为是公然的背叛。难道这还不算出卖国家机密？很可能，巴卡京自己不是蓄意背叛，我认为他不是倡议者，而正好相反，他从戈尔巴乔夫或还有别的什么人那里接到了相关的命令。我坦率地说，我对此不感兴趣。对这种做法本身，态度永远只有一个：特工工作有其自身规则。当然，我们不主张搞政治谋杀。情报总是需要的，这不是秘密。怎样获取？世界共同社会目前还认为获取情报允许不择手段。我个人无意对特工机构的行动给予道德评价，但我想，窃听在当时、战时、乃至今天在特工行动中都是完全允许的。

设备研制的水平一直很高，而这都是国产机器。从技术角度它们不可能被发现，所说的现代化窃听系统也不过如此。但是，甚至在当时，苏联特工部门所运用的不仅有靠电缆输电的麦克风系统，而且有真正独一无二的设备。例如，1943—1946年任美国驻苏大使的阿维列尔·哈里曼曾收到过安装了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件礼品。这是一个苏联方面送的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半身塑像。安进礼物中的仪器没有电池供电，而是靠外部的照明工作，依靠外部能量实现传播信号。

当然，窃听设备不仅安装在美国使馆之中，而且也安装在所有其他的使馆中。有一次我离开学院到莫斯科逗留几天，顺便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无线电专门实验室。头一天，一个同志邀请我去看看研制的新产品。该楼内有几个研究中心，从莫斯科各使馆截获的情报都送到这里。

“谢尔戈，我现在给你看一件非常有趣的东西，”这位同志在引

发我的好奇心,“我想,你会好奇的。”

这是丘吉尔首相与常务副外务大臣卡多甘的一次推心置腹谈话的录音。我感到极为震惊。当然不是因为录音事实本身,因为外国驻莫斯科使馆被窃听之事我早就知道。使我震惊的完全是别的东西:卡多甘最后几句话竟是在咒骂英国首相。我英语不坏,但副大臣放肆的语言表达明显超出所出版的全部教课书的范畴。后来才弄清楚,丘吉尔未经内阁批准和卡多甘的同意就无权提议讨论某些决定。

回家的路上我不由自主地想:多奇怪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某个副人民委员,别说副人民委员,就是某个政府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胆敢和斯大林用这种口气说话……

在家里,我把听到的录音讲给父亲听。他非常不满:

“他们有什么权力允许你接触这些东西?”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求父亲不要介入此事,只限我们两人知道就完了。但对我们当时所听到的内容却进行了探讨。

“是的,那里政府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父亲对我解释说,“任何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对首相的意见提出异议。”

我再作了一次比较:要知道,我们这里的领导成员都是阿谀谄媚之徒,很少例外。

事情是这样,我结识了卡多甘。他对我从哪里学的英语非常感兴趣。他说,你是不是在为自己将来当官做准备?我回答说,不是这样,我懂英语,也懂德语,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学其他语种。但我只准备搞技术工作。

我感觉他并不相信我说的话,他说:

“我们培养人都从学院开始……您研究语言只为追求另一种生涯?这不可能……”

但是,除了技术,我确实从未幻想过其他任何东西。

无论是在雅尔塔，还是更早些时候在德黑兰，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和外国人没有接触过。后来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在南方一幢国家别墅里我邂逅了哈里曼[1]和哈里·霍普金斯[2]。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和特别助理。俩人来见斯大林，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去那幢别墅时深信那里没有什么人。这样我们便相识了。

我们的谈话相当有趣。原来，还在苏维埃化之前哈里曼在格鲁吉亚就拥有几处锰矿，以后他也在我国工作过。

“我记得你妈妈那时非常年轻，”他讲道，“她在银行工作过，对吧？当时你们那里正在搞一个慈善活动，我捐助给饥民的甚至比你们向我提议的还要多。你妈妈非常漂亮。别人告诉我，她是一个契卡人员的妻子。”

“你们决定以这种方式影响契卡人员？”我开玩笑说。

“不，她确实非常漂亮，我无法拒绝捐助饥民的请求。”

我父亲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也有一次类似的邂逅相遇。和在雅尔塔一样，我们很少见面，每个人都有很多工作，但我们仍有机会交换意见。有一次他讲，他认识了一个美国特工部门很有趣的小伙子。他22岁，格鲁吉亚人。是个可爱的有文化的人，热爱格鲁吉亚。只要有这一点对父亲来说即已足够，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父亲承认，他惊奇于这位年轻人历史知识的丰富。特别是他们谈到了所谓的拉兹人（另一名称为明格列尔人），格鲁吉亚

---

① 哈里曼（1891—　）美国政治家，二次大战后冷战时期与苏联打交道的主要美国外交家。曾任美国驻苏大使（1943—1946）。——译注

② 霍普金斯（1890—1946）美新政时期民主党行政官员。二次大战期间为罗斯福最亲密的私人顾问。二次大战期间曾代表罗斯福数度出使伦敦和莫斯科。1945年罗斯福逝世后，赴莫斯科协助安排波茨坦会议。——译注

民族共同体中这一支的大部分都在土耳其。当时,这比苏维埃政权搞民族迁移,甚至比苏沃洛夫将15万波兰人迁居乌拉尔还要早许多时候,土耳其人将这些人从滨海迁到远离格鲁吉亚边境的山区。拉兹人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但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

这位美国特工对这个民族的问题非常了解。很难说,这仅仅说明其个人嗜好,抑或是与其特工职责有关的有针对性的目的需要。但是,与他的交往使我父亲获得了明显的乐趣。他对与我父亲的交谈也一定很感兴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和斯大林一起飞抵德黑兰的都是些什么人。

多年之后我在格鲁吉亚一家报纸上读到,此人撰写了回忆录,并讲到了与我父亲的会面。当我了解到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也姓沙利卡什维利时,我着实吃惊不小。根据某些细节我推想,1943年父亲见到的那个人就是美国这位著名将军的一个近亲。

摘自官方资料:

约翰·沙利卡什维利,陆军上将。从1993年秋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国军界他从排长升到师长。是越战老兵。在就任美军陆军最高职位之前指挥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

陆军上将沙利卡什维利的父亲是格鲁吉亚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20年代曾与入侵的红军部队作战。格鲁吉亚苏维埃化之后逃亡国外,后在土耳其军中服役。

约翰·沙利卡什维利降生于波兰,他父亲作为军事参赞继续在那里服役。他是老沙利卡什维利与一位波兰女人结婚所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父亲在意大利服役,并在盟军攻入欧洲后被美军俘虏。部分资料表

明,他在意大利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居美国。

当然,无论在雅尔塔还是在德黑兰,我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会面。我们甚至吃饭都在单独的房间。在德黑兰,而后在雅尔塔都举行了形式上较为简单的正式宴会,但其参加者都是最高领导人。在较低层次上也免不了觥筹交错,比如,我们的保安人员和美国的警卫队员便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而我们哪伙人都不属于,所以,我们的伙食显然要差些。顺便说一句,在德黑兰,我们的伙食颇为清淡。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学员在列宁格勒学院的饮食更为素淡,老实说,我们对领导并无抱怨。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吃"婚宴"。因此,我非常理解地对待领导不许我们喝酒的规定。

也许和大家一样,我读了许多关于那些会晤、关于那些比如在雅尔塔款待贵宾的应有尽有美味佳肴的有趣回忆录。事情可能真是这样,我不拟妄加评论。只是我们离这一切都很遥远,我们只是在一旁而绝不是在正式招待会上看到过罗斯福和丘吉尔。

除了与谈话录音文字有关的基本工作之外,我还得以干我最喜欢的活儿:不断地调谐、修理接收设备。我们的设备从没有中断过工作,看来,领导对我们是满意的。

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我父亲和国家安全机构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以往一样,他仍是国防委员会委员和苏联战略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看来,这一点已足以解释他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逗留的原因。在波茨坦,我甚至就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我已没有任何正式任务。因此,我不用再去"听"杜鲁门、丘吉尔、以及后者在选举中失败后代表英国出席会议的艾德礼了。但我知道,在波茨坦,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我们的盟国都采取了类似的侦察措施。也是别无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工机构都不会放弃获取对其利益攸关的情报的可能。在德黑兰是这样,在

雅尔塔和波茨坦是这样，我想，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还会是这样。设备在不断完善，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特工工作的规律却是永恒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领导人、特工行动理论和实践领域公认的专家艾伦·杜勒斯写道，对于"声音监控"必须具备"一流小巧的电器设备、巧妙的仪器伪装和能潜入住所并隐蔽安装设备的间谍。"

按照这位美国秘密机构元老的话说，1960 年凯博特·劳治大使在联合国展示了悬挂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办公室内的一块巨大美国国家徽标。专家们确定，里面藏有一个小巧的仪器，将美国大使馆内最神秘的大使办公室内的谈话悉数传送到苏联监听站。艾伦·杜勒斯认为，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事例。

在此应当指出，艾伦·杜勒斯丝毫没有指责同行之意。我重申，这里涉及的是世界普遍承认的做法。将技术设备应用于特工机构的业务工作之中早已成为一条准则，而且不仅仅在国外如此。比如，瑞士特工机构仅为收听电话联系即使用了近 4 万套登录设备。众所周知，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工部门都积极运用技术设备，而且某些措施经常超越法律范围，也并不使社会舆论怎样难堪。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不宜揭穿和诉诸讨论的。例如：在办公场所、住宅和私人汽车运输工具上安装窃听设备等。

三、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窃听

有人可能要问：但要知道，斯大林有兴趣阅读放到斯大林桌子上的美、英首脑秘密谈话资料，他是否对知道其亲密战友们的谈话具有同样的兴趣呢？要知道，正像巴扎诺夫在其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声音监控"即已司空见惯。

摘自正式资料：

鲍里斯·巴扎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助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

1900年生于乌克兰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市。在基辅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几个月时间，在文尼察领导省人民教育处同样时间不长，而后成为亚姆波利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书记，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县党委书记。

从1920年11月起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工作，从1922年起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从1923年8月起任政治局书记、斯大林助理。1928年1月1日秘密越过苏联—波斯边境。是西方出版的关于共产主义政权结构的一系列书籍的作者。

摘自鲍里斯·巴扎诺夫回忆录：

我因有急事进入斯大林的房间，和平时一样，事先没有报告。我当时正赶上斯大林在打电话。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讲电话，而只是在听电话。他手握话筒听着，只是听，自己什么也不说。我终于惊奇地发现，斯大林桌上所有四部电话的话筒都在原处未动，他手里拿着贴在耳边的话筒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一部不明电话，它的线是莫名其妙地通到他桌子抽屉里的。我再看一遍斯大林的四部电话：一部是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电话；一部是“克里姆林宫上层”电话，经过“克里姆林宫上层”交换台接通各分机；另一部是“克里姆林宫下层”电话，经过“克里姆林宫下层”交换台通话；通过这两部电话可以和具体负责工作人员及其家人通话；前者主要联接办公室，后者主要联接住宅；通话需总机接转，有女接线员服务，她们都是由国家政治保安局挑选并在国家政治保安局编制内工作的。

最后，这第四部电话是个“转盘”。这是一部自动电话机，

用户非常有限(60个,后来80个,再后来又多些),是列宁要求购置的。他认为,秘密的和非常重要的电话谈话总有被接线小姐偷听之虞,于是,特为政府委员之间的通话安装了专门自动电话机,而无需任何女接线员的服务。这样,重要通话的秘密便有了保障。

就是说,斯大林没有用这些电话中的任何一部讲话。我只需几秒种的时间就可发现这些,并弄清楚斯大林的写字台中有一个中心控制器,他借此可以切入并偷听通过“转盘”的任何电话谈话。通过“转盘”通话的政府委员们都坚信,偷听他们讲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自动直线电话。因此,他们的谈话完全不加掩饰。而这样就能知道他们的全部秘密。

斯大林抬起头,用凝重的目光直视我的眼睛。我是否明白我发现了什么?我当然明白,斯大林也已经看见。从另一方面来讲,因为我每天多次不通报便进入他的房间,或早或晚我会发现这一机关……在斯大林为权力而斗争的事业中,这是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使斯大林可能偷听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之间的谈话,永远掌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而这是一个极具重要性的武器,斯大林是他们中间惟一心明眼亮、洞悉一切的人,而他们却都茫然不知。

我是一名党员。我知道政治局一名委员有条件监听其他委员的秘密。我是否应该通知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如果斯大林偷听季诺维也夫的谈话,季诺维也夫是否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偷听斯大林的谈话?无人知晓。

我对巴扎诺夫的回忆录持极为怀疑的态度。当然,我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他在他所描述的年代在克里姆林宫所见到的一切,但我相信,也请您相信,斯大林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有一个专门

机构搞窃听,像大家通常认为的那样,起初归党中央委员会管辖,而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对政府委员进行监视从列宁时代即已开始,这已不是秘密,斯大林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创新。还记得,巴扎诺夫在叙述克里姆林宫存在窃听器的时候,他谈到了他和"局内人"梅赫利斯的谈话。这又是一个佐证,说明干这种事的不是契卡,而是党的机构。我相信,斯大林感兴趣的一切都有人汇报,因此,总书记本人从事这一勾当明显没有必要。

至于谈到这些行动的合法性,那么,众所周知,那个年代安装窃听器无需检察院的批准,一切遵照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指示进行。这些任务时常落实给专门机构,但仍需有中央委员会的批示。

有一个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编制中有过一些相关下属机构,但不是在我父亲任内务人民委员时期。当时它们归中央委员会管辖,受党的机关领导。我当然见过窃听器,它们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讯人民委员部和其他部门的专门实验室研制的。显然,无论是反间谍机构还是特工机构都在使用它。我已经说过,这一设备是较为完善的。

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非常清楚有人在"听着"我们,这已是战后的事了。我们是从当事人本人那里(在我家安装窃听系统的工程师之一,一个诚实而又品行端正的人,他认为应将此事告诉我的父亲)得知的,还知道是谁下达的这一命令。像通常一样,指挥者不坐在捷尔任斯基广场,而是在中央委员会。党的机关对最高层的监督从未松懈过。

第八章 核盾牌

一、斯大林要求贝利亚加快搞出核武器

摘自塔斯社1949年9月25日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9月23日宣称，根据美国政府获得的材料表明，最近的某一周内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弹爆炸。同时，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新闻媒体发表这些声明之后，其他国家的报刊也纷纷发表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不安。

为此，塔斯社受权特作通告如下：

“众所周知，在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水电站、矿山、运河、道路的建设，这些建设工程必须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实行大范围爆破作业。由于这些爆破作业过去和现在经常在我国不同地区进行，很可能，正是这些作业引起了苏联境外一些人的注意。”

至于原子能生产，塔斯社认为必须提醒大家，还在1947年11月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就原子弹秘密问题作了声明，他说，“这一秘密早已不复存在。”这一声明表明，苏联已经揭开了原子武器的秘密，自己已经拥有这一武器。美利坚合众国学术界将莫洛托夫的这一声明视为虚张声势，认为俄罗

斯人拥有原子武器不会早于1952年。但是，他们错了，因为苏联还在1947年便已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

至于国外某些集团因此而广泛散布的不安，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和美国的三哩岛，托茨克附近新地、拉多加湖进行的有军队参加的核武器试验，南乌拉尔的放射性污染，亨福尔德钚工厂所发生的事故……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包括足有250次之多的各式各样的事故和事件，这或由于原子"裂变"，或由于某个人的主观决定，致使上千名士兵、中士和军官不幸遇难。"这是需要！"

核盾牌，也就是直到不久前我们还自豪地称之为核导弹的武器，建立得要早些。这是用汗水和鲜血创造的。但正是它从40年代末起掩护了苏联。那时，1949年8月29日，我们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所进行的试验并不是世界首次。更早些时候，1945年7月16日早晨5点半，大洋彼岸的阿拉莫戈尔多试验场突然腾起一团耀眼的光焰，于是便揭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竞赛的序幕。在这场竞赛中，我们注定不会是赢家。

多年已经过去，但是，蒙在制造核武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还完全没有揭开。甚至近几年出现的有关这一题目的报道也让人大失所望，不仅没有使期待已久的秘密真相大白，反而使那些已昏昏欲睡的新闻检查的警惕眼睛重又燃起了新的热情。那么，我们、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敌人都渴望获取的有关原子弹的真相究竟在哪里？

这一章我要讲述我父亲生活中几乎不为人知的一页。但同时，这也是尝试公开讲述苏联和外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讲述由于命运的安排进入苏联核计划领域和参加类似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些命运有时是悲剧式的。诸位读者，我还想向各位讲述一下被称为"原子"特工的那些人。实际上，在制造秘密

武器方面，苏联特工机构发挥了特殊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摘自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

7月17日震动世界的消息来了。下午史汀生到我的寓所里来访问，把一张纸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着，"婴儿们满意地生下来了。"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有桩非常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道，"这意味着新墨西哥沙漠里的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已经制造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和斯大林谈些什么。总统和我感觉到我们不再需要他的帮助来战胜日本。他曾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答应一等到打败德国军队之后，苏联即进攻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诺言，自从5月初起，他们就不断地把俄国军队调动到远东去。我们认为，这些部队未必需要了，因此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谈中对美国人成功地运用的那张王牌不中用了。不过他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我们俩人都认为需要让他知道这个决定局势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向他说明任何细节。这个消息应该怎样告诉他？是用书面，还是口头？应该在一个正式的专门的会议上，还是在日常会谈之中，或者是在一次这样的会谈之后？总统的结论是，应该采取最后一种办法。他说，"我想，我最好是在一次会议之后告诉他说：我们有一种完全新型的炸弹，不同寻常，我们认为它对于日本人继续作战的意志将有决定性的效果。"我同意这样做法。

……第二天，7月24日，当全体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并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看见总统走向斯大林，并开始了只有自己翻译参加的谈话。我站在离他们5码远的地方，仔细观察这次最为重要的会谈。我知道总统准备说什么，重要的是这对斯大林产生什么样的印象。我现在回想起这整个的一幕还是如此清晰，好像就发生在昨

天一样。看来,他异常兴奋。新炸弹！威力无比！可能对对付日本整个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多大的成功！这就是那一刻我自己的印象,我相信,他还没有意识到对他讲述的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完全可以看出,在他的沉重的工作和思虑之中,原子弹没有位置。如果他对这次刚刚完成的革命在国际事务中的意义具有哪怕一点意识,便会立刻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说:"感谢您告诉我你们有了新式炸弹。我当然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一名我们的核科学领域的专家明天早晨会见一下你们的专家?"但是,他的脸上满是愉快和安详的表情。于是,两位重量级活动家之间的交谈很快便告结束。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走近杜鲁门。"结果如何?"我问。"他没有向我提一个问题,"总统回答。这样一来,我深信,斯大林当时对美、英在如此漫长的时期里所倾心进行的科学研究的重大过程并不特别了解。美利坚合众国为此英勇涉险,并耗费巨资超过4亿多英镑……关于此事未向苏联代表团再作任何通告,苏方对此也未再提起。

关于美国第一次原子武器装置在阿拉莫戈尔多沙漠爆炸的消息,斯大林在同杜鲁门会晤前便已知道,这已不是秘密。关于美国人获得的试验结果,正是我父亲本人向斯大林作的汇报。这事就发生在那里,在波茨坦,在大国首脑会议召开期间。谈话时有谢洛夫上将在场,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这些细节的。

谢洛夫上将当时在占领德国的军队中,朱可夫元帅的麾下。顺便说一句,他的苏联英雄称号就是朱可夫提议授予的。谢洛夫在攻克柏林、占领泽耶洛夫高地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正是他对我讲述了整个事情发生的实际经过。从特工部门来了几个人,带着关于美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情况的材料。他们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也立即将情况汇报给斯大林。

斯大林非常不满。他的激怒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人走到我们前面去了……自然，他最强烈的愿望是想知道我们的情况进展如何。我父亲报告说，我们还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他说，我们所达到的水平还不能让我们早些回应美国人的挑战。

我应当说，他们关于这一题目的谈话当然不是第一次，斯大林经常关注着研究进程。就是在那一次，我父亲报告了最新结果，他特别讲道，钚元素已经提取到，现在正全力进行炸弹本身结构的研制工作。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说，就是在最佳运行状态下我们也不可能提前，"最少要两年。"

与目前经常描述的相反，这次谈话没有库尔恰托夫在场，自然也没有所谓斯大林的一连串自言自语。文章说，斯大林当即责成库尔恰托夫加快工作进度。谢洛夫对我讲，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在认真听了我父亲的结论后只说，近期还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大概就是全部情况。众所周知，尔后便发生了丘吉尔回忆的和美国总统的那次谈话。

丘吉尔的惊讶完全可以理解，而我们对斯大林和杜鲁门这次谈话前的那些事早已知道。斯大林听了美国总统的通报表现极其平静。很可能这并不是什么通告，而是一种试探。看看斯大林有什么反应。

会议结束，斯大林回来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指责任何人，只是指示我父亲提出加快这项工作进程的意见。众所周知，为此成立了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专门委员会，国家不惜财力物力、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

摘自官方资料：

专门委员会是根据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决议设立的，进入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有贝利亚(主席)、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万尼科夫、扎韦尼亚金、库尔恰托夫、卡皮

查、马赫涅夫、别尔乌辛。责成委员会“领导铀原子核能利用的全面工作”。后来专门委员会改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1953年3月又责成专门委员会领导其他国防特别工作。1953年6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专门委员会，其人员归入重新成立的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

斯大林同样也催促氢弹的研制。应当在这方面给他以应有的肯定，没有他的同意真的会一事无成。他有许多招术，从对实施方案者的物质奖励到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无疑，效果很好。有一次我对我现在的同事讲，当时我们研究所里所拥有的计算机比今天的还多，有11台！而且容量也大，虽然是第一代，但我们有了！顺便说一句，都是国产设备。所有的原子计划、火箭计划、以及其他大型系统计算都由我们的计算设备来完成。很奇怪，所有这一切已被人遗忘。要知道，主要的设计人员都在基辅和哈尔科夫。列别杰夫教授以及一大批其他科学家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协助下制造了这些机器。他们最初的任务就是为了实施核计划。

当时党用伪科学的帽子压制控制论。党中央和党的机关总是远离实际的。

尤里·日丹诺夫及其同伙猛烈抨击控制论，而我们的国家却运用这一理论的指导为“国防”生产了我们极其需要的机器。他们的饶舌没有防碍我们，因为对于诸如核计划和火箭计划这类重要的课题，党务工作者是不许染指的。在他们有可能干涉的其他领域，他们当然极为活跃……而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干实事。请诸位相信，他知道中央机关的价值……他需要它仅仅是为了实行监督，而无论如何他不是计算技术的反对者，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相反，还调拨所需物资，让企业转向生产新产品。

是的，从今天的观点无疑可以说，应该对有发展前景的事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但是请想一想，那时是多么不平凡的岁月。

如此重大的任务即使不是在今天，而是在较为顺当的80年代提出来，我也不相信会取得这种成果。而当时却是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一切从零开始。但我们却搞成了。

米哈依尔·别尔乌辛，战后年代曾任化工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其60年代末撰写而直到不久前才发表的回忆录中说，“如果不成功，我们要因失败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当然，我们大家都有恐惧感。”叶非姆·斯拉夫斯基随声附和，他是那个年代原子能联合工厂的第一负责人，后来是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获得者，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其他资料则直接了当地说，拉夫连季·贝利亚有一次带两份工作人员的名单来到试验场，一份是获奖者的名单，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则因研究成果失败予以逮捕……甚至谣传说，我父亲直到最后一刻都不相信炸弹会爆炸。

诸如此类的寓言故事确实很多，我读过那些名单，还有其他文章，而事实真相却与此不同。1949年8月，当时我本人出席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现场，因此，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道听途说。甚至有文章写道，爆炸之后我父亲心情恶劣，因为不是他第一个将试验成功的消息报告给斯大林的。

我父亲当时的反应我记得非常清楚，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爆炸之后父亲和库尔恰托夫立刻相互拥抱、亲吻。记得父亲当时说：“谢天谢地，我们一切正常……”问题是每个科研组内部都有对手，这里也不例外。经常有人给斯大林写信、打报告，说爆炸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据说美国人就在取得一定成果之前搞了几次试验，而且还是在已有了某些成果的前提下进行的。

无论我父亲还是参加实施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当然知道这些。他们也清楚，从纯理论上来讲，第一次试验就存在不爆炸的可能性（我现在已不记得当时讲的概率是多少了）。显然，当炸弹成功爆炸之后，他们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一看父亲即已明白，取得这一成功对他以及和他多年一起共同工作的人具有怎样

的价值。

现在有文章说,"这是贝利亚的辉煌成就"等等。但是,这是苏联的辉煌成就,苏联科学的辉煌成就。不用说,一个巨大的使命完成了。

坦率地说,这次爆炸给我的印象并不同于我父亲、库尔恰托夫及其他人(观察舱中我们共有 10 人)。毫无疑问,印象是强烈的,但并不令人震撼。比如,对我产生印象更为强烈得多的是试验我们的炮弹穿过"红色高加索"巡洋舰,它从一舷钻入而从另外一舷飞出。但那是"我们"研制的,我和我的同志们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而这里……我当然清楚自己正置身于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制造了一枚具有无限破坏力的炸弹,这一切对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但在感觉上还是不一样的。我很清楚美国人的这类试验,并知道他们是怎样试验的。总之,我非常平静地从望远镜旁边走开。观察舱中安装了几架这样的望远镜。

对于库尔恰托夫和我父亲来说,这次爆炸联系着他们生命的一个完整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当然既亲切又珍贵。

当前描写这些事件的文章,不准确的地方比比皆是,而经常还有昧着良心的谎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名单,如果有人说科学家们害怕我的父亲,那只能由其本人负责。我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还有许多不正确的传言,说我父亲和科学家们焦躁不安,不断地搅扰军人们等等,不一而足。我已经说过,我们呆在一个隔离舱中,里面有一整套设备。分置各个隔间的设施应有尽有,每一处都有其特殊的功能,专司其职,无论是库尔恰托夫还是其他人,都不能插手试验的进程。这是个军事试验场,由军人提供一切服务,无需科学家的干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是其他人的事了。后来组建了特种航空大队和火箭部队参与试验,而当时是从某兵团抽调的部队承担此项任务。

现在已不需要库尔恰托夫做什么了。东西已制造出来，并交给了军方，就看结果如何了。而我父亲一般总是要求从研制的开始阶段军人就参与进来。当我们搞某种新技术设备试验时，他总是向我强调这一点。老实说，在生活中这对我帮助极大。军人不应在制成品装备部队时才研究某些东西，而是从其开始研制的那一刻起，这样便能深入理解全部细节，在运行过程中定能提出合理的建议。无论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以后，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恪守这一忠告。不管愿意与否，每一研究成果都不免存在某些差错。我本人毕业于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研究班，一生为国防事业工作，但是，我从不认为接受那些将来要同我们的研究成果打交道的人的合理建议是件可耻的事。

是的，生活中无奇不有。比如，我们这些设计人员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投机取巧走捷径，而在战斗状态下应用这些技术装备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能说出这里的原因。不止一次，许多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视军人为不够资格的人。我父亲对此却另有看法。多年来我一直确信，他在这方面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知道年轻的学者对我的推论有多大兴趣，但是，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父亲的为人。只有那些不可信的传言，说他对人大喊大叫，令军人们焦虑不安，才令人感到困惑不解。那位斯拉夫斯基的某些说法还是可信的。比如，尽管多年过去之后他仍然承认，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总是倾听专家的意见，非常善于处理组织方面的难题，帮助实施所有必须实行的决定。是的，"贝利亚从不干扰我们"这句话使有些人感到多少有些奇怪。

二、苏联"如果没有贝利亚，就不会有原子弹"

像通常说的那样，对此也要表示感谢。当要求库尔恰托夫提供针对我父亲的书面证词，证明贝利亚怎样千方百计阻挠苏联第

一颗原子弹制造时，他直接了当地说："如果没有他贝利亚，就不会有原子弹。"

现在说说是谁向斯大林报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正是我父亲本人所为。因此，有关谁在这方面抢了我父亲的先，并因而使他十分恼火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除了他，还有谁能报告此事呢？

消息从核试验场直接传到莫斯科。稍后，斯大林请我父亲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和他的亲密助手以及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邀请到他那里。此时的谈话当然也就较为详尽了。

那个年代大家认为，这样的邀请重于最高级别的勋章。科学家们受到了满意的款待。大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奖励，汽车，为他们建了楼房。总之，原子弹工作者的劳动得到了足够的评价，而这是在战后普遍贫困的条件下。斯大林当时说，我非常愿意为所有为核计划工作的其他人提供这一切，但遗憾的是，国家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

当时许多科学家都受到了很高的奖赏，我父亲获得了国家奖金。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奖励。做成这样一件大事，他们大家都异常兴奋。不管我们今天怎样说，但在当时，国家有了核盾牌。众所周知，正是在那时结束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

关于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给我留下了最为亲切的回忆。

摘自官方资料：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院士。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原子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第一组织者和领导人。在其领导下，1939 年建成苏联第一台回旋加速器，1940 年发现铀原子核裂变。

他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建成了欧洲第一个核反应堆（1946 年），制造了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1949 年)、世界上第一颗热核炸弹(1953 年)和原子能发电厂。他是列宁奖金和数项国家奖金的获得者。

1960 年逝世,时年 58 岁。

他是个极有天赋的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他就读于塔夫里亚国立大学,后来这所大学改建为克里米亚国立大学。革命后在那里授课的人中有克雷洛夫和约费教授,而且还有年轻的塔姆任助教。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到那里进了数学物理系,学习当然出类拔萃。他中学毕业时就获得了金质奖章。1923 年他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而这一切仅用了三年时间!

后来,库尔恰托夫成为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员之一。该所当年被公认为是苏联物理学的中心。研究所本身是在约费领导下于革命后立即设立的,物理技术部就由约费院士本人领导,化学部的负责人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苗诺夫。他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和列宁奖金的获得者,两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是化学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整个学派的创始人。

战争年代他从事的工作离核研究很远。1941 年他前往塞瓦斯托波尔,接受海军指挥部的特别任务。事情是这样:德军从空中投入海里许多磁性水雷,这些水雷在船只靠近时产生的磁场作用下进行爆炸。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他。这样一来,据悉,经过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同志们退磁处理的舰艇没有一艘被炸,其中包括潜艇在内。在战时,海军所有的舰艇都经过了退磁处理,但最初的成功试验还是在黑海进行的。

1942 年年底,库尔恰托夫来到莫斯科,他被任命为我要论及的这一课题的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人。

当实施原子弹计划的问题提出之时,摆在我父亲面前的最难

的任务是组建一个齐心协力的集体，将那些在极短的期限内即能实现自己想法的人聚集到一起。他着手开始工作，首先邀请了约费、谢苗诺夫、卡皮查。请不要见怪，在这几位大科学家当中他没有看出哪一位能统领这一事业。我父亲考虑，约费是个理论家。他是个卓越的科学家，但只是个理论家。我父亲把他召来，是因为知道约费拥有许多年轻的学生，能够提示对谁应该特加关注。

卡皮查？他不仅是个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工程师。他的问题是在别的方面。彼得·列奥尼德维奇·卡皮查其实根本不想为原子弹计划工作。

摘自官方资料：

彼得·卡皮查，院士，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得者，低温物理和强磁场物理创始人之一，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组织者和第一任所长。1939年发现液态氦超流性，研制出借助涡轮冷气发动机液化空气的方法和新型电磁波超强机组。

他是诺贝尔奖和几次国家奖金的获得者。

我和父亲就这一题目交谈过。对卡皮查当然没有直接讲过，但这并不是秘密。很可能，像对哈里顿一样，对他也有揭发材料，有什么把柄给抓住了。当中央委员会开始对他实施调查的时候，我父亲试图尽可能做些什么。他能保护那些实施原子弹计划的人，把他们都保护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卡皮查不想为制造原子弹工作，这就使事情变得明显复杂起来。

在科学院系统，中央委员会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我记得父亲召来卡皮查的朋友谢苗诺夫院士，并请求他力所能及地帮助彼得·列奥尼德维奇·卡皮查。父亲说，我本人不能从官方角度帮助卡皮查。他要是在我这里工作，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但既然事已

至此，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这位天才人物。原子弹研制者当时的收入颇丰，于是，我父亲请求谢苗诺夫从他将取得的奖金中拿出一些钱来给卡皮查。父亲说，这样的科学家不应在这里受罪。

至于卡皮查是这个制度的反对者这一点我父亲当然知道。我不记得是 1936 年还是 1937 年，当卡皮查从英国来到苏联而不能回去的时候，他直接了当地向莫洛托夫宣布："我不想在这里工作。"莫洛托夫很吃惊："为什么?"卡皮查这样解释说："我在这里没有像在英国一样的实验室。"

"我们购买设备，"莫洛托夫回答。

实验设备买了，一模一样，也盖了同样的大楼。但尽管如此……

他从 20 年代末开始在英国工作，约有 10 年时间。他回到苏联的情况是这样的：卡皮查第二次结婚娶了著名造船专家克雷洛夫的女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这位院士病得很重，卡皮查携妻子来看望老人，人们就没放他回去。

在这里我事先声明一下，他曾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救我出狱。当然，他是知道我父亲是怎样待他的。我心怀感激地回想起他，还有万尼科夫、图波列夫、拉沃奇金、科罗列夫。他们为救我出狱做了能做的一切。我讲过，他们两次去找赫鲁晓夫。他们达到了目的。

而同时普遍认为，是我父亲把卡皮查从原子弹计划项目中"赶出去"的。有一次他对谢苗诺夫说："真可惜，老天啊，这样有才能的人为布尔什维克工作。"谢苗诺夫对我讲："我当时笑了，说，拉夫连季·贝利亚真是不可救药。"

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我父亲寻找着一个能领导如此复杂的一桩事的科学方面的独一无二的人。他同 50 多个候选人交谈过，最后选中了库尔恰托夫。约费以及其他人的建议当时无疑帮了父亲的忙。

我父亲带着这一建议去找斯大林，他认真听完之后说：

“好吧，就库尔恰托夫。既然您认为这个人必不可少，那就请便吧。”

最有趣的是，斯大林当时提醒我父亲说：

“你要知道，库尔恰托夫会遇到老资格科学家们的强有力的抵制……”

我父亲明白，斯大林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这些大科学家的情况同样做了相关的咨询。

总的说来，应该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创建的苏维埃体系，而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在检查制度方面加以完善了。党的机关在当时和以后，都一直对所有的人实施监督，无一例外。在国家机关中设置特别机构，在苏维埃机关中则有国家监督。通过一个人检查另一个人，一切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的基础上。显然，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总之，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就这样成了苏联原子弹之“父”。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对我父亲说：应当确定一个科学院院长的人选，谁合适？他说，能否把库尔恰托夫用在这个位置上？

我父亲表示坚决反对，他把库尔恰托夫找来，对他讲了和斯大林的谈话。他说：

“你自己定，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如果拿定主意走，我当然不反对。要是留下来领导这一计划，我将会很高兴。”

库尔恰托夫是个聪明人，对荣誉看得很淡。他直率地回答说，他无意于当科学院院长，希望留下来继续搞原来的计划。我父亲说，那么你自己去对斯大林说吧。斯大林的反应可想而知。当这种场合下有人反驳他的建议时，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对我讲，斯大林当时非常生气，指责库尔恰托夫和我父亲俩人的固执。就是说，是贝利亚唆使你这样干的，

不想去当科学院院长。并威胁说，反正要安排他去当院长，不去也得去。

大概在萨哈罗夫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我想，今天再讲这位科学家的惊人才能已经没有必要。他在大学三年或四年级学习的时候进入了我父亲的视野。他在那时便已有了可以用于实施第二阶段计划的有益建议。

我父亲掌握所有与国防有关的那些领域里表现突出的年轻人的全部资料。很清楚，我父亲本人并不到各研究所和大学去跑，这些事有人干。成立了几个特别小组，专司选择科技干部，其中也为实施核计划选人。他们不是高等院校或科学院的代表。记得塔姆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福克院士及其他一些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一重要工作。我不能记得所有的人。但是，像兰道、吉兹布尔格这样著名的科学家都被吸收来加入到选拔有前途的科学界年轻后备力量的行列。我不记得具体是谁，但萨哈罗夫作为大有希望的入选者，却被他们剔除了。当时的结论是：他可能是个有能力、有天赋的人，但难于接近，等等。事情是这样，安德烈·德米特利耶维奇·萨哈罗夫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充满自信的人，总认为自己正确。我这里指的不是他的哲学主张。于是，科学泰斗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将来和他打交道不会轻松。他提出的观点，就是多年投身科学的学界前辈时常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但是，萨哈罗夫经常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且言辞很尖刻。显然，科学泰斗们决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尽管有天赋，但令我们大家都不痛快的年轻人？

只要存在，就能发掘出来。当时寻找到了多少极有天赋的小伙子，不仅有物理学家，而且还有数学家。他们立即被邀请来参加谈话，参加讨论会。这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作。我们应给予我们的科学家们以应有的肯定，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真正能胜任实施核计划的集体。

多年之后我读了安德烈·萨哈罗夫关于和我父亲会面的回忆。“只是过后我才感到害怕，”萨哈罗夫写道，“才明白在和谁打交道。”从纯人性的角度来读这些东西是令人不快的。因为他似乎感到害怕的这个人——我的父亲，刚好对他怀有极大的好感。要知道，萨哈罗夫本人回忆说，我父亲建议他在需要的时候可去找他。

我父亲非常了解这些资深科学家对萨哈罗夫的态度。很明显，这是个天赋深厚的年轻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父亲拥有这位大学生的全部资料。如果他对大多数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有名单和部分情况资料，那么我已经说过，他拥有萨哈罗夫极为详尽的材料。我是从万尼科夫和马赫涅夫将军那里知道这些的，后者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为我父亲负责公文处理的助手。于是，他们就这样向我回忆了我父亲认识萨哈罗夫的经过。出于对这位“刺儿头”大学生的兴趣，我父亲邀请他来谈一谈。谈话是非常坦诚的。

“你怎么想，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家不接受你的思想？”我父亲问。

萨哈罗夫坦率地讲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父亲一直喜欢独立不羁、非同寻常的思维。他邀请几位年轻的理论计算员，请求他们鉴定一下这位在校大学生满腔热忱坚持不放的那些想法。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虽然他仅仅是个大学生，但他几乎和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相差无几。”

“那就这样，”我父亲说，“你们帮帮他。让他结束学业和自己的计算，你们把他收下，让他研究你们的题目。”

进入由极为年轻的理论计算人员组成的小组之后，萨哈罗夫很快便成了这个小组的领头人。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与必须和实物打交道的炸弹设计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他的那些计算当时就派上了用场。这就是他在大学时即已开始搞的那些计算，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构成了他工作的基础。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当然,遗憾的是,他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惩罚机关对萨哈罗夫早就了解,也有惩治他的动议。安德烈·萨哈罗夫是那种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也不善于隐瞒。当然,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还不像后来那样直言不讳,但对惩罚机构来说却已足够。按照当时的标准,已有充分的理由"追究"一个青年的责任。如果直接了当地说,正是我父亲的干预制止了他们。最可怕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我们这里一直把异端思想当作反对国家的刑事犯罪。像不久之前所做的那样,把一个人关进内务部监狱,抑或送入精神病院,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我已经说过,我父亲总是千方百计鼓励我对技术的兴趣,我开始对无线电的业余爱好也是出于他的忠告,我也因此才能熟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无线电实验室。而且,这个实验室的名称完全是假设的,在这个实验室中有分属各个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小组在那里工作。我记得,一个帮我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专家向我介绍了特工专用的无线电台,有我们的设计师制造的,也有德国造和英国造的。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毛孩子的强烈兴趣……按照特殊规章制度在一个封闭实验室工作的小组也使我非常感兴趣。谁都不许接近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好奇心都未能得到满足。当我得知他们"只不过"是对从国外收集来的资料进行分析的神秘面孔时,我真是大失所望。这丝毫不使我惊奇,因为这类工作组有不少,他们按不同方向划分工作,对各种材料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鉴定和评估。

我自然不知道物理学家们在干什么,但当时在实验室中我听到了他们的一些谈话。记得这些人讨论过近期就要出现的新式超级武器。按我当时的理解,他们讲的是制造一种破坏力惊人无比的炸弹,但不是我国,而是在国外。他们担心希特勒可能获得这一新式超级武器。

任何人都没有怀疑,与德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一点我经

常听到。当然，关于可能制造某种炸弹的谈话，除了好奇心之外，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其他想法。使我铭记在心的是德国人可能成为这一可怕武器的拥有者。国外有关制造这种炸弹的详细情况我当时一无所知。

三、苏联的“原子”情报工作

许多年过后的今天，我回想起实验室中的这些谈话，以及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技术保障人员”的会面，我想：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在当时的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就不纯粹是个惩罚组织。受过最高技能训练的专家在这里从事一系列与军事技术有关的问题的研究，而且并不仅仅与军事问题有关。运输、航空、工业、经济——总之，对评估某一强国进攻苏联的战略可能性所必须的一切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有关机构感兴趣的课题。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特工部门也从事这一评估。有一些人，或合法或非法，从国外获取有关情报。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内也有一系列机构专司整理汇集来的资料，因为没有分析选择，所有的特工情报就不过是一堆废纸。例如，特工能报告进攻的日期。但是，当把这一情报与技术、经济、科研联系到一起时，就要求进一步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在当时的30年代末是如此，在40年代乃至今日仍是如此。要知道，普里马科夫统率俄罗斯的特工机构不是偶然的。我不拟评价他的活动，仅举这一事实为例，而这个例子是有典型意义的。普里马科夫是一位学者，一位分析研究的专家。

这样的任命在当时很少讲究排场，但原则还是有一个：应该有分析研究的专家在特工部门工作。我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撰写原子弹的历史时也为他们书上一笔。我指的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我们昨天所有的那样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编著的历史仍然没有多少改变……

是的，不久前尤里·哈里顿院士曾滔滔不绝地讲过，他特别写道，在获得我们的特工人员的相关情报很久之前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泽利多维奇和哈里顿本人就对铀在可调控系统的反应堆中裂变的树状链式反应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建议利用重水和碳作为中子减速剂。据这位可敬的院士讲，在战前的年代里，弗廖罗夫和鲁西诺夫即在实验中获得了重要成果，确定了链式反应的关键参数，即在铀中子核裂变中所产生的次级中子数量。当时弗廖罗夫和彼得扎克发现了无需中子辐照而自然发生的铀裂变。

哈里顿院士还回忆了苏联科学家的其他科学功绩。还在战前的时候，他和泽利多维奇即已弄清产生核爆炸的条件，并估计出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而 1941 年在古列维奇参加的情况下确定了铀—235 的临界质量，用院士自己的话说，就是获得了真正的近似数值，但由于对核恒量认识有限，数值始终不能精确。

我觉得，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对严格禁止宣扬获得有关情报这一事实的议论也颇为有趣。虽然已经无人不晓，而我们的“原子”特工尤其应该清楚，为什么苏联的物理学家不讨论这一题目。

我无意和哈里顿院士或其他什么人展开辩论，但这个题目还是值得一谈的。要知道，我父亲在制造核武器中的作用这一主要内容一直没有论及，而且他对自己履历中的某些细节避而不谈。

摘自官方资料：

尤里·哈里顿院士，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奖金和其他数项国家奖金的获得者。

1904 年他生于彼得堡，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1921 年起在谢苗诺夫领导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1926—1928 年被派往英国卢瑟福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获哲学博

士学位。1931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及其他科研机关工作。1939—1941年与泽利多维奇一起首次完成铀裂变的链式反应计算。他是炸药理论领域新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

哈里顿院士领导俄罗斯联邦核研究中心超过45年，这个中心即是后来的全俄实验物理研究所——著名的阿尔扎马斯16号。他在88岁时辞去正式职位，成为最重要的俄罗斯科学研究中心的荣誉领导者。

他是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直到不久前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严格的秘密条件之下，从未见诸公开报道。1992年12月他首次公开声明自己参加了原子弹计划的研制工作。

当时有人曾两次试图使尤里·哈里顿脱离与制造核武器有联系的工作，甚至指控他搞间谍活动。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哈里顿从事科学研究。反对者所持的主要理由是哈里顿曾在英国工作过，而这样的人是不应该予以信任的。而他确实在卢瑟福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过。在那个年代这一揭发材料是够严重的。

这样一来，只是由于我父亲的一再坚持，哈里顿才被允许参与这项工作。我明白哈里顿没有回忆到这一点的原因，请诸位相信，我对他没有任何索求。他对这一事实默不作声和其他人不说出全部真相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我明白这一点。

所幸当时一切都过去了，哈里顿院士得以继续工作。数年之后，那时我父亲与国家安全机构甚至连间接关系都已经没有，斯大林把他叫了去：

“这是有关哈里顿的材料，这些东西使我相信他是英国间谍。你怎么看？”

我无法准确肯定当时具体是谁——是阿巴库莫夫还是伊格纳季耶夫在负责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但“案件”正是在这个部门拼

凑出来的。他们搜集了有关哈里顿的一大堆材料，并呈递给了斯大林。既然是我父亲在主管核计划工作，斯大林就把他叫了去。

我父亲清楚地记得“除掉”哈里顿的前几次企图，因此，重提院士曾为英国谍报部门工作过的老调并不使他特别惊奇。

“所有为这一计划工作的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父亲说，“我准备为他们每个人的行为负责。我不为他们热爱和憎恶苏维埃制度负责，而是为他们的行为。这些人正在并将继续为交付给我们的计划而诚实地工作。”

谈话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进行的，有关哈里顿院士的案卷就放在他的桌子上，很容易猜到里面所写的内容。

“关于哈里顿我要说的是，”父亲报告说，“他是个绝对诚实的人，绝对忠诚于他为之工作的事业。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干什么卑鄙勾当。”

我父亲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文件交给斯大林，后者将文件放入保险柜，说：

“很好，出什么事由你负责。”

“我用脑袋对整个计划负责，而不只对哈里顿一个人，”父亲回答说。

于是，我父亲写的便函便留在了斯大林那里，而哈里顿顺利地活到我们今天的日子，在科学界工作数十年，硕果累累。

顺便说一句，科学家被荒谬指控的情形不少。一部分人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另一部分被怀疑搞破坏。像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院士这样的情况，我父亲便不得不以书面的形式担保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四、贝利亚启用狱中的科学家

1939—1940 年当我父亲任内务人民委员之时也有过较为严

重的情形，他正是以这种方式“放出了”许多军人和专家。当然，他们没犯任何罪，但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之流千方百计地阻挠释放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大规模镇压的罪人。

1936—1938年大逮捕的结果是使国家实际上丧失了技术人才的精华。遭逮捕的有图波列夫、米亚西谢夫、佩特利亚科夫、科罗廖夫、托马舍维奇，后者是波里卡尔波夫的一个副手……还有几十和上百人，同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他们的亲密助手。这一时期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技术骨干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大批飞机设计师、发动机专家、坦克制造专家都遭逮捕，后来参加核试验和火箭计划设计的那些人也备尝苦难。我已经说过，是谁把他们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的，他们自己对此也非常清楚。

当我父亲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很显然，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改变现状。说他在进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前不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那是荒谬的，他当然了解。他不但了解，而且还清楚这一切将导致什么后果。当时的局势是，整个科技领域已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当然，今天说起来简单：立即释放所有的在押犯，并以此重建被践踏的公正，解决出现的问题。遗憾的是，甚至人民委员都没有这个权力。最好是从来就不要逮捕这些人。但既然在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之前事已至此，他便开始尽其所能地予以纠正。但他很快便遭到了党的官僚机构的强大抵制。

比如，无论他怎么奔波努力，他仍然不能立即释放图波列夫。直到图波列夫完成一种型号飞机的设计，这一努力才获成功。这种飞机是图—2型。还是后来通过斯大林，尽管有党的上层的百般阻挠，图波列夫终获释放。不仅如此，这位设计师和他的助手们还获得了很高的奖励和军衔。图波列夫获将军衔，并在一段时间过后由于他所设计的第二架飞机而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既然我们已接触到了在国防领域工作的苏联科学家、设计师

这一话题，那就让我们追踪一下这位图波列夫命运的足迹。大概这样的悲剧也是当今许多名人的共同遭遇。

所谓的“图波列夫案件”自始至终都是编造的。我父亲清楚这一点，但是有犯人本人的供词。可在1937年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取得供词，那是众所周知的。

当我父亲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极为震惊。图波列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极为压抑的状态。

“我对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所说的话大为吃惊，”后来图波列夫本人对我讲，“他说，请您推翻对自己的供词，这是强迫您签字的。”

可是，图波列夫拒绝了。这还需要别的什么解释吗?

按他的话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位新来的人民委员，并把这一切看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又一次挑拨而已。他已经绝望，不相信他能等到有人试图搞清他的遭遇的那一天。整整3个月，图波列夫一直坚持说他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对我讲，只是当我的父亲对他讲下面的话时，他最终相信了：

“那好吧，请您也不要承认自己是个诚实的人……只请您说出您都需要什么人配合您工作，并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

按照我父亲的命令，把他的所有关键性工作人员都聚到了一起。和图波列夫本人一样，他们都是犯人，受到过同样荒谬的指控。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创造了相应的工作条件。他们住在宿舍里，有警卫看守，和那些幸免被惩罚的专家们一起工作。

我父亲经常被指控制造了这些“避难所”。但他能够做到的只是释放这些人，而不能撤销法院的判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来理清案卷，并作出释放的决定。为了改善集中营里这些科学家的境遇，便临时将他们集中到这些所谓的“避难所”里。

我丝毫不想反驳从集中营出来后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的回忆录。我认为，普通服刑者知道的情况并不很多。他们讲述自己的

遭遇一定是真诚的，就像那些在1936、1937和1938年蹲过监狱的人一样。他们只知道新的人民委员姓什么，仅此而已。而后，已是在50年代，贝利亚的形象被塑造成另一个样子，已如前述……

图波列夫、科罗廖夫、米亚西谢夫、明茨，以及许多其他的人，这些镇压行动的受害者，无论是当时还是在我被捕之前或以后，(这时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他们都对我讲过我父亲在释放苏联科学家(核物理学家、飞机设计师及其他所有的人)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人对此难道有美化的需要吗？

他们认为，是我父亲救了他们。在那种形势下他们讨好我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还有人要强迫他们提供揭发我父亲的证词。

他们感激我父亲，是因为他把他们从监狱和集中营"提了出来"，并创造了工作环境，最后这些人终获释放。

我已经说过，在苏联，进行逮捕不是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倡议……这里涉及的只是那些大人物，如图波列夫、科罗廖夫、米亚西谢夫、几位核物理学家及其他的人。他们这些人只有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倡议或批准才成为镇压的牺牲品的，别的根据是没有的。我们说过对军人的大规模逮捕。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亚基尔等等。只有得到这些人，而主要是伏罗希洛的批准才能逮捕这个或那个军人。他们中许多人首先充当了对正直人犯罪的帮凶，而后来他们自己也被辗在了镇压的车轮之下。

科学家们的情况也是如此。随便找出一个那些年的"案卷"，上面必能找到另一位负责人、人民委员的批准文字。比如，一位科学家来自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那么，这个部门的人民委员即需签署批语。我知道，惟一没有在这类文件上签字的人是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而今天我们认为属于无辜受害者的许多人，我不能说他们也是如此清白。无论承认这一点怎样令人痛苦，但是，如果能够彻底客观的话，甚至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也曾同意逮捕

这个或那个活动家。他虽然从来就不是镇压的拥护者，但事实终究是事实……

他为什么有时这样做，这是个特殊话题。而奥尔忠尼启则在自己死后未留下一份这类文件，在档案馆中一定保存着他坚决反对逮捕的另一类文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说过，就算这些专家不喜欢苏维埃政权，但如果他们还在为它工作，他们就不应该为自己的观点而受难。在这方面，他和我父亲志同道合。

任何人都不能推翻这一事实，即战时在我父亲领导的部门中没有一个人被捕，也没有一个人被撤职。在原子弹研制时期也是这样。这完全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企图。有人企图这样做，但我父亲没有批准，他要求出示指控的事实根据。其他人的做法与此不同。当有人向伏罗希洛夫提出类似的建议时，他便立即批准，或坐下来亲自签批。很遗憾，这样的人不只他一个。

“拿出事实来，证明这个科学家确实在与外国情报部门合作，而不要对我说他是英国间谍，”我父亲这样说。

事实当然是没有的。那个科学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大难临头，他仍能得以平静地继续工作。我父亲从不允许污辱人。请诸位读一下那次中央全会的材料，指控他庇护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这类指控以前就曾喧嚣一时，但我父亲始终认为：

“这位学者认为我们是一群出身低微的人，这是他个人的事。但要知道，他是不是在诚实地工作？”

我已经讲过，他终其一生都遵循着这些原则。那次中央全会上说贝利亚一直不是从党性而是完全从业务素质方面来衡量一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而这对党的上层来说这一点正好就是对布尔什维克原则的最为严重的破坏。

摘自苏共中央委员、中型机械部副部长扎韦尼亚金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的发言：

马林科夫在自己的报告中谈了贝利亚在许多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原子能利用问题上无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做法。马林科夫同志说，氢弹试验的决定没有向政府报告，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而是贝利亚自作主张。我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

我们制定了一个政府决议方案。这个方案在贝利亚处放了一段时间，后来他把它拿回家去看。我们的想法是他要和马林科夫谈一谈这件事。大约两周之后，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并开始翻阅这个文件。他看到文件的结尾，那里写着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签字。他把这一条勾掉，并说，这不需要，就自己签了字。

同志们，氢弹是什么？目前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也不仅是原第一总局(现为新成立的中型机械部)的工作问题，这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当时，美国人制造了原子弹，并爆炸成功。一段时间过后，在我国政府的领导下，依靠我们的科学家和工业，我们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美国人看到其优势已失，便按照杜鲁门的命令开始了氢弹的研制工作。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不是白痴，我们也着手这一事业，而且据估计，我们并不比美国人落后。氢弹的威力比一般原子弹要大数十倍，它的爆炸将标志着美国人正在准备中的第二次垄断地位的丧失，也就是说，这将是世界政治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贝利亚这个恶棍竟然不经过中央委员会而擅自决定。

……我觉得，在评价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贝利亚时，对他的正面素质评价中未免有些夸大其辞。众所周知，他是个不拘礼节、要求苛刻的人，他不买任何人的账，他能推动工作，他有这一种品质……我可以毫不奉承地说，任何一位中央主席

团委员在辨别某一问题上都会比贝利亚更加敏锐和更深入。贝利亚向来以组织者闻名，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个糟糕透顶的官僚。斯大林同志去世之后，贝利亚特别明显地玩起了蛊惑人心的勤俭节约把戏。美国人建了几座生产原子裂变物质的大工厂，花费了许多资金。当我们提出要搞新的建设问题时，贝利亚便对我们说："见鬼去吧，你们要花很多钱。纳入到五年计划中去吧。"我们对此不能容忍，我们国家对此不能容忍。贝利亚对我们反复强调："见鬼，把你们的投资纳入到被批准的数额中去吧。"

同志们，我同意将贝利亚开除出中央主席团，撤销其党内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中央主席团将带领我们党和国家不断前进，取得新的成就。

过去就带领了……

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都进入了核工作委员会，我父亲当然也在其中。当时能谈的是什么呢？谁向谁又隐瞒了什么呢？真是荒谬绝伦。就对我父亲进行所谓逮捕的那一天，刚好我们和万尼科夫将军、库尔恰托夫及其他一大批人一起应该汇报有关这一问题的政府决议草案。我本人参加了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上面直接就有"接受委员会的意见……责成委员会……"等字样。这里说的是氢弹。我们比美国人早一年制造了出来。就在这一天应该决定如何爆炸和在哪里爆炸。

甚至拥有像我父亲这样权力的人也不能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而作出这些决定。国防部长是布尔加宁，军人自然要听他指挥。而只有军人们才能完成炸弹的爆炸工作。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要绕过他们呢？我本人在这份文件上看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签字，但形式上我们还应获得部长会议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通过。这是斯大林时期即已存在的法定程序。

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我父亲对党务工作者总抱讥讽态度，而且不允许他们插手核计划。这一点在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他也确曾要求节省经费。当时有人对他说，美国投入军备的经费比我们多上百倍。他回答说，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比我们强很多。到了拿自己的愿望去同国家的可能条件相衡量的时候了。继续绷紧了干无异于自我毁灭。要知道，这是战后极其艰难的年代。

有一段时间，也同样指控他滥用资金。我父亲兼管石油工业，那个年代我们制造的采油设备比美国先进。今天已经没人记得涡轮钻机是我们而不是美国人制造的了，现在我们却要从美国人手里购买……当年由于我父亲的坚决要求才开始了大陆架的钻探，这还是在战前时期，阿塞拜疆整个的油田开发都起因于他的倡议。但费用很高。因此指控他浪费资金，说为什么要钻到海里去，陆上更经济一些……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有一点父亲是清楚的，即不经过中央但对事业有利的事他认为是值得去做的。

他和苏联石油地质学的创始人伊万·米哈依洛维奇·古布金院士交情深厚，他曾对我父亲说，鞑靼斯坦一定有石油。后来我父亲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就在那里打了第一批油井。作为国防人民委员，他分管石油工业、煤炭工业以及其他若干部门。

回过头来再谈那次中央全会。我能够补充的是，马林科夫也对我父亲提出了荒谬的指控。他也说，“贝利亚未经中央和政府同意便作出了氢弹爆炸的决定。”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报告：

“……大家知道，贝利亚管理过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我们应向全会汇报的是，在特别委员会工作最重要的问题上他我行我素，擅自行动，无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

五、贝利亚是怎样领导核武器研制工作的？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专门责成我父亲来领导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为考查实施原子弹计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我父亲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第一个委员会。作为战略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他掌握了那一信息，后来开始的一切都由此而来。

这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领导，其成员有约费、卡皮查以及其他几位苏联著名科学家。

我这里说的都很具体，并非空穴来风。我父亲提供了此前从德国、法国和英国获取的确凿的情报资料。但是，计划仍被束之高阁。诚然，委员会承认，这一课题在理论上是通得过的，但实际实施这一计划需要10年时间。所以，时机未到。在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紧要关头，不能将资金投入到在可见的未来没有回报的项目中去。我父亲坚决不同意这种结论，西方文献资料的说法与此完全不同。

但情报部门还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我父亲组织汇集了西方国家的情报资料，包括任何与这一课题有关的其他材料。他在当时就肯定说：

“绝不允许德国先于我们获得这一武器。”

1940年初，我父亲再次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提出进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建议，作为这份呈文的基础还加入了情报部门获取的新材料。而且，到这时候，无论是我国的还是西方的科学家都已不再怀疑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了。

但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有其反对的理由：战争业已临近，应当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国家需要新的飞机、坦克。总之，时机未到。而我们的情报部门获取了完整的“巴巴罗萨”计划，已开始细

心研究对未来之敌实施反击方案。原子弹问题要留待来日时机成熟之时。

情报机构的情报继续搅扰着我的父亲，令他寝食不安。他向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铀已不再出口，因为全部都已用于德国的研究工作。德国人还试图控制欧洲的全部重水储备。法国人进行阻挠，因为几乎所有的重水储备都落入了约里奥—居里夫妇之手。很可能，这些情报资料当时就来自法国。

最有趣的是，当时情报机构报告说，含量丰富的铀矿正从非洲远渡重洋被偷运到美国。

分析家们无须特别费力即可得出相应的结论：国外的工作已转入工程阶段。我父亲极为担心西方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

我父亲建议，哪怕不是全部规模都上，而只是将这一工作在苏联启动起来，技术工艺我们已经具备。

而后来战争爆发了，大家对此都已无暇顾及。

1942年，美国聚集了一大批从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来的科技人才，开足马力制造原子弹。我父亲又一次去找斯大林，他说："再也不能等啦。"和前几次一样，他又呈上情报机构的材料。

事情终于启动了。尽管规模不大，但这一工作总算展开了。成立了实施铀计划管理总局。万事开头难，虽然当时是在战争条件下，没有财力，没有资金，但总算是开了头。新成立的管理局由鲍里斯·里沃夫·万尼科夫负责，后来他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任中型机械部第一副部长，两次获国家奖金。作为人民委员，万尼科夫将军在战争年代从事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供应工作。这个局隶属于我父亲。为什么是他？因为他是从1939年开始便始终坚持必须开展这项工作的惟一的人。

这一安排也考虑到，他是国防人民委员，能协调好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我父亲分管的其他国防行业的工作也进展顺利，如冶金工业。而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计划要求整个工业都调

动起来。因此，需要一个既懂业务，又善于在战时条件下开展组织工作的人。我知道，正是当时的局势决定了这一选择。除此之外，全部特工情报继续通过他的机关，源源不断地送到我父亲手里。

当然，这一规模的计划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他不能对某一设备作技术性的计算，但可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获得这类计算的结果和知道其物理特性，这对确定方向、提出问题已经完全足够。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对承担的工作总是极为投入。例如，当他在格鲁吉亚工作时，他不得不研究亚热带农业问题。当然，他不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请来农学家、土壤学家以及其他农业专家，向他们讨教。这是一般的实际经验。他驱车从一个集体农庄走到另一个集体农庄，观察、分析，培养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成为一个育种专家或土壤学家，但对与组织这方面工作有关的问题他已作了透彻的研究。在这里，他同样热衷于刨根问底，发掘问题的实质。总之，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核物理学家本人那里了解到，他们时常惊奇于他对问题本质的瞬间把握。

他不需要搞清原子弹的结构或理论问题，有别的工作等着他做：必须建立渗滤厂，需要回旋加速器、加速剂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东西，缺少这些就无法制造原子弹。

他当时的工作量特别大。他和科学家们经常在我面前进行讨论，有时在我们家里，有时在郊外。他一直早起，九点之前看 3 个小时材料，接下来的一天便忙个不亦乐乎。组织问题的工作量是很大的。

为解决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在我父亲的建议下，1946 年实行了相关部门的合并，使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由我父亲领导的苏联部长会议特别委员会。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工作在战争时期即已开始，成立了专门实验室，建立了渗滤厂、核反应堆。条件尽管艰苦，但工作在继续。实际上从 1943 年起这些工作就已全面展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联的科学领先地位从来不容置疑。但是，当部分情报材料公之于众之后，便有人断言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从美国人那里偷学来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有时间能决定一切。情报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苏联科学家的负担，使他们得以在极短的期限内完成任务。

大家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那些为生产炸弹所必须的工业部门战后都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如果我们两手空空，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就开始我们的工作，出结果的时间就会晚上10年左右。

我们的科学家仔细研究了制造工艺并取得了成果。但我还要客观地说，我们的核物理学家没有仿效美国的原子弹。比如，我们的原子弹结构不同，这要归功于哈里顿院士。我们的原子弹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是的，核燃料都一样，都是钚。但是，简单说来，美国制造的弹头是在弹筒中发射出去并通过压挤而开始链式反应和释放能量。我们制造的弹头不需弹筒，而代之以球体的压挤。这是个较为复杂的结构，但却能产生最佳压挤效果，提供最优有效系数。

苏联科学家从情报部门获得的东西非常之多，最后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而且不仅仅核武器是这种情况。

流行观点认为，科学家们不知道西方类似工作进程的情报材料来自何处，应当指出这是不对的。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材料是情报部门搞到的，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知道获得这一情报的具体渠道。

而且，有几位西方大科学家费尽周折，被秘密地转移到苏联境内。我能说出几个人的名字。比如，布鲁诺·蓬捷科尔沃就是用潜艇从英国被送到苏联的。

摘自官方资料：

布鲁诺·马克斯·蓬捷科尔沃，生于1913年。苏联资料证实，他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获得者。是有关中子阻化及其为原子核所控、原子核同质异能性、微弱互动、中微子、天体物理学等一系列著作的作者。

他生于意大利，从1939年起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从1940年起他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工作。根据官方资料，他到苏联的时间是1950年。

蓬捷科尔沃在西方时即已开始从事类似的核计划工作。两位无线电学方面的专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潜入苏联境内，他们都是地道的美国人。

我还能说出数十人的名字，但是，我不认为我有权谈论他们。我可以解释个中原因。问题并不在于今天这些东西还是什么高级秘密，特工部门可能对他们的名字已了如指掌，但随便谈论他们仍是不妥当的。他们有子女、孙子孙女。我相信，只能对那些公开的情报材料发表言论，而既然国外和我们的报刊至今从来没有披露过，他们的名字就不应该被提到。

请回想一下刚好40年前美国对罗森贝格夫妇的审判。真是悲剧。因为疏忽或者愚蠢，赫鲁晓夫在美国承认了埃特尔和利利安·罗森贝格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有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如实作了回答。尽管他们没有承认曾经为苏联工作过，但还是被处死刑。美国特工机构只有他们向苏联提供原子秘密的间接材料，没有直接证据。如果不把赫鲁晓夫的供认考虑在内，在美国至今都没有这种证据。

而出卖罗森贝格夫妇的是埃特尔的弟弟。这一次他收入颇丰，为揭露自己的事业而获得了几百万美元。

有非常多的人都曾为苏联工作过，他们有的介入深些，有的浅些，其中也和实施核计划有关。但特工部门有自己的原则：一个国家永远不出卖为其工作的特工。这是应有的道德准则。诚然，我们正开始忘记他们。

我父亲在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很久便对铀计划产生了兴趣，这一决定就是根据特工部门从德国、法国、英国和稍后从美国获得的材料而作出的。据我所知，第一批材料来自1939年年中或年底的法国，内容是关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工作状况。当时来自德国的材料引起了不容置疑的兴趣。简言之，人所共知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铀会发生裂变，在其发生反应过程中可产生巨大能量，同时几个国家(我要强调的是德国、法国、可能还有英国)的物理学家立即开始明白，链式反应是可能的，而既然如此，就能够制造一种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能量的设备。换句话说，当时第一次涉及到了制造新式武器的可能性。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科技情报和经济情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完全可以理解，和"纯情报"领域里最高级的专家一起工作的还有重要的分析专家，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获得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递到他们手中。我想，对他们就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些最有意义的研究方向的趋势所作的综合研究整理，在今天对之作分析研究仍然是很有趣的。和内务部军官们一起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还有为数众多的技术专家、顾问，他们都是参加分析情报材料的专业人员。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参加审议鉴定的都是苏联著名科学家，比如说，有约费院士、卡皮查、谢苗诺夫以及他们的一大批学生。

材料逐渐汇集，时间一到，分析家们便得出结论：和我们苏联一样，在几个国家里，科学已将这一课题从幻想变为可以实现的预测。

关于我国科学家对制造新式武器的贡献容后再叙，现在我想

先说一点。当然,在战前的时候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情。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了解了制造原子弹前的那段历史。

我自己没想到在1939年年底的时候便接触到了未来武器的秘密。这时候我们家来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讲英语,我就以为他是英国人。他在我家住了大约两周时间。

父亲没有介绍他,只简单地说,这是个年轻科学家,叫罗伯特,为了解一些情况而来。就这些,再没说什么。

罗伯特个子很高,瘦削,30岁左右,长着一张很有个性的脸,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有可能是犹太人。而他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只能猜测了。

像通常一样,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而没有吩咐,这样的事情是不能问的。我知道,父亲的生活多年与情报机构联系在一起,如果认为有必要,他自己是会说的。

罗伯特懂德语,但讲英语更方便一些。我懂语言,因此,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而且,在罗伯特不出门的时候,父亲也让我留在家里,不去上学。他说,和你在一起,他不会感到过于寂寞。

我们的这位客人读的东西很多,而当他结束工作的时候,总是喜欢问我一些问题:苏联中小学如何授课,内容是什么,现在物理课的内容,还有数学和化学等。总之,是一个成年人的一般好奇。他向我演示了一系列速算方法。我明白,这个人一定与技术有关。

"他感兴趣的一切都告诉他,但你自己什么都不要问,"我父亲说。我们的相处就是这样,他问我答。一般而言,那些年我父亲从来不讲来我家做客的那些人的情况。

我已不能确切地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942年末还是1943年初,有一天桌旁坐着弹药人民委员万尼科夫、武器装备人民委员乌斯季诺夫,他们在谈新式武器。谈话涉及到美国正在加紧进行与一种破坏力极大的炸弹有关的研究。他们谈到核反应堆和其他有关事项。我当时也听到,这些工作在美国由罗伯特·奥本

海默领导。

我前一天刚从我学习的学院回来，对谈论的话题也很陌生，而当客人都散去之后我问父亲：

"你还记得几年前在我家做客的那个罗伯特吗……"

父亲当时没有告诉我他姓奥本海默。他简单地回答说：

"你还没忘？他来这里是为了建议我们实施你刚才听到的这个计划方案。现在他在美国工作。"

"战前在我家的那个人是秘密进入苏联的吗？"

"我想是的，否则后来就不会允许他在官方机构里负责这项工作了。"

我当时问父亲，他现在有没有帮助我们。父亲回答说，目前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除了他还有许多人在帮助我们。

摘自官方资料：

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物理学家。1943—1945年负责美国制造原子弹工作，后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基础研究所所长。苏联百科词典称他为制造氢弹的反对者，1953年被指控为对国家不忠诚，并被禁止接触秘密资料。

1967年逝世，享年63岁。

美国反间谍机构不可能证明他与苏联的合作，但是，对奥本海默的这些指控甚至见诸报纸杂志。他被禁止从事秘密工作，不给他提供研制氢弹的机会，指控他为俄罗斯人从事间谍活动。他的妻子是共产党员，有这一条即已足够。

当时在莫斯科，我没有同他说起他的出身履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4月22日生于美国纽约。他的父亲还是个14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从德国来到了美

国，可能是作布料生意发了财。一个波罗的海姑娘成了他的妻子，她叫埃拉·弗里德曼，一个艺术家，绘画教师。顺便说一句，他们家拥有很多藏画，其中也包括凡·高的油画。

罗伯特和他的弟弟弗兰克就在这个家里长大。顺便说一下，他弟弟也是一位科学家。

罗伯特从少年时起便是个多方面的天才。他写诗，甚至曾经幻想要成为一个诗人；研究物理学、化学、希腊语、拉丁语、历史等。

他只用3年时间便于1925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后来他像那个年代许多美国大学生一样，决定在欧洲继续自己的学业。于是他便到了剑桥大学，开始在卢瑟福领导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学生们因老师的眼睛将这位大科学家称为“鳄鱼”。彼得·卡皮查也是他的学生之一。他甚至在为这位科学家建造的剑桥实验室的墙面上画了一条鳄鱼，并略带机智地解释说，鳄鱼类似于科学进步，用颌骨啮碎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而且永不回头。

还在英国的时候就有人预言，奥本海默在科学上前程远大。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于1928年回到美国。在此之前，当地的几所大学对他在英国和德国发表的科学著作即已广为人知。奥本海默选择了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靠近旧金山。有人说，他作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是这个大学图书馆里存有大批法国16至17世纪的诗歌作品。

像许多西方科学家一样，罗伯特·奥本海默长期对政治事件漠不关心，只是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德国开始压制知识分子之后，他对政治的态度才有明显的改变。比如，他公开声援西班牙共和国。1937年父亲死后，罗伯特继承了大笔遗产，于是，他便在物质上积极帮助反法西斯主义者。一般说具有亲共产主义情绪是当时西方许多知识分子的特点。

还在1939年的时候他便对制造原子弹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他非常明白欧洲各实验室所做的科学发现的意义。从1941年秋

天开始，应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普顿的邀请，奥本海默开始在国家科学院特别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专门从事原子能军事应用课题的研究。正是在那个时候，白宫决定拨付巨款制造核武器。苏联特工机构及时将这一情况报给了莫斯科。

1942年，奥本海默率领一批理论家制造未来炸弹的模型。这个集体第一次认真研究了在轻核合成、特别是氢的合成过程中核能释放的可能性。这时所有的科研工作全都开始按统一的计划进行，这一计划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在此之前已和英国签订协议，授命美军正式组织英、美核物理学家的共同工作。

奥本海默本人也坚持这样集中起来，以赶在纳粹分子的前面。他早就建议将来自不同国家的物理学家集中到一个实验室里。1942年秋天“曼哈顿计划”主任格罗夫斯将军提议由奥本海默领导这个实验室，当时他38岁。

后来按照奥本海默的建议为这个实验室选了地点——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高原。

从1942年起，当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在美国集中核物理学家的全部工作并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之时，国家安全机构也在积极开展工作。据悉，奥本海默最初遇到的不快事件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他过去曾属于左翼政治组织，这一点他虽然并不隐瞒，但却给他在秘密实验室的工作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有人甚至向格罗夫斯将军报告说，出于安全考虑奥本海默不宜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领导岗位上。格罗夫斯之所以信任这位科学家，是因为他早已与共产党员断绝来往并从那以后和左翼分子没有保持任何联系。和反间谍机构的愿望相反，奥本海默被留了下来，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后来原子弹的制造工作顺利进行并在阿拉莫戈尔多地区进行了成功试验。在完全秘密的条件下将弹头的各个组成部分提升到安装在沙漠中的一个铁塔上。1945年7

月16日凌晨5点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8月,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一点也已家喻户晓。

同年10月,奥本海默不再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职务。氢弹的制造已由法西斯横行时期从德国移居来的爱德华·捷勒负责。奥本海默有一段时候主持了普林斯顿前瞻研究所的工作,后来成为原子能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9年他进入一个专门为研究美国轰炸机飞行员在高空拍摄的照片而成立的委员会,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痕迹,这一点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1953年底艾森豪威尔总统下达命令,“禁绝奥本海默与秘密材料的接触。”对这位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为共产党员提供物质援物,和他们保持联系,是一个女共产党员的情人并娶原共产党员为妻,接收共产党员参加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等等。总之,都是围绕这一点。几个月之后开始正式审理。审理进行了三周时间。那些日子奥本海默刚刚年满50周岁。

委员会不能证明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以及对这位科学家的其他指控,但最后判决如下:奥本海默不适宜担任任何与接近军事秘密有关的职务。他被立即开除出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呈递的上诉书亦被驳回。

安全委员会作出结论:“奥本海默没有完全依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原则行事,因而在未来有可能威胁这一安全;他不是个完全诚实的人;奥本海默在氢弹制造中的表现使人怀疑他在未来的行动是否会符合国家安全的要求。”

1963年,在这位科学家逝世前4年,原子能委员会重新审查了这一判决,为奥本海默颁发了恩利克·费尔米奖金,以表彰他为掌握和利用原子能事业所作的特殊贡献。但是,严格来讲,这还不能算为这位科学家完全恢复名誉。

爱德华·捷勒的命运却是另一个样子。

摘自官方资料：

爱德华·捷勒，1908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律师家庭。他先后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莱比锡求学。1934年在丹麦的博尔，1935年到美国，就读于华盛顿大学。

1941年他接受邀请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与奥本海默发生冲突而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违背奥本海默的意见，战后为自己新建了一个实验室，离洛斯阿拉莫斯不远。

他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和热核弹头的参加者。苏联有关资料表明，他"反对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们的冲突始于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不赞成捷勒研制热核炸弹，甚至解除了他参与研制原子武器的工作。最后他们彻底分道扬镳，奥本海默坚持自己的立场，捷勒千方百计要求制造氢弹。他在美国负责这项工作。美国政府当然支持捷勒。

1949年10月，奥本海默领导下的咨询委员会审查了氢弹制造方案，并得出结论，热核武器的制造会不可避免地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道义上的损失。爱德华·捷勒及其他几位科学家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特别热衷于这一计划的实施。1950年初，杜鲁门总统命令启动工作……美国第一次在地球表面完成原子合成反应是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岛上。

爆炸是在7点14分进行的，"迈克"(爆炸装置的代码名称)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大约达到1200万吨级，爆炸地点选在埃尼威托克的环状珊瑚礁岛上。但美国制造的这个弹头还不是便于运输的武器，其外型过大，急需压缩到炸弹大小的尺寸。

1953年8月20日苏联报刊登载政府声明："近日苏联进行了一次氢弹的爆炸试验。"诚然，我得知这一消息已是被放出狱之后的事了。

这是一枚真正的热核炸弹，因此，我们赶在了美国人的前头。

1954年，在伊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领导下世界上第一个核电站在莫斯科附近投入使用，开始供电。这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

罗伯特·奥本海默有一次说："我们是为魔鬼做完了工作。"是的，制造了最可怕的武器，所幸它没有进入纳粹分子的军火库。苏联没有选择，甚至二战之后我们都不能感到自身的安全。因此，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绝不是斯大林和我父亲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古怪要求。如果我们首先没有制造出氢弹这一武器，我们就只能跟在美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原子弹的制造史就是这样的，除了接受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克格勃驻东京机构工作人员斯塔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少校1981年8月以叛国罪被判死刑。在逃到西方之后，他主动将在莫斯科郊外情报学校学习的情况写成回忆录，公之于众。按这位原特工的话说，当他第一次从教师那里听到苏联洞悉"曼哈顿计划"秘密的历史时，他"惊得目瞪口呆"。美国人成功地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构保守了自己核计划的秘密，"曼哈顿计划"实施过程的情报却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被传送到苏联。

情报学校的老师举苏联情报机构的高效工作为例强调说，我们以这种方式赢得了几年的时间，否则，这段时间我们就会仰人鼻息，听美国人的摆布。

很可能，按照这一确实精采的模式还要培养不只一代特工，而且肯定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特工才这样训练。但苏联特工部门的业绩的确惊人。

当时帮助我们的人很多，例如，克劳斯·富克斯。后来这位科学家被迫承认曾为苏联工作过。但是，我重申，这远不是惟一的情报来源，我们有数十位像富克斯这样的人。

摘自官方资料：

克劳斯·富克斯，按西方情报机构的说法，是苏联最有价值的间谍之一。

1911年10月29日生于靠近多特蒙德的吕瑟尔斯海姆市的一个著名新教宗教活动家、埃米尔·富克斯神学博士之家。他的父亲是年轻时即加入了德国社会党的首批神职人员之一。

1928年，克劳斯·富克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获得了奖章，然后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德国社会党。纳粹当政之后他潜入地下。1933年7月德国共产党派他去巴黎，而后又派他到了英国。

他在同情苏联的著名企业家罗纳德·哈恩的家里住了3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学家涅维尔·诺特的实验室工作。1936年12月他25岁的时候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而后由涅维尔·诺特博士推荐继续在马克斯·博恩教授的实验室工作。在爱丁堡大学，他和博恩共同撰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

1940年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被拘押，被安置在马恩岛的集中营里。后同其他被拘押的人一起被转到加拿大，监禁在魁北克的集中营里。在企业家罗纳德·哈恩和几位著名科学家的斡旋之下于1940年12月底返回英国。

1942年初，克劳斯·富克斯加入英国国籍，并被吸收参加与制造核武器有关的秘密工作，分在德侨物理学家派因尔斯的工作组里。

从活动方式上他负责监视在纳粹德国进行的类似工作，得以长期接触英国秘密情报处驻外机构发回的绝密材料，特别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从科学家保罗·罗斯巴乌德那里获得的情报资料。

从1943年12月起，在美国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美

国核计划,即“曼哈顿计划”。1943年至1946年,克劳斯·富克斯和派因尔斯小组一起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汉斯·贝捷手下工作,6月份转到英国的哈鲁埃尔,那里已经建成了一个新的动力装置。

1950年1月被捕,同年3月1日伦敦法院判处他14年监禁,1959年6月24日提前获释。

48岁的时候转到东柏林,两天后取得民主德国国籍和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1972年起为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75年获国家一等奖金,荣获卡尔·马克思勋章。

1988年2月28日逝世。

“全体苏联人民都应感激克劳斯·富克斯为苏联物理学家提供了内容详尽的情报,”直到不久前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院士才这样承认说。“在苏联,像一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有关的情况一样,这种帮助总是秘而不宣的。1959年富克斯获释之后,我去找乌斯季诺夫,请求奖励富克斯为苏联所提供的帮助。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政府和党内都身居高位,并密切注视着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表示同意,这是应该做的,又说,想一个奖励办法。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

有人说,几年前在苏联刚开始谈论克劳斯·富克斯的时候,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院士令人不解而又十分气忿地嘟哝说:“富克斯?好像搞了些东西,但没一点实质性的……”亚历山德罗夫在伊格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死后负责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领导多用途核反应堆研制计划近30年。

部分资料表明,亚历山德罗夫科学院院长的前任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也不喜欢提到克劳斯·富克斯。原克格勃不无根据地

认为，安全机构关于奖励苏联特工的建议正是他给“砍掉”的，其理由是这一奖励会给“苏联科学家投下阴影”。

众所周知，有一点是可信的：根据尤里·哈里顿的过迟的承认，为苏联核计划的实施做出重大贡献的克劳斯·富克斯的确一直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表彰。而且，据目击者证明，在“兄弟”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克劳斯·富克斯的葬礼上没有一个苏联代表参加。

其实这并不奇怪，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场合是极其始终一致的。还在1950年3月，在这位苏联特工被判刑之后，苏联政府便迫不及待地急于与富克斯脱钩。

摘自1950年3月8日塔斯社消息：

路透社报道了近日在伦敦对英国原子科学家富克斯的审判过程，他因破坏国家机密被判14年监禁。在审判中，作为公诉人的英国总检察长绍乌克罗斯声明，似乎富克斯向“苏联政府间谍”提供了原子方面的秘密。塔斯社被授权宣布，这一声明纯属愚蠢的虚构，因为苏联政府对富克斯其人一无所知，任何苏联政府“间谍”和富克斯也没有任何关系。

在当时的1950年，无论我们怎样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一声明多半是着眼于情报机构的利益而作的辩解。要知道，原驻丹麦苏联特工头子米哈依尔·柳比莫夫上校根据他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多年任职经历所作的结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说：“特工是一个伪君子的职业……”但是，苏联政府以及亚历山德罗夫之流在70、80年代的伪善行为又作何解释？

据我推测，在某种程度上被迫采取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因为担心会给“苏联科学家投下阴影”和需要正式承认苏联情报机构在苏联核计划实施中做出的不容置疑的功绩。不管当时党的上层愿意

与否，不可避免地还需要承认对苏维埃制度更为可怕的一点，即承认掌握苏联整个情报网达15年之久，如今已被革出教门的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作用，而这无论如何是与苏联领导人的打算不相调和的。

美国人认为，克劳斯·富克斯帮助苏联加快解决原子弹课题3到10年时间。他们断定，从富克斯处获取的情报使我们得以先于美国着手热核武器的工作。我只能说，这位科学家的确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哈里顿院士就这样写道："富克斯和其他特工所提供的情报包括了为制造核武器所必须的宽广的科学技术各分支的范围。例如，核反应堆中在强流体作用下形成钚，各种算式，最后还有美国第一枚核弹头详图。"

我所要补充的是，富克斯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关于制造氢弹工作过程的情报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这一工作是在读者已熟悉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捷勒的实验室进行的。

官方材料表明，克劳斯·富克斯走向与苏联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美、英两国制造核武器的全部工作都对自己这个反希特勒集团中的盟国严格保密。这位反法西斯科学家出现在苏联情报总局驻伦敦军事情报处，并开始提供有关情报。例如，尤里·哈里顿院士便持此说。按照其他材料的说法，苏联情报机构与富克斯建立联系是在1941年的秋天。原则上这一信息与官方说法相去不远。无论如何，我们最有可能断定的是，就在这个时期吸收了这位德国反法西斯科学家。1942和1943年，克劳斯·富克斯积极与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驻外机构合作，而后又与国家安全部、再以后是克格勃的第一局（对外情报局）合作。

与富克斯的关系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通过德裔女人乌尔苏拉·科辛斯卡娅建立的。

摘自官方资料：

乌尔苏拉·科辛斯卡娅，苏联女特工，工作假名为“索尼娅”。她借助于设在家中的无线电发报机向莫斯科发送原子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送来的情报。她家离牛津不远。富克斯受审之前不久她携子女逃到苏联。而后她住在民主德国，两德合并后住在联邦德国。不久前，85岁高龄的鲁菲·韦尔纳（乌尔苏拉·科辛斯卡娅）声称，她不认为自己是德国的叛徒，从17岁加入共产党开始，她就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只有出于思想意识才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位苏联女特工承认说。

在美国，与富克斯保持联系的是间谍“赖蒙德”——美国公民哈里·戈尔德。通过他输送到总部的情报有在田纳西州橡树岭渗滤厂的建设情况，战争年代英、美原子科学家所进行的科研工作情况等等。

回到英国之后，富克斯提供了关于温茨凯勒钚生产化工厂和原子核反应堆最为详细的情报，以及分解同位素企业建设计划、氢弹原理图。他向莫斯科报告的有关美国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珊瑚岛地区所作的铀—钚炸弹试验结果的绝密材料和铀核反应堆在空气冷却和水中冷却操作情况的对比分析对苏联科学家非常实用。顺便说一下，苏联间谍富克斯出席了1945年6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

这位核物理学家与苏联情报机构的合作几乎持续到1949年的夏天。与此同时，美国反间谍机构已对以各种方式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全部人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克劳斯·富克斯便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视野。纳粹分子上台后他参加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被发现，这位反法西斯科学家的亲苏倾向暴露无遗。当时即已弄清，在盟军缴获的盖世太保的档案中，克劳斯被列为210号。

占领当局计划，在苏联领土上一旦发现这位物理学家就立即将其送交德国，他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

今天，在独联体各国对苏联间谍富克斯在此之前的被捕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原来，对这位科学家的揭发直接与“维诺娜”有关(苏联安全机构有数千需要解密的业务代码名称)。早在1945年9月的渥太华，苏联大使馆密码员伊戈里·古津科出逃。他向西方提供的情报多数都与情报总局在北美的活动有关，并包括这次所谓的原子间谍事件。3年之后，美军安全处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解码专家梅列迪特·加纳德得以对苏联电码的深层秘密进行探究。在叛逃者古津科提供给加拿大当局和美国专家破译的一份密码电报中，便包含有“瞄准”克劳斯·富克斯和他住在剑桥的妹妹克里斯特尔的内容。1945年“赖蒙德”(哈里·戈尔德)来过她的住宅。他从1936年起便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合作，而这次的行动并非没有人注意。供出这位联络员的是一个名叫伊里莎白·本特立的女人，而“赖蒙德”又同样供出了富克斯。

美国方面坚决要求将案件移交美国法院，但英国人没有这样做。这位苏联间谍以后的命运读者已经知道。

有不少人向苏联提供核秘密。显然，只要回想一下莫里斯和劳恩·凯恩即已足够，他们多年来一直以彼得和海伦·克罗盖尔的名字为美国特工机构所知。他们曾进入罗森贝格夫妇小组工作，而在他们1961年被捕前的最后6年时间里一直与苏联著名特工戈登·隆斯德尔中心保持联系。

摘自官方资料：

戈登·隆斯德尔，真名为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苏联特工。战时和战后在西方几个国家工作了几年。战争结束时他在柏林，负责保障苏联特工机构驻外负责人在德国首都和总部之间联系的畅通。他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盟国与党卫

队沃尔夫将军进行单独谈判的情报。后来他参与了“原子”间谍活动。

1970年在莫斯科市逝世，年仅48岁。

西方资料表明，莫里斯·凯恩是在西班牙被苏联特工吸收的，他正在共和军一方参加战斗。他先是在美国，而后又在英国向莫斯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在英国，凯恩夫妇以日益兴旺的旧书商人为掩护开展工作。在安全机构第五军事情报处对其在伦敦郊外的寓所进行搜查时，发现了装在手电筒中的功率极强的发报机、高频接收器、密码簿、高精确度计算器、为加快反应而用在胶片上的磁铁氧化剂。

戈登·隆斯德尔(科农·莫洛德)1961年被判25年监禁。他的亲密助手凯恩夫妇(彼得和海伦)曾与克劳斯·富克斯和罗森贝格夫妇有牵连，被判20年监禁。

后来在1969年，莫里斯和劳恩·凯恩夫妇获释，用以交换杰拉尔德·布鲁克，他因散布反苏宣传而在莫斯科被捕。他们夫妇现生活在莫斯科。几年前，英国电视台与苏联克格勃合作，以这几位苏联情报机构的“原子”间谍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电影——《奇怪的邻居》。

也许，说出完全无偿地为苏联提供美国和英国核计划基础机密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的时代已经到来。克劳斯·富克斯就是这样做的，其他许多人也拒绝了物质奖励。这经常作为这些人与苏联合作的条件之一。

不过，安全机构为部分苏联间谍还是支付酬金的。美军现役军人戴维德·格林戈拉斯在洛斯阿拉莫斯服役，当时富克斯在那里工作。格林戈拉斯得到了一大笔酬金，但这位间谍所提供的情报还是物有所值的。

戴维德·格林戈拉斯是埃塞尔·罗森贝格的哥哥，在妹妹家庭

的命运中他刚好起了非常不幸的作用。与朱利斯·罗森贝格有这种关系，他不仅自己承认与苏联特工合作，同时也向反间谍机构出卖了妹夫。埃塞尔和朱利斯成为惟一在电椅上结束自己生命途程的苏联间谍。此事发生在1953年6月19日，地点是纽约辛辛监狱。

但是，现在已经清楚，曾和戴维德·格林戈拉斯共过事的一个人还活着，这就是原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而准确说来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驻外机构的人。看来，有一点也需要澄清。在美国人们都叫他阿纳托里·雅科夫列夫，而这位苏联间谍真实的名字是阿纳托里·亚茨科夫。直到不久前他才承认，他从克劳斯·富克斯和罗森贝格夫妇那里都获得过情报。

摘自官方资料：

阿纳托利·亚茨科夫，1941年起在纽约工作，“住在”苏联领事馆内。他是以外交官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的身份来到美利坚合众国的。

1943年以后他全身心投入“曼哈顿计划”的工作。后来他负责克格勃特工教育系，1985年退休。

这位特工向“华盛顿邮报”承认，联邦调查局能够发现的在美国活动的情报网“只有其中的一半或者还要少些”。

总之，被发现的还不是很多。阿纳托利·亚茨科夫，这位特工机构军官本人在罗森贝格夫妇败露后不得不离开美利坚合众国。在法庭上甚至听到了他的名字，尽管他用的是编造的假名。

为西方所知的还有另一个名字——阿纳托利·戈尔斯基。他是在伦敦工作的苏联特工，他负责与著名的“剑桥五杰”之一多纳德·马克林联络……

摘自官方资料：

多纳德·马克林是苏联国外特工机构最有成效的情报组成员之一，几年中他向苏联提供了西方几个实验室核研究过程的有关情况。

他的父亲马克林先生是名律师，自由主义分子，苏格兰族人。30年代初他在詹姆斯·麦克唐纳的政府内领导教育委员会。

他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兴趣还是在他进特里尼蒂的霍尔高等学校之前，被苏联间谍伯吉斯吸收大概是在1933年。在英国外交部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从1938年9月起任英国驻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从法国回国后便升了官，先后任英国外交部二秘、总局参赞。从1944年春起出任驻华盛顿使馆一秘，负责英、美科学家合作实施核计划事宜。1947年2月起进入政策合作委员会，专司英、美、加拿大之间核政策的协调工作。

由于担心被捕，他和伯吉斯一起于1951年逃到苏联。直到5年之后，苏联政府才承认马克林和伯吉斯已获准在苏联避难。

在苏联居住的最初几年他在古比雪夫教书，后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在苏联期间，他撰写了《苏伊士之后英国的外交政策》一书。

在"原子"特工中间还有一位英国人叫约翰·凯恩克罗斯。他本人曾任汉克勋爵的秘书，后者主持过英国科学委员会的工作。从1940年秋天开始，与利用铀—235制造核武器有关的问题便不止一次地在其会议上讨论过。一年以后，成为在英国成立的"tube alloys"("管道合金")咨询委员会成员，战争期间，这个委员会与实施美国核计划工作的科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于是，有关

核研究的情报便被不断地送到我国情报中心。

诸位读者在“特工迷宫”一章中还会遇到多纳德·马克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而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在那个年代里为苏联工作的另一位英国人——阿兰·南·梅伊。他是位亲苏的英国科学家，从1942年起在加拿大从事核研究工作。他是在二战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主动要求为我们工作的。

与梅伊合作的是情报总局，在一次会面中这位间谍带来了关于核武器研究的秘密报告、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的情报以及浓缩铀的样品。这使军事特工机构驻渥太华的负责人极为震惊。而且，情报总局这位上校据说在与梅伊合作期间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感觉，他也因为这一间谍活动而连续获得两枚战斗勋章。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物理学家、意大利侨民布鲁诺·蓬捷科尔沃。根据克格勃第一总局材料，这位核物理学家1943年开始提供关于西方同事们工作的绝密情报，当时他在从事原子课题研究的蒙特利尔英、加小组工作。专家们认为，他和克劳斯·富克斯一样，都为保障向苏联提供最重要的情报做出了特殊贡献。

但仅仅是他们吗？无论是在独联体还是西方，曾用过“帕耳修斯”这个假名从事间谍活动的物理学家至今仍流传着不少歪曲的言论。被原特工们证实的部分资料表明，此人在克劳斯·富克斯到美国之前一个半月的时候即已开始在“曼哈顿计划”内工作。他是谁，暂时只好猜测。阿纳托利·亚茨科夫声称，这个苏联间谍所幸还活着，这一情形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这一点似乎也能解释其他的一切。

是的，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利坚合众国核计划秘密进行了成功渗透，有人十分准确地将其形容为美国原子“裂变”，这一戏剧性事件至今仍充满着神秘和不解之谜。尽管“冷战”似乎已经过去，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那些遥远事件的参与者都已所剩无几，但他们好像并不急于揭示那些“画面”。毫无办法，特工部门这样做有

其众所周知的重要理由。

今天几乎已无人记得我们同盟国之间有一个交换军事和科技秘密情报的协议。这一协议在战争初期即已签订。1943年夏天，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晤时签订了在核动力领域共同工作的秘密协议，其中有一有趣的直接涉及苏联的小小条款：双方商定不将自己的秘密告知第三国。我们已经知道，将苏联排除在原子计划之外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我们的科学、政治、军事情报机构的工作非常出色。当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伊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甚至专门写了一封信，以科学家的名义向特工们表示谢意。

*　*　*

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特工，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苏联制造核盾牌的历史中都有自己的特殊位置，似乎只有一个人被排除在20世纪武器制造者的名单之外。但是要知道，在半个世纪之前，正是他，我的父亲处在核计划课题的顶端。无论今天怎样描述这位原特别委员会主席，对这项宏伟计划向国家负责的正是我的父亲。在他的手中聚集了巨大的科学潜力，还有特工机构。这是否有必要改写过去的历史？

很遗憾，在我获释出狱之后，我和伊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只见过两次。我们对我父亲在制造核武器中的作用谈了许多，还谈了我们认为的辉煌时期，即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通过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于史无前例的极短期限内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当时我从伊戈里·库尔恰托夫那里了解到，像他一样，鲍里斯·里沃维奇·万尼科夫和许多其他曾与我父亲一起参加核计划实施工作的科学家都被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叫去，并要求："请提供指控贝利亚的证据！党必须证明他的丑恶作用！"

像库尔恰托夫一样，大多数与我父亲共事多年而了解他的科学家都拒绝参与这出闹剧，从而使我又一次确信这些人诚实和正

直的品行。我只能猜测他们每个人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却是舍己为人的壮举。

大概，惟一他们不得不让步的是不能将这些回忆公之于众，但这是他们迫不得已的。

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我重申，每当我回想起那些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科学家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亲切。他们非常了解我父亲，眼见他身处危境。他们对他的评价、救我出狱、千方百计提供帮助，这一切对我非常重要。我不能接受这些人的物质援助，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而我时刻能感受到的精神支持对我最为重要。读者大概能够理解我这一点。

第九章　女大公之谜

一、尼古拉二世之女大难未死，还在人间？

“6月5日，星期二。亲爱的阿纳斯塔西娅已满17岁了。我们全家人在喝茶前散步。从昨天起，哈里托诺夫给我们做饭，每天送两次吃的。女儿们向他学习做饭，晚上揉面，早晨烤面包，烤的不错！”

“6月14日，星期四。我们亲爱的玛莉娅已过19岁。我们和衣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整夜未眠。一切都起因于我们最近接连收到的两封信，信中告知我们要做好准备，忠于我们的一些人要把我们劫走！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期待和半信半疑是非常折磨人的……”

“6月30日，星期六。在托博利斯克之后，阿列克谢第一次接受治疗。他的膝盖开始痊愈，但还不能完全伸直。天气温暖而令人愉快。没有外面的一点儿消息。”

俄罗斯最后一位君主的日记记载到此猝然中止，几天之后，尼古拉二世、他的全家及其亲信人等被枪毙。

关于沙皇一家的悲惨命运，现在的文章很多，人们也经常谈论。与此相关的我可以讲一讲战后3年或4年我所经历的一件有趣的事。

但是，我首先要提醒诸位读者注意与叶卡捷琳堡地下所发现的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遗骸有关的几个细节问题。

1991年，世界报界报道了在叶卡捷琳堡附近轰动一时的发现。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对死于子弹和刺刀的9具遗骸进行了精心细致的研究工作。俄罗斯科学家对找到的骨骼进行复原，确定其年龄、性别，对其生前照片和颅骨照片进行微机处理对比。俄罗斯法医主任鉴定师弗拉基斯拉夫·普拉克辛宣布，从沙皇一家及其周围人的9具骨骼中能确定为其本人遗骸的有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和医师博特金。来自美国弗罗里达州的专家大概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992年，为建立纪念堂，在叶卡捷琳堡沙皇一家被害的地方树立了第一块纪念碑。出人意料的是，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罗曼诺夫大公家族成员并未莅临乌拉尔。大牧首宣称，在暂时没有明确将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尊为圣徒之前，他不能出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实际上，他正在将遇难者列入圣徒的行列。这一解释没有引起歧议。而大公家庭成员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声明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声明称："我们不想给社会舆论一种藉口，认为我们的到来就是承认在叶卡捷琳堡郊区发现的遗骸就是沙皇的一家。现在还存在疑点，不能确定……"

不过，嘈杂的报界没有注意到一声孤单的令人不安的铃声，似乎谁都不想抛开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宣布将这一真假未定的遗骸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独联体报界报道说，是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大公的遗孀列奥尼达·格奥尔基叶夫娜女大公向鲍里斯·叶利钦提出这一请求的。

"我们想要的只有一点，"女大公写道，"为了俄罗斯的纯洁，在阴险杀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这一事件上恢复真相和公正。"

接下来事件的发展是这样的。英国报纸报道："英国科学家协助破解1991年在离叶卡捷琳堡不远处发现的人体遗骸的秘密，认

为它们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沙皇家人的骨骼。帕维尔·伊万诺夫博士从苏联科学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取得骨样，带到英国，在英国南部奥尔德马斯顿市的研究中心开始了艰难而精细的试验过程，并得到法医机构的支持。采用的聚合环式反应法在保障遗骸认证方面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方法又以 DHK(脱氧核糖核酸)加强法之名而为世人所知。这一方法可以在一般研究 DHK 试样数量不足或质量不高的情况下用于试验头发、骸骨、血液或布料。科学小组的第一任务便是在被发现的骸骨中取得 DHK，确定五具骨骼同属于一个家庭的成员，然后科学家便可以对骸骨中的 DHK 与罗曼诺夫家族直系后裔的一缕头发中的 DHK 进行比较。"

这一轰动一时的消息在 1993 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揭穿。英国报纸《星期天邮报》报道说，奥尔德马斯顿实验室成了"俄罗斯方面预谋骗局的牺牲品。英国学者在为认证同一性而对俄沙皇家庭成员的遗骸进行研究之后宣布，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假的。"而且，报界并不排除这些遗骸是那些善于经营投机生意的人计划在沙皇家人埋葬地搞旅游而大捞一把事先"埋下的"。报刊上甚至出现过几位著名俄罗斯官员的名字，他们幻想采取声势浩大的措施来安葬沙皇一家，并迎接可能莅临的英国女王。不过，这一切都已超出了本话题的范围。

我已经讲过，我经历的那件事发生在战争结束的几年之后。在此之前我已从军事学院毕业，成为军官，在莫斯科服役。军人的自由时间不是很多，但只要有可能，我总是愿意光顾剧院。妈妈知道我的这一嗜好，有一天提议说："谢尔戈，我们今天去看剧。在大剧院上演《伊万·苏萨宁》"。

"妈妈，"我说，"我可不是斯大林，只有他能把《苏萨宁》听上 40 次。"

而斯大林确实对他喜欢的歌剧百听不厌。

"走吧，谢尔戈，"妈妈劝我说。"我让你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人。"

我们的座位在第六或者第七排，离坐着一位陌生女人的包厢很近。

"我就是因为她才劝你来的，"妈妈说。

我看到，这位女人已满头白发，身穿黑色衣服，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整个演出时间她从头哭到尾。

"你知道她是谁吗？"妈妈问我。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是尼古拉二世的女儿，女大公阿纳斯塔西娅。"

这当然出我所料，我只知道沙皇全家还在1918年的时候就在乌拉尔被枪毙了。

"到家时我全告诉你，"妈妈答应我说。

那是战后的莫斯科，大剧院。而面前出现了原来并不存在的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女大公殿下。这里离克里姆林宫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在这夜晚时分，斯大林总是在那里工作。正是那个斯大林，数十年来作为这个制度的化身，剥夺了千百万"阶级敌人"的生命，把他们在磨盘中辗碎。多少贵族、沙皇的官员和军官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送命……而这里坐着俄罗斯末代皇帝的一个女儿！

摘自官方资料：

多年来，一直流传着关于女大公奇迹般获救的各种相互矛盾的传说，我们发现，话题总是涉及阿纳斯塔西娅，而非塔季扬娜、奥莉嘉、玛莉娅。

正是在所谓改革时期的公开化的年代，苏联报刊出现了新的说法。以一个名叫叶夫根尼·帕尔哈诺夫的原集中营囚徒说法为根据，记者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大概是1952年，当这位在押犯还在臭名昭著的喀山精神病院的

时候，他了解到，“在这个封闭的和对外严格保密的机关里终身关押着由于各种理由都不能枪毙或关进集中营的一个人，据说这是贝利亚本人亲自签的字”。

好吧，就让我们从“贝利亚本人亲自签字”开始说起。读者已经知道，1952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原人民委员与集中营、监狱和监狱医院系统已没有任何关系。提到这个名字很可能只是为了像俗话所说的显得“妙语横生”。这位退休者在回忆中所作的另一定论更为令人生疑。请问，那个年代有什么人不能“枪毙或关进集中营”，就算由于“各种原因”？大家都知道，极权主义国家大概从来不会出现这类难题。

但是，我们还是回头来看一下帕尔哈诺夫先生的回忆。“甚至打扫厕所的女清洁工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少尉军衔，全部服务人员都有军官军衔”。

我们且不去计较这一点。不去计较到这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差不多已有7年时间并不存在了，甚至也不去计较女清洁工招摇地戴着军官肩章。在“精神病院”的病员中各种各样的闲谈碎语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关于“不受拘束的病员”的谈论。令人感兴趣的是另一点。报纸通过援引这位直接证人的话说明了一件事，即在这个封闭的医院里几乎从1917年起就关押着几个人，他们远不是像您想的那样疯疯癫癫的。

这是对秘密的第一次触及？

“我住在六楼也是最高一层的病房里，而这两个人是从一楼最有特权的那一层来的，他们经过多年斗争和绝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医院范围内自由活动的权利。我还逐字逐句记得我们的谈话：

“‘您是俄罗斯人和正教徒吗？’

“‘是的，我甚至还受过洗礼。’

“‘我们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明天是我们全俄罗斯的重大节日——罗曼诺夫王朝命名日。您明白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吗？是罗曼诺夫王朝300年大庆。’后来他又改正说，‘是罗曼诺夫家族和死在叶卡捷琳堡伊帕季耶夫宫我们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大人及其家人的节日。而为此我们应当献给我们沙皇家人中幸免于难的一个女儿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罗曼诺娃公主一份礼品。所以请您将包裹中的东西作为礼物分给我们一份。’于是，他们用磨薄的铝勺切下一块蛋糕、香肠，拿了些糖和蜜饼，将所有这些东西用纸包起来，然后走了。临走前他们又说了一句：‘您明天上午10点从您的窗户可能有幸观看到命名式。’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病房门口始终站着一个卫生监督兵，认真地听我们的谈话。”

回忆录的作者肯定说，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952年1月14日至20日之间”。按照帕尔哈诺夫的话说，第二天这位在押犯看到，四对身着黑色套装的男人排成菱形走到喀山医院妇女病房的门前，为首的便是前一天晚上来他病房的那个老头。

“后面站着身穿白大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尉。整10点的时候，阿纳斯塔西娅由两名宫廷女官恭敬地搀扶着走下台阶。她穿着丧服，戴着厚厚的面纱，长长的拖地后襟由两个跟在身后的女孩托着，而第三个女孩走在队伍的最后。她们在离小门5米远的地方停下，和男人之间还有一半的距离。大尉打开门，男人们走向阿纳斯塔西娅，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单膝着地跪下。她走到他们跟前，他们向她祝贺节日，献上礼物。”

下面援引的还是那位原犯人的话：

“他们所说的话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尉录了音。阿纳斯塔西娅将手伸给一个男人，他吻了她的手，尔后她拥抱他，三次吻了他的脸颊。然后女士和男人们彬彬有礼地互相鞠躬，各自散去。”

回忆录的作者肯定说，被他称为喀山医院犯人的许多患者都观看了仪式的整个过程。各位注意到没有？整个仪式都是在行政机关的眼前进行的，应当认为是得到它的准许的，而且还录了音。为什么？谁要听这个录音？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是惟一的问题，当然也远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阿纳斯塔西娅怎么会在皇帝一家被杀几十年后出现在喀山“精神病院”？

根据叶夫根尼·帕尔哈诺夫的论证，报界向读者提供了下面的说法。据说还在沙皇一家被捕之前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去了教父的庄园做客。这位公爵在得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人被捕的消息之后，试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越过芬兰边境，但被抓住了。逃跑者被带回原地，人们好像将此事向列宁做了报告。叶夫根尼·帕尔哈诺夫从一个原军队飞行员的犯人和其他几位喀山精神病院的长住人员那里听说，列宁曾下令对阿纳斯塔西娅“无论如何不能枪毙，并将她安置到一个封闭式的特别幼儿园里。”公爵被押进监狱，这一事实较为近乎情理。至于“封闭式特别幼儿园”，我怀疑1918年的时候俄国是否存在这种东西。

不管那里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传说依然到处流传。就像在“古老的善良年代”，列宁就是人道的化身，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枪毙！”他的继任者们忠实地执行了伟大领袖这一遗嘱，允许被害沙皇的女儿颐养天年，尽管处在与世完全隔绝和严格保密的条件下，

但活着！而且还有宫廷女官、仆人等等。

只是这一切与保守国家机密没有结合好。有了如此众多的见证人，这些人说不定哪一天会走出“精神病院”的高墙，还谈何机密……。

唉，这一切确实都是杜撰。如此而已。在喀山没有发现女大公在那里逗留多年的任何痕迹。

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一个对俄罗斯历史稍感兴趣的普通人，随时都能再讲出两三个关于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奇迹般获救的传说。也和“喀山的故事”一样，这些传说都没有一个获得过文献的证明。但是，无风不起浪。不管你是否愿意，你会一再地去想：为什么在所有场合下总是要谈到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

最近几年来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在苏联报刊上抛出大量冒充历史研究的令人生疑的说法，这些显然是“炒作出来”的轰动性真是不可胜数。比如，认为“尼古拉二世于1957年2月6日逝世”，这样的见解有何价值？据说这是里加的某位法学家在研究两年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偶然认识的一个人告诉他，在苏呼米住着的别列兹金一家确实是皇家后裔。尼古拉二世本人住在阿布哈兹，化名谢尔盖·达维多维奇·别列兹金，在去世前不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位初露锋芒的研究者没有在生时见到本人，但他找到了一些人，他们据说在别列兹金—罗曼诺夫处见到过刻有“尼古拉二世”像的金表，还不止一次听到过与这一家庭相伴的某些秘密。如果相信这些文字，那么，谢尔盖·达维多维奇曾因故坐过牢；而从20年代起开始在铁路部门工作；后来又先后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食堂、茶叶和柑桔科研所工作。传说在他死后，其墓几次被掘，还录像拍了电影。报刊上说，几年前在苏呼米，几位别列兹金—罗曼诺夫的后代相继过世，其长女已年过90。女大公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名。

据说这一令人吃惊的故事还有文件作证。苏联报界肯定说，

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法医鉴定实验室为别列兹金和罗曼诺夫的照片做了同一认证。

请问，在叶卡捷琳堡被枪毙的是谁？是他们的替身！在执行枪决那天将沙皇一家从伊帕季耶夫宫提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尤罗夫斯基。我们还会谈到这个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话。而现在让我们回到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问题上来。按照那一说法，尤罗夫斯基完成了中央交待的指示。为执行布列斯特条约的秘密条款，苏联政府保全了皇帝及其亲人的生命。换言之，这涉及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机密。

机密？可能是吧。诚然，我知道的是别的情况。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都被枪毙了。提议要枪决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呢？他也要求执行枪决，尽管捷克白匪团或其他人劫走沙皇一家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是后来编造的……。我说的这些都是从我父亲那里了解的情况，而他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听来后讲给我听的。

枪毙孩子、妇女……这当然是极为卑鄙的行径。我父亲也这样认为。我听说，就连斯大林也不支持这一决定。据说他是这样说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沙皇本人也许应该枪毙，而包括孩子在内的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必要。无论如何，斯大林是这样认为的。我重申，列宁坚决要求枪毙他们。

这里还有一个列宁参与杀害沙皇一家的证明！但是，诸位读者，今天有人向我们讲，说这一切都是叶卡捷琳堡苏维埃的罪过。据说是他们通过了执行枪毙的决议。糟糕的是，乌拉尔人让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面对可悲的既成事实。是的，也应该，应该枪毙这些恶棍！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于工农政府州苏维埃主席团机关。鉴于

敌人日益逼近叶卡捷琳堡和非常委员会对白卫军企图劫走原沙皇及其家人重大阴谋的揭发(文件在我们手中),根据州执委会决议,尼古拉·罗曼诺夫已于7月15日夜(电文如此。实际上对罗曼诺夫末代家族来说,其大限临头是在1918年7月16至17日之夜)被枪决,其家人已转移到一个可靠的地方。为此我们特作通知如下:'鉴于反革命白匪日益逼近乌拉尔红色首府和企图复辟登基的刽子手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判(企图劫走他的白卫军阴谋被揭穿,并找到了一些污蔑性文件),州苏维埃主席团决议决定,枪毙无数次血腥镇压俄罗斯人民的罪魁祸首原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1918年7月15日夜执行了判决。为了社会安全利益,和他一起被拘禁的罗曼诺夫一家已被关押起来,并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城外。州苏维埃主席团。有关阴谋的文件立即派通讯员送达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请速答复,我们在机关专候'。"

这里还需要什么解释吗?厚颜无耻,这绝不是斯大林在其个人统治时期引入的异物,绝对不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一切在列宁时期即已开始。

而莫斯科又作何反应?

"今天我将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你们的决定。无疑它会得到批准。"

这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大家听取了关于枪毙尼古拉·罗曼诺夫的消息(来自叶卡捷琳堡的电报)之后经讨论作出决议如下:主席团承认乌拉尔州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现责成斯维尔德洛夫、索斯诺夫斯基和阿瓦涅索夫同志草拟报纸发布的有关报道。"

这是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那天夜晚所举行的会议记录中摘录出来的。

在我们看来，与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命运有关的其他若干文件材料也是很有趣的。让我们援引1918年7月19日《消息报》的一则报道：

“7月18日，第五届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主席。议题是枪决尼古拉·罗曼诺夫。大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宣读了刚刚收到的乌拉尔州苏维埃专线发来的关于枪毙原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的报告。最近一个时期，乌拉尔红色首府叶卡捷琳堡受到了日益逼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匪帮的严重威胁。同时，企图从苏联政权手中夺走这位业已登上皇位的刽子手的反革命阴谋被揭穿。鉴于此……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妻子和儿子被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停！妻子和儿子。女儿们呢？没有一句说到直到最后时刻仍与俄罗斯皇帝呆在被布尔什维克没收的伊帕季耶夫工程师的别墅（在正式文件中该楼被称为有特殊用途的房屋）里的人们。不奇怪吗？塔季扬娜、奥莉嘉、玛莉娅、阿纳斯塔西娅在哪儿？最后，博特金医生、女侍杰米多娃、厨师哈里托诺夫和仆人特鲁普又在哪儿？

通过对已众所周知的文件、西方卷帙浩繁的资料和不久前俄罗斯安全部刚刚公布的材料进行分析，我试图细线条地展示一下事件的真实画面。

退位之后，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失去克伦斯基政府允许他和他的家人去英国的希望。英国政府准备接纳前盟国首脑、格奥尔格五世表兄一家，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克伦斯基本人公开答应要将罗曼诺夫一家送到摩尔曼。将由英国军舰将他们从那里送到英国。临时政府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因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坚决反对他们离去。

先是在皇宫的家中被捕，然后转到离秋明250公里远的托博尔斯克。在那里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人得知发生了十月政变。众所周知，后来按照与乌拉尔州执委会达成的协议，罗曼诺夫一家被从托博尔斯克转到叶卡捷琳堡，监禁在伊帕季耶夫家中。

现在再来读一下文献资料：

摘自不久前在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发现的
契卡人员卡巴诺夫的笔记：

4月末或5月初乌州契卡书记（乌拉尔州肃反委员会）和一小队全副武装的人马将原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女儿奥莉嘉、阿纳斯塔西娅、玛莉娅、塔季扬娜、儿子阿列克谢从托博尔斯克带到了叶卡捷琳堡。（笔记所标日期为50年代末，这位老契卡人员的记忆明显出现误差。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玛莉娅女大公、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博特金医生、沙皇近侍切莫杜罗夫、仆人谢德涅夫、侍女杰米多娃于1918年4月30日抵达叶卡捷琳堡。5月23日，阿纳斯塔西娅和奥莉嘉、还有阿列克谢皇储以及随行人员共26人被送到叶卡捷琳堡。）

他们当中有宫廷医生博特金教授，一位宫廷女官（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阿列克谢是被一个14岁男孩子推车送来的，因为他有病不能行走。原沙皇的随从——里沃夫公爵、戈利岑公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塔季谢夫伯爵以及两名厨师被安置在原看守所里，我的哥哥米哈依尔被任命为所长，而政委是我的弟弟，也叫米哈依尔。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女儿奥莉嘉、塔季扬娜、玛莉娅、阿纳斯塔西娅和那个男孩被安置在伊帕季耶夫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周围有两米高的栅栏。我被责成秘密监视这幢房子的动静。因为尼古拉二世站在窗台上便可越过栅栏看到城里的情况，于是，在房子周围立

起了更高的一道板墙。履行这些职责使我非常劳累，于是便感到对我们的敌人如此人道非常不满……1918年7月10日尤罗夫斯基向我宣布，我被任命为特殊用途房屋的机枪警卫队队长。交给我指挥的机枪队有4名矮壮的拉脱维亚人，他们都35岁左右，平均在军队服役12年以上。他们和另外4人再加上4挺机枪便构成整个队伍，以取代原来的28人。原来的警卫队长在阳光充足的日子还允许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整天在小花园中散步，尤罗夫斯基同志却只许他们散步两个小时，而且还要有人看着。除了我指挥的机枪队外，守卫这所特殊用途房屋的还有主要由工人组成的一个营的部队。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都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睡在军官用的行军床上。尼古拉的儿子阿列克谢睡在一个较小的房间，那位宫廷女官常和他在一起。博特金教授和两名厨师睡在饭堂。

……尼古拉二世的女儿们：阿纳斯塔西娅、塔季扬娜和玛莉娅比奥莉嘉漂亮许多，但她们都和奥莉嘉一样，快乐，开心，生气勃勃，在小花园里散步时，常唱着乡村四句歌……。阿列克谢14岁，疾病缠身，他的两腿不能活动，因此，去小花园散步的时候要把他抱起来，放在一个童车上，由尼古拉·罗曼诺夫一个厨师的14岁的侄子推着。这名厨师在从托博尔斯克来到这里以后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

消灭俄罗斯末代皇朝的计划是这样制定的：行动本身就在我们的机枪队集体宿舍内进行。这个地方有厚厚的砖墙，拱形砖砌的房顶，双层窗户和铁栅栏。外边竖有两排木板围墙。在我们看来，市区内不会听到开枪声。除此之外，决定在窗下放一辆首批出厂的福特汽车，消声器极差，计划在行动进行中打开发动机，以其噪音淹没射击的声音。1918年7月17日夜间，我和我的队员们将房间中的床和其他东西清走，只留

一张维也纳式椅子给阿列克谢……尤罗夫斯基同志来到尼古拉及其家人住的地方，对他们说："城内不太平静，因此，为了安全我请你们现在到下面去。"尼古拉·罗曼诺夫未说一句话，便抱起自己的儿子沿着楼梯向下走，后面跟着他所有的家人。尼古拉将儿子放在维也纳式椅子上，自己站在房间中央，而所有其他的人都脸朝门站在了他的左右。同志们开始射击，其中也包括我。不管汽车发出怎样巨大的噪音，仍能清晰听见射击声和尼古拉·罗曼诺夫所养的四条狗的狂吠声。这所特殊用途房屋对面的矿业研究所和一所小房子里都亮起了灯。这之后射击停止了，3 条狗被吊死，第 4 条狗杰克没有叫，所以就没有动它。应该枪杀而还没有断气的几个人都用冷兵器杀死……最后，装到汽车上的共有 11 个人的尸体和 3 条狗的尸体，所有的尸体都用帆布盖着。这辆载着尸体的汽车在坐在车里的 4 个人和骑马的 2 个人的押送下离开了这所特殊用途的房屋……

保留下来的还有另一个刽子手尤罗夫斯基所提供的证明。

摘自官方资料：

雅科夫·尤罗夫斯基，1876 年生于托姆斯克一个镶玻璃工和女裁缝的家庭。毕业于只有两个班的犹太俄语学校。学过裁缝和修钟表。因杀人而服过刑。190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从事革命活动曾经被捕。革命后他先后担任乌拉尔契卡委员会委员、乌拉尔州侦查委员会主席、州执委会军事部委员、特殊用途房屋警卫长。后又担任省部契卡主席、人民财政委员部国库局局长。

从 1924 年开始在经济部门工作。1938 年死于克里姆林宫医院。

是他亲自向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儿子阿列克谢开的枪。

未遭到过苏联政权方面的镇压。列宁对尤罗夫斯基评价很高。

摘自雅科夫·尤罗夫斯基回忆录：

7月16日收到从彼尔姆发来的暗语电报，命令处死罗曼诺夫一家。16日晚6时，菲利普·戈洛谢金（他是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州军事人民委员）指示执行命令。12时应当来一辆运尸首的卡车。但12时卡车没有来，直到一时半才来。这推延了命令的执行。同时，我们这里一切准备就绪，挑出12个人各持纳甘左轮手枪。有两名拉脱维亚人拒绝向姑娘们开枪。当卡车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我们叫醒博特金，他又叫醒其他所有的人。在楼下选了一间带有抹泥木板间壁的房间（为避免跳弹伤人），从里面把家具全都搬了出去。队伍就在隔壁房间待命。罗曼诺夫一家什么都没有猜到。小队成员谁向谁开枪已经事先定好，而且命令瞄准心脏，以免过多流血和尽快结束……阿列克谢、他的3个姐妹、宫廷军官和博特金未死。不得不向他们补枪。在试图向一个姑娘补一刺刀的时候，枪刺未能穿透裙子上的腰带。因此，包括检查（摸脉等）在内的整个过程共用了20分钟。后来开始搬运尸体，并装上汽车，车厢铺上了呢绒，以免血水流出。有人开始偷东西。于是，在搬运的时候，不得不派3个可靠的同志看守尸体（尸体要一个一个地搬）。在枪毙的威胁下，被偷的东西全部返还（有金表、镶钻烟盒等）。

我们乘车大约走了3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叶尔马克应在上伊谢特工厂的后面把这个地点准备好。开始打算用汽车运进去，在了解地形之后决定用马车拉（选中的地点是一个汽车不能通过的废矿井）。在驶过上伊谢特5俄里的地方遇到

了一大队人马，有25人骑马，还有坐在四轮马车里的人。这是叶尔马克为此而准备的工人队伍(他们中有的是州执委会苏维埃委员)。他们喊出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不把他们活着带来?!"他们认为，处死罗曼诺夫一家的任务将交给他们。开始将尸体装到马车上。已有人开始搜口袋，不得不又一次以枪毙相威胁……

无论是尤罗夫斯基，还是另一个刽子手卡巴诺夫说得一样清楚：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歧异之处只有被枪杀者的数量。部分历史学家断言，尤罗夫斯基叙述有误，当时被杀害的是11个人。

所有的资料都毫无例外地认定，在被枪毙的人中就有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女大公。比如，王储阿列克谢的前教师日利亚尔在他于20年代在维也纳出版的回忆录中就这样写道：

对于大多数被囚禁者来说，死亡的来临几乎就在顷刻之间，但是，阿列克谢还在微弱地呻吟。尤罗夫斯基用手枪结束了他的生命。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只是受了伤，当凶手向她走近的时候她开始喊叫起来。最后她被刺刀刺死。安娜·捷米多娃由于藏在枕头下面而安然无恙。她从房间的一头跑向另一头，最后还是倒毙在凶手的刺刀之下。

白卫军侦查员索科洛夫对皇帝一家被害案进行了如犯罪侦查学家所说的"跟踪追击"，结果证明，实际上不存在阿纳斯塔西娅获救奇迹的一点可能性。

尽管如此……

战后时期，一个军官有一次来找我的父亲，是大尉或少校。他讲的事情乍听之下令人颇感奇怪。战时，他在波兰境内身负重伤。一座正教修道院的修女将他抬了回去，并进行精心护理。在修道

院里，我们这位军官认识了女修道院长，和她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据他讲，女修道院长对和他这位俄罗斯人交往很感兴趣。后来，在事先得到他保持沉默的承诺之后，她向他承认说："我是尼古拉二世的女儿，阿纳斯塔西娅。"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位军官在战争结束回国后向我父亲讲述了关于她的事情，但此人找过他却是事实。自然，在听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之后，我父亲便把全部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诚然，这位军官也从我父亲处得到保证，不会有任何不利于阿纳斯塔西娅的事情发生。斯大林表示怀疑："大概是冒牌货？查一下。"于是，便安排她来到了苏联。当然，这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

据说斯大林决定，让那个军官去一趟波兰，建议那个女人到苏联来。当然，这也要看她是否愿意。

显然，由于女修道院长曾经请求俄罗斯军官在任何时候都不向任何人透露他所知道的情况，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觉得有些可信。

我知道，阿纳斯塔西娅同意来苏联。她在莫斯科呆了两周时间，住在为她预备的单独住宅中。那位军官陪着她。自然，谁都不知道她就是末代沙皇的女儿。她参观了博物馆、剧院，还去了一趟列宁格勒。

我不知道调查真伪之类的细节，但我从父亲那里听说，曾邀请她留在苏联，国家为她提供全部生活保障。阿纳斯塔西娅对此表示感谢，但拒绝留在苏联的邀请。她说她已向上帝发了誓，必须回到修道院去。这就是我能讲述的一切。我只知道她当时就回到了波兰，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尼古拉二世女儿的消息。

二、对沙皇之女可能获救的推测

俄国末代皇帝女儿所救的苏联军官……，我父亲对昔日前线

战士的承诺……，以及斯大林邀请女大公回到故国等等……读者会同意，这里有某些东西令人困惑不解。可能这里就有解开阿纳斯塔西娅公主多年不解之谜的钥匙？在莫斯科曾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接待过波兰东正教女修道院的院长。请她留在苏联的说法也所言不虚。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停留期间无论如何神秘莫测，都一定会留下某些踪迹。而这里提到的她担任院长的那个修道院，难道就没有任何踪迹可寻？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还有一个"环节"，女大公向苏联政府提出的惟一请求是：将她秘密葬在列宁格勒的皇陵。

最后盖棺论定自然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但读者势必同意，这段令人惊奇的故事无论如何不像是一个冒名顶替者的传说。

顺便讲一下冒名顶替的故事。我们已经说过，伪阿纳斯塔西娅(不是玛莉娅、奥莉嘉、塔季扬娜！)有好几个。最后一个名叫安娜·安德松，死于1984年2月。俄罗斯皇族首脑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公爵1991年5月谈了有关她的情况："冒名者总是很多的。显然，这个女人周围的那些人相信，皇家在英国银行存有大笔款项。但是要知道，皇帝作为爱国者在战争初期就将这笔钱转到了俄国，而且认为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说这是他个人的钱是不对的。这是存在俄国盟国用于备战的一笔国有资金。有趣的是，一个南美国家原总统的儿子有一次问我一个熟人，大公未从国家带出资金是否属实？这怎么可能？他说，我父亲一共当了10或12年总统，我们全家就都成了百万富翁。而这些傻瓜当政300年竟落得一无所有……他对此感到不解。而我们所理解的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安娜·安德松首先应该去看望自己的祖母玛莉娅·弗多罗夫娜皇后，她住在丹麦，她心中从未相信她的儿子和家人已经死去。本来只要去一趟，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她没敢走这一步，尽管她在柏林，离丹麦只有几个小时的行程……"

"请问，"读完这一切而疑虑重重的读者会问，"究竟通过什么

方式女大公得以免遭杀害？要知道，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全部已知的材料都不容置疑地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但我相信，在伊帕季耶夫家开枪杀死的不是阿纳斯塔西娅。据她讲，她的获救应该感谢博特金大夫，他让自己亲生的女儿去替她受死。姑娘是为皇族最后一脉细枝不致枯萎而死的……博特金大夫以此牺牲来挽救俄罗斯。确切地说，他是试图挽救。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还提供了一项证明，按她的话说，在可诅咒的1918年事件发生的那个可怕的7月之夜，俄罗斯末代皇帝和君主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储也没有被杀害。

勿庸置疑，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女大公殿下当时在莫斯科讲述了全部细节。当时一定翻出了一些文件，只要这些文件能间接证实她所讲的东西也好。您是否记得，斯大林首先感兴趣的是什么？“是不是冒牌货？查一查。”不可能不查。如果阿纳斯塔西娅讲了怎样救出王储阿列克谢的一些细节的话，在40年代能查的也同样是这些文件。总之，对历史学家们来说也许有可供思考的东西。

而尤罗夫斯基究竟向谁开的枪？包括他在内的罪行参与者相信，这就是阿列克谢。或者有人知道真相？是谁？

假定，代替皇储受死的是他的一个同龄人，他的周围有这种人吗？有！

大家会记得，契卡人员卡巴诺夫在他留给“大有前途的后人”的笔记中肯定说，尼古拉二世14岁的儿子被抱进小花园，并被放进由“一个厨师14岁(！)侄子推着”的童车里。

现在再回头来看雅科夫·尤罗夫斯基的叙述：“6点钟的时候男孩被带走了，这使罗曼诺夫一家及其周围的人极为惊慌不安。博特金及医生来问，为何如此慌张？解释说，这个男孩有个被捕的叔叔，后来逃跑了，现在又回来了，想看看侄子。第二天男孩被送回自己的家乡(可能是图拉省)。被捕，后来逃跑，现在又回来

……"这一解释听起来至少让人感到奇怪。被捕逃掉之后又回来?为什么?要知道,如果您还记得,伊帕季耶夫寓所中的事件的另一个参加者卡巴诺夫曾证实,14 岁男孩的叔叔在"从托博尔斯克来这里之后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这一切应如何理解?又是一个谜?好像是这样。

"6 点钟的时候男孩被带走,这使罗曼诺夫一家和周围的人极为惊慌不安……"是什么因素引起的这种反应?难道被带走的是阿列克谢皇储?但又是怎样掉的包?

而如果假设,尼古拉二世本人,他周围的人,包括博特金医生,他们会不会提前得到了正准备处死他们的消息?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那天夜里一家人睡觉比平时晚 3(!)个小时,这使"行动"的参加者们也不免感到几分惊奇。

博特金医生有时间去救阿纳斯塔西娅。这么说,他知道前面等待大家的是什么?

当然,这一切都出于推测。皇储最终有可能不被打死。而如果考虑到那天夜里的一片混乱(只有趁火打劫有什么意义!),完全也可以设想他能得以幸运失踪。当然是在别人的帮助下。

我是在甘冒招致历史学家的愤怒的危险,但考虑到看押皇帝一家的那些人的描述便不难推测,有人会为了珠宝而为"阶级敌人"提供任何服务。而珠宝对于罗曼诺夫一家来说是十分充足的,这已为无数文件所证实。

很难说这一分析是否恰当。但是,在翻阅与叶卡捷琳堡枪杀事件有关的无数文件时,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所写书中的主人公。如果让令人难忘的沙里科夫身处保卫伊帕季耶夫家的警卫队中,他会和这些精选出来的恶棍和坏蛋打成一片,配合默契。这些人随时准备为了大公的几件饰物不仅出卖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连祖国母亲都会出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设想,皇帝一家及其周围的人也有这样的同盟者?这样,

当时的情况便可解释得通了。比如，博特金医生完全能和这些人保持接触而不致引起别人的特别怀疑。

但是，我重申，这是从假设中作的推测，并没有什么文件为证。惟一的希望是，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能找到阿纳斯塔西娅女大公战后在莫斯科停留的蛛丝马迹，那时我们方能了解阿列克谢皇储的命运。

遗憾的是，对那位被全俄罗斯君主女儿救过一命的军官以后的命运也一无所知。在波兰修道院的相遇，和贝利亚的会见，在莫斯科与女大公共同度过的几周，难道这些他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很难相信，如果考虑到这位作战军官对国家机密不负所托，较好的可能是这段历史成了他最亲近的人的独有财产。可能他们中会有人出来响应？希望这位军官本人还活着，过去的岁月毕竟不是很长。可是，女大公活到今天的可能性是一点都没有了。您是否记得在影片《弑君者》中扮演阿纳斯塔西娅的尤里娅·鲍利索娃？不多不少再加 75 年……。这么说来，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今天已年过 90。在历史上她将永远是 17 岁的女公爵，罗曼诺夫家族最后的残余之一。或者压根儿就没有？

“我已向上帝发了誓，必须回到自己的修道院。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可能，就满足我惟一的请求，我请求把我秘密葬在列宁格勒的帝陵中。”

甚至，如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信它也仍然是值得的……

第十章　老罪孽们长长的阴影

一、1952年马林科夫抓的“列宁格勒案件”

1950年12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中央组织局委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中央候补委员、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和列宁格勒市执委会主席拉祖京极刑——枪毙。被判长期监禁的当时有另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被告一样，他们被指控组建反党集团，正如他们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他们搞破坏活动，旨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和对抗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其转变为同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斗争的堡垒。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是战后大规模镇压行动之一。我的父亲被指控为这一镇压行动的组织者已有多年。成为镇压牺牲品的在当时不仅仅是列宁格勒市、州和区组织的全部领导人，而且还有曾被提拔到中央党政机关和国家的各州党组织中任职的几乎全部苏维埃和政府工作人员。仅列宁格勒州根据官方材料被立案侦查的就有2000多人。被定罪者的家属也受到了株连。

我想立刻来反驳对我父亲的指控。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以及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所有被害人的命运都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决定的，考虑到被指控者的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有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什基里亚托夫。列宁格勒领导人之死首先应由他们负责。多年来，祖国的历史学家们只对一个细节认为最好视而不见，这就是对这一"案件"的被告所进行的全部审问不是由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负责，而是由党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的。我父亲和这一丑恶行径没有任何关系。我记得他立刻表示，这是借助摧毁大力支持沃兹涅先斯基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以攫取最高指挥权的又一个计谋。我父亲尊重沃兹涅先斯基，对他评价很高，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克里姆林宫的人是不喜欢他的。其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对这位天才领导人的赏识。简言之，他们视沃兹涅先斯基为竞争对手……

像我父亲一样，沃兹涅先斯基对各种小集团和党内斗争非常反感。他是当时最年轻的，也是明显最有前程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晋升是在战争年代。据我所知，斯大林认为他是个很有才能的经济学家，而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周围人的不满。他们对这样的人是从不手软的。

但是，这里应着重指出，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所固有的争夺权力的斗争的意义上发生的，而且为统治方式而进行的一场如此残酷的斗争。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都认为党应当领导一切，在他们眼中经济活动是第二位的。沃兹涅先斯基、我父亲以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从来不掩饰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占首位的应该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换言之，这些人并不否认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管理体制本身表示怀疑，因而要求实行改革。

沃兹涅先斯基后来是我父亲都被党的机器除掉了。1964 年赫鲁晓夫这个党魁本人也将被清除。而且人们把他除掉并不难。原因在于他触动了那部机器的利益。当时国家机器起而反对沃兹涅先斯基。如果这一切不曾发生，毫无疑问，那时不久之后国家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部长会议主席。因此"列宁格勒案件"的组织者

和发动者十分准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我知道流传着一种说法：斯大林一直极为仇恨列宁格勒，并在生命的晚年最终处理了它的领导人。我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我通过朱可夫和我父亲当着我的面所进行的那些谈话知道，斯大林非常喜欢列宁格勒，因为他的许多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与这个城市紧密相联的。顺便提一句，他不支持列宁将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提议，但是，显然他当时并不拥有后来所获得的那种权力，因此，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他甚至认为，国家首都一定要设在港口城市。很可能他对彼得大帝其人情有所衷。总的来说，他对俄罗斯历史非常熟悉，如果说有谁在他面前一知半解地谈论这个国家的过去，他便会立即中止谈话。

时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据：列宁格勒的反对派使斯大林激怒。但这并不完全准确，这样的反对派集团在莫斯科也有过不少……还有人说斯大林早就不喜欢列宁格勒，这与基洛夫有关，这一论断也同样不够严肃。我知道，基洛夫、他的亲密战友的被害一事深深刺痛了斯大林。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给基洛夫增添光彩，但是，从他全部演说的内容可以看出，他是最忠于斯大林的人之一。只要读一下他在党代会和其他公共场合的讲话即足以说明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对战后列宁格勒的情况了解很多，因为我还在解除封锁之前就来到这个城市。库兹涅佐夫来过我们学院，并不止一次向我们发表讲话。我们这些学员们都认为，这位列宁格勒的领导人是位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和平易近人的人。我知道他的行为深得民心，对他的指控没有丝毫根据。很可能他和列宁格勒的其他同志想使列宁格勒市的权力与其所拥有的潜力相适应。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按我的理解，苏联党的机构无视列宁格勒市委的意见，阻碍了该市的经济发展。党的权势分子实际上是企图将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工业和科学文化中心降至一个省

城的水平。那些人在向斯大林汇报时总要在政治上给列宁格勒领导人的任何举动添油加醋:瞧,列宁格勒委员会企图使该市成为第二个首都。我想,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

我重申,事实上那里和中央没有任何抵触,党的上层只是要排挤掉沃兹涅先斯基以及支持他的那个庞大的党的组织。

1949 年 2 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同志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罗季奥诺夫和波普科夫同志反党活动"的决议,其中写道,他们"反对国家的活动是不健康的、非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表现在对列宁格勒组织的蛊惑人心的吹捧和对联共(布)中央的贬责之中,表现在公告将自己打扮成列宁格勒的特殊保卫者,也表现在图谋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列宁格勒组织之间制造隔阂,从而使列宁格勒组织疏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解除了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和罗季奥诺夫的职务,几天后,马林科夫带领中央工作组来到了列宁格勒。首先他召开州委和市委联合会议,他在这个联合会议上而后又在次日召开的联合全体会议上达到了迫使被控者承认组织"反党敌对集团"的目的。一切都是在发扬 30 年代政治运动的"优良传统"中进行的:荒谬绝伦的指控,威胁,悔罪等等。后来,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插手了这一"案件"。

阿巴库莫夫的部门只起了辅助性的作用:因涉嫌与英国谍报机构有联系而逮捕了卡普斯京,并"逼取"了有关口供。其实,就已知文件而论,国家安全部对向英国提供情报这一点兴趣并不大,审讯基本围绕与"反党集团"有关的问题。像通常一样,涉嫌搞间谍活动仅仅是逮捕人的借口。

1949 年 8 月 13 日,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在没有检察长批准(甚至根本没想这样做!)的情况下便逮捕了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拉祖京、索洛维耶夫。还在早些时候,沃兹涅先斯基就被解

除了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

在我看来，仔细研究一下后来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是很有趣的。9月9日什基里亚托夫向政治局呈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提议将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后是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等。10月27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终于轻松地出了口长气：政府首脑职位的第一竞争对手已被逮捕。

在枪毙沃兹涅先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过去10年之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承认：

"为达到获得在列宁格勒存在一个反党集团虚构证词的目的，马林科夫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查过程，并直接参加审讯。对所有被捕者都使用了非法侦查手段、刑讯逼供和严刑拷打。为列宁格勒存在一个反党集团制造假象，按照马林科夫的指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对被捕者开庭审判准备了一年多，其间他们遭受了粗野的嘲弄、野蛮的折磨，威胁要加害他们的家人，将他们关进单身牢房等等。对被指控人员的心理诱导在开庭审理前即已加强，并贯穿于整个审理进程之中。被告被强迫背诵审讯笔录，并不许偏离事先编就的司法闹剧的台词。他们被欺骗了。他们当时相信，承认参加'敌对活动'对党是重要而又必要的，党必须以实例传授揭露敌对集团的有关经验教训；并向他们保证，不管最后判决如何都永远不会付诸执行……关于从肉体上消灭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拉祖京的问题，在进入司法程序很久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决定。"

判决在夜里一点钟宣读，两点钟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被判罪的人还活着了。

后来在其他几个城市也进行了类似于"列宁格勒案件"这样对

被告的审判程序，在被枪毙的人中有沃兹涅先斯基的妹妹和弟弟，以及大批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

全部“列宁格勒案犯”直到1954年4月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那一年，阿巴库莫夫和“他的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同谋们”也被执行了枪决，而罪行的策动者马林科夫同志仍和从前一样，继续稳坐他的政府首脑的宝座。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称“列宁格勒案件”的组织者为贝利亚。自然不能提出任何证据，况且，就是今天也无人妨碍将这一罪行归咎于我的父亲。不过，历史学家们最多不过是援引赫鲁晓夫本人的发言而已。

而出污泥而不染的马林科夫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苏共中央六月(1957年)全会之后马林科夫在组织所谓‘列宁格勒案件’中的罪恶作用问题就提出了。但是，为掩盖其犯罪痕迹，马林科夫几乎销毁了全部与‘列宁格勒案件’有关的文件。马林科夫原办公室主任彼得罗科夫斯基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汇报说，1957年他对已被捕的马林科夫助手苏哈诺夫的保险柜中没收的文件进行了登记……在苏共中央六月(1957年)全会开会期间，马林科夫数次查阅苏哈诺夫保险柜中的文件，拿走了许多，而在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之后没有返还从‘列宁格勒案件’卷宗中抽出的文件，声称已经作为私人文件加以销毁了。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肯定说，他已销毁了这些文件……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二、1951年11月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

他们甚至有办法指控我父亲还制造了另一重大“案件”，即所谓的明格列尔案。当时有数万格鲁吉亚人遭到迫害，都是完全无辜的人。1951年11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在格鲁吉亚存在一个准备推翻共和国内苏维埃政权的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的决议。当然是虚构的，在明格列利亚不存在任何反革命组织。正如赫鲁晓夫在死前不久所承认的那样，“明格列尔案件”是旨在反对我的父亲的。诚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只指责斯大林一个人，说他安排炮制了这一案件，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党的上层，当然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试图用这种方式借斯大林之手将贝利亚撤职。独裁者永远不受他人影响的说法是不对的。无论如何，有不少例子表明，斯大林对其最近圈子里的人有时还是让步的。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在格鲁吉亚搞大规模镇压定会败坏我父亲的名誉，而后自然可以“除掉”他。

无论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还是在其在西方发表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谈到了斯大林的恣意专横，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他自己在组织“明格列尔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却避而不谈。他也正是这样逃避了积极参与策划人所共知的“医生案件”的责任。

三、1953年1月的“反革命医生案件”

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有一天，斯大林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向我们宣读了一封信。一个叫季玛舒克的女人报告说，她在一个医学研究所工作，日丹诺夫死的时候她正在瓦尔代。她写道，日丹诺夫之死是医生们治疗不当所致；对他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可避免会导

致死亡，而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如果当时斯大林正常的话，他就不会对这封信作出那样的反应。总之，医生们被捕了……显然，许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都感到这些指控证据不足。但他们谁都不发表意见。既然斯大林对此已有说法，他又亲自“处理”这一问题，那么别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当我们不是一起坐在主席团的桌旁而是私下交换意见时，我们首先对科涅夫的信感到愤怒……科涅夫写来的信不仅是给那些已“被揭露的人”定了性，而且促使斯大林扩大了怀疑对象的范围和对医生们的完全不信任。……当然，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个人的病态性格和某种“精神共性”造成的。而科涅夫和斯大林确实具有某些精神共性的东西。这也许就是科涅夫对党的二十大谴责斯大林暴行而党的二十一大又有所“补充”一事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

审讯“罪犯”开始了。我亲耳听到斯大林屡次打电话给伊格纳季耶夫。当时伊格纳季耶夫是国家安全部长。我了解他。这是个身患重病、性格温和、思想深刻、让人颇有好感的人。我对他非常好……他（斯大林）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对这些倒霉的医生要打击再打击，无情地痛击，给他们戴上镣铐……

请注意：赫鲁晓夫没有将“反革命医生案”与我父亲的名字联系起来。我们翻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这位党魁在1956年2月25日的发言中，详细讲述了“明格列尔案件”和“列宁格勒案件”，顺便提及，“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不知道案件的全部情况。”他提到了那些医生们，但把对他们的镇压只归罪于斯大林一个人。关于我父亲，只字未提。而当需要对上述言论作结论的时候，他却相当巧妙地将听众的注意力转到了我父亲的身上：

“在捏造某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劣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组织的走狗。这个家伙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才在党和国家取得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地位的呢？现在很清楚，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在梯子上步步高升的。”

中央第一书记接下来所讲的全部内容已完全失去了任何意义：贝利亚插手导演了所有“卑鄙可耻的事件”，这一点听众们已铭记在心。而对过去的同志，除了谩骂以外没有提出任何一项具体指控，这已不是那么重要了。目的已经达到，有谁胆敢揭穿国家首脑在说谎呢？

塔斯社 1953 年 1 月 13 日第一次刊登了关于逮捕“害人医生”的报道：

不久以前，国家安全机构破获了一个医生恐怖分子小组，其目的在于以有害的治疗方法缩短苏联国务活动家的生命。这个恐怖分子小组的参加者包括：沃夫西教授，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内科医生；科甘·梅教授，内科医生；科甘·贝教授，内科医生；叶戈罗夫教授，内科医生；费尔德曼教授，耳鼻喉科医生；埃廷格尔教授，内科医生；格林施泰因教授，神经病科医生；马约罗夫，内科医生。

文件资料、调查、医学专家的鉴定以及被捕者的供词表明，作为暗藏的人民之敌，这些犯罪分子对病人进行了有害治疗，并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损害……

犯罪分子们承认，他们利用日丹诺夫同志生病的机会，对他的病作了错误的诊断，掩盖其心肌梗死的病情，采取对这一重病禁用的治疗方法，并以此杀害了日丹诺夫同志。现已查明，这些犯罪分子也缩短了谢尔巴科夫同志的生命，在对其治

疗过程中错误地使用了效力过强的药物，制定了对他来说是致命的疗法，并因此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这些犯罪医生首先努力损害苏联军事领导干部的身体健康，使他们失去工作能力，从而削弱国防。他们努力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科涅夫元帅、什捷缅科陆军大将、列夫琴科海军上将等等失去工作能力。但是，逮捕打乱了他们的罪恶计划，犯罪分子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已沦为人类恶魔的杀人医生粗暴地践踏了科学的神圣旗帜，玷污了科学家的清誉，卖身投靠了外国间谍机构。这一恐怖小组的大多数参加者（沃夫西、科甘、费尔德曼、格林施泰因、埃廷格尔等）都与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焦因特”①有联系，这个组织是美国间谍机关据说是为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提供国际援助而建立的。实际上，这个组织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里进行着广泛的间谍、恐怖及其他破坏活动。被逮捕的沃夫西向侦查人员声称，他通过莫斯科的希梅里奥维奇和著名的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米霍埃尔斯从美国“焦因特”组织得到了“关于消灭苏联领导干部”的指示。其他恐怖小组的参加者（维诺格拉多夫、科甘·梅、叶戈罗夫）很早就是英国特工机构的间谍。

调查将在近期结束（塔斯社）。

老一辈的人当然还记得那个岁月报刊所制造的歇斯底里气氛。《火花》杂志特别写道：

“人民之敌反革命集团的罪行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所有了解这些在医学教授治病救人外衣掩盖下被雇杀手的罪恶的

① 焦因特：估计是美文 Joint 一词的音译，英文原意为“参与”——译注

诚实的人，都会满怀愤怒和憎恶。”

在我们家也和每个家庭一样，几位著名医生的被捕当然也成了议论的话题。我父亲和这一卑鄙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此话已不必再提。我们的愤慨还与另一件事有关，有一位被捕的医生曾救过我的命。战争爆发前几年（我们还住在第比利斯），有一次我患了严重的流感并发症。当地的医生虽然都是优秀的专家，但无能为力。不幸的是，那几天我父亲因事去了莫斯科。当然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但妈妈没有任何安慰的话可以告诉他。病情在逐渐加剧。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当后者了解情况之后，便答应帮我们忙。应他的请求，第比利斯来了两位出色的医生——埃廷格尔和拉波波特。雅科夫·吉利亚里耶维奇·埃廷格尔和他的同事在我家呆了近两周，后来还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我接受了当地医生的治疗。但我的这条命能够保住，无疑应感谢埃廷格尔这位心脏病教授、专家和拉波波特。很显然，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终生都对这两位莫斯科的医生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经常来我家。他虽然不是我们的主治医生，但我们都喜欢与这位有风趣的人交往。有一次在我父亲制止“医生案件”之后，维诺格拉多夫和卫生部第四局负责人叶戈罗夫教授在我家谈起了当时事件的真实情况。

“您知道，”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说，“我老了，当然在肉体上我已无力承受这些折磨。我不得不向他们提供证据，但我只针对那些在我被捕前就已去世的人。虽然我也明白，有可能镇压他们的家人，但我还能怎么办？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危害要小些，我只能以此聊以自慰。”

自然也谈到了埃廷格尔，以及成为专横妄为受害者的其他医

生。

而“医生案件”确实是由科涅夫和利季娅·季玛舒克的信引起的。

摘自官方资料：

利季娅·季玛舒克，1898年生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1918年入萨玛拉大学医学系学习。从1926年起成为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局的医生，并一直在这里工作到1964年退休。1953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她列宁勋章，以表彰她“在揭露杀人医生案件中对政府给予的帮助”。1953年4月，授予季玛舒克勋章的命令被撤销。

1983年逝世，享年85岁。

有人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利季娅·费奥多西耶夫娜·季玛舒克都在为她所受到的待遇愤愤不平。诚然，在一年之后才又授予她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以代替被剥夺的那一枚。应当认为，这枚勋章的获得是这位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主任所当之无愧的。但是，对她的怨恨依然如故，因为她的名字将作为人性卑鄙无耻的象征进入千百万人的意识之中。最近出现了不少文章，把季玛舒克医生说成是当时局势的无辜受害者。但这更加似是而非，因为当利季娅·季玛舒克向弗拉西克中将（不是斯大林！）发出这封信的时候，她不能不猜到这对几位著名医生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只要看一眼那张记录下季玛舒克在接受勋章时那幸福的瞬间的照片，关于她是否由于心灵痛苦的全部怀疑便会顿然冰释：这确实是这位迄今为止一直不为人知的“克宫”工作人员最闪光的时刻。

命运之神也同样对一个不知名的米哈依尔·留明中校微笑了，他是苏联国家安全部特重案件侦查处的一名侦查员。像他的上司阿巴库莫夫一样，他将积极参与对在1950年11月即已被捕的埃

廷格尔教授的审讯。几个月之后，国家安全部的头头本人也被逮捕。逮捕的依据就是留明中校的告密。按照惯例，中央委员会从不拒绝这类“反映”，那封信便及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

很难相信，一个普通的侦查员会做出如此大胆的一步。毫无疑问，“揭露”阿巴库莫夫的想法本身是在老广场诞生的，而留明只是被利用而已。是的，这位警惕性极高的侦查员不会特别抱怨什么，留明很快成为上校、苏联国家安全部特重案件侦查队队长，后来又成了新任国家安全部首脑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本人的副手。留明的高升与他插手的“医生案件”一同终结。我父亲到内务部后留明被捕。1953 年 4 月 4 日广播中几次宣读了苏联内务部公告：

“苏联内务部对被指控从事针对苏联国务活动家的破坏和其他活动的医生小组案的全部先期侦查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检查，结果发现，此案被追究责任的有沃夫西教授、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科甘教授、埃廷格尔教授、叶戈罗夫教授……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对他们的被捕难辞其咎，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调查表明，对上述人员的指控都是虚构的，而侦查人员所依据的文件材料是缺乏根据的。现已查明，似乎能够证实对他们起诉内容的被捕者的供词都是原国家安全部侦查处的工作人员使用苏联法律不允许和严禁使用的侦查手段获得的。

“根据苏联内务部为核查此案而专门设立的侦查委员会所作的结论，对被捕者……及因本案而受株连的人员予以彻底平反，对他们提出的关于从事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的指控予以撤销，并依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4 条第 5 款予以无罪释放。对错误实施侦查的责任人予以逮捕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40年之后，惨死在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埃廷格尔教授的儿子、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埃廷格尔教授讲述了他1970年与原政治局委员尼古拉·布尔加宁的会面："布尔加宁认为，'医生案件'和反犹计划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按他的说法，他们得到了当时一批党和国家负责人的'帮助'。我问他具体是谁，他笑了，并回答说：'您想让我说出一大批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吗？许多1953年时的当事人现在还担任关键职务，我还想平静地过我的晚年'。"

显然，布尔加宁所谈到的那些人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使国家忘记谁是镇压苏联著名医学专家的罪人，又是谁最后结束了"医生案件"。像通常一样，在当时的50年代，党的上层分子和贝利亚同样处于不同的阵营，分庭抗礼。对于新任内务部长这一条他们是永远不能饶恕的……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在苏共中央7月(1953年)全会上的讲话：

> "同志们，听说贝利亚在释放医生、在清理格鲁吉亚案件、在清理沙胡林和诺维科夫案件、清理雅科夫列夫元帅案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也应当予以澄清，在这些事务中他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相反，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已。"

这是无可反驳的布尔什维克逻辑……

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沙胡林、诺维科夫、雅科夫列夫案件。

1946年春天，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反间谍总局"斯麦尔什"逮捕了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苏联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和一大批航空工业系统的其他领导人以及空军最高指挥部的代表人

物。他们的罪行是蓄意搞破坏活动。据说他们一部分人提供而另一部分人接收了用以装备苏联空军的不合格飞机。就在1946年当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这些“破坏分子”期限不等的监禁。1951年12月，炮兵元帅、军事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炮兵总局局长沃尔科特鲁边科上将、武器装备部副部长米尔扎哈诺夫被交付法庭审判。1952年2月他们全部被捕。

1953年4月17日，我父亲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份报告，提议释放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和毫无根据地被捕的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人员。5月份，关于沙胡林人民委员、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以及其他同志的刑事案件由于没有犯罪要件而宣告终止。几年前，党的机构终于不得不正式承认贝利亚对释放所有这些人所起的作用，有关文件已经公布。

众所周知，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撤销了“明格列尔案件”的有关决议。因此，我父亲来到联合内务部的1953年春天确实有所作为，只是还不允许他放开手脚，为那些在战前和战后的镇压过程中饱受苦难的人们大批平反，恢复名誉。

四、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止一次看到一些文章，说我父亲在其整个一生当中以一个极端的反犹太分子著称。而与此同时，某些西方材料又证实，他在战争期间与米霍埃尔斯共同组建了一个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与国际犹太组织建立联系。例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尼科利亚·维特认为：

“关于国际犹太阴谋的假设同样可以用来反对贝利亚。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贝利亚很可能不仅不能参加下一次清洗的准备工作，而且会与其他领导人一道成为受害者，这些领导

人都是原来斯大林特别关照的对象，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他的犹太妻子已被强迫流放）、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但是，当让人想起叶若夫分子横行时的最坏时刻，即认为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犹太人、军人、党和经济领域的高级领导人、党的经济精英正在策划搞一个大规模阴谋的思想日渐成熟的时候，1953 年 5 月 1 日夜间斯大林患了脑溢血……"

和任何品行端正的人一样，反犹主义只能引起我父亲的极端厌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对犹太族人的好感，而且是由来已久的好感首先是基于他对他们的深入了解。这是由于在情报机构，在技术部门，也就是在他终生工作的领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因此，他对犹太人怀有深深的敬意。顺便说一句，有许多这样的人在我父亲生前担任了很高的职务，而在他死后便不允许了。比如，赖赫曼是个大局的局长，米尔施泰因也是一个局的局长。我知道，苏联情报机构在国外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行动都有犹太人的参加。我没有泄露什么特别机密，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对我父亲的反犹指控只是众多指控中的一项。如果情况稍有不同，那些人又会努力指控他是一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同谋。顺便说一句，事实上真走了这一步……我父亲确实是建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积极倡导者，一大批参加犹太复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也与我父亲有联系，我并不否认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但可以这样说，他们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不仅对犹太运动极为有利，而且对苏联也同样有好处。我父亲认为，这种折衷是完全允许的。而且有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一切都是在完全公开的条件下进行的。不管党的机关对这一点的态度如何，他们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政策。但到后来，同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就开始实行一条对党的上层来说更为熟悉的政策：逮捕、挑拨离间、政治迫害。比如，米霍埃尔斯的遭遇

就是如此。后来我父亲在其致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出了这些罪人的名字。

我父亲是最早站出来积极支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人之一。他这一主张的理由是,有数量众多的犹太族人,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分子在内,分散在世界各地,将所有这些人变为自己的盟友也符合苏联的利益。父亲认为,建立一个国家是犹太人民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幻想,也必将成为重建历史公正之举,而苏联的支持将会使他们心存感激,铭记不忘。因此,宣布我父亲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看来早就有了土壤。

他从不按民族来划分人,你是俄罗斯人或犹太人,乌克兰人或格鲁吉亚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犹太人中,与他关系亲密的人不少。万尼科夫就是一例,当时这一情况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上将、部长,5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原子弹计划中,斯拉夫斯基工作顺利,他是苏联中型机械部部长。当时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后来这就只是口头宣言了。

但是,在当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中反犹太分子却不乏其人。比如,安德烈·日丹诺夫和他的时任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部长的儿子。他们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信念。

对于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分子这一点同样不加掩饰的还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可能不是这种人,无论如何他没有公开表现出来。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马林科夫的女儿是个出色的聪明的姑娘,名叫沃利娅。她爱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的姓好像是施滕贝格。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在中央委员会里主管一个部的工作。当野蛮反犹之风开始加大之时,马林科夫立即要求他们离了婚。

斯大林也同样逼迫自己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和格利沙·莫罗佐夫离了婚,而这是个非常优秀的人。顺便说一句,如今他依然健在。

作为斯维特兰娜的丈夫,他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了外交

部工作。父亲和我待他都非常好，在他和斯维特兰娜离婚之后我们还尽可能地支持他。他的家人都已被捕，对他来说，艰难的日子已经到来。他是个诚实的品行端正的人，未做过任何蠢事，倾刻之间从国家首脑的驸马沦为一个弃儿。但我们家的大门还和从前一样，对他永远是敞开的。有一次他来我家，向我们讲述了斯维特兰娜的新丈夫尤里·日丹诺夫找他谈话的事情。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以蛮横无礼的态度叫我离开莫斯科，"格利沙极为愤怒，"而我呢？我回答他：你听着，我知道你是个大人物，但你从我这里还想得到什么？我已不再和斯维特兰娜见面，至于我住在什么地方，与你有什么关系？"

莫罗佐夫能以这种口气和小日丹诺夫讲话仅仅是因为他和我们家没有断绝关系……

然而，斯大林尽管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有时甚至出于他的授意，但他并不是一个反犹主义分子。从他的角度来说这只不过是政治游戏。无论是在他之前或之后，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像开关阀门一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过犹太人这张牌。而且不仅仅在俄罗斯是这样。可以说，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成了所有灾难的罪人……要知道这是如此方便：利用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那个时期，斯大林未能经受住诱惑而在各种问题上对犹太人提出指控。当时在斯大林的秘书处和他的周围犹太人一直不少，而这从未使他不安过。请大家回想一下麦赫利斯、卡冈诺维奇等等……

由我父亲倡议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直到1942年初才开始工作，由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主持。1946年底，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令撤销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国家安全部也负责处理了这个委员会问题。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涉及到一大批的人，其中包括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书记、诗人伊萨克·费费尔、苏联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利纳·施滕、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

原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以博特金·鲍利斯·希梅利奥维奇命名的中心临床医院主治医生、记者列昂·塔尔米，以及其他许多的人。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当时判处13人死刑。

几乎在事隔40年之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道出了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真实的情况："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提出刑事诉讼的直接借口是伪造的和以非法侦查手段获取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戈尔德施泰因（1947年12月19日被捕）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林贝格（1947年12月28日被捕）的悔过书。他们在自己的悔过书中认为，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他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似乎正在从事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揭发上述人员的审讯笔录于1948年1月10日和5月1日由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现已查明，马林科夫对非法镇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涉案人员有直接责任，与案件的侦查和法庭审理有直接关系。1949年1月13日他召见洛佐夫斯基，强迫洛佐夫斯基承认从事了犯罪活动，在整个漫长的谈话过程中都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在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林科夫利用了5年前（1944年2月15日）写给斯大林的有米霍埃尔斯、爱波斯坦、费费尔（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签名、由洛佐夫斯基起草的关于在克里米亚境内成立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倡议书。这次谈话之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联合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理由如下："因政治上不可靠和从事了与中央委员身份不符的活动……"现已查明，侦查行动野蛮地践踏了法律，并运用了禁止使用的手段以获取"口供"。尽管如此，在第一轮审讯中，洛佐夫斯基、费费尔以及其他人都拒绝承认自己从事了敌对活动。后来，除了希梅利奥维奇，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有罪，并提供了关于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从事

间谍和反苏活动的悔过书……

对无辜者的指控和对他们不公正判决的签批早已由上级领导预先决定(1952 年 4 月 3 日伊格纳季耶夫呈给斯大林一份起诉意见书,并附处罚方式建议——所有被告全部执行枪决,只有利纳·施滕除外)。切普佐夫(军事法庭主席)后来指出,在有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在场的时候,他被马林科夫召见,并说出了有必要另行调查此案的想法。但马林科夫回答说:“中央政治局对此案已经研究三次,请执行政治局决议。”

摘自官方资料:

1948—1952 年,因所谓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捕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上百位犹太作家、诗人、科学家、演员、职员、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当中 10 人被判死刑,20 人被判 25 年劳改。像通常一样,当时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处以 10 至 15 年不等的刑期。不过,在进入所谓司法程序之前,在国家安全部的刑讯室里活过来的并不是所有的人。

五、生物学家瓦维洛夫和遗传学家列索夫斯基案件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前对人民所犯的罪行更多。它所犯的丑行之一便是“瓦维洛夫案件”。我知道,有人把这位优秀科学家的死也归咎于我的父亲。我想,让读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判死刑并不像文章中时常所说的那样是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所为,而是最高法院。我妈妈在农学院工作,她为瓦维洛夫院士的遭遇深感痛苦。这一话题在我家中讨论过,自然也在科学家中间讨论过。有一天,在进行这样的一次谈话之后,妈妈已不是仅仅只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她

的同事们请求我的父亲，要他想办法救救他。这样，我父亲会见了为尼古拉·瓦维洛夫的命运感到不安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和其他几位科学家。我知道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最后父亲答应科学家们，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签发，但还是要尽力帮助瓦维洛夫院士。

遗憾的是，至今人们仍然不肯承认在瓦维洛夫案件中，并非一切都是都那么简单明了的。在听取了他的情况之后，我父亲看到了这一点。据父亲讲，他对尼古拉·瓦维洛夫的诚实没有怀疑，但侦查部门掌握了一些无可否认的“把柄”。据悉，瓦维洛夫带着他有名的植物标本收藏走遍了整个世界。他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危害国家的活动，但侦查人员证明，在与院士交往的许多人中间就有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尼古拉·瓦维洛夫不能否认的还有告密信中的内容。情况的巧合对这位诚实的人来说是致命的。而且，我父亲能够做到的只是减轻对瓦维洛夫院士的判决。据我的理解，那个第一判决没有急于付诸执行，我父亲抓住了第一次机会为他减轻了判决。完全撤销根本不可能，这令人感到有些遗憾。但是，父亲并未失去彻底释放瓦维洛夫的希望，而为了使尼古拉·瓦维洛夫能活到这一天，父亲决定将他转到一个封闭的研究所里。主要是先把他从监狱提出来。遗憾的是，这位科学家终因病重身亡。

妈妈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十分压抑，她和父亲进行了一次当时对双方来说都很沉重的谈话。和妈妈一起工作的人都非常热爱瓦维洛夫，尽管大多数人都明白，不是我父亲逮捕了他和判他有罪，她在心理上仍然比别人更要感到沉重。自然，父亲当时也极为沮丧，他说：

“你要知道，我能够施加影响的只是个别事情，但撤销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连人民委员也做不到。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你要知道，瓦维洛夫不是被枪毙的。很遗憾，尼娜，这样的遭遇还会有很多很

多……"

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在"瓦维洛夫院士案件"中起了致命作用的是并非没有一点名气的特罗菲姆·李森科。

摘自官方资料：

特罗菲姆·李森科，1898年生于卡尔洛夫卡镇（乌克兰）。就读于园艺学校和基辅农学院，在阿塞拜疆的白教堂试验场、棉花研究所工作。20年代末，他在科学界崭露头角，证明他所进行的试验能保证经过春化处理的谷物提高产量。简言之，李森科提议将耐寒的冬播种子经过浸泡和催芽处理之后，再作为春播作物播种。

很快，波尔塔瓦农学家的名字便轰动全国，尽管李森科的想法本身并未经过实际检验。革新家成了劳动红旗勋章的获得者，1934年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起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不管今天听起来如何奇怪，但在支持这位精力充沛、勇于创新的农学家的人当中就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

他是毁灭苏联生物学和迫害许多祖国科学家的罪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获8枚列宁勋章。

原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特罗菲姆·李森科于1976年逝世，享年78岁。

我从妈妈那里没有听到过一句有关李森科的好话。她是个农业化学家，曾在瓦维洛夫和普利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培训班学习过。捷米利亚泽夫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是个冒险家，而他的思想是伪科学。但要知道，他是真正的科学家所抵制的所谓人民院士的一员。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都一样。凡是非科学态度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尽

管如此,李森科在瓦维洛夫院士以及许多其他苏联科学家的悲惨命运中所应承担的罪责仍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并不局限于谴责斯大林,尽管他支持了李森科。众所周知,后来如此热心地庇护这位"人民院士"的还有赫鲁晓夫。

后来在战后时期,和瓦维洛夫院士的境遇一模一样,俄罗斯卓越的遗传学家尼古拉·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也多亏我的父亲而没有被枪毙。多数读者或许会因丹尼尔·格拉宁的小说《顽固分子》而记得他。

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战时在德国以一个大科学家的身份主管一个实验室的工作。1945 年他被带到苏联,并判 10 年徒刑。他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只能勉强忍受。后来他被送到南乌拉尔的一个实验室,在松古尔。那里曾经是内务部的疗养院,后来成了与核计划有关的项目的基地之一。据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本人回忆,那里的环境非常优美,处在一个秀丽的湖边。前不久一家报纸刊载了老同事为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记录的一篇口述故事。顽固分子回忆道,虽然他是个官方罪犯,但有一个厨师长和一个裁缝,同时隶属于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的还有约 50 个"自由"专家和十几个外国人。我讲这一点并不是说当罪犯好,究竟如何,我有亲身体验。那些已有许多记载的所谓"杀人棒"在那种条件下却救了许多人的命,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的命运仅为一例而已。

顺便说一下,在德国平安度过整个战争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许多科学家和德国人紧密合作,并在那里取得了不坏的成果。很清楚,1945 年可以把他们全部枪毙或绞死,理由是和敌人合作,这一点即已完全足够。党的机关准备挨个儿收拾他们,但也有些人想到了未来:这些科学家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益的人。起码我父亲这样认为,他证明说,应当让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和其他的人去参加工作,而不是惩罚他们。据我所知,顽固分子诚实工作,并

在科学上成就颇多。

党的机构对合理性从来不感兴趣。有这样一个例子。1943年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是列奥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他超过所有自己的同事10年制造了小型反应堆。他是火车头制造方面的大人才！他是全苏热力工程研究所的组织者之一和第一任所长。1930年他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死刑。而且有多少人遭遇这样的命运！

六、强迫少数民族迁移是谁的责任？

关于驱逐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各民族人民的文章已写了很多，而对参与这一卑鄙勾当的日丹诺夫、赫鲁晓夫和整个党的机关却不置一辞。是谁想出的这些花样，谁下达的命令？要知道，现在已经明了，作出决定的是政治局。当讨论驱逐居民的时候，我父亲当着许多人的面发火了。虽然他一直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也从没骂过人，但这次他已忍无可忍，失去自控，他冲着积极推行迁徙高加索各民族这一卑鄙政策的策划者之一道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部想法。这个人就是谢尔巴科夫。

“你是个白痴，”父亲说，“你难道不明白你是被当成最傻的傻瓜而被利用?!”

我不拟援引整个谈话，但我想意思已经明白。最使我父亲气愤的是，党的上层竟然决定在将德军赶离高加索之后就实施这一卑鄙计划。当年和军队一同坚守高加索的当地居民现在已不再需要。我父亲正式提出了反对驱逐这些人的意见。当时有几个参加过高加索保卫战的领导人来找他。我父亲对他们非常了解，1942年他们都曾和他一起组织过那里的防务。他坦率地对他们说：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挽救你们几家人，政治局不支持我的意

见。”

他们拒绝这一好意，和自己的民族一同走了。

可怕的悲剧。一些被派去参加这一行动的军队领导人后来向我讲述了官兵们对待这一命令的态度。但有什么办法，这是命令！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可以评论这些问题的是非曲直，而当时这些部队只能服从党的上层的决定，提出疑问不应该是他们的事。

但是，只要读一下近几年发表的与驱逐这些民族有关的材料就会发现，所有的命令、电报、报告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和这两个部门的局长们的签字。其中谈到的是关于用来执行驱逐行动的车皮数量和调派相应部队参与这一行动有的问题。在这些文件上签字的有我的父亲、克鲁格洛夫、梅尔库洛夫、以及其他人等。我重申，这些都已公开发表过了。只有一次我见到了 1944 年 1 月 2 日父亲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遵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和人民委员会 1943 年 10 月 28 日决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已完成将卡尔梅克族人迁往国家东部地区的行动。”

是“遵照……命令”。但是，历史学家们通常只努力挑选那些由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或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具名的材料来发表。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一卑鄙行径的倡议者就坐在卢比扬卡，而不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发现，党在此处也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为掩护，而对将整个民族驱离故土的始作俑者——政治局的决议却一字不提。要知道，把惩罚机构推到“前沿”是我们的传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几年前开始了对安全机构和警察机构不加区分的辱骂谴责，此时党就火上浇油，不时地公布一些与驱逐居民有关的文件。这样便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只是把克格勃和党的关系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还有一类文件则没有公布，以免使人看出，卢比扬卡的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老广场强迫他们做的。党的上层不想停止

使用强加给全国的这些老调子:这些机构不听监督。

在谴责肃反人员进行的政治谋杀时,究竟讲过几句正确的话?为政治谋杀辩护是不可能的,但是,是谁下令“消灭”托洛茨基、斯捷潘·班杰拉?1959年10月15日克格勃人员波格丹·斯塔申斯基在慕尼黑杀害了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斯捷潘·班杰拉。按照谁的命令?有文章说,这一行动是当时苏联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命令干的。这是不对的,不会有一个特工机构的领导人会承担此事。最近有文章断言“除掉”班杰拉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出的决定。要知道,这在30年前即1962年10月在卡尔斯鲁厄(联邦德国)对斯塔申斯基所进行的审判中,即已得到证明。他所受到的刑罚较轻,只判了几年徒刑,因为法庭认定此案主要罪责应由主犯苏联领导来负。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可掩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曾作出命令授予杀害班杰拉的凶手一枚红旗勋章。

七、托洛茨基的被刺

而又是谁使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凶手、西班牙共产党员拉莫·梅尔卡杰尔成了苏联英雄?授予他英雄金质奖章已经是1961年的事了。逻辑在哪儿?党和国家谴责在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政治谋杀,但自己却在此期间派遣一个杀手去慕尼黑,而给另一个杀手在他服刑期满后发了一枚金质奖章。真是丑恶的政策!

托洛茨基于1929年11月被驱逐出苏联。当时报纸报道,是因“从事反苏活动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作出的决议”被驱逐的。那时就在说谎,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特别会议可以单独作出这一决议,这是最高层领导一手操纵的,其中包括斯大林本人。后来没有任何必要去搞政治谋杀,尽管托洛茨基一直坚持不懈地与自己昔日的战友作斗争,但他的影响力已微乎其微。他的声望

正因这一谋杀而明显上升。如果他是寿终正寝，人们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当然不是外国特务，但不管他愿意与否，他得到了外国特工机构的资助。这一点有文件可以证明。大概，这种政治上的妥协是家常事。我们不认为列宁是德国特务，尽管他接受了德国特工机构提出的把他转送去俄国的建议。

我父亲认识托洛茨基是在20年代初。在列宁去世前托洛茨基去过北高加索，后来也去过几次。父亲说他是个残酷而又极为自负的人。现在通常把这种类型的人看作原教旨主义者。托洛茨基确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他不同意小范围内的革命，主张世界革命。他要的是如此规模的革命……

父亲说他是个极为傲慢的人，从来不肯走下他的圣山而费劲去同"贱民"接触。群众集会是一回事，但和布尔什维克的全体领袖们一样，托洛茨基对人们的命运很少感兴趣。托洛茨基需要的是整个世界。可能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如果他能接近群众，还不知道20年代的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但是，我觉得如果托洛茨基处在斯大林的位置上，世界所受到的震动一定更为强烈些，而且会来得更早些。关于集中营是按照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指示建立的，最初我也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数万名完全无辜的人质被枪毙，这一事件也应由托洛茨基负责。部队中的政委制也是托洛茨基的发明，这是他个人在红军中的惩罚机构。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一时期与他进行斗争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今天人们认为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一点……后来斯大林也走上了那条路，但当时他对托洛茨基的建议却是极为敌视的。

他们之间的斗争累月经年。斯大林在角逐中获得了胜利，因为在这场斗争中他依靠的是为托洛茨基所不耻的"贱民"。斯大林要更聪明更有远见些。后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在境外都不能闭嘴的时候，特工机构便收到了那个著名的命令。

在自由图书公司于1940年发表的列夫·托洛茨基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说:"历史的报仇比强大的总书记本人的报复更可怕。"

他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

谋害托洛茨基的尝试很多,大概有10到12次。我猜想,我父亲作为内务人民委员肯定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一事件,因为有苏联情报机构的介入。有一次这样的行动就是由墨西哥著名艺术家达维德·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领导的小组实施的。1940年5月他和自己人一起对托洛茨基的郊外别墅进行了扫射和攻击,但进攻最后被击退了。

1940年8月20日,西班牙共产党员拉蒙·梅尔卡杰尔潜入防范严密的别墅,把自己打扮成托洛茨基的比利时信徒,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用冰镐给这位流亡领袖以致命的一击。第二天,托洛茨基在医院逝世。

这一行动的组织者是特工干部瑙姆·埃廷库将军,他和梅尔卡杰尔及其母亲卡里达德还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认识的。

梅尔卡杰尔本人被捕,并被关进墨西哥城的"列库姆别里"中央监狱。法院判他20年监禁。后来他住在苏联和古巴,死后葬在莫斯科的昆采沃公墓,用的名字是拉蒙·洛佩斯。

参与谋杀托洛茨基的人的命运不尽相同。埃廷库将军在斯大林临死之前不久被捕,并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于1953年被释放。而在杀害我父亲之后埃廷库再度被捕,并不得不在弗拉基米尔监狱服刑12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内部命令授予谋杀托洛茨基的参加者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红星勋章。他和西凯罗斯一起攻击了科依安卡的别墅。1970年这位原秘密特工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作为一位著名拉丁美洲学者而为世人所知,是《名人生平》丛书关于切·格瓦拉、萨尔瓦多·阿连德、波利瓦尔几部书的作者。

我听说，他曾和西凯罗斯在西班牙的一个国际纵队中作战，并在那里被吸收加入苏联情报机构。部分资料表明，他曾在梵蒂冈工作过一段时间，并从那里回到了苏联。

曾有一大批懂西班牙语的特工被派到墨西哥。一家流行报纸载文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组织了这次本世纪最为轰动的政治谋杀的罪人”，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自愿作出自我牺牲，当然更不是为了金钱。例如，西凯罗斯认为，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正确。梅尔卡杰尔、埃廷库、以及其他人的行动也都出于自己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执行谁的命令。那些行动的参加者们认为，他们执行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命令，我们知道这是不无根据的。

八、卡廷悲剧是怎样发生的？

党总是能够插手那些肮脏的事情而又不失时机地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只有党的上层领导人除外。甚至在所谓的改革时期都没有道出有关卡廷悲剧的全部真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所有的领导人都试图将大批坑杀行动“算在”德国人账上。1990 年 4 月塔斯社才宣布，“苏联方面为卡廷悲剧深表遗憾，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公布了波兰军官的总数，“约 15000 人”，他们的名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报表中从未被提到过。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时说：

“最近找到的一些文件虽间接，但却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前有数千名波兰公民死在斯摩棱斯克的森林中，成了贝利亚及其帮凶的受害者。波兰军官的坟墓就在死于同一只罪恶之手的苏联人的墓旁。讲述这一悲剧是不轻松的，但却是需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事实真相才能到达真正复兴

和真正相互理解之路。”

这段话引自1991年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卡廷悲剧》文件汇编。这本关于这个制度的可怕罪行之一的文件汇编的出现本身是向公开化的一个突破。但是，当时真话也才讲了一半。我立即注意到了所发表的文件中的影印图片。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已将其中一部分文件交给了波兰共和国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而这里有些是作为新文件呈给读者的。我读完之后明白了，欺骗仍在继续：我知道其存在的一个主要文件没有收录在汇编中。

在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交给他的只是在苏联档案中找到的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案件总管理局处理战俘和被拘留者名单和其他材料的副本，其中列有1939—1940年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科泽利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别列斯克集中营里的波兰公民的姓名。没有一个文件涉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战俘之事。文件只能证明，满载波兰公民的军用列车发往斯摩棱斯克。

当我们开始知道关于卡廷、关于存在一个政治局决议的“特别案卷”的事实真相时，世界还不知道，苏共中央总书记早已知道这一往日的秘密。当戈尔巴乔夫托辞说苏联档案馆不存在相关文件时，他完全是在说谎。其实，应当认为，对苏联方面的“把戏”早已习以为常的波兰人对这位“改革之父”也不会十分信任。他们是对的。诚然，在揭穿这位已不存在的苏联的破产前总统的例行谎言时，他已不须感到脸红，因为戈尔巴乔夫已辞职了。

摘自苏联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答外国记者问：

有关卡廷的秘密记录和文件问题，戈尔巴乔夫肯定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从天而降。当在克里姆林宫将全部卷宗交给他的时候，他对某些情况的了解是和

叶利钦一起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间。"现在这是你的包袱了……"如此说来,这里有一点是真实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收到了全部文件……特别是在卡廷问题出现的时候。在此之前苏波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工作。开始寻找材料。戈尔巴乔夫知道有这些材料,这一次他本人要我拿给他看。我命令找出档案中所有与卡廷有关的材料。不一会儿给我送来了用大信封封好的一包文件。虽然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可以打开纸袋,但我没有这样做,就像那1500个纸包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档案库中一样,我没有打开过其中任何一份。我将纸袋拿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自己打开它,读了文件内容,然后没有让别人看就又装回纸袋,贴上封条,对我说:"这就是那些需要找的东西,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波兰军官的材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份文件,纸袋是当着我的面封好的。而当我问他是否应将卡廷这一消息通告有关人员时,他说,谁该知道他会自己通知的。

"您怎么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什么人讲过这些文件没有?"

"这我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他还曾两次问我是否销毁了与卡廷有关的秘密笔录的材料!"

"他想销毁这些材料吗?"

"当然,特别是那些秘密笔录,因为对他来说实际上这是一颗定时炸弹。这些材料的发现和公之于众威胁到了他的道德和政治生命。要知道,明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却欺骗了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国内舆论,对世界舆论也是如此!"

我在接任总务部部长职务后,我首先了解到的就是那些秘密封存材料。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的秘密议定书和有关卡廷的文件就属于这种材料。因为围绕材料背后的事件在此之前报界已闹得沸沸扬扬,我立刻向总书记汇报:文件还在。

我将秘密材料、签着字的地图拿给他看。他摊开地图研究了很长时间，研究双方同意划定的边境线。我记得上面有两个人的签名：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戈尔巴乔夫长时间地研究了文件之后说："拿走，越远越好！"而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声称，"寻找秘密条约原件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在此之后不久，他好像不经意地问我，是否已将这些文件销毁。我回答说，对此需要作出专门决议。他说："你明不明白，这个文件现在意味着什么？"他是个故弄玄虚的大骗子，这已不是秘密……

在这个问题上还想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那至少是太幼稚了：殊不知这是对本国人民，以及对因布尔什维克党的罪恶而失去自己数千名儿子——民族精华的邻国人民的拙劣而又卑鄙无耻的欺骗。但克里姆林宫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至于昨日的仆人主动"出卖"今日失势的主子，而后者同样是个党棍，只是更为机敏灵活一点而已，他只能如此做，而不会是别的样子。

另一位机关权贵法林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更为引人注目：

"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里没有发现揭示卡廷悲剧内情的材料，我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学者们发现的材料无疑揭示了部分内情，结合波兰方面的看法所依据的资料，使我们很难再坚持原来的说法而敷衍了之……显然，最简便的办法是：通知雅鲁泽尔斯基，经过对有关档案库的仔细检查我们未能发现直接证据（命令、指令等），表明卡廷悲剧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犯罪者是谁。与此同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案件管理总局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护送部队管理局1940年的遗存档案中却发现了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信性提出置疑的标记。依据上述标记即可得出结论，在卡廷地区

杀害波兰军官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而具体负责者就是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以什么方式和选择什么时间向波兰和苏联舆论界宣布这一结论……”

报告上标明的日期是1990年2月。法林向戈尔巴乔夫所提的建议同样令人瞩目：“能够得出结论……”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为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周围的人，都明显不想让执政党去充当“靶子”。

后来，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毫无惭意地欲将这一责任推给叶利钦，他说，我将卡廷的全部材料都交给了鲍里斯·叶利钦，但他为什么没有通告波兰方面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一位总书记即使在其退休之后仍然信守自己的话：戈尔巴乔夫“实不知情”。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记者们的问题回答得更为坦率：“戈尔巴乔夫连宪法法院都不去，因为他害怕这个问题。”

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的领导人本身也未能道出全部事实真相。正式发表的声明指出，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是卡廷悲剧的参与者。诚然，固守老说法的大众媒体也作了一点修正：“最初文件中出现过贝利亚的名字，但后来不知是谁又给划掉了……”。这一情况不知为什么没有使任何人感到特别不安。而这一切都是徒然。无论是1940年3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文件还是其他材料当中，都找不到我父亲的签名。喧闹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的组织者们谎称，对这一不幸行动当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

而实际情况却是，对波兰军官实行枪决投票表示赞成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加里宁，总之，是整个党的上层。顺便说一句，被枪杀的波兰军官远较戈尔巴乔

夫所承认的数量要多，是 20857 人。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特别坚持要这样做。我父亲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中公开站出来反对这一丑行的惟一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

"战争已不可避免。波兰军官团是同希特勒进行斗争的潜在盟友。无论如何，我们要进入波兰，而波兰军队在未来战争中应该站在我们一边。"

党的上层的反应可想而知，而我父亲因固执己见险些丢了乌纱帽。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宣称："这样我可以负责这些机构的工作！"但即便如此也未能迫使我父亲在波兰军官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当然，大家都明白，一个人的不同意见已经无济于事，波兰人在劫难逃。

我父亲受命在一周的时间内将被俘的波兰军官交给红军部队，而血腥镇压本身交由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施行。我猜想，护送部队中还是有某些分队参加了这一行动，但枪杀波兰人却是红军所为，不管承认这一点让人多么心痛。这就是至今仍然精心掩饰的事实真相。

事情就是这样的，父亲示威性地拒绝服膺大多数人的罪恶决定，并且，斯大林原谅了他，这种事在斯大林的圈子中是没有先例的！

斯大林没有忘记这一点……但事实就是事实：我父亲拒绝参与这一犯罪，尽管他知道，要拯救这 20857 个人的生命他已无能为力。要考虑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远不是始终和斯大林的意见保持一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喜欢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还能够听下去。

尽管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期待多年，希望能有一个诚实的总书记承认"卡廷案件"文件卷宗的存在。我非常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文件，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封印下从 1940 年起存档的。我记得十分准确，父亲将他不同意枪毙波兰军官的原则意见写成了

书面材料。这些文件在哪儿?

1993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波兰呆了一段时间,于是我坚信,那里的人们早就非常清楚:关于卡廷事件今天仍未道出全部真相。

在波兰我参加了不少有趣的会见和各种层次的谈话,我想,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我的交谈者们对卡廷问题早有研究,并对后来俄罗斯领导人所提出的新说法也明显不满。在波兰,人们都非常清楚,这些依然是半真半假,不会更好些。例如,当我父亲拒绝执行这一罪恶命令时,伏罗希洛夫立即提议授命军队来完成这一行动,并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为什么不谈这点?因为这会损害军队的声望?但为什么从法西斯手中解放了波兰的军队今天应为当时政治领导人的罪恶决定承担责任?看来,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此处道出"贝利亚案件"的真相就必然会牵扯到别的方面的问题。

我父亲还是从集中营解救了几个人,其中就有1942年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波兰军队的司令员弗拉季斯拉夫·安德斯。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我家在小尼基塔街的单独住宅中,至今我都还记得他住在我家的许多细节。

苏联的波兰武装力量副司令员耶日·克利姆科夫斯基
1945—1947年在耶路撒冷和罗马所写的回忆录摘抄:

> 安德斯知道,还在签订7月条约几个月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曾建议普舍兹杰茨基在苏联组建波兰军团……1941年8月12日广播电台报道,为执行波—苏条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赦免所有处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这样,对于分散在苏联广阔土地上的数十万波兰民众来说便结束了毫无信心的日子,无望的岁月和无眠之夜……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关在集中营里,另一些人在集体农庄和伐木场或筑路工地工作,或处于自由流放的境地;还有一部分人在所谓的建筑队里,而少部分人在红军队伍中。考虑到在苏联有大约30万

波兰公民适宜服役，所以，组建两个师根本不多。但据小道消息，这只是未来军队的第一支队伍……

当然，这完全是我的揣测，但是我想，斯大林知道安德斯没有被枪毙，而且就住在我们家。如果那个时期我父亲没有斯大林哪怕是间接的支持，情况一定会全然不同，我父亲关于在苏联境内建立波兰盟军的想法也便难以实现了。

他最初建议组建波兰部队还是在1939年，但当时他的这一建议被束之高阁。当希特勒签署的21号命令“巴巴罗萨计划”送到我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没人能回绝这些提议了。问题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当时出于保密考虑，决定不要过急组建波兰部队，以免引起德国人的警觉：苏联已经知道德国正在为战争作准备。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波兰人被置于集中营里，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在这几个集中营的基础上秘密组建部队。正因如此，后来波兰军队才会如此迅速地正式组建起来。第一军团也是正式组建的，大概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顺便说一句，后来安德斯的军队开赴近东并受英军指挥，我父亲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

我父亲的行为逻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甚至谈不到什么特别的人道主义，而只是合乎情理。战争的日益临近已无可怀疑，父亲每天通过情报机构获得大量有关的证明材料。他认为，处在苏联境内的所有这些人可以成为波兰军队的骨干，将来能和我们一道进入波兰。挺进德国的第二条路线是没有的。

为什么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人坚持要枪毙这些军官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会将半个国家的人杀掉或赶入集中营。而斯大林为什么表示绝对赞成枪毙他们？正像现在人们所说的，他是出于帝国的利益。无论如何，他是从他的角度解释自己的立场的，如果将来掌权者是这些军官，那么波兰就将不

是我们需要的波兰了。在当时斯大林已看到波兰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

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后，这些人被军用列车从集中营运到了斯摩棱斯克，在路上，武装部队换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队。把那些人运送到什么地方的证明书上有我父亲的签字，但在处决文件上他一个签字都没有。然而，在许多情况都已大白于天下的今天，这一切仍不能阻止某些人继续制造谎言。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波兰、德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拍摄了一部不坏的电视片《卡廷案件》。可又是在讲谎话：

> "对 20857 名没有犯罪的人执行枪决的命令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向斯大林提议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对他们处以极刑——枪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部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

电视观众中一定有人将这一谎言当成是引自某个文件，而实际上这是伪造的。我父亲从未提出过如此荒唐透顶的建议。顺便说一句，这种谎言就是普通的肉眼也能看得出来：众所周知，1946年之前在苏联根本就不设政府的部，而是设人民委员部，因此，无论伪造者的愿望如何，内务人民委员是无法在什么地方签字的。类似的明显歪曲和伪造文件及事实的例子还能列出许多，但在这个问题上所要指出的甚至还不是这一点。那部电影初看起来是在指摘政治局的罪行，而实际上是在混淆视听："这一决定在政治局几位最高领导人的小圈子中通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在贝利亚所拟定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没有亲手杀死这些人，而只是在"贝利亚所拟定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我时常感觉到苏共中央依然没有寿终正寝，曾经执政的这个党仍在继续操纵着社会舆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大

众传媒工具仍像从前一样不辞辛劳地大量发行在老广场诞生的谎言?

其实,多年来与卡廷悲剧有关的整个事件不过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谎言。1943 年 4 月德国电台报道说,占领当局在卡廷附近发现了被“犹太政委们”枪杀的数千名波兰军官的坟墓,苏联方面立即表示未曾参与这一行动。对战争期间在卡廷工作的国际委员会所作结论苏联也是这样明确地作出了反应。斯摩棱斯克解放之后,一个以著名外科医生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委员会被派到卡廷,其得出的结论与正式说法不相吻合是可想而知的:波兰军官不是在 1940 年而是在 1941 年秋天被德国人杀害的。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苏联方面的公诉人鲁坚科声称,枪杀波兰人的是德军第 537 工兵营的士兵。国际法庭对这一说法未予承认。

现在已经清楚,参与掩盖卡廷秘密的不仅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全部总书记,其中也包括最后一位。

一份绝对可信的波兰资料证明,在战争期间,有一次当话题涉及到消失不见的波兰军官时,梅尔库洛夫对他的同胞们说,“他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完全能猜测到,梅尔库洛夫会以这种方式让那些参加组建波军的波兰人明白,继续寻找这些人是徒劳无益的。要知道,波兰人在当时就要求知道事实真相。而梅尔库洛夫是那些了解内情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因为他是我父亲的第一副手。何况我们家的人都已知道这些……

有这样一个细节:安德斯住在我家的时候,梅尔库洛夫常来看他,这使我惊奇不已。客人是谁我后来才知道,而当时只是在想,是什么样的人物要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陪着呢?

摘自官方资料:

弗拉季斯拉夫·安德斯,波兰著名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

1892年生于华沙近郊的一个土地代理人家庭。在里加工学院读书的时候于1914年应征入伍。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学院。在纳希切万汗组建的骑兵团中作过战。1917年2月之后入克列霍维克枪骑兵团，从11月起任波兰步兵军第七波兰步兵师参谋长，在白俄罗斯作战。

1920年他参加对红军的战斗。后来在巴黎最高指挥学校学习，在罗夫诺、克列梅涅茨、布罗德、巴拉诺维奇地区指挥过骑兵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任里兹巴尔克骑兵旅司令。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军队在解放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5年起代行波兰武装力量最高司令职责。

194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剥夺其波兰公民权。从1954年起成为波兰侨民的实际领袖。他不承认波兰政府，也没有再回到祖国。

九、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的主张

直到不久前才得知，苏联领导层应承担罪责的不仅仅是杀害波兰军官，而且还有50年代对苏军军职人员的杀害。联邦德国发表的以前不为人知的德国社会统一党秘密档案文件证明，1953年6月17日镇压起义之后，在民主德国有40多名拒绝向起义者开枪的苏联士兵被枪决。在柏林和马格德堡自己人杀害了我们的同胞……

在1956年的匈牙利，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要知道，在那里拒绝开枪的人也被自己人打死了。但是，除了政治领导人之外，谁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我清楚地记得民主德国起义前夕所形成的局势。我父亲认为，德国问题是欧洲的关键。不仅如此，他说，关键问题是苏联和

德国结盟。

苏联经济因战争而急剧衰退，生活水平极低。我父亲认为，应该将整个国民经济的潜力都转移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来。我父亲说，这样做不应当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数千万苏联人看到了欧洲的繁荣，而且是一个被战胜的欧洲。自然他们会把那里的情况同国内的情况作比较。胜利者从德国归来，又陷于极度贫困之中。德国即使被战争破坏，但和苏联比较起来，其生活仍是相当好的。

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父亲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德国应当统一起来。而且，他说，不应当强迫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就可以使我们有德国人民和这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可靠的盟友。父亲深信，这样苏联就可依赖其经济实力并在 25 年抑或更多的时间内利用这张王牌。我们旨在分裂德国的相反行动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西德投入美国和英国人的怀抱。我父亲希望看到一个自由的德国成为反希特勒集团同盟国之间的平衡器。

我父亲劝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成员们，应当由我们采取主动提出统一的中立的德国的倡议。德国对此一定会非常赞赏。而当英国和美国忙于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和殖民地等事务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这些方面。我们却可以依靠德国的潜力，赢得充裕的时间，得以恢复经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当然，还可以解决国防问题。

记得父亲笑着说：

“你看，他们提出了多么愚蠢的建议?！试将梁赞州和斯摩棱斯克州分开而让这些人互相打仗。要知道这是违反自然的事！制造两个德国，就是这样的蠢事。”

摘自苏共中央七月(1953年)全会速记记录:

莫洛托夫:但是,在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德国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贝利亚站在与我党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他当时说,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贝利亚的这些言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一点已经明确,在现有情况下即在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出于对前途命运的考虑,资本主义的德国可以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或者对苏联保持中立的国家,这不仅仅只是幻想,而且意味着实际转向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立场……在贝利亚所提出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中就这一问题他的建议是:承认"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建议"拒绝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当然没有接受……这充分显示出贝利亚没有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在此情况之下,我们感到贝利亚是一个与我们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人,他是资产阶级阵营的人,是苏联的敌人。

在德国问题上贝利亚建议的投降主义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他是要向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降……我们现在已开始明白,这是一个异己分子,是反苏阵营里的人(异口同声:对!)。

马林科夫:应当说,贝利亚在讨论德国问题时的建议不是调整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在民主德国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并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从目前所知的有关贝利亚的全部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新评价他的这一观点。显然,这一事实说明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分子……主席团决定撤销贝利亚的现有职务,开除其党籍。主席团得出结论,不能和这个冒险家善罢甘休,决定逮捕党和人民

的敌人贝利亚(异口同声:对!雷鸣般的掌声)。

揭发和驱逐贝利亚这个蜕化变质分子,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将会更加强大和团结一致。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确信,采取这些断然措施是这种情况下惟一正确的选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还坚信,列宁会这样做,斯大林也会这样做(雷鸣般的掌声)。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将获得中央全会的一致赞同(雷鸣般的掌声)。至于我们在斯大林同志死后在揭穿贝利亚的3到4个月时间里所犯的个别错误和所出现的偏差,我们会同心协力地予以纠正。我要说的是,这很好,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能力有多大,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有人高喊:对!)便认清了这位冒险家的真实面目,彻底铲除了这个恶棍和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掌声)。

有一个时期,斯大林同意我父亲的想法,曾正式采取了将占领区联合起来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文件保留了下来)。苏联政府向英、法、美司令部建议在德国实行大选。应当说,我父亲是那一时期德国合并的倡导者之一。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后来,统一民主德国的拥护者们感到了党的上层的强大抵制,因此努力不再去触怒他们。而我父亲还在继续证明,苏联政府施行的方针将会导致悲惨的后果。要知道当时即已得知,有数万名民主德国的公民已经逃到西德,而在民主德国,居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最后终于导致了起义的爆发。

美国人的态度耐人寻味。那时,他们的分析家们由于对事态的未来发展估计有误,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按照苏联的提议合并德国(苏联通过情报机构已获得有关文件),为作出对于自己人来说更易于理解的结论而提出的口号是:如果按照俄罗斯人提出的条件在德国实行大选,那么世界就将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甚至即便形式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也会成为苏

联的盟国，而这是美国人所不能允许的。于是他们拒绝实行大选，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联的提议也作出了和美国人完全一致的反应。实际上当时西方支持了主张分裂德国的苏联执政党的上层分子。

接下来将德国联合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尝试都遇到了来自苏联内部和西方列强以及民主德国的抵制。德国党的上层在尝到权力的甜头之后，已经不愿再将它交出去了。

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已是一位垂暮的老人，但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同意在任何原则基础上的德国联合，而其他人则看到了实行这种联合就会失去他们个人的权力。尤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他在皮克死后成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乌布利希的智力水平无论是在民主德国本国还是在苏联都是人所共知的，但显然，这并不影响这个人当政数十年，1963 年他甚至成了苏联英雄……他在苏联安然地度过战争时期，但后来他却在德国人民面前把自己打扮成反法西斯的积极斗士。他随苏联的后勤保障部队进入德国。而实际上，正是这位乌布利希曾经站出来公开反对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害的真正反法西斯分子恩斯特·台尔曼。但是，乌布利希经历中的这一事实自然在我国和在民主德国都没有宣扬过。

在德国骚乱开始的时候，起义者们要求乌布利希和他的政府辞职、实行自由选举、苏联撤军。为对付起义者而投入了坦克部队，有数百人牺牲，数千人被捕。

在中央全会上，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承认，民主德国的局势使他们深为忧虑，于是通过了“实行改善政治和经济环境措施”的决议。并向乌布利希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推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但向与会者掩盖了一件事实，即苏联党的领导人被迫接受的是贝利亚曾经提出过的建议。而时间却已失去

了。实际上对起义没有采取任何政治性的、非暴力的预防措施，党的上层对德国将来是否会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弃而不顾。

"你们干嘛要互相捉迷藏？"我父亲愤怒了。"比方说，民主德国的全体居民全都赞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这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即便如此也只有整个德国的四分之一的居民。在任何情况下，甚至有西德居民的某种支持，你们的方案也行不通。但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相反，这甚至会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不会再要求我们的干预，我们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消耗我们的财力物力。"

所有这一切都是获得了赞同的，但是，在全会上，我父亲的建议、他的论证没有人提到过。而可怕的是，德国问题就这样悬而未决。

我父亲非常了解德国，包括其历史和所面临的问题。这与他在战前就对德国感兴趣有关。后来在战时，我们在那里拥有分布极广的情报网。因此，作为苏联战略情报领导人，我父亲在任何时候都不缺少可靠的情报。

特别引起他兴趣的是德国设计师的研究、德国科学家的成果。粉碎法西斯之后，我们从德国人那里所获甚丰。例如，为我们奠定了火箭建设和核动力制造的基础。了解德国的科技潜力无论对我们的设计师还是科学家都极为有益。在苏联，有数十位德国专家在心甘情愿地忘我工作。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父亲关于与苏联紧密合作的统一民主德国的幻想几乎在他死后40年才得以实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与联邦德国的多年对抗，也不会有臭名昭著的柏林墙和人员伤亡，更不会有因大批长期在民主德国驻扎苏军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要知道，至今还没有人计算过，国家在数十年中为党的上层官僚保有"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桥头堡"这一不切实际的愿望到底浪费了多少钱财。

摘自苏共中央七月(1953年)全会记录：

马林科夫：在上一星期，即我们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审议贝利亚案件那天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报告的内容是有关1953年6月26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据称贝利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捕的。苏共中央档案中没有这次的会议记录，这是史无先例的！顺便说一句，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这一最高职位。只是在事后，在6月29日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组织侦查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犯罪活动案件”的决议)，他来找我，建议通过内务部采取行动以恢复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我向他说明，这个问题应经过中央委员会的讨论。这是个什么样的建议呢？现在从贝利亚处没收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份文件：“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贝利亚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措施，因为我们对他个人采取的行动已扭转了事态发展的方向。

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得出结论，最近与南斯拉夫关系中所推行的路线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现已清楚，由于我们未能以迎头相撞的办法解决特定任务，那就应该转用其他方法。决定与南斯拉夫确立一种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联系

紧密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关系——互派大使、照会、公务会晤等。

贝利亚要利用这一时机是别有他图。

按照他所制定的计划，内务部驻南斯拉夫的有关代表应在贝尔格莱德向兰科维奇转交一封信，信中以贝利亚的名义阐明了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完全不同的观点……按照贝利亚的方案，内务部代表应在与兰科维奇的会晤中声明："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同志转达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由贝利亚一手炮制的这封信是用来与"兰科维奇同志"和"铁托同志"建立紧密关系的。贝利亚未能给南斯拉夫发出这封信，他作为一个叛徒被捕的时候，这封信就装在他的口袋里。

但是，贝利亚企图与作为苏联敌人的兰科维奇和铁托达成协议，意味着什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贝利亚背着我国政府炮制的这封信是从背后打击苏维埃国家和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直接服务的厚颜无耻的企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我们做出结论：贝利亚是另一阵营的奸细，是阶级敌人的奸细(异口同声：对！)。

摘自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犯罪活动"的决议(苏共中央全会 1953 年 7 月 7 日会议一致通过)：

最近几天发现了贝利亚通过其间谍机构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兰科维奇建立私人联系的犯罪行动计划。

十、贝利亚主张与南斯拉夫修好

现在说说我父亲和"南斯拉夫问题"。赫鲁晓夫和他周围的人说，如果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不怂恿斯大林而如实地汇报情况，他就会更深入地研究局势的发展，进而无疑会找到正确解决这一

问题的途径，而不致于最后导致与南斯拉夫的决裂。”

人们说与南斯拉夫决裂是斯大林的错误，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在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时期，曾经向斯大林呈递一份情报材料说南斯拉夫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背离了苏联党和经济活动的经验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总之，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南斯拉夫式的建设国家的途径。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秘密。无论是铁托还是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都没有对我们隐瞒任何东西，但却让我们明白，他们不想让别人干涉他们的事务。但在此应着重指出，他们并未打算和苏联与苏共中央决裂。他们为我们的军舰和潜艇提供海军基地，为我们的空军提供机场，这些都归苏联使用。

我父亲对此处之泰然，并没有像国家党的领导层那样感到忧虑不安：瞧，南斯拉夫正在偏离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各个国家应建立何种制度应根据当地条件而定，盲目照搬别人的经验并非明智之举。比如，南斯拉夫不能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因为将数量众多的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与高加索极为相象，在山区搞集体农庄不是件简单的事，我父亲对此深有体会。

“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他说，“就让他们建设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社会。主要的是南斯拉夫是和我们在一条船上。要知道，他们甚至不表示反对我们部署驻防部队，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因此，不应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我方的生硬态度必然会激怒他们。”

在某一时期斯大林同意这个观点，他甚至将拥护与南斯拉夫加强联系的政治局委员们戏称为铁托分子。他自然也将我父亲归入铁托分子之列。但令人奇怪的是，在那次全会上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猛烈抨击我父亲与兰科维奇和铁托保持联系，而在斯大林时期他也曾经是个“铁托分子”。

“从我们政策的长远目标来看，通向地中海的出口极为重要”，

他支持我父亲说，“这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甚至如果现在在南斯拉夫当政的不是铁托，而是一个国王，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斯大林记住了这些话，后来还很认真地研究了国王返回南斯拉夫的问题。在一次铁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甚至问他：

“铁托同志，您怎么看在南斯拉夫实行君主立宪问题？国王就像英国女王那样，而铁托同志担任终身首相……”

在斯大林处谈话之后，他们一同来到我家的别墅，铁托、马林科夫和我父亲把这一建议当作笑谈来讨论。铁托当时说：

“为了现在让国王复位，竟需要经过那么多年的斗争……”

我知道，后来苏联领导人，确切地说是党的上层，经斯大林的同意，几次企图换掉铁托，因为他不太听任我们的摆布。我不知道为什么吉拉斯在其回忆录中没有述及此事。据我所知，当企图以更合适的领袖人选取代铁托的时候，也曾对他提出过一定的建议。向兰科维奇也有过类似的提议。但在当时我父亲就对斯大林说，这个主意不会产生什么结果。无论是吉拉斯还是兰科维奇以及铁托周围的其他人，都对铁托极为忠诚，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要知道，他们都和铁托并肩战斗过，而这一点非常能团结人。总之，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明显不同。我们党的领导人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战争为何事，而铁托的战友们都和他一样，在整个二战当中出生入死过。看来，这一点也给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父亲对此深为理解。

我知道，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之后，安全机构曾受命除掉铁托。事情是否发展到谋杀阶段，我不得而知，但我还记得父亲对这一决定的反应。他说，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他们想用当年除掉托洛茨基的方式对付他们。当时我无能为力。那件事从 1929 年开始，一直拖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局势和那时已完全不同，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刺杀铁托。”

摘自官方资料：

按照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在1952年深秋到来之前的某个时候产生了除掉约瑟夫·铁托的几个方案，他是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和刚结束之后的亲密盟友。所有这些方案都直接与格里古列维奇—马克斯的名字有关(这个秘密特工的名字读者已经熟悉，他参加了对托洛茨基的谋杀行动)。这里有一份文件，是当时苏联国家安全部写给斯大林本人的报告，出于极度机密的原因而由伊格纳季耶夫的副手一人执笔，并且只有一份底稿。文件内容如下：

"苏联国家安全部申请批准利用苏联公民、195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秘密间谍'马克斯'—格里古列维奇同志筹划和组织一次消灭铁托行动(材料附后)。"

"马克斯"持哥斯达黎加护照被我们派到意大利，在那里他成功地赢得了南美外交官和访意著名哥斯达黎加活动家、商人的信任，并打入他们的社交界。

利用这些关系，"马克斯"根据我们的布置取得了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公使的任命。为履行自己的外交职责，1952年下半年他两次访问南斯拉夫，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可以接近与铁托关系亲密的圈子，获得了铁托本人接见他的承诺。"马克斯"目前所处的位置有可能用以实施消灭铁托的积极行动。

今年2月初，"马克斯"被我们召到维也纳，与他在秘密条件下安排了一次见面。在讨论"马克斯"利用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我们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考虑到他的地位，哪种方式对他最为合适。"马克斯"提议采取由他本人除掉铁托的有效措施。我们就此建议对他要装扮的角色进行了商讨，并因此制定了实施消灭铁托行动的如下可行方案：

1. 要求"马克斯"取得铁托的亲自接见，其间他应当从藏在衣服内的无声装置中放射一定剂量的鼠疫肺菌，以使铁托和在场的人中毒身亡。"马克斯"本人将不了解使用制剂的实质效果。为了保住"马克斯"的生命事先将给他接种抗鼠疫血清。

2. 由于铁托将前往伦敦访问，派遣"马克斯"去那里，任务是利用其官方身份和他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韦莱比特的个人私交，出席韦莱比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为铁托举办的招待会。行动的实施方法是使用在日常用品掩护下的无声装置向目标射击，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制造恐慌，从而创造有利条件，以使"马克斯"不留痕迹地引身而退。

3. 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邀请外交使团参加的官方招待会，其行动实施方法与第二方案相同，同样授命"马克斯"本人，他作为派驻南斯拉夫外交官将被邀请参加这一招待会。

除此之外，还吩咐"马克斯"研究另一方案是否可行，即创造条件，通过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向铁托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件礼物装在一个珍宝匣里，在其打开的同时启动喷洒瞬间致命毒药的装置。

引用这份秘密档案中的文件，沃尔科诺夫时而强调说，"感觉到斯大林对除掉铁托一事连遭挫败而日益增长的不满，贝利亚和国家安全部头子伊格纳季耶夫疯狂寻找完成领袖指示的途径"；"贝利亚在其临被捕前的一段时期内竭力施加自己的影响。他将格里古列维奇召到莫斯科。贝利亚明显地害怕事情败露，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大家将会非常清楚是谁的意志在左右杀人之手。"又是谎言。我所知的一切与此不同：无论是通过战略情报机构途径还是与我父亲有联系的一大批国务活动家所反映的情况都表明，就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正式破裂之后我们和铁托的

接触也一直没有中断过。我还可以说得更多些，为了完成我父亲所承担的战略情报方面的任务，这样的接触在这一时期甚至还有所加强。也许，将下述事实公之于众不会是泄露国家机密：还在战争爆发之前，铁托、兰科维奇等许多人就与我父亲通过战略情报这条线保持联系。

斯大林对此是否知情？我完全可以推测他也可能并不知情。他通常感兴趣的是战略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本身，而不是情报来源。我父亲从不暴露与他联系的那些人的名字，就是对政治局委员们也不例外。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工机构都不会允许有类似的"透露"。我希望这一情况能使历史学家在分析我们两国的关系史时更客观一些。

我父亲遇害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修复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于是开始让铁托相信，横亘在两国关系发展之路上的石头是贝利亚。铁托笑着说：

"如果您觉得以这种方式向自己的党交待此事较为方便，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那是您的事。但我很清楚，事情并非这样……"

铁托从未作过指责我的父亲的声明。顺便说一句，赫鲁晓夫本人多年之后讲，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父亲便赞成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在中央全会上，无论是他，还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或其他的人，当他们肯定说发现了"贝利亚致兰科维奇的秘信"的时候，他们都公然在说谎。我父亲是奉苏联领导人之命准备与南斯拉夫方面取得联系，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就此问题曾经公开讨论过。在这里，他们是有意使参加全会的人产生错觉，误入歧途。

我父亲的积极主动精神还体现在他要求政治局授命他起草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的文件。这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并决定在开始行动的时候先通过非官方途径为进行这种非官方谈判准备条

件，解释一下斯大林死后苏联国内所形成的局势，并摸清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

我父亲准备好了信件草案，并将其提交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审议。它们就夹在有关南斯拉夫的其他文件中间。而这些文件如何被用来在中央全会的参加者面前诋毁我的父亲，大家已经清楚。

后来也是那些人开始塑造铁托的崇高共产党员形象。赫鲁晓夫前往南斯拉夫，铁托和兰科维奇来苏联，1956 年的中央报纸甚至报道说，他们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在雅尔塔附近的克里米亚山林中猎鹿运气极佳，大家都满载而归。

但铁托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共产党人。他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苏联轨道的，但我要说他是更易为人民接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国家的残暴政权的专制领导人，其法律也同样残暴。当铁托告诉赫鲁晓夫他不参与诋毁贝利亚的时候，他说，他这样做和他曾经拒绝"作为你们 1917 年事件的参加者"的做法是一样的。事情是这样：苏联领导人试图"美化"铁托的个人经历，并差一点使其成为列宁格勒十月变革的参加者之一。铁托拒绝了这一荣誉。按他的话说，他当时从俘虏营被释放归国途中偶然来到彼得格勒。因没有任何证件而被关进彼得罗帕夫洛夫堡。后来我国有人撰文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袖曾置身伟大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苏联是一贯善于篡改领袖们的履历的……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斯大林在战后指责我父亲说：

"我们救他真是没有道理，您就不应该派飞机去接他。最好是德国人当时把这个铁托和他的司令部一起消灭掉。这样，我们今天的麻烦或许会少些……"

说这话的时候有我在场。当时我父亲一言不发。记得桌旁还坐着其他人。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将这一谈话继续下去。

战争期间，我父亲通过战略情报机构获悉，德军正准备实施一

次空降行动。计划活捉铁托元帅及其整个司令部人员。德军希望借此改变南斯拉夫占领区的战事进程。丘吉尔的儿子当时也在铁托司令部里。

营救行动获得成功，铁托和其他人都被救出。我父亲座机的机组人员救出了元帅和他身边的人，其中也包括被派到南斯拉夫人民军司令部的丘吉尔之子。机长和他的小伙子们赶在了德军的前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使飞机能在一块很小的平台上起飞。剩下的人员都由其他车辆送走。

向铁托施加影响的斗争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不是偶然的，但在元帅的周围也有我们的人，比如伊万诺维奇。后来他当上了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总参谋长，似乎因试图逃往苏联而被击毙。很遗憾，我不知道详情。

摘自原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
团长助理戈罗什金的回忆录：

“通过几次和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会面和交谈我得到一个印象，无论作为南斯拉夫全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还是只作为一个普通人，铁托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尊敬。他没有躲在司令部里苟且偷安，而是置身在战斗激烈的前沿阵地，有一只手受了伤。希特勒的特工机构到处追寻他的踪迹，企图使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群龙无首。德国人不仅悬赏帝国马克要铁托的头颅，而且几次尝试活捉铁托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全体领导人。这样的行动在我们进驻南斯拉夫的1944年也曾经有过一次。战后我和铁托未曾谋面，但我知道，他的儿子从苏联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在莫斯科城下与希特勒分子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支手臂。”

在那次中央全会上叫嚣的所有对铁托的谴责都是无稽之谈，他的领导层没有背叛与我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其境内部署军事基地，不受他人控制，没有第三方力量发挥作用。南斯拉夫拥有在苏联积极支持下创建的精锐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部队近45个师。

无论是斯大林生前还是以后，南斯拉夫都曾建议苏联在其境内部署导弹基地。这是军人们，尤其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我父亲的支持下提出的论据之一。这些论据的提出是为了抵制反对与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的党的上层的。他们知道招惹党的领导层并非明智之举，因而提议将接触限制在军事范围之内进行一些接触。我知道父亲对斯大林和在政治局都论证了这些想法，并强调加强这一关系的必要性，因为不应当促使南斯拉夫与美国结盟。这是那一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在那次中央全会上还完全歪曲了我父亲对解决“匈牙利问题”的态度。我父亲强烈谴责匈牙利共产党对经济事务的干涉。而共产党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对什么都不负责任，包括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我父亲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

其实，在这方面恶迹昭彰的不仅是匈牙利人，所有这一体制莫不如此。要知道，不久前我们党还在作出有关收获土豆的决议，难道这不愚蠢吗？

我父亲建议彻底改变我们对盟国的外交政策。战争结束的时候，赢得辉煌胜利的苏联的威望如日中天，从而无须特别努力便可提高国家的声誉。但克里姆林宫似乎对此茫然不解。应当使所有的占领军，其中也包括我国和美国的军队，撤出德国，而同时又不像1956年11月在匈牙利所做的那样，将这些军队派到其他国家去。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从布达佩斯发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1月20日，根据科涅夫同志和谢罗夫同志提供的材料，从叛乱者手中缴获、从居民手中没收和被抛弃的步枪共181766支，各种机枪3172支，火炮和迫击炮40门，其他枪支和手榴弹64000颗……我们同卡达尔同志进行了交谈，认为目前必须从参加反国家的暴乱而被捕的人中选出5至7人，对他们在反动派控制匈牙利期间积极参与野蛮恐怖活动判处他们死刑，执行枪决，以震慑反革命势力和迅速恢复国家秩序，卡达尔同志同意我们的建议……”

苏联领导层认为，1956年11月4日凌晨开始的“旋风”行动实施顺利，匈牙利暴动地区全境已被置于我军的控制之下。尔后无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还是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无不这样如法炮制。而我父亲劝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说，不能只依赖坦克。但是，我们执政党的上层并未吸取民主德国事件的教训。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令人遗憾地同其内政如出一辙。

第十一章　制度压迫

一、贝利亚的被捕、受审、处决经过：是否历史真实？

"7月10日，报界报道了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指控他是英国间谍和人民的凶恶敌人。根据官方报道，判决死刑的审判和处决贝利亚都在1953年的12月；而根据其他方面的消息，尤其是赫鲁晓夫提供的资料表明，贝利亚是在被捕后立即被枪决的。社会各界有充分理由思考打倒贝利亚的意义所在……掩盖处死贝利亚的真实情况，并以遵守'法律程序'为幌子，他的敌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危，并屡次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为了使威望日高的贝利亚名誉扫地，他们采用了屡试不爽的集体请愿和群众集会的方法，以反对这位'无耻的叛徒。'"

很遗憾，上述文字的作者、法国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和他的东方和西方同事一样，最终还是走上了已被人踏过的老路。比如，这位尼科利·韦尔特断言，贝利亚为"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在政治警察的范围之外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除掉贝利亚重又提高了军队的作用，并使其摆脱了来自国家安全机构的跟踪监视"……等等，这些都毫无新意。

而这位西方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更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他写道：

"当然,他的前任雅戈达和叶若夫都是因同样的指控而突然被捕和处决的。但1953年毕竟与1938年有所不同。除掉贝利亚是否意味着向'非法状态'的倒退?抑或正好相反,这是走向法治和缓和警察制度所采取的又一步骤?确实,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像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一样难于确定,既可解释为权力之争,又可以认为是'解冻'的开始。除掉贝利亚的情况,未经真正审判的枪决,故作姿态的侦查,按照斯大林时期的传统而对他提出的虚假指控,这一切都证明了1953年夏天政治局势的复杂和由非法状态转向合法状态的难度。国家安全机构的强大力量使贝利亚的对手们除了密谋和立即处死他别无选择,这就使得他的拥护者们没有机会能够预先组织对付密谋活动。但是,考虑到贝利亚权力的广泛基础,他的实际威信以及制度本身至今仍一直不断强调的自己对法治的热中,贝利亚的对手们不能够承认他们仅仅是除掉了政治警察的可怕头子,而且此人还戴着可敬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假面具。"

如果按照这位苏联历史研究者的逻辑,当时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及整个党的上层,除了对政治局自己的战友使用刑事(我们终于可以使用法学术语了)手段进行镇压之外就别无选择。但我们仍能谅解尼科利·韦尔特在此作出的明显荒唐的结论。与我国的历史学家毕竟不同,他试图对事件进行剖析,而不是简单重复赫鲁晓夫的政治局拼凑的拙劣说法。在他之前谁敢说对国家领导人之一既没进行法庭调查也未经审判?苏联的有关材料对所谓除掉我父亲,而确切说来是对一次司空见惯的政治谋杀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几年前,苏联报刊援引苏联元帅的话发表了有关逮捕贝利亚的文章,作者讲述的据说都是多年前从朱可夫本人那里听到的内

容。而这最可能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个人沉默这么多年而非要借改革的“幌子”才决定开其尊口呢？对这类东西新闻检查是不会构成障碍的……但我不想过分挑剔，也不拟再费唇舌去批驳作者的论断，为什么他讲的内容在许多微小的细节上都与使人听腻了的官方说法相吻合，而这些东西还在1953年夏秋之交党的积极分子集会上已重复多次了。

简单说来，多次重复的说法是这样的。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把朱可夫叫去，他对元帅说，要去克里姆林宫一趟，苏联部长会议当天要召开一次会议。按照回忆录作者的说法，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说，布尔加宁当时很紧张，甚至见面时没有马上向他问候，只说克里姆林宫有要事在等着他们。

“我环顾四周，发现大厅里坐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以及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贝利亚不在。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说，贝利亚想夺取政权，我受托和我的同志们一起逮捕他。然后是赫鲁晓夫讲话。米高扬仅插了几句嘴。他们讲了贝利亚企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所造成的威胁。

“‘能完成这一危险的任务吗？’

“‘没问题。’我回答说。

“大家知道我和贝利亚宿怨颇深，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屡次发生冲突。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曾经想逮捕我，只要提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他们已在寻找合适的机会……顺便提一下，有一次斯大林坦率地对我说，他们要逮捕我。贝利亚向斯大林屡进谗言，但后者回答他说：‘我不相信。一位英勇的统帅，爱国者，同时又是个叛徒，我不相信。放弃这个肮脏的想法吧。’大家知道在这之后，我会乐意逮捕他。这就干上了。

“当时决定，主席团成员的私人卫队都部署在克里姆林宫

离主席团成员聚会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逮捕贝利亚私人卫队的任务交给谢罗夫完成，我则负责逮捕贝利亚。

“马林科夫讲解了每一行动步骤。部长会议的会议将被取消，让部长们各自回家。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召开一个主席团会议。

“我应和莫斯卡连科、涅杰林、巴季茨基及莫斯卡连科的副官一起坐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等会议厅传来两声铃响我们便冲进去。

“他们提醒我说，贝利亚身强体健，会‘柔道’招式（徒手格斗）。

“‘没什么，我的力量对付他绰绰有余……’

“我们走进大厅。贝利亚在桌子旁边的正中间坐着。我的将军们绕过桌子，好像是打算靠墙坐下。我从背后走近贝利亚，命令道：

“‘站起来！您被捕啦！’

“没等贝利亚站起来，我已经扣住了他的两手……”

很可能，这已够了。怎么能如此蔑视自己的人民，迫使他们相信一位光荣的统帅和一位政治局委员进行格斗的童话故事……顺便说一句，格奥尔吉·朱可夫本人当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回忆，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参加过逮捕的传奇经历。但是，这对党的上层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神话已经开始在世上流传。

但是，那一天在莫斯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官方的说法是：在逮捕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贝利亚之后有几个小时他被押在林姆林宫内，随着夜幕的降临，他被押送到莫斯科军区的拘留所里（防空部队）。据说，在进行调查的几个月时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按照这同一个官方说法，我父亲就是在这个拘留所里被执行枪决的。

我们回想一下，官方认定他被捕的那天是1953年6月26日，调查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时间。12月17日报上刊载《在苏联检察院》的报道称：

“关于贝利亚和其他阴谋分子一案的调查业已结束，次日开的庭审，于12月23日审理完毕。判决中宣布，贝利亚被指控犯有‘组织背叛苏维埃国家反革命阴谋集团罪，他们的目的在于利用内务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政权，推翻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产阶级国家。’在起诉书中直接声称贝利亚及其同伙制定了取得外国反动势力对其阴谋实施援助的犯罪计划，与外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

谁是我父亲的同伙？梅尔库洛夫，原国家安全部长后为苏联国家监察部长；杰卡诺佐夫，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科布洛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梅希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长；苏联内务部第三局局长戈格利泽以及苏联内务部特要案侦察部主任弗洛济米尔斯基。他们6人在终审的当天全被执行枪决。令人惊奇的工作效率，不是吗？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1953年12月18—23日在莫斯科进行的庭审为什么要秘密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颇为耐人寻味。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特别审判庭的人员构成。苏联元帅科涅夫任庭长。被任命为特别审判庭成员的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赛丁，苏共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依洛夫，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会主席库恰娃，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戈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卢尼奥夫和陆军大将莫斯卡连科。

按照部分历史学家的观点，这是内务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在

其存在的整个历史中对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审判。从1953年底开始就有人想要把这一事件作为“世纪审判”载入史册，但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很遗憾，这一绝对极为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难道不正是应该在这里寻找对苏联战后而且不仅仅是战后历史某些猜测的答案吗？

比方说，假使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和大家公认的一样，在莫斯科确曾进行过审判。但是，曾经喧嚣一时的“贝利亚案件”的原始卷宗在什么地方？几年来，无论是政论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时援引这些材料。特别审判庭秘密庭审的速记记录本身至今也未予公布。侦查材料也没有公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一侦查在苏联总检察长罗曼·鲁坚科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为什么？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当然，按照“改革时期的公开性”的最好传统，这里最简单不过的做法也是将这一切仍归咎于克格勃的“阴谋诡计”。但这一次行不通。还在1992年秋天的时候俄罗斯安全部总档案馆亚历山大·久布琴科馆长便承认说：

“非常想在什么时候能看一下拉夫连季·贝利亚案件的卷宗。问题在于我们这里从来就未曾存在过这些文件。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共有多少本。与贝利亚有关的所有案卷没有存放在我们这里。我能推测到，这些材料深藏不露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不是所有人在对这些人物的法律评价上具有完全一致的观点。”

然而，特别审判庭的判决已经执行。无论如何，还是公布了相关的决定。

公　告

1953年12月23日

本日19时50分，根据1953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

特别审判庭第003号庭长令，有苏联总检察长、一级执行检察官鲁坚科和陆军大将莫斯卡连科莅临现场，我——特别审判庭警卫长、上将巴季茨基执行了特别审判庭判处贝利亚·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死刑的判决。

上将 巴季茨基
苏联总检察长 鲁坚科
陆军大将 莫斯卡连科

公 告

1953年12月23日，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卢尼奥夫同志、军事副总检察长基塔耶夫同志，有上将格特曼同志、中将巴克耶夫和少将索平里尼克同志莅临现场，对1953年12月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判处死刑的下列人员执行枪决：

1. 科布洛夫·波格丹·扎哈里耶维奇，1904年出生；
2. 梅尔库洛夫·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1895年出生；
3. 杰卡诺佐夫·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1898年出生；
4. 梅希克·帕维尔·亚科夫列维奇，1910年出生；
5. 弗洛济米尔斯基·列夫·叶梅利亚诺维奇，1902年出生；
6. 戈格利泽·谢尔盖·阿尔先季耶维奇，1901年出生。

上述罪犯已于1953年12月23日21时被执行枪决。

验明正身死亡——医生(签字)。

摘自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回忆录：

在与贝利亚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使赫鲁晓夫在党内官员

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迅速排到了最前面。贝利亚被枪决之后，赫鲁晓夫甚至外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变得充满自信，活力充沛。我观察到，在许多细微的地方在实践中都表现出了这一“地位的改变”。甚至赫鲁晓夫的卫队也开始放肆起来（通过仆人的派头永远能够判断出主人的角色和地位）。赫鲁晓夫的汽车总停在出口的台阶旁的首位，他的出入已有其他中央主席团成员陪伴，等等，不一而足。

赫鲁晓夫多次回忆起那些对他来说是划时代性的日子。在他的叙述中有多处不相吻合，难免陈规旧套，重复矛盾，但对事件进程的转述还是准确的。

大家都同意逮捕贝利亚……在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大家讲完对贝利亚的看法之后，马林科夫应该按下铃的按钮。赫鲁晓夫讲道，这时发生了一点意外，马林科夫由于紧张怎么也找不到放在桌子下面装电铃的盒子。于是，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按了自己的备用按钮。进来一组军人。朱可夫元帅和莫斯卡连科将军向贝利亚宣布他被捕了。贝利亚猛地把手伸向放在窗台上的公文包。赫鲁晓夫打掉他的公文包，以为里面装有武器。实际上包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贝利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他被剥夺了嘉奖和头衔，成了阶下囚。贝利亚的卫队甚至没有看到他是怎样被带到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在那里，他要一直等到对他的审理和判决。停在莫斯科街上待命的坦克都各自返回营地。

各国报界什么荒诞不经的故事没有传播过！甚至断言，贝利亚是在没有审判和调查的情况下直接在汽车里被打死的。那些日子，我们的报纸报道了由家喻户晓的科涅夫元帅领导的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的组成。法庭的人员构成是颇具代表性的。调查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审判过程是关起

了门进行的。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研究了苏联检察院所提供的材料和听取了被告人陈述之后，判处人民和党的敌人贝利亚及其6名主要帮手死刑——枪决。1953年12月23日执行了这一判决。

这就是“我国历史中划时代事件”的组织者之一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回忆，而且是用“消除贝利亚危害”的主要实施者、原中央第一书记的女婿本人的话转述出来的。

摘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正如我们原先约定的，我提议向中央全会提出解除贝利亚（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议）所担任的一切职务的问题。而马林科夫还是有点慌张，他甚至不把我的动议付诸表决，而是当即按了一下秘密电钮，从而把军人们召了进来。第一个进来的是朱可夫，在他后面的是莫斯卡连科和其他人。朱可夫当时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当时我和朱可夫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我们让军人参与此事？我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我们决定把贝利亚抓起来，那么他会不会召来隶属于他的肃反工作人员和警卫队，下令把我们隔离起来？我们将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大部分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人都是贝利亚的人……起初，我们授命莫斯卡连科和5名将军逮捕贝利亚。他和同志们应该携带武器，而他们携带武器应该由布尔加宁将他们领进克里姆林宫。那段时期，军人们进克里姆林宫要将武器放到警卫处。在会议召开前夕，朱可夫和其他几个人加入到了莫斯卡连科小组。这样，走进办公室的有10人或更多。马林科夫有气无力地对朱可夫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您把贝利亚抓起来。”朱可

夫向贝利亚命令道:“把手举起来!”莫斯卡连科和其他人拿出武器,以防贝利亚于万一。贝利亚伸手去拿放在身后窗台上的公文包。我揪住他的手臂,防止他从这个公文包里拿武器。我们事后检查,他的公文包和口袋里都没有武器。他拿皮包的动作仅仅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

贝利亚在武装监护下立即被押进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的隔壁房间里。并立即作出决定,明天或者后天,要尽可能快地召集党的中央全会,以便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同时我们解除了苏联总检察长的职务,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能客观地调查贝利亚案件。我们任命鲁坚科为新的总检察长,并责成他对贝利亚案件进行调查。我们就这样逮捕了贝利亚。但把他安置在哪里呢?我们不能把他交给内务部,那是他的部门,都是他自己的人。

当时他的副手是克鲁格洛夫,大概还有谢洛夫。我不太了解克鲁格洛夫,但对谢洛夫是完全了解的,我也信任他。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谢洛夫是一个诚实的人。即使他有一些问题的话,这是所有契卡人员都难免的,可以说,他只不过是斯大林总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我提议由谢洛夫来看管贝利亚。但其他人认为还是小心为妙。克鲁格洛夫我们是信不过的。最后我们商定,最好是将此事交付莫斯科军区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莫斯卡连科带走了贝利亚,在他的人员的监押下将他带到自己的指挥部,关进防空洞。我看到他做了该做的一切。我们的会议至此结束……后来我们得到一张名单,上面列有100多个女人的姓名。她们都是贝利亚自己的人给他找的。而他对所有的人都使用一种接待方式:所有第一次到他家的人都招待一顿饭,并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他事先在酒中已放入安眠药……

顺便说一句，阿朱别依也没有放过“女人”这个题目。诚然，和岳父大人有所不同，他说出了另一个数字。按他的话说，在人们谈论最多而又从来没有任何人见过的那份名单中，共被列入200个女人的名字。世界上无奇不有。其他材料则根本无视这些细枝末节，一些材料称是700人，另一些则认定有800人。如果不是数十年之后他向世人展示布尔加宁、阿巴库莫夫等人的爱情传奇，我永远都不会注意赫鲁晓夫女婿回忆录中这一虚构的情节。即使这些事实真的存在，阿列克谢·阿朱别依本人当时也未必能知道。他的飞黄腾达还是后来的事。他能够呈献给我们的，最多不过是复述别人咀嚼过的东西而已。

遗憾的是，改革时代这本畅销书的作者还犯有其他事实逻辑错误。比如，我从未衣着考究地举行自己的婚礼，后来也没有穿过将军服，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将军。说我父亲被枪杀之后我和马尔法就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也是明显的谎言。

“贝利亚被枪毙之后，谢尔戈和尼娜·泰穆拉佐夫娜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使其深为感动，”阿朱别依写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相信了谢尔戈和泰穆拉佐夫娜说的话。他们写道，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许多事情他们当然不知道，但他们看到了这个人正在滑向深渊，而他们也不得不和他一起向这个深渊滑下去。”

读者们，当你们读“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家庭悲剧命运的时候，请也回想一下这个已一版再版发行了数万册的传奇故事……。

顺便说一下，如果相信阿朱别依的说法，“贝利亚在临刑前写信给中央委员会的赫鲁晓夫，请求宽恕他，请求给他忏悔的机会，无论何种方式，甚至让他服苦役都可以。”我们觉得，在这里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无论是12月，还是11月、10月、9月和7月，我父

亲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都不能够给正在奔向权力颠峰的赫鲁晓夫同志写“忏悔”信，也不能提供有关证词，**因为他已经于1953年6月26日在莫斯科市被杀害，既无审判也没有调查。**事情就是这样。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不明原因地推迟了，我父亲便回了家。他通常都在家中吃饭。大约是中午时分，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上将的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万尼科夫后来3次获得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当时是我父亲的原子事务方面的亲密助手。我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正在给政府写一份关于准备进行武器试验的报告。

打电话的是试飞员阿梅特·汗·苏尔丹，他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我和他，还有谢尔盖·阿诺欣，也是苏联英雄，优秀的试飞员，我们那些年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关系亲密。

“谢尔戈，”他喊道，“你们家有枪声。你全都明白吗？你应该赶快逃，谢尔戈！我们帮你……。”

我们确实有个航空大队，而且在芬兰或瑞典找个地方藏起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后来我不止一次确信，这些飞行员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当下就明白了。一切都明摆着，除了反对我父亲的阴谋，我家的枪声还能意味着什么？其他情况只能揣测。但在这种时候逃跑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父亲被捕了，那么逃跑只能授人以柄。无论是我的罪还是我父亲的罪都还不明不白，我为什么要跑，又是逃避谁？总之，我拒绝了，并立即将这一切告诉了万尼科夫。

我和他乘车从克里姆林宫回我们在小尼基塔街的家，这里离起义广场不远。我们住在一幢革命前建造的独家平房里。父亲和母亲占3个房间，我的一家占两个。

当我们的车驶近的时候，街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只是在内院停着两辆装甲运兵车。后来我听说还有几辆坦克停在我家旁

边，但我亲眼看到的只有两辆装甲运兵车和一些士兵。立即映入眼帘的是父亲办公室窗子上被击碎的玻璃。这说明确实开了枪。我父亲的私人卫队还在，但人员屈指可数。当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我想，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出人意料。

我和万尼科夫应该在下午 4 点钟和我父亲见面。我们见不成了……

里边的警卫不放我们进去。万尼科夫要求解释原因，并想检查这些军人的证件，但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父亲没有在家。被捕了？被杀了？当我回车上的时候，一个警卫人员告诉我："谢尔戈，我看到用担架从这里抬出一个人，用帆布盖着……"

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我在想刚才听到的事情。是谁躺在用帆布盖着的担架上？急着抬走一个普通警卫？不大可能。

逐渐的，我又找到了另外几位证人，肯定说看见了那个担架……。

库尔恰托夫在万尼科夫的办公室等我们。俩人开始给赫鲁晓夫打电话。看来，大家已经猜到了，谁会是整个事件的指挥者。那次谈话当时有 6 个人在场。

万尼科夫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儿子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和库尔恰托夫非常希望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事。赫鲁晓夫当即安慰他们。他说，让谢尔戈回到别墅自己的亲人们身边，并且用不着担心。

我和这些人道别的时候坚信，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和万尼科夫拥抱后就走了。

门口已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护卫人员在等着我。有几个人和我一起上了一辆汽车，另一辆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汽车紧跟在后面。在驶近别墅的时候我看到，别墅也被军人包围着。院子里还停着几辆装甲运兵车。

我一路小跑赶进屋里。所有的人，妈妈、马尔法、孩子、女家教，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这里也坐着几个武装人员。

无论是妈妈还是妻子，她们都表现得极为镇静。显然，大家都在等我。

“你看到你父亲没有?”这是妈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很可能他已不在人世，并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我告诉他们，不久前在家中我还见到了他。

妈妈没有哭，她只是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就立即去安慰马尔法：我的妻子正等着分娩第3个孩子。

二、贝利亚死后其家人的遭遇

过了不到半小时时间，房间里走进一个穿军装的人，说：

“有命令要将您、您的妻子和孩子转移到另一栋别墅。”

妈妈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你什么都不要怕，”她用极为缓慢、低而平静的声音说。而且我觉得，她好像说的声音很低，因为马尔法也听到了。“人死只有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应该当之无愧地去面对。我们不再猜测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命中注定就是这样，谁都没有办法。但你要记住一点：无论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妻子，没有谁敢动他们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和我一样，妈妈也相信，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再一次拥抱，吻别。我们明天会怎样，谁都不知道。

妈妈被允许送我们上汽车。当我和妈妈道别的时候，我没有料到，等在我前面的还有和妻子儿子的生离死别。

我们乘坐两辆汽车。不明其中原因，也不顾我们的抗议，硬要我们的女儿乘坐一辆汽车，我和马尔法乘坐另外一辆。我们的大女儿生于1947年，小女儿生于1950年。

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只能猜测了。路边就是我们称之为“近邻”的斯大林在昆采沃的别墅，但我们的车开过去了，并没有停下。过了大约20分钟我们拐上了一条乡村道路，并在一幢国家别墅的门前停了下来。这里也是斯大林时常光顾的地方，以前我没有来过。和所有当时的国家别墅一样，是一栋不大的木头房子。我们将在这里与世隔绝地度过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

现在我和家人所住别墅的外围警卫由某个军事分队担任，装备有冲锋枪和步枪。房子里面同样有武装人员昼夜守卫，但他们都着便装。和我家的别墅一样，院子里也有几辆装甲运兵车。

只有这一切以及已被拆了全部的电话都在告知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由。

每天定时开饭，在固定的范围内散步，警卫队的行为举止相当有分寸。

“您急什么？”当我想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和妻子可否带孩子离开这里而去询问警卫队长的时候，他这样反驳我说。“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你已正式被拘留，如果您的妻子需要就医，我们可以把医生带到这里来。我们没有接到其他命令。”

我父亲出了什么事？妈妈呢？国家到底出了什么事？脑子里转的尽是这些想法。

我们周围的人都努力不和我们接触，而当我们要问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叫来他们的上司，而这一位在其一生中无论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标准的回答：“我们没有接到其他命令。”

我几次请求让我看看报纸，回答是“没有规定”。看来，他们是打算把我们关在这里不让知道任何事。没有电话，没有广播，也没有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

一次和孩子们在花园里散步，我看见留在小凳子上的一张报纸。这是否是有意而为，我不得而知，但这份收获对我来说可谓弥足珍贵。报上刊登了对我父亲的指控，如果在此之前我还有怀疑

的话，那么现在我终于明白，国内发生了旨在反对一大批人的国家政变。老实说，我想，这次阴谋的牺牲者不仅只有我的父亲，而且还有国家其他高层领导人。目前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对照在报上读到的内容和在小尼基塔街上的亲眼所见，我当然不相信关于我父亲被捕的报道。

大约一个半月之后，在夜里3点钟的时候，几名武装人员走进我们的房间，宣布我被捕了。我想这没什么，最起码不明不白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我看了一下表笑了：应该等到夜更深的时候来宣布我的被捕。

我尽量安慰哭泣的妻子：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尽管我自己对此并不相信。

三、在狱中的一年多

我被武装押送到一座监狱，根据路线我猜到是列福尔托沃。后来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没等我跨进监狱门，便想对我进行搜查。但我已经忍无可忍，在这里充分显示了我的个性。

我被绑起来，并带上了手铐。想给我换上囚衣，但尺寸不合适。这便是我的牢狱生活的开始。

曾几何时，我曾听过万尼科夫、明茨、图波列夫以及其他著名或不著名的人讲的故事，按他们的说法，他们都是上过“共产主义大学”的人。我当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身陷囹圄。但是，监狱里的所有“把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监狱看守的惯用手法便是竭力凌辱犯人，以此摧毁犯人的反抗意志。

从监狱建筑艺术的观点来看，关我的监狱很明显是一座最高级的监狱，这一点我有足够的时间作出评定……这还是在叶若夫时期建的。在美国影片中时常有类似的场景：六至七层高的楼房

和公用过道，使人印象颇深。

多年以后，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另一位囚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道："著名的列福尔托沃建筑是个'K'字型，整个楼层的间距，金属回廊，手摆小旗的调度员，通向审讯室的过道。在各个办公室进行轮流审讯……"

列福尔托沃，有多少人的命运在你的高墙之内沦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第一个牢房竟有两名警卫，门口也设一个岗哨。我想这都是新鲜事儿。在我的朋友和熟人的故事中是没有这一情节的。囚室很小，有六步长两米宽。铁栅封着的窗户极高，无法看见外面的景象。一张固定的床，还有一个带水笼头的洗脸池，其实也是便池。这是个普通的犯人"居室"。

我的"邻居们"勉强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们俩都着便装，每隔 4 小时一换。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必要：牢房内设两个岗哨，门口还有两个岗哨……

没有向我出示逮捕证，也没有传讯我。几次我想和警卫交谈，都没有结果。只有一次其中的一个忍不住说：

"你为什么总烦我们？我们是警卫，告诉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坐着。我们打扰你了吗？"

我明白，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很可能他们确实一无所知。大概过了两周，我厌烦了这里的一切，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便大吵大闹起来："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为什么至今还未向我出示逮捕证？"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大尉走进牢房：

"您想干什么？"

"如果不向我出示逮捕证，我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地呆着，"我回答说。

"你试试看……"他威胁说。

我已忍无可忍。也许是最近几个月的神经紧张使我失去了自

制，我一拳打过去，而他没有来得及躲闪。

我当即被打倒，并被捆了起来。一小时后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他们给我松了绑，并警告要关我禁闭。

我决定不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转过身去，面向墙壁一言不发。

这时，几个穿便服的人和两名上校走进牢房。他们说：

“这是逮捕您的决定。”

我接过递给我的一张纸。“因参加反国家的阴谋活动……”我又读一遍。没有签字，没有盖章。根据我们听过的那些无数的故事，我知道，这类文件必须要有检察官的签字。

“这是文字游戏，而不是文件。”

上校的脸涨得通红：

“再闹就得给你从头再来一次。”

我想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要打你们就打，为了让你们轻松些，我自己先动手。”

确实是我自己先动的手，但奇怪的是没有得到回应。

两名上校和其陪同人员一起走了。

我的手表早被没收了，因此，我甚至不知道第一次带我去受审的时间。4 名看守走在旁边。我们穿过几条走廊之后，我明白我们已来到另一栋楼房。前面走着一个手执小旗的人，他不时发出某种信号，应当认为是要求回避我们。我知道，这也是监狱的日常规矩。

我们从许多门的旁边走过，最后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写字台，圈手椅，旁边放着一个小桌子。另一边坐着几位将军和着便装的人。

让我坐下后，我一直保持沉默。

“你涉嫌参与了旨在推翻苏维埃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案件……”

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含义这才开始接触到我了。“恐怖组

织"，"为英国情报机构搞间谍活动"，"通讯器材已被我们没收"，"秘密联络"，"您已被揭穿"，等等。

由此便可得出结论，我是个阴谋家和英国特务。难道他们自己相信他们现在说的话吗？那么是谁和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从我们家找到了一台练习器。这不是发报机吗！搞无线电的人知道，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练习，技能就会下降，因此我总是努力抽时间加强练习。这部练习器是我亲手安装的，没料想它竟然成了我的"案子"的"物证"。

当然，鉴定结果使我的未来侦查员们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发报机……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练习器。"但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而当时我在听完了全部胡言乱语之后说：

"不管怎样我想看看文件……。"

他们对我说的话反应强烈：

"我们没有义务向您提供任何文件。"在场的一个人用生硬的语气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们的问题。在向我提出正式指控和在我最终了解我呆在这里的原因之前，我将不和你们进行任何谈话。"

我当即听到：

"关进去！"

我转过身，并往处走。

奇怪的是，我没有回到自己的牢房。不知为什么是被领到了另一间牢房。两天之后又被领到第 3 间，尔后是第 4 间……而且每次转到新牢房总是在备受折磨之后。只要一躺下，就会被人弄起来。这样会持续极长的时间，间隔只有两三天。

我想，这又是监狱中的一个绝招。

又过了 10 天时间，我再次被带去审讯。我立即注意到，办公

室里的人少了，除了熟悉的之外，又见到了几张新面孔。

“我是基塔耶夫中将，副总检察长。”其中一位军人自我介绍说，并立即递给我一张纸。依然是那些荒诞不经的指控，但已经有了签名：基塔耶夫中将。

“请您签字！”

我拒绝了。

“不，无论如何您都要签字，说明你知道了。”

我拿过钢笔写道：“我知道了这个荒谬的文件。贝利亚。”

基塔耶夫微笑着说：

“您甚至不能想象调查结果都掌握了什么样的证据……如果您想保住自己的性命，您就应该自己讲出您的叛国行动，这样才会使我们相信，您真的想悔过自新。”

这已经涉及到性命问题了。

显然，他们都各自在心里掂量着我的沉默。于是，其他人立刻接上话茬儿说：

“您还这么年轻……我们有意帮助您，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您要做的就是能正确理解这一点。您应当减轻我们的任务，并以此首先帮助您自己……”

我拿定主意，自己不值得再表现那样凶狠，不能上挑拨离间的当。当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明白了，在蹲监狱最初的日子里我的表现是极愚蠢的。没有必要打架，很可能他们正希望我这样做。

听完他们的话，我说：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惟一的请求，就是为你们所提出的指控说明依据。你们现在所说的这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和您可能没有关系，”我听到这样说，“您确实不是阴谋的组织者，但组织者是您的父亲。况且，他已经作了有关的悔过。您的母亲也已对一切供认不讳。所以，现在就看您的了，谢尔戈·拉夫

连季耶维奇……"

"好吧,我要求当面对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允许的吧?"

于是,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审讯。规定不允许他们动手打人,但是,当他们明白,除了自己的工作我不打算和他们谈论任何话题的时候,便开始对我实行精神折磨。

当他们谈起我父母所谓的叛国行动时,我一再要求出示他们供认的审讯笔录和进行当面对质。

侦查员们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

"您关不关心自己的死活?"

这一切持续了数周时间。

我不想用琐碎的细节使读者厌烦。我只说一点,审讯中鼓噪的全部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一切都与我参加子虚乌有的阴谋扯在一起。

"我很难反驳你们的指控,"我说,"现在让我们看看具体事实。"

基塔耶夫变得更为厚颜无耻起来。他时而侮辱我,时而侮辱我的父亲。一次,当他打算说我母亲难听的话时,我打断了他:

"请您注意,我并没有被锁在椅子上,我警告您:再说一句我母亲,我就打残您……"

他暴怒了:

"兔崽子,你在这儿的生活都由我说了算,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一点。但你要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这一切都记在心里……

我们沉默下来。当他平静之后又重新开始劝我说,某些高层领导已下达命令,只要我同意和侦查员们合作就放我出狱。

当他看到不会有任何收获的时候,便开始给我"施压"。他说:

"要知道你的孩子很快就该生了……而完全可能使他不出生……"

他和我战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试图打垮我。他承诺，如果我提供证言证明我父亲有罪，就立即放我出去和家人团聚，恢复我的工作，也不会再有谁来打扰我和我的家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不让我睡觉。我深切地知道这是怎样的痛苦折磨，当一个人五六天不睡觉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只要刚刚入睡就把你叫醒。而且这个时候他们一句话都不说。

当他们打人的时候，通常只会使皮肤发青。而不会留下任何其他痕迹。

我是个体格很强的人，我的看守们显然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便加倍地折磨我。第一周拷讯之后，我便处于那种长睡不醒的状态，怎么摇晃都不管用。看到我这种半昏迷状态，他们可能明白我已经处于临界极限，于是，他们找来了狱医。

我再没见到基塔耶夫。我被交给另一位调查员。原来他是副总检察长卡马奇金。

这一位没有特别强调我的"叛国行动"，他说：

"关于这一点您以后自己讲，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怎么会成为一名学者、科学博士。您的父亲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要知道您差不了多少。"

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全是这类谈话，而且基本上都是他说我听。但有一次，我显然是深深地刺痛了他：

"您当然能写出您想写的一切。请您相信我不会加什么批注，但既然您要写什么东西，就应该努力不要出现语法错误，而且客气一点说，您的句法结构也不规范。"

卡马奇金对这一放肆无礼感到手足无措。我不得不一一指出他出错的地方。

显然，他同时还审问过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米高扬、图波列夫、拉沃奇金、科罗廖夫等。他不时挑拨说：

"您对他们总是百般维护，大加赞扬，而他们却只说您的坏话。

您何必这样，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

这纯属谎言。当我后来在乌拉尔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到我这里来，并讲述了他们是怎样被强迫提供证明我和我父亲有罪的证词的前后经过。没有一个人讲了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的东西。

开始时把他们召到中央委员会，后来到检察院，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已是在我被释放之后，朋友们对我讲，我担任主任设计师的那个单位组织了一次党员会议。正如已弄清楚的，有位“贵宾”是中央国防工作部部长，直接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命专门前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提议，希望我的同事们把我搞臭，并开除出党。

会议进行了 3 天，不管怎样对我的同事和原来的部下“施压”，都没有一个人说我担任的职务是由于有特殊背景，而这正是党的机构所需要得到的。

党员会议拒绝进行投票表决将我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亲自上阵。这是没有先例的。不仅如此，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特别决议，对我担任主任设计师所研制的全部设备进行了反复的检验。参加者有苏共中央委员会组建的特别委员会委员和军事人员。可以说，是为了预防极有可能的破坏活动。如果能找到对我“落井下石”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起来会非常简单。设备这种东西，要让它发动两三下就“卡壳”并不难。但是，在这里也没有一个卑鄙小人。所有的试验都顺利通过，确证了我们所制造的武器是合格适用的。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萨夫，现在是总设计师和院士；在我之后担任我们单位主任设计师的拉斯普列京院士；本金，现在的院士，科学院主席团委员；我的副手沙巴诺夫，后来的陆军大将，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以及其他同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还和我保持

着私人和工作来往。他们今天都还在继续工作，在军事技术领域担任着领导职务。我至今仍对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感激不尽。不管对我的指控如何离奇荒谬，这些正直无私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我是一个为自己的国家工作的诚实的人。正是他们，将自己的前程置诸度外，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公开声明："我们相信他。如果他真的在某些方面有罪，那就让他自己说出来。让他到我们的党员会上来讲。"

当时我当然对此毫无所知。牢房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看守们也不讲监狱高墙之外发生的事情。

身处我的境地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决定宣布绝食。显然，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发生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几个大汉闯进来，先把我捆住，戴上脚镣，然后开始通过肠衣漏斗给我灌汤。这样的事重复了几次。但我明白，我应该斗争。

日复一日对我说的都是同样内容的话。有一次还提到了我的那台无线电练习器：

"您还和伦敦保持联络。"

当专家们作出鉴定，这架机器的信号在最佳状态之下的有效距离只能在百米之内，他们便改换了话题。我知道，如果我的侦查员们真的想弄清什么的话，他们就应该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

有一天在带我去审讯时，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来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干什么来了？

我和他进行了单独交谈。不过，我相信会有录音。监狱里所有的办公室都会装有相关设备。

马林科夫立即说，他是专程为我而来。

简言之，我们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马林科夫说，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和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我有义务提供那些要求我提供的证据。"这是需要。"他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这

种事情是不乏先例的。这可以使我无性命之忧和得以同家人团聚。

我感谢他的关怀，但我说，我不能杜撰并不存在的东西，更不能以出卖我父亲和母亲为代价而苟免一死。我说，我想就是您马林科夫也应该明白，这样做是极为可耻的。

马林科夫没有把话题继续下去，他说：

“你考虑一下，我过两三周再来找你，到时候我们再谈。”

我的“邻居们”已从我的牢房中被清走。我在独自躺着的时候想，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马林科夫来找我干什么？劝我签那些愚蠢的文件？政府首脑需要我的供认？

我已然猜到，这位我们全家人的朋友早就背叛了我的父亲。

每天对我的例行审讯突然变得有些奇怪。侦查员问我是否听说过那样一个人的名字。听到过？什么场合？好。而还有那样一个名字呢？没听过？好。某个人到过你们家吗？到过……这些内容明显地风马牛不相及。

马林科夫真的又来了。

“怎么样？”

我默不作声。

“好吧。也许你在另外一件事上能帮上忙？”他说的这句话听起来特别富有人情味。“你听到过关于斯大林私人档案的事吗？”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回答说，“在家里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

“那么，怎么说呢……要知道，你的父亲手里也有档案，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从未听说过。”

“怎么能没听说过?!”马林科夫这时已经沉不住气，“他手里应该有档案，应该有！”

他显得非常沮丧。

关于我父亲私人档案的事我确实一无所知。但是，很自然，如果我有所知的话，对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一切都已十分明了：他们需要这些档案，因为里面可能存在有损于他们名声的材料。

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斯大林在保险柜中存着一些文件材料。但是，他如今已不在人世，他的私人档案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总之，我在等着马林科夫的下文。

他站起身。

“好吧，如果你自己不想帮自己……”

他没有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马林科夫。

冬末时节，已是在对我父亲的所谓审判之后（我当然不知道关于侦查结束和内务部一批工作人员被枪决的事，因为从外面没有获得任何消息），把我从列福尔托沃监狱转到布特尔卡。这里的牢房要宽敞一些。一边墙上有 3 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床，另一边也有 3 张。他们向靠门的床上扔一个褥垫，加固一下照明灯就走了。牢房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在列福尔托沃的时候没人带我去放风，除了去受审和洗澡。在这里，每天在监狱的小院子里都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

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编号和在此之前的列福尔托沃时完全一样。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但看守们说我的话被我听见了：“2 号拒绝出去放风。”为什么正好是 2 号，我至今不得其解。

我当时确实拒绝过出去放风，因为感到身体不适。看来，监狱管理部门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抗议。很快，一位身着上校制服的监狱高级领导来看我。

“您为什么拒绝出去放风？病了？您要明白，这对您不好。甚至感到不舒服，最好也要出去换换空气。”

我向他们解释，这没有一点抗议的意思，我的确感到不舒服。

“那我叫医生来。”上校说完就走了。

医生很快来了。他给我检查之后说：

“您患了流行感冒，我们把您转到医院去。”

我拒绝说：

“我就留在这里。如果可能的话，就给我些药。”

给我送来了药。

在列福尔托沃监狱，看守们不知道我的姓名。在这里，看来大家已经知道了一切。一次，一个看守小声对我说：

“一切都会正常的，你不会死了！你的号牌已经摘下去了。”

就这些人而言，他们的态度完全正常。他们的眼睛是老练的，他们很快便能弄清，他们眼前的人是谁。

我不发脾气，起码不对不该发的人发脾气……我保持着我的尊严。早晨起床，做操，用凉水浇身子。也许这也是他们对我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看守们看到：这是个正常人。于是，他们也用对待正常人的态度对我。

显然，谣言是有的，但道听途说是一回事，而他们日复一日亲眼所见到的这个“人民公敌”却是另一回事。

他们甚至还允许我到图书馆看书，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很惭愧，我以前从未读完一本列宁的著作，而在监狱里却完全可以仔细研究一番了。因为有充裕的时间。

而最主要的是给我送来了一大批科技书籍，甚至还有一把计算尺，这是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工具。

被捕前我在从事水下发射弹道火箭系统研究。水兵都知道，波浪的摆动不应该改变飞行系数。我就研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至今手中还保存着几页在布特尔卡时所做的演算纸。整个图纸被寄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它们立即被用在了工作中，而几页草图却留了下来。

但是，在允许让我干我喜欢的工作之前，却浪费了不少的时

间。尽是那些单调乏味的审讯、护卫队……而在春天的时候，有一次把我拉去枪毙。六七个冲锋枪手，一名军官。让我靠墙站着，喊了口令。除了满腔愤恨，我已一无所有。你们这些白痴，我说，我今天的结局就是你们将来的下场……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这场戏都是演给我妈妈看的。这段时间她一直关在布特尔卡。她站在监狱楼内的窗子后面，从上面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命运，”他们对她说，“就掌握在您的手中。只要您在证词上签字，他就能保住性命。”

我妈妈是个聪明人，她明白“招供”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我妈妈推开递过来要她签字的文件时，警卫们一时不知所措起来。

对妈妈来说，这一场景是在昏厥中结束的，而我当时鬓发全白。当看守们看见我的时候，我从他们的脸色表情明白了我外表的变化。照镜子一看，已是满头白发……这就是我的经历中的一段。

那次假枪毙事件之后，对我的身份不再保密，约束也渐放松。某种希望出现了。尽管我还和从前一样孤身独处，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我能感到：某种东西应该有所变化。

审讯变成了交谈。副总检察长察列格拉茨基对我说，他也在对我妈妈的案件进行调查，而后来他承认，他整理了对我父亲审讯记录，似乎曾进行过这些审讯。

我们在狱中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

“您要做出点像样的事情，一定要做。您要自己证明这一切都是……”

这些话我已铭记在心。

一个囚犯在一名检察官身上能看出什么好东西呢？而我通过“您要做一些什么……、您要证明…”这句话将他作为一个品行端

正的人记在了心里。他很能让人想起旧俄时期的司法官吏。我感觉得到，他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虚张声势。他当然不想作恶。从妈妈的谈话中我知道，在审讯中他对她的态度也颇为得体。有一次他说：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我不得不向您提出关于您丈夫的情人问题。”

妈妈对其他调查人员所提出的此类问题已习以为常。他们一再要她相信贝利亚是个腐化堕落分子，并要求她：别再为他掩盖啦！

和回答其他人一样，妈妈对察列格拉茨基回答说：

“我和他生活了一辈子，这方面我对他非常了解，而您却试图劝我相信反面的东西。我不相信您说的事，就像我不相信其他所有的一切一样。”

在我们整个一年半的单独监禁期间，像对待我一样，他们也未能向她出示过一份有损我父亲名声的文件。

在布特尔卡的最后几个月我继续搞我的计划研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特别委员会搞了一次检查，并作出决定：方案很有价值，应当付诸实施。

后来，国内所有核导弹潜艇都装备了我在莫斯科监狱研制的系统。

我的无期徒刑结束了。在我被捕之后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一次我被带到卢比扬卡。为什么？我不知道。

穿过捷尔任斯基广场（这是当时的名称）上灰色高楼的走廊，我来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谢洛夫的办公室。这里除了主人之外，还有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我认出了他。在对我进行审讯的时候他出席过两次或者三次。诚然，他本人只是坐在一边，没有提任何问题。

摘自官方材料：

罗曼·鲁坚科。1953 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 年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1907 年生于切尔尼哥夫州。从 1925 年起开始在检察院机构任职。30 岁时任顿涅茨克州检察长，乌克兰解放后任共和国检察长。在纽伦堡法庭担任苏联总公诉人。

在谢洛夫的办公室里，鲁坚科向我宣布，苏维埃政权已经赦免了我。

“对不起，”我说，“但要知道，我既没受审，又没有审判根据。赦免从何谈起？”

鲁坚科大发雷霆，并开始讲述那个所谓的阴谋。但谢洛夫当即打断了他：

“什么阴谋！别再愚弄他了！这套假话是说得够了。直接了当告诉他政府的决定。”

于是，谢洛夫向我宣读了政治局决议，苏联总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这一决议也作出了自己的有关决定。我得知，从今以后我仍可以和从前一样从事各种秘密工作，并可搞自己的课题研究。

他们还说，工作地点由我选择。他们没有提莫斯科，他们认为我也不会提莫斯科。

我想知道得更具体些，就问：

“您是说我可以选择制造我研究的设备的那个城市吗？”

“是的，”谢洛夫回答，“这是一些研究所和工厂的名单。”

单子上没有莫斯科，这我早就料到了，而且我也没有丝毫留下来的愿望。

四、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迫改名10年

我选择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已经多次到过那里，非常了解当地军工厂的基础设施。还在我被捕之前的时候，我们单位就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

"那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谢洛夫说。

决议本身我没看到，但据我后来得知，我未来的厂长被召到莫斯科，让他看了决议。这一决议还是当地政府未来所应遵循的依据。按照政府的规定，除了工作之外，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应获得一套住房。

我妈妈也被带到了谢洛夫的办公室。在我之后她被叫来这里，并对她说，她可以留在莫斯科或前往第比利斯。妈妈回答说，把我派到哪里，她就去哪里。

我们在布特尔卡又度过了一周。在此期间我和妻子见了一面，这是一年半当中第一次获准见面。而大约在一个月之前，转交给我一张儿子的照片，他当时已经到两岁了……这样我才得知，我有了一个儿子。

当时我也获悉，还在1953年12月的时候，报纸便报道了我父亲被枪决的消息。

我们在警卫的押送下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护照上的名字是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格格奇科里。而对我提出的所有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我得到的惟一回答就是："您没有别的选择……"

我失去了上校工程师、科学博士、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的头衔。国家奖金没有发给我，列宁勋章也没有还给我，这是我因研制了新式武器而获得的。

战争期间我被授予红星勋章和"保卫高加索"等奖章。这些也

没有返还。

在我的军人证上写着：职务：士兵；军种：步兵；文化程度：军事学院。但各种奖励都列在上面……

我被捕时是28岁。现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待我的是普通工程师的职位，只是附加了一个“高级”头衔。

在被捕前的3年时间里。

此事发生在1950年的夏天，当时朝鲜半岛的战争已经打响。

摘自官方资料：

和伟大卫国战争一样，这次战争也是不宣而战，爆发于一个星期日的凌晨4点。1950年6月25日，在著名的“34型卡秋莎”大炮的支援下，经过两个小时的炮击之后，百万北朝鲜军队开始向南方推进。只用3天时间便占领了汉城。9月中旬以前民主朝鲜军队即已逼近大邱和釜山。眼看敌人就要被逼进大海。但是，在屈指可数的短短时间里，美国竟将其驻扎在日本的占领军大部兵力投到了朝鲜南部。这一行动预先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联合国7月7日便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的侵略，并批准组建国际部队将其击退。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北朝鲜军队后方准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陆战队，在仁川，从釜山军事基地开始了猛烈反攻。10月底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也就在10月份，8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超过30个师）在彭德怀元帅的指挥下越过朝鲜边境，中国和美国军队直接发生了冲突。

多年以来，无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作战行动、确切地说是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侵略行动的原因和进程秘而不宣。苏联也没有大肆宣扬其对朝

鲜战争的积极参与。直到最近报刊中对第64独立航空军的飞行员们也没有任何报道，他们从1950年11月起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都在参加作战行动。曾3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阔日杜布，当时仅他的一个师就在异国的空中击落敌机258架。苏联飞行员共击毁敌机1300多架，自己损失345架战机。

部分资料表明，当时有22名苏联飞行员成了苏联英雄，许多飞机驾驶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

从那些“演习”飞行中归来的不是所有的人。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场上，有100万中国人，900万朝鲜人和54000美国人丧生，苏联军人的牺牲数目至今无人知晓……总而言之，那场战争的许多历史真相至今仍然神秘莫辨。

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经去世，而中国和北朝鲜的统治者们相信美国人不会放弃南韩。美利坚合众国也作出了让步。战争就在其3年前爆发的地方——沿着原来划定的以其悲痛经历闻名的38线宣告结束。

奇怪的是，至今仍有许多材料认定北朝鲜是这次侵略行动的受害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全世界早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推动了这场战争，积极倡议者是斯大林。这对军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特别的秘密，因为在朝鲜的上空有我们的飞行员作战。

我要向大家讲述的那次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发生在美军陆战队在朝鲜登陆的前夕。在此之前，我们已结束了反舰导弹的研制工作，并顺利通过了试验。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些，我曾将试验结果向中央主席团作过汇报。

这一武器已投入批量生产，但暂时我们只有50枚导弹。

苏联战略情报机构获悉了正在准备中的汉城附近的登陆作

战。美军已集中大批海上力量，有战列舰、登陆艇、几艘航空母舰、以及护卫舰等。

斯大林就从这一点开始谈起：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正在筹备之中，美军想击退北朝鲜的军队，其目标我们是明确的。我们的军人和设计师们怎么说？有了新式武器，我们能不能阻止美国人的行动？

我们报告说，我们可以在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内击中目标。正如试验所证实的那样，为了使一艘航空母舰失去作战能力而退出战斗必须要发射4至6枚导弹，而击沉一艘大型运输船则只要一枚导弹即已足够。

空军总司令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日加列夫报告了空军军团的准备情况和实弹演习的结果。他后来成为空军主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尔后是武器装备部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开始汇报。

在那一刻，我和我的同志们都感到自己是备受瞩目的人物。我们的"彗星"(这一产品的代码)投入批量生产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我父亲的发言给在场的人浇了一瓢冷水。

"根据情报机构获得的材料，"我父亲说，"如果我们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计划对我们所有的基础工业中心实施核打击。莫斯科也在轰炸计划之内。因此，我认为任何行动都应预先考虑到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

出现了冷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其他军人都沉默不语。

"难道我们没有进行空中防御的武器吗？"斯大林问，"我们有歼击航空兵、截击机……"

"让我们听听军人的意见，"我父亲提议，"他们能否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经济和军事中心？我们现有的资料表明，美国

计划轰炸我们的7至9个城市。”

我对克里姆林宫这次会议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我被斯大林从那里赶了出去。当话题涉及到利用反舰导弹时，我由于年轻，没等别人说完就站起来说，现在还不能这样做。

斯大林仔细看着我，说：

“怎么，你们对此还没准备好吗？”

“不，”我回答，“已经准备好了，试验已经通过，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打断我的话，“谁也没有问你们。你们可以讲有关准备的情况，可以谈你们的导弹能击中还是不能击中目标，而用还是不用的问题不是你们那个级别的人的事。总之，这里已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出去吧……”

我们站起来走了。坦率地说，大家都心情沮丧。

其他情况我是从华西列夫斯基和我父亲处了解的。斯大林提议投入两个图—4空团。在中国已布署了几个伊尔—28团，因此，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作出决定吧。”斯大林提议说。

政治局立即一致表示同意。我父亲回忆说，布尔加宁比别人讲的都多，他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否则美军的登陆作战就无法阻止了。

这一切发展的结果是使一次局部战争升级为一场严重的武装冲突。起初斯大林并不感到可怕。他这样说：“没什么，让他们打，我们将来进行还击。”

当时我父亲提议说：

“不管怎样，让我们听听总参谋长的想法，他和国防部长的意见不一致。”

什捷缅科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致声称，如果我们攻击美国军舰，其后果不难预知。我父亲支持军人们的意见。

他们向斯大林报告说，防空部队目前拥有的设备甚至达不到

60%的把握可以击落美军飞机。他们向斯大林解释，我们的歼击航空兵可以在12000米的高空之内拦截美国轰炸机。但据现有资料表明，美国飞机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8000米。不排除有个别飞机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不可能形成密集攻击。

斯大林仔细听完军人们的结论之后便取消了投入两个空团的决定。

“事情这样是不行的！”他说，“把我们赶走的那几个小子找回来……”

一小时后又找到了我们。我们明白，既然找我们去见斯大林，说明问题严重了。

斯大林的第一个问题是：

“有人向我报告，说你们正在研制防空导弹？”

我说，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将自己的研究情况曾向部队打过报告，但他们对此不太感兴趣。

“谁已经有了这种导弹？”斯大林问。

“瑞士‘埃尔利孔’公司有，但射程很短。”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美军袭击莫斯科，你们的导弹能在12到16公里的高度击中目标，但能不能达到18公里的高度？”

“其潜在射程能达到25公里，”我汇报说。

“那好，贝利亚同志，”斯大林转向我的父亲，“请您安排这项工作，在现有集体的基础上，吸收武器装备部以及其他必要的部门参加。我们应在一年的时间内造出这种防空导弹。”

在这里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我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制造这种导弹是十分复杂的事。当时中央主席团成员、还有高级军事将领都在场。

我说完这话立即感到后悔。斯大林发火了：

“你要知道，我们政治局是不讨论简单问题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复杂问题。你们的任务不是议论，而是执行！

现在我就命令你们，"但他马上作了更正，"政治局作出决议，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制造出能掩护莫斯科的武器装备。"

马林科夫和我父亲受命起草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有关决议。

美军登陆作战按计划如期进行，众所周知，谁也未对其舰艇实施攻击。朝鲜战争在继续，而我们在按照命令做着我们的工作。

这一任务我们在一年内完成了，而且制造出来的不只是样品。苏联政府曾冒了这样的风险，并迫使我们接受这个风险：在进行研制的阶段(即在"地对空"导弹没有试验结果的情况下)就批量生产组合机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能再作任何修正。在我们进行第一次实战目标射击试验时，有近50家工厂已经开足马力生产导弹的发动机和构架。控制系统稍落后些，因为对其试验排在了最后。

与此同时，开始了环莫斯科防卫圈的建设。

试验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一枚导弹便在12—14公里的高度击落了全速飞行的米格—15飞机。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速度稍慢，这自然不能引起我们多大的兴趣。

但空军指挥部要求试验，所以还是起飞了几架配备干扰装置的大型图波列夫轰炸机。试验这样进行：机组人员将飞机升空，启动自动驾驶仪，然后在进入射击目标区之前跳伞。

拉沃奇金设计局订制的无人驾驶靶标未能及时完成，后来交付的时候，也是第一枚导弹一击即中。

斯大林很是满意，他赞不绝口，并许诺要奖励所有有功人员，但当即又表示：

"这还不够，你们要建一个环莫斯科防卫圈。"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还没有这样高的速度。实际上整个工业都在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一任务。有数万人参加了莫斯科防卫圈的建设工作。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不到30岁的

人，一连几周泡在试验场、前沿阵地、建筑工地，昼夜不停，24小时都成了实际工作日。

当军人们向斯大林汇报说系统已准备就绪时，他已经知道试验场中的试验结果。但他仍不满意。他把空军总司令叫去，命令他准备搞一次从3个不同方向至少要5架飞机同时起飞的行动。"我以后再告诉您，这些飞机具体从什么方向飞向莫斯科。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对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完成得怎样。"

我们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但军人们与我们不同，他们声称无法确保万无一失，因为未被完全击毁的飞机可能在莫斯科市区坠落。

该我们走了。我父亲后来对我讲，克里姆林宫就这一题目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辩论。大家反复向斯大林解释，甚至即使所有的目标全被击中，落到莫斯科郊区的飞机残骸仍会造成人员伤亡。他同意这一结论，但命令在试验场搞一次扇形防御模拟演习，让不同类型的飞机，以不同的高度和速度来自不同的方向。试验获得成功。作为主任设计师，如果是其他人，凭这一地位应该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但名单中没有列入我的名字。诚然，先前我已因制造反舰导弹获得了列宁勋章和斯大林奖金。

总之，当时实行工作奖励，参加实施课题的专家，在完成某项设计方案之后都要申报嘉奖。我的一大批同志当时都获得了英雄称号。

当我们制造了反舰导弹之后，由于我的坚决要求，飞行员阿诺欣和帕夫洛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阿梅特·汗·苏尔丹也是个优秀的试飞员，他在二战期间就已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他的战功簿上记有150次空战，击落30架德国飞机。这30架是他单独击落的，另外还有20架是和他人联合击落的。而他又是一个高水平的试飞员，他参加试飞的飞机超过100架。

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认为他应该第三次成为苏联英

雄。他对此当之无愧，这是无可争议的。遗憾的是，事与愿违，由于阿梅特·汗·苏尔丹是克里米亚鞑靼族人而被从名单中划掉了。

常言道，飞行员是天生的，这话说的就是苏尔丹这种人。二战前在航校毕业后，他当了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后逐渐升为分队长、大队长、团长助理。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歼击机飞行员。肩宽体壮，虎背熊腰，个子不高，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同样强健的神经。我想，仅仅是因为他出身的民族才影响了他没有在战争结束时第三次成为苏联英雄。战争结束后，不管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态度如何，他还是作为两次英雄称号的获得者而被军事学院录取。由于许多原因，他并没有开始他的学习生涯。或许是对那种不公正的待遇内心感到委屈，或许是另有原因，总之，他离开了军事学院。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们相识是后来的事。从部队转业后，苏尔丹进了航空工业部的试飞学院，我们就是在那里见的面。

我们需要挑选几个同意参加试验的人。我们的反舰导弹方案已经准备就绪，必须要有一个同样的，但由人工控制的这种炸弹，也就是说需要有一名试飞员来替代火箭中的发射装置。火箭悬挂在图—4 型飞机上，然后飞机起飞……

在克里米亚有一个带试验场的机场，是专为原子航空而建的。我们决定对其加以利用，只需将起降跑道向外拓展 5 公里就够了。

在向我们推荐的数十人当中我们选定了 4 个人。除了苏尔丹，我们还请到了谢尔盖·阿诺欣，他曾多年在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设计局工作，有着非凡的飞行嗅觉。在一次试飞当中，他应该在俯冲的时候毁掉飞机而跳伞。当时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他的飞行是震撼人心的。

顺便说一句，苏尔丹在试飞中也多次表现非凡。按照指示他应该跳伞(这样的事有过不止一次)，而他却冒着生命危险将几架飞机飞了回来，其中既有拉沃奇金设计的，也有米高扬设计的飞

机。

帕夫洛夫和布尔采夫也是优秀的试飞员。他们每个人在我们研制的设备上都作过30—35次飞行。极为危险，机降时速达400公里。

飞机起飞之后，我们的设备便与机体脱离，试飞员们将其对准舰靶，然后转弯返回，驶向跑道降落。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大，但苏尔丹、阿诺欣、帕夫洛夫和布尔采夫都心甘情愿冒这个险。当时他们确实帮了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大忙，我们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上百枚的导弹。

“彗星”试验使苏尔丹获得了列宁勋章和国家奖金。其他飞行员也成了国家奖金的获得者和英雄。以前曾经上报过授予阿诺欣英雄称号，但不知为什么未获批准。这次如愿以偿，我非常高兴：他们对这些奖励全都当之无愧。

对上校工程师斯捷潘涅茨和特罗菲莫夫的回忆也使我颇感温馨。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飞行员，或者是飞行的领导，在试验中我们大家共同分享了成功和失败。不言而喻，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在这里我只补充一点，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的忠实战友。

参加制造反舰导弹是我的第一项重大科研工作，因此，给我的记忆特别深刻。和我一起干的都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全身心投入，敢于做出大胆的技术决定，不为老的框框所左右。现在已经可以说了，当时苏联武装力量装备的这种导弹可以在100公里或更远的距离内击中任何海上目标。它既可以装核弹头，也可以装普通弹头。正是在那时，第一次开始不是由飞机专家，也不是由导弹专家，而是由我们这些无线电专家来决定苏联的武器面貌。这是一套头部可以自动制导的复杂的系统，并配有自动稳定装置。

后来我们开始制造“空对空”导弹。第一批弹头击中目标的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尔后又达到了30公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导弹不断完善，并投入了批量生产。但这已是别人做的工作了。

和自动装置有关的工作极有价值，无论是反舰导弹还是"空对空"、"地对空"导弹，这种自动装置都是必不可少的。稍后些时候，又参加制造射程为30公里的导弹，其高度要求是从5公里到25公里，后来又降到从5公里到1公里。当时的战斗机还不能低空飞行。目前的自动装置和控制系统可以保证在25至15米起伏的地面上空进行飞行。

我是所有这些系统的主任设计师，我领导了这些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这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在现代军事装备中，没有一件仪器是一个人制造的。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的时候，尽管我是刚刚被释放出狱，被列为普通工程师，但我是作为主要专家开展工作的……当时我们制造了从水面和水下发射的导弹，以及一大批变型品种。我还具体领导过一种舷式计算系统的研制。

1960年5月1日

在我们设计局制造的防空导弹的第一次战斗洗礼是在伊朗边境进行的。尔后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美国侦察飞机的战斗是旷日持久的。1960年5月1日，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侵入苏联领空，经过苏联秘密军事目标的上空，飞向乌拉尔。

沃罗诺夫少校炮营中首先进入战斗状态的是侦察和目标指示观测站的炮手们(他们是亚库什金中士、上等兵涅克拉索夫和哈巴尔金)。在飞机飞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防空兵总司令下令将其击毁。一架U—2型飞机就这样被击落了。

摘自沃罗诺夫少校的报告：

兹报告，您的关于消灭1960年5月1日侵入我国领空、破坏苏联国家边境飞机的命令已于莫斯科时间8时53分执行完毕。

在飞机进入火力区两万多米高空的时候发射了第一枚导弹，随着一声爆炸，目标被击毁。击中目标得力于各种仪器，而间隔不长时间，监视人员目视观测到了飞机残骸的下落和从被击落的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关于战斗结果我已按照命令写了报告，并采取措施拘禁了跳伞的飞行员。

1962年4月10日，在格林卡桥上，用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哈里·鲍威尔斯交换了苏联特工威廉·亨利霍维奇·费舍尔，他比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更为有名。于是，世界开始忘记那个不成功的飞机驾驶员，忘记1960年5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郊外天空中发生的一幕，最终也不会知道当时所发生的真实情况。

鲍威尔斯是稍后被击落的，而第一枚导弹击毁了我们自己的飞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牺牲了。

牺牲的飞行员的名字是萨夫罗诺夫上尉。很清楚，这一悲剧对于整个乌拉尔防空部队来说算不得什么秘密，但报界直到9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透露任何消息。这一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当时没有而当已广为人知的“敌我识别器”。

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关于嘉奖优秀导弹专家的命令中，第一个列入名单的就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萨夫罗诺夫上尉，这一报道刊登在1960年5月7日的中央各大报上。但秘密被保守了很长时间。

预备役上校米哈依尔·沃罗诺夫回忆说：

“我们营在1959年秋天收到了新型成套地空导弹。这次目标就在我们营的区域内。我发出口令：‘放！’瞄准官爱德华·费尔德勒柳姆愣在那里没有反应，显然是发生了某种心理障碍。我向他又喊一次：‘快放！’并且骂了句难听的话。这样导弹才向目标飞去。”

按专家们意见，谢尔盖·萨夫罗诺夫的悲剧飞行源于不必要的防护行动。与此相同，还有一架升空拦截的米格—19。但鲍里斯·艾瓦江却要幸运得多，当他发现有奇怪的云层时便急剧俯冲下来。

鲍威尔斯被击落了。在他之前有先行者，之后也有后继者。部分资料表明，在1960年5月1日之前美利坚合众国的飞机至少有17次侵入我国领空。后来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美国在波罗的海、巴伦支海空和南方的损失就足以说明问题。而且还有古巴、近东，都是美国的飞机……

就在最近知悉，苏联军人操纵的地空导弹曾使游弋在黎巴嫩海岸的美国第六舰队遭到重创。这一事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方都对外界严格保密。当时共击落8架舰载歼击机和轰炸机、1架“幻影—2”型飞机、4架以色列战斗机和两架法国“超军旗”舰载强击机。

地空火箭防空部队的历史还有待于专家去研究。到那时我们也许就会了解真相，究竟是何人付出的巨大努力、何人的劳动和才能造就了安全保卫祖国领空这么多年的第一批地空导弹成套设备。最好是能公开宣布这一新式武器发起者的名单。毫无疑问，这份名单中一定会有我父亲的名字，他是国防工业的行家里手，一位最优秀的组织者。

而在制造第一批海基弹道导弹的历史中又有多少“空白点”！由海军中校费多尔·科兹洛夫指挥的，北海舰队“布—67”号潜艇发射了世界首枚海洋弹道火箭，“布—62”潜艇的全体官兵参加了在太平洋上的演习，对这些情况我们知道多少？甚至最近首次刊登的事实明显不足的报道中也不免漏洞百出。公布海洋弹道火箭制造者名单的日子还没有到来？这说起来理由并不充分，其实是另有原因：历史学家们仍徘徊在陈规旧套之中。

我们再回想一下这段空白。第一次潜艇发射火箭与马克耶夫、谢米哈托夫、伊萨耶夫院士有最直接的关系。在最初阶段，我

和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同事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制造了全部海洋弹道火箭的控制和发射仪器。其后舰队所收到的火箭已经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而非液体燃料发动机，其有效射程可达一万公里。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水兵已经装备这种火箭。

在长达45年的科学活动中，我的确做了不少的工作。甚至在今天，我们都无法一一历数我们“彗星”研究所在宇宙勘探、通讯和其他许多特殊领域所完成的一系列科学工作。

要知道，在乌拉尔一切都不得不从零开始。没有一个像样的基地，需要我们自己来建设。但最主要的是，我周围的人都有着真诚工作的愿望。像在莫斯科一样，和我一起工作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从莫斯科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部分人都有固定的方向。后来我得以从乌拉尔大学数学力学系和物理系、乌拉尔工学院无线电系和自动化系以及其他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一些有才能的年轻人加入到我所领导的课题组来工作。

从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初的日子起，无论是邻居还是周围同事，都知道我是谁和出了什么事。我们当时住在工人区里。人们对我妈妈也怀着这种友好的态度。

我们在乌拉尔生活了10年。在押送我们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我们一次都没有遇到恐吓我们的事。对我改名换姓的解释是：“人们对贝利亚的看法怎样你们是知道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荒谬的。要知道，在当时当地有许多人因苏维埃政权而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们猜得到而且能够理解，一切并非都是官方宣传所说的那样。

我妈妈当时在工厂的实验室工作。一次晚班回家的路上遇到有人斗殴，这是工人区常有的事。这时立即有一个人走过来。

“我们认识您。您不要害怕，我们送您到住的地方。”他们把她送到了家门口。

这样的事能忘吗？

我们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只是因为医生警告我说，我妈妈必须改换气候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好的东西渐渐忘却，留下的只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便是这样的城市。

以谢米哈托夫为代表的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和工作中的大多数同事——米罗纽克、库普里亚诺夫、塔巴奇尼克、纳扎罗夫、拜科夫、特里福诺夫、拉米亚京和许多其他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我工作上的同事，同时也在生活中帮助我克服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我常常感觉到"制度"对我的压迫，这样的时候是有的。但我也经常得到来自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帮助。我不止一次感念苏联科学家和设计师们对我的好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无线电工业部长卡尔梅科夫以及其他重要的工业组织者给予我的帮助都是极为重要的。有一点很有意思，我时常会觉得比我父亲在世时做事更为方便。没必要为自己的固执己见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会以极强硬的态度要求必备的一切。从前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在许多涉及工作的问题上我几乎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我和乌斯季诺夫的友谊始于40年代末，他对我们单位的组建帮助很大。他是个妙趣横生的人，既是个工程师，又是一位组织者。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年龄差异，他的地位又很高，但仍然有许多东西把我们联系到一起。

年轻人愿意接近他，他也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他和科罗廖夫、切尔托克这样著名的科学家时而有"争吵"，和年轻人之间却从未发生过。他视科学青年为未来的支柱，这一点大概已能说明一切。

我在他成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和此前当中央书记的时候还不止一次见过面。我们一起到过火箭制造厂，他为研究一系列设计方案而几次叫我去莫斯科。当我们的情报机构报告说美国人在制造激光反火箭系统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的时候，我和一批科学

家被请到莫斯科，而我不得不在莫斯科呆上两个月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我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话题，但从未谈过我父亲的事。我时常觉得，他是非其所愿地有意避开这一题目。

在最后几次会面中，有一回我们谈到了他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伤心地说：

“怎样才能让他迷上技术？你考虑给他找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乌斯季诺夫之子负责的那个单位曾经是我们设计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非常不满意于近10年来国内形成的工作作风，也影响了小乌斯季诺夫。

“这不是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可以消磨时间，”乌斯季诺夫说，“应该让他一心钻研技术，干点实事！”

“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他去做，”我提议说，“研制坦克激光炮。”

遗憾的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父亲死后，他的儿子被迫离开了技术部门。这样的事有时也在所难免。

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本人因其弟弟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故不能和我直接见面，但通过其他人也竭力帮助过我。

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明茨院士在得知我需要通过副博士论文答辩时，对我什么话都没说，就自行申请，成了我的论文答辩评委之一，后来又坚决要求重新授予我科学博士学位。我还惊奇地得知，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明茨、拉斯普列京、贝格，曾向最高评审委员会请求恢复我的学位，因为剥夺我的学位是非法的。但是，不出所料，请求没有回音。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曾经决定作为在职学生参加考试以获得工程师证书。这个证书在被捕后没有还给我。我是作为挑战才采取这一措施的，但军事学院毕业证的副本还是交给了我。

万尼科夫、马赫涅夫、库尔恰托夫、晓尔金、图波列夫、科罗廖

夫、马克耶夫……三次和两次英雄称号获得者、院士、总设计师等等，这些与技术有关的任何一个人，这些响亮的名字会说明许多问题。而在经历了列福尔托沃和布特尔卡的牢狱生活之后，我的回忆都与这些人的会面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科学家和设计师，都曾尽其所能地支持过我。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期间，我不止一次发现，许多人只有在我确实有困难的时候才流露真情，伸出援助之手，而我父亲在世时他们便会袖手旁观，不愿让人感觉有谄谀拍马之嫌。

当然也有另一种人。那些人竭力避开我，尽管他们过去曾表现得完全不同。而我自己也尽量不使人为难。甚至在乌克兰工作时，我发现，对我的压迫往往也使许多人同我保持距离。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一位在我被捕前和我一起工作过的旧日同志发表过回忆录，从此以后我再未向他伸出过自己的手。我曾经请他到我们的设计局工作。我们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富有成果。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工作能力很强。但是，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实际上是肢解了我们单位，将其一分为五。我们的这位在此之前从未参与过阴谋诡计的同志，这次却与集体对着干起来。新的领导感到满意，这位设计师备受赏识。但是，时代在变。随着国家新领导的上台，他的这一高级职务也得换人。

一位科学院通迅院士，将军，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一个业务工作和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我读着他写的有关我和我的同志的一些无稽之谈，不禁想：这到底为了什么？

我忍无可忍，便拨通了长途电话：

“要知道，你写的关于我们大家的事都不是真的，你最好向我解释一下是为什么？”

“你明白，”他说，“这是我以前写的，是被强迫写的……”

“你自己知道，也强迫我提供证据，证明你们是破坏分子……

要知道，我没有提供。因此，恕我直言，你这是作孽。”

在多年的工作中，而我光在试验场就度过了几年的时光，通常我总能遇到一些十分出色的人。比如，我经常回想起炮兵元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库列绍夫。出于保密考虑，他甚至一度改名换姓叫谢尔盖耶夫。

摘自官方资料：

帕维尔·库列绍夫，炮兵元帅。

战时先后任著名的“卡秋莎”火箭炮团团长，西北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火箭炮部队作战部主任。从 1943 年起任红军火箭炮部队司令员。

战后担任炮兵学院火箭系主任、防空试验场主任、防空装备部队总司令、国防部火箭—火炮管理总局局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金获得者。

我们是在试验场认识的，当时正值我们和科罗廖夫设计局的工作人员一起作地空弹道火箭试验。记得朱可夫笑着讲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一段轶闻，说他战时想解散火箭炮部队，并将这一想法写信告知斯大林。我从库列绍夫处了解了有关细节。1943 年，时任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赫鲁晓夫确实将自己的建议写给了斯大林，其根据是：火箭炮不是有效武器。当然，赫鲁晓夫元帅的热情被浇了冷水。当他成为第一书记没人再能阻止他的时候，他便着手关闭飞机设计局、火炮设计局，把一切力量都转移到了火箭武器的研制方面。这是个好斗的才疏学浅的人！这样的人企图干涉军事，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可以说，以后的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举动同样没有远见。例如，我们研究所多年来一直研制防空电子设备，执行与宇航、海军有关的任务。但是，上边一声令下：转轨。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这是

后话。

请诸位回想一下前几年所发生的事。几十年一直生产火箭的工厂开始生产拖拉机，飞机制造企业转而制造锅炉，等等。不考虑企业的所长和专业特点。大家蜂拥而上，只顾眼前。

这一切都根源于党的机构没有能力将事业善始善终。对军转民的问题没有周密的考虑，只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和搞些实现不了的计划了事。而事业本身却遭受了损失。

我们在自己的研究所里开始仔细分析我们自身现有的能力，认清国民经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施展力量的地方。

乌克兰一年产多少粮食？几千万吨。而在加工和保存过程中要损失多少？官方资料显示是30%。这是不应该有的。为什么要发生这种情况？要知道，我们损失的数量就是我们以后要用外汇购买的数量。需要专业成套设备对粮食进行加工。很清楚，对于一生都在从事航天器材研究工作的专家们来说，这是个新领域。但是，他们完成了任务。这里不是发明自行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方，都存在类似的工艺，而我们的研究是以军用器材为基础的。

简言之，新工艺和传统工艺比较，可用节能原理，更自动化和生产效率更高，可保证生态平衡免遭破坏，能够节省生产用地，以较少的劳动力使产品质量获得明显提高。我们发现，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利用超高频能源是极有前途的发展方向。超高频电磁场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能够保障所需热量的充分供应。

我将不再用技术细节来烦各位读者，但您自己可以判断一下这一方法及其效能。能源消耗将降低一点五到两倍，劳动生产力提高3倍，而且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还能节省生产用地。

最为有趣的是，超高频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并未加以利用，尽管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和潜力。基辅“彗星”科学研究所全体员工联

合电子工业企业决定填补这一空白，已经研制出超高频能源的基础机件，其功率水平为10瓦到100千瓦。我们可以制造一至一百立方米的容积箱。干燥粮食设备的模型样机已通过试验认定。小麦或稻子、玉米或荞麦，什么农产品都一样，只要经过加工处理，其发酵率即可提高20%—30%。我们的设备以这种方式还可以加工蔬菜和水果。蔬菜在储存过程中损耗通常可达30%，新工艺却能达到无损耗存储。比如，葱经过这种加工处理后可保存两年而不变质。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这一产品很有竞争优势。在美国类似的设备要卖到10万美元，而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只及其1/15。

对事情理智务实态度的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国防企业的确能够而且也应该向国民经济提供许多东西。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现在我们国家所拥有的潜力而言，只要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专家们没有解决不了的课题。当然，我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研究所。比如，我们真切关心生态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动力耗费巨大的工艺和生产给这个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我们研究所研究制定了一个系统，可以有效获得污染状况的图表，既包括化工污染，同时也包括核辐射污染。

现在，我们正研究农村通讯系统，目的在于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而无需外汇支出。要知道，我国大约有8万个村庄完全没有通讯设施。

乌克兰内阁、机械制造和军转民工业部支持了我们。研究项目被列入民族工业转轨纲要，试验工厂已开始批量生产我们提出的配套机件。虽然不是时时处处都在明确执行民族工业转轨纲要，但很显然，在这样一种态势之下，“国防人员”必能为其自身的巨大潜能找到用武之地。

我目前的职务是乌克兰机械制造和军转民工业部“彗星”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和主任工程师。科研所的名称来自于50年代初，当时我和那些与我一样的年轻科学家一起全身心投入工作，制

造了第一批反舰导弹，其秘密代码为“彗星”。

五、在乌克兰工作和生活30年

我的生活与基辅相联已近30年。我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度过了10年的流放生活之后来到这里的。

这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细节。政府最终也没有把我在乌拉尔生活的那段时期正式定性为流放。但是，除此之外，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呆的那段时间又能被称作什么呢？我是被押送去的，他们并不掩饰对我这个列福尔托沃和布特尔卡原囚犯实行的长期监视。有一次我走到天天跟踪我的所谓“外勤”车跟前，开玩笑地向他们提议说：

“你们听着，我和你一起乘车是不是更方便些？这样我就不会在车站挨冻，而且还会省下车票钱？”

小伙子们丝毫没有惭愧之意：

“你就装作没看见，别让我们丢了饭碗……”

我们就此告别。到第二天早晨又相见。

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实针对我们的挑拨行为。向我们有系统地派遣各种各样的人，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10年的全面监视！来到乌拉尔三四年之后我们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请来车里亚宾斯克，届时有人等您，有非常重要的话对您说。要知道，我们是禁止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但我还是设法去了，但毫无结果。

事情是这样，有人在我们信箱中投进了一张我父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漫步的照片。他从未到过阿根廷。自然，这使妈妈非常激动。

总之，围绕这张神秘照片的故事完全可以写一部侦探小说。

又过了几个月，信箱中出现了一本《环球》杂志。您会看到，我

至今还保存着它……

但愿读者能相信我说的话:照片上是那位在 1953 年 12 月 23 日被枪毙的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他正和一位太太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背景上映出漂亮的总统官邸。可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从来就没有到过拉丁美洲,而照片上标明的日期是 1958 年。

贝利亚从照片上向外望着。数百万人都熟悉的很有特点的转头姿式,盖到眼睛上方的帽子。在 30—50 年代报纸的合订本中,这样的照片可以找到几千张。而这张照片的令人震惊之处是在其他方面:斯大林的一个亲密战友也拍在这个总统官邸的背景上。这是同一张照片。杂志中的文字说明指出:"在喧闹疯狂的阿根廷首都也有相对平静的角落,其中之一就是坐落着总统官邸的五月广场。"

这个谜直到 10 年之后仍在继续折磨着我。请您注意这张照片作者的名字——别萨拉博夫。最奇怪的是,甚至编辑部的人都没人能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妈妈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她震惊得喊出了声:"你父亲!"我难于判断,到底是谁和为什么需要造假,谁有能力伪造阿根廷作家阿尔弗雷德·瓦列拉笔记小说的插图?

可能有人想以这种方式指控我们偷越国境?这张照片所附的匿名信告知,在黑海岸边的阿纳克利亚将有个人等我们,他有"关于父亲非常重要的消息"。尽管不允许我们离去,妈妈还是在工厂办了医疗诊断,我安排她秘密飞到第比利斯。几天之后,妈妈来到指定地点,等了很久,但谁都没有来。

迁到基辅之后,我仍能充分体验到制度对我的压迫。在乌克兰工作的最初几年,监视一直没有中止,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样,不让我担任科技领导。我承认,虽说有人相助。事业本身要求我继续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表现开始有所改变,要求对要我负责的工作赋予形式上的权力。主任设计师的职务使我得以不是通过善意的同情者,而完全是通过内阁和各部机关的正规渠道办事。后来,我甚至参加了科学院的工作,得到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并成为一个重大项目的总设计师,可以说,这个项目与制造新式武器有关。

我和莫斯科来的同事们共同从事的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我只能透露一点,即这项工作与航天器有关),于是,我们决定在基辅设一个莫斯科研究所的分支机构。这样,几年前我便成了这个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坦率地说,无论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后来,我对行政工作一直不感兴趣。但有的时候又不得不权衡利弊。为了推行必要的技术政策必须实行一长制,技术问题不能用投票的方式解决。多年的经验使我坚信,各种假设和前提条件应当得到充分验证,而作出决定应该是那些对该项工作的最终结果负责的人。只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同意出任这一职务,解决了这一对我至关重要的问题。

完全可以设想,当时一切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在1954年年终的时候,当局完全可能作出其他决定,在恕我不死的同时剥夺我所热爱的工作。之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特别应该感激起而保护我的苏联科学家们。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述及。显然,政治局不得不同意他们的论据。而且我推想,处于权力巅峰上的那些人们一定会这样推论:其实他能怎样?被剥夺了一切,就让他尝试着在一生中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吧……

我认为,剥夺了一个人的头衔、职位,这还不能算是全部。我不想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当我年轻的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受到嘉奖而却与我无缘,这些都曾深深刺痛过我。我不隐瞒,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想隐瞒的事实还有,我曾有多次机会离开国家,早些时候

和最近时期都有。但是，我只要这样做，就是背叛我父亲的在天之灵。我从来就没把党的上层和我终生服务的国家等同视之。总之，其他人那么轻松地走出的这一步，对我却不适用。

摘自《纽约时报》：

苏联领导人的儿子谢尔盖·尼基托维奇·赫鲁晓夫走进罗得州普罗维登斯市移民局的小楼，当他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他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长住合法居民。在苏联共产党倒台16个月之后，已成为政治学家的57岁工程师和他的妻子瓦连金娜就一直等待发给外国人的居住证。不久前记者在罗得州克兰斯顿他的家中采访了他。他说，他决定获得在美利坚合众国的长期居住权是“因为在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都比较轻松。我在莫斯科还有一套住宅。那里我还有一幢别墅，有一片树林和池塘，还有个小养鱼池。”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解除领导职务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苏联政府一直不批准他的儿子出国。

对其他人如此轻松的一步却与我无缘。我拒绝了所有去美国、英国的邀请，他们答应在那里为我安排好一切工作条件。

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曾几次将我作为鉴定美国激光宇航器材料的专家从基辅请到莫斯科。在一次会面当中，这位苏联特工机构头子、未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我——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儿子有过一次谈话。

我们谈到了事业，谈到苏联情报机构掌握的有关材料，但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说，他认为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您误会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回答说，“无论是调查我的案件而将我关在狱中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对事件的看法。我也从未拒绝承认，而且永远不会拒绝承认自己

的父亲。我认为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是被党的权势份子杀害的。我对此没有大喊大叫，并不表明我已相信了那些杀害他的凶手们所编造的一切。"

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完我说的话，低下了眼睛，半晌一言不发。

"不管怎么说，我赞成你这种做法……"

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面。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是苏维埃政权所有过的最聪明的国家首脑之一。我当然不能赞赏他1956年在匈牙利与异端思想斗争的做法。只要回想一下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中他们的所做所为就足以说明一切。当时他是苏联特命全权特使，枪杀了与赫鲁晓夫和党的上层持不同政见的匈牙利人士。这笔血债谁来负责？当然不是安德罗波夫下的命令，但他是执行者。后来，在清除了谢米恰斯内之后，他被任命为克格勃的主席。这说明，他是个与制度配合默契的人。但从个性上来说，他长于分析问题，知道这一制度需要加固。有我父亲的前车之鉴，他采取了修修补补的办法，而不去触动党的权势分子的利益。但这同样又是一个错误，改变制度不改变其主要方面是不可能的。

这一制度也干涉人的私生活。

释放出狱之后我和妻子一起生活了几年。遗憾的是，迫害中伤一刻不止。我总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好些，但无所改变，一如既往。于是，为了孩子我们决定假离婚，说好等他们长大成人都能自立的时候，我们再生活在一起。但这仍然于事无补……

马尔法·马克西莫夫娜·佩什科娃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和她的关系一直很好。她现在住在莫斯科，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是高级研究员。她经常来基辅看我们。

儿子谢尔盖和我一起生活。他娶了个乌克兰姑娘，是个很出色的姑娘。警惕性极高的人曾经极力阻止他成为一名大学生，谢米恰斯内当时就干涉过。他被解除苏联克格勃主席职务之后担任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是的，我儿子也很有个性，他进了另一所大学。如今他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研究无线电电子学。

大女儿尼娜毕业于斯特罗甘诺夫专科学校和芬兰艺术学院。她未来的丈夫曾在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我一直认为他是爱沙尼亚人。后来承认，他是芬兰人。我无可奈何地笑着说："这正是我们家所不能办到的！"但她的离境被批准了。

小女儿娜佳住在莫斯科，是位艺术理论家。孙子们都正在长大。

摘自"贝利亚案件"材料：

"法庭查明，还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贝利亚便已开始从事叛国犯罪活动，并与外国情报机构建立秘密联系……最近几年直到被捕，贝利亚和外国情报机构一直保持并不断扩大秘密联系。多年来，贝利亚及其同伙小心谨慎地掩饰和伪装自己的敌对活动……所有被告犯罪证据确凿……都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叛国罪……查明被告贝利亚犯有叛国罪，为夺取政权和恢复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反苏维埃阴谋集团罪，对忠于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实行恐怖活动罪，积极反对革命工人运动罪……对其判处极刑——枪毙，并没收其个人财产，剥夺其军衔和各种嘉奖。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六、对贝利亚被害问题的思考

历史是不能假定的，但我们仍然不妨设想贝利亚最后决定取得政权，并使那个不幸的国家有所改变。谁会成为新国家首脑的反对派？而谁又会是他的追随者？

对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支持自然不能算数……我想，追随他的会有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会有什捷缅科将军

和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他们手中有军队，因此实力雄厚。我不知道内务部队的立场，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就是我父亲没准备夺权。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内权力宝座的竞争者大有人在，后来的事态发展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党的机构与我父亲的立场是对立的。我曾经读过一位在苏共中央工作了30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发表在《论据与事实》报上的一篇日记。

> “斯大林死后，我们大家都感到恐惧，”这位“党的战士”承认道：“千万不要让贝利亚上台，如果他上台，他首先就会取消党的机关……”

我重申，我父亲不想当独裁者。但是，机关权势分子的自卫本能向来极为发达。如果当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成员支持他，无疑会拉开改革的序幕，而党的大批干部也会害怕这些改革。

哪怕只有下面这一个理由，我父亲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了这么多年之后再来第二个格鲁吉亚人……这，在这个国家最起码是不严肃的。

完全可以理解，我对所有这一切想了很多，也曾和能够对我父亲死亡之谜透露一丝线索的人会过面。而且确实有所收获。我已经说过我曾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见过几面，而且还应该再有一次谈话的机会。元帅特别想见我，可能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我们没有见成面……是有人完全有意不让我去见朱可夫，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话：“如果你父亲活着的话，我就会和他在一起的……”

1958年我见过当时的法官之一什维尔尼克。他女儿搞无线电技术研究，我们也因此而相识。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一点，就是我没见到过你活着的父亲。你能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说更多。

另一法官米哈依洛夫，当我与他在其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见面时，他也让我明白，当时法庭里坐着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但他不能就此话题再说什么。

为什么多年以后赫鲁晓夫要写便条给我母亲，并寻找和她见面的机会？后来米高扬为什么也有两次这样的举动？为什么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无论向我还是向我母亲都没有出示过哪怕一份有我父亲签字的审讯笔录？

为什么要处死我父亲，这对我来说并不是秘密。我父亲以为他是在同政治活动家们打交道，所以向战友们提议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者哪怕是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届时可以讨论讨论人们期待已久的话题。我父亲认为，国家所有的领导人都应该坦诚地讲出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切，讲出自己在大规模镇压时期的所做所为。我记得，在他死前不久在家中谈到这一点时，妈妈曾警告他说：

"考虑一下，拉夫连季，这是你的尽头。你这样做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无论是妈妈还是我们大家，当时都没能想到这一切会使我们的家庭变成什么样子。妈妈说尽头是指他父亲的政治生涯的尽头，没有更多含义。"战友们"却走得更远。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以及其他的人，对这种情况确实有惧怕之处。

我深信，民族出身这张牌当时也起了作用。我父亲也是因这一特征而被当成"替罪羊"的，将对共产主义制度下数百万无辜牺牲者的镇压这笔帐都记在了他的头上。

"甚至当我们在审判贝利亚之后已经了解了许多情况的时候，我们对党和人民还是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将一切都算在了贝利亚的头上。对我们来说他是个合适的人物，于是为了开脱斯大林的罪责，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在这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显然更为坦率些……

我已经期待多年，现在依然在期待档案终于会得到公开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谁是大规模镇压的罪人就会真相大白。别的不敢说，在苏联，档案工作永远都是上乘的。甚至在按照赫鲁晓夫的旨意进行“清理”之后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苏联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还是留下来了。

摘自《共青团真理报》(1993年6月18日)：

“……我们对过去所知的一切并非全都名实相符。例如，甚至像贝利亚这个妇孺皆知的恶棍的情况都是如此。不久前，俄罗斯档案馆主任管理员鲁道夫·皮霍亚根据其所读过的文件声称，斯大林时期实行镇压的关键人物不是贝利亚，而是马林科夫。”

然而，40年来，在数百万人的概念中，贝利亚一身集中了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全部罪恶，那个“妇孺皆知的恶棍”的形象就是党的宣传机构有意塑造的。

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不久前指出：有关贝利亚的文章既可说汗牛充栋，也可说什么都没有写。很难不同意这一看法。臆测和公开的流言蜚语实在不能算数。难道我们大家真的如此天真，以致至今仍害怕承认，在当时的1953年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党的上层只不过是迫害了一位始终如一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家，而把极权主义制度的全部罪恶几乎全算在了被害者的身上？我父亲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既不是英国特务，也不是大规模镇压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包括“伟大的改革家”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在内的刽子手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

有充分理由认为，有意识地欺骗苏联人民的不只是党和国家

的所有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在福罗斯的“不屈不挠的”被软禁者①。今天在俄罗斯，某些政治集团对保守原苏联的国家机密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否则，所谓的“贝利亚案件”就不会直到今天仍然讳莫如深。这究竟是为什么？不过，这又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我着手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赶今天的行情，而是为了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对我的观点同意与否是读者的权利，我仅建议各位思考一下所读过的内容。

是的，我父亲时常犯错误，但他对他所效命的国家是忠诚的。正是他贝利亚，是苏联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位始终不渝地公开主张释放所有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的数百万无辜者，并为他们彻底平反。正是他，也是中央主席团中惟一的一位委员，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由克林姆林宫的全体领导人向大会全面报告所做的一切。党的上层作出的回答就是杀害了他。同样可怕的是，在我父亲惨死之后还让谎言的浊流伴随他的名字达几十年之久。

贤明的政治活动家、优秀的分析家、出色的组织者、聪明而又有才能的人，显然是进不了毫无原则的克林姆林宫活动家们的班子的，这些人在自己的主子故世后为争夺他留下的遗产而争斗不已。鲜明的个性和只知争权夺利的愚昧无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父亲在1953年的时候是否明白这一点呢？难道他真的相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会承认自己的罪行？或者他自己准备在党代会上讲述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行为？看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手中掌握的档案使党的上层分子感到如此恐慌不安，那并不是偶然的……

谁能知道，如果在搞大规模镇压问题上有罪的赫鲁晓夫和他

① 此处是指戈尔巴乔夫。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变时，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边上的休假地福罗斯休假，被软禁在那里。——译注

周围亲近的人以及新上台的党的领导人不搞政治谋害的话，苏联国家的历史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这次机遇过了许多年之后却变成了一场平庸无能的、惨遭失败的改革。要知道，不管怎样，生活本身证明了我父亲的正确，但是为此却耗费了多少年，进行了多少次的试验，而且后来就连这个曾经是强大的国家也消失了……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也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论断：我父亲所热衷于改造的那个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注定是要失败的。也许，他错就错在这里。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和英雄人物。也许，在当时，在1953年的春天，我父亲本来就做了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向制度提出挑战，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向人民负责。无论是在他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在克林姆林宫里都从未这样做过，而向全世界广为宣布的改革到头来只不过是他在“历史性的”1985年全会[①]之前30年就已提出的一些思想的不成功的实现而已。其实，党的权势分子从来都没有忘记，所谓新事物只不过是已被遗忘的旧东西罢了……

我敢预言：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所写的关于我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他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族的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生的苏联时代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我们坚信，一定会是这样的。历史是可以重写的，这样的事例已有过不止一次，无论是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莫不如此。想一劳永逸地使人民丧失历史的记忆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多种神话，甚至是上升为国家机密的神话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

① 系指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于1985年4月召开的宣布苏联开始实行改革的苏共中央全会。——译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我的父亲贝利亚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１
作者＝
页数＝４６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